

# 季风：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 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

【美】罗伯特·D.卡普兰 / 著

Robert D. Kaplan

吴兆礼 毛悦 / 译



美国版的世界地图总是将西半球置于中上方，而印度洋几乎消失殆尽，这间接反映了西半球在已经远去的20世纪是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事实。然而到了21世纪，这一切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部深度审视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阿曼、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力作中，卡普兰向我们展示了活力四溢的“季风亚洲”对美国权力的未来至关重要。

从非洲之角到印尼群岛以及这片辽阔海域的其他广大沿岸地区，卡普兰用游历的足迹和寻访的热情向我们展示了人口、气候、宗教和政治对这片动荡地带的的影响，预言了如果美国希冀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占据应有之地，季风亚洲，必将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通过对在未来数十年内重要性日益增长的神秘地区的全面叙述，卡普兰巧妙地将历史、纪实性报导和大战略融汇为一幅恢弘的画卷。”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丰富的游记亲历，简洁的历史素描以及广泛的战略分析，一种匠心独具的融合。”

——《纽约时报书评》

“没有哪些书是不可或缺的，但《季风》是个例外……这是一部关于新世纪全球政治演进的力作。”

——《达拉斯晨报》

“令人信服……阅历与学识，成就了卡普兰的非凡洞察力。”

——《华盛顿邮报》

“卡普兰，极具洞悉地缘政治的天赋。”

——《华尔街日报》

ISBN 978-7-5097-4386-7



9 787509 743867 >

ISBN 978-7-5097-4386-7

定价 49.00 元

3A设计艺术工作室

010-59367103

装帧设计 / 宋 涛

www.ssap.com.cn



施己之善得，回向于智慧。  
出书犹如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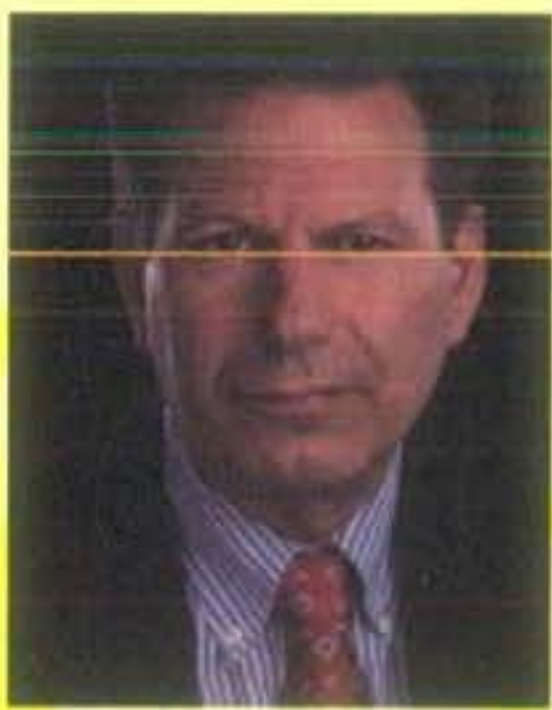
WISDOM OF  
TRANSFERENCE

【回向恒品】  
策划

微博关注：

<http://weibo.com/transferences>

<http://weibo.cn/transferences> (手机版)



摄影：Maryna Marston

**罗伯特·D.卡普兰**  
( Robert D. Kaplan )

1952年6月23日生于纽约，美国知名“鹰派”战略学者。2009年被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任命为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现为《大西洋月刊》记者，其作品广泛见于《国家利益》《外交事务》《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新合众国报》《华尔街日报》等报纸刊物。

卡普兰长期担任美国军方顾问，包括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此外，他还在军事战争学院（Military War College）授课，并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CIA等机构进行了大量的演讲。近年来，卡普兰关于美国权力属性的一系列颇具争议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高层的争论。《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便是一例，其关于“印度洋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中心”的观点在美国激起了广泛的讨论。



# 季风：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 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

丛

译

略

战

洋

海

【美】罗伯特·D. 卡普兰 / 著

Robert D. Kaplan

吴兆礼 毛悦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by ROBERT D. KAPLAN**

Copyright: ©2010 BY ROBERT D. KAPL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 《海洋战略译丛》 总序

张蕴岭\*

地球的70%被海洋覆盖，海洋对于人类之意义无需赘述。海洋不像陆地那样被山川河流分割，被国界隔离，它是一个互通的整体，应该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资产和共同享有的资源。

尽管海洋早被人类加以利用（比如捕鱼，取盐），但是它的巨大价值真正被认识还是始于现代工业文明。无垠的海洋是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它有多大，它的彼岸到底是什么。现代工业则提供了用于制造大型船舶的技术和材料，这使得人能够在海上进行远航，而正是全球远航才让人发现了新大陆。于是，海洋也就成为沟通世界的最便利的大通道。有了这样的大通道，意味着谁掌握了制造大船的技术、拥有从事远洋航行的能力，谁就可以具备开发和利用海洋致富的手段。于是，海洋提供的便利，很快被那些拥有优势的国家大加利用，成为他们掠夺财富、抢占地盘、扩展殖民，甚至称霸世界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19世纪末，美国军事家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

---

\* 序言作者为第10、11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权论，认为海上综合实力决定国家兴衰，要使国家强大，必要拥有海上霸权。马汉的理论被认为是经典，至今仍有影响。鉴于此，围绕海权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止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海洋成为了角逐的战场，海洋被强势霸占或瓜分。

不过，事实也表明，要获得，特别是能维持在海洋上的霸权并非易事。历史上，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英的帝国舰队，都曾称霸一时，最终也都成为过去时。如今，只有美国还维持着二战以后确立的海洋霸权地位，几大舰队仍能在海洋上耀武扬威。不过，维持这样的海洋霸权美国已显底气不足，政府的财政赤字飙升，美元信誉下降，削减赤字的压力增大，军费预算不得不大幅度缩减，总有一天，也会发现其霸权难以为继。

海洋的价值新近被发现和利用是其拥有的丰富资源——油、气、矿产和其他可资利用的资源。许多沿海国家因发现大型海上油气田而财富剧增，尤其是当陆地可用资源几近枯竭时，海底蕴藏的矿产资源提供了诱人的前景。于是，围绕海上资源占有、开发和利用的争斗也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甚至成为发生冲突的火种。

其实，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还有海洋的另一面，即海洋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这是人类活动，尤其是现代工业化发展的后果。海洋成了最方便的污水排放处，大量有毒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向海洋，使很多海域成为没有海洋生物的“死水”，蓝色的海洋变红（红潮），还有大量的废物集聚成一个个“垃圾岛”在海洋上漂流……

海洋呼唤维护，海洋呼唤管理，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第一个这样的法规，已有70多个国家签字，被认为是创建海洋新秩序的开始。这个公约的本意是化解有关国家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矛盾，



通过分责管理优化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然而，出于复杂的历史、地缘和现实原因，它反而成为加剧相关国家发生冲突的因素，比如，专属经济区给定沿海国家200~300海里的管理海域，但由于专属经济区的界定原则模糊、范围重叠、权利和义务不够明晰，无论是在划定上，还是在管理上，都引发了新的矛盾，一些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存在划界冲突的情况下，自行圈定范围，进行管辖，从而引起矛盾和冲突，有的海洋大国，像美国，甚至不签署公约，也即不承认它的法律效力，我行我素，……

人类因争夺陆地（包括划定国界、扩充领土）发生了无数次战争，生灵涂炭，为争夺霸权和资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人类的悲哀。如今，对海洋的争夺和破坏似有加剧之势，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中国是一个基陆接海的大国，既有广袤的陆地，也有很长的海岸线，沿海居民靠海吃海，重视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据考证，早在隋唐时代，中国人就开始扬帆出海，与邻国开展海上贸易。元朝时期，中国已经与上百个国家通商，许多都通过海上的通道进行。特别是明朝时期，郑和指挥船队七下西洋，船队之大，航程之远，无与伦比，远早于麦哲伦、哥伦布的远航探险之行。不过，与那些以探宝、抢财、殖民的欧洲航海家不同，郑和的船队出航是为了互通有无、弘扬国威，因此，在沿海受到来自海上倭寇的骚扰之后，明朝竟以禁海加以应对，这说明了以大陆为根基、基于大陆文化战略思维的中国，并没有把海洋作为强国富民的主要资源来看待。

相反，海洋留给中国的多是恐惧。据解，“海”这个字本身的构成就含有“可怕”之意，是“水”与“晦”的合体。尽管这可能是一家之言，为咬文嚼字的意解，但是，仅从近代的历史来看，海洋为中国带来的灾祸却是历历在目的。1840年的鸦片



战争，就是西方列强利用海洋进犯中国，从北到南，沿着海岸线，一路打杀，撬开了中国的一个个关守，迫使清政府签订开放口岸的条约，让列强在中国获得了各种特权和治外法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大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中国从此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如今，尽管中国的实力大增，捍卫国家安全的能力大大提高，但是，东海、南海的安全威胁仍然居于高位，中国感到的战略压制也主要来自海上。

不过，现代中国对海洋的认识还是有了重大的转变。其一，中国的现代化经济起步于沿海地区。国家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主动打开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加工出口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进口大幅度增加，海上航线成为中国连接世界市场的主要渠道，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海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在此情况下，不断提升海运能力，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等，都必然成为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其二，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传统的“地大物博”架构发生逆转，海洋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其中，最重要的是海上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这些资源一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通过贸易交换或者投资开发取得；二是来自近海，尤其是属于中国可资利用的专属经济区。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中国形成了一浪超过一浪的“海洋热”，各种各样的文章、专著铺天盖地，对中国的海洋战略研究也由冷变热，似乎成为一种“显学”。

当然，海洋意识增强的不仅是中国，其他临海国家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这也引起了围绕海洋资源、专属经济区、海岛主权归属等的争端大大升温。中国与许多国家接海为邻，存在



岛屿归属与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本来，出于维护国家间关系与地区安定的大局，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也曾得到相关国家的基本认同。但是，在中国实力提升、海洋意识增强的形势下，争议变得难以搁置，联合开发更难加以推行。争端升温、冲突升级，不仅损害了国家间的关系和地区的安定，而且也增大了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还有，它也引起了其他大国（其中主要是海洋霸权国家美国）趁火打劫、直接介入。面对与相关国家海洋争端的升温，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海上战略遏制，一些国人惊呼，中国面临新的“海洋包围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倒是比较好理解，因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加大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力度，不会容许外强侵犯中国的海洋权益或者利用海洋侵害国家的安全。但是，对于“建设海洋强国”，仍需要细细斟酌，准确定位，明晰战略和政策。

什么是“海洋强国”？目前各种解读都有。比如，有的认为，“海洋强国”是中国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几千年来，受陆地中心文化的影响，海洋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如今，中国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是对海洋重要性的高度肯定，把海洋的重要性与国家的强大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有的提出，“海洋强国”是一个全面发展战略，内涵是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技，优化海洋生态环境，加强海防力量。还有的提出，向海洋进军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竞争的焦点，也是世界新一轮空间挤占、资源争夺、战略要地控制的主战场，为此，中国要扩大管辖海域，维护中国在全球的海洋权益。国外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非常关注，也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



这是中国向海洋进军的信号，是要在争端中采取强硬的立场，与美国争夺海上霸权；也有的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与美国争霸的海洋强国路途还长，作为海洋强国的身份尚不明确，还有待观察。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依靠开放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中国重视海洋，提出新的海洋战略是理所当然的。如今，中国不需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围绕中国是走“蓝色文明”（代表海洋意识，开放文化）还是“黄色文明”（代表大陆意识，保守文化）之路进行争辩，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融入了世界。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不是要获取霸权，而是要确立她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让其人民获得应享的福祉。中国一再宣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争霸，也不称霸。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只是其新形势下实现民族复兴全面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总体来看，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型大国，不会只重视海洋、看轻大陆，必然会实行陆海均衡的发展战略。

张洁博士牵头翻译出版了这一套海洋研究丛书，出于对我的信赖，要我为丛书写一个序言。我是这个领域的门外汉，不过，鉴于她一再坚持，盛情难却，我也只好答应了。海洋问题如同海洋本身那样宽阔无边，深奥难解，我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素养，不敢探究，想来想去，只是写下了一些想法，算是表明我对这套丛书给予的支持和期待吧。





前 言 欧亚大陆之边缘地带 / 001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中国纵向扩张，印度横向扩张 / 003

**第二部分**

第二章 无处不在的阿曼 / 023

第三章 寇松的边疆线 / 037

第四章 “印度这片土地” / 055

第五章 俾路支和信德 / 081

第六章 古吉拉特令人担忧的崛起 / 119

第七章 德里观点 / 150

第八章 孟加拉国：关于存在的挑战 / 171

第九章 加尔各答——下一个全球性城市 / 194

第十章 谋与美 / 227

第十一章 斯里兰卡：新地缘政治 / 241

第十二章 缅甸：印度与中国碰撞的地方 / 267

第十三章 印度尼西亚的热带伊斯兰教 / 299

第十四章 海上亚洲的中心 / 323

**第三部分**

第十五章 中国的两洋战略？ / 343

第十六章 和谐与混乱 / 363

第十七章 桑给巴尔：最后的前沿 / 379

后 记 后帝国主义秩序与印度洋 / 400

致 谢 / 407

译者的话 / 410

CONTENTS

目 录





# 前 言

## 欧亚大陆之边缘地带

欧洲图志勾勒出 20 世纪的世界格局轮廓：从佛兰德斯战场（Flanders Fields）<sup>①</sup>到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sup>②</sup>，从柏林墙到科索沃烧毁的村庄，从 1914 年持续至 1989 年的漫长欧战到其后的血腥战争余波——欧洲始终是世界中心。诚然，具有重大影响趋势与事件也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发生。然而，从古代世界帝国的瓦解到美苏之间的两极争霸，大国政治与欧洲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密切。

我的结论是，如同欧洲勾勒出了 20 世纪的世界格局轮廓一样，大印度洋——西起非洲好望角，途经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一路向东延伸至印度尼西亚群岛——可能构成对新世纪来说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格局图景。令人期待的是，21 世纪不会像 20 世纪那样充斥着暴力，但是 21 世纪与 20 世纪相似，依

---

① 佛兰德斯位于欧洲西北部，包括今天的比利时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荷兰的泽兰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佛兰德斯由于地处欧洲北海地区的要冲，成为欧洲的主要战场之一。——译者注。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诺曼底登陆地点之一。——译者注。



然存在一个可以辨识的地理范畴。在这片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一个从未远离中国视野的中世纪穆斯林社会的沿海区域 (maritime oikoumene)——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紧张对话,世界能源运输路线的中枢,以及印度和中国在海洋和陆地上势不可当地悄然崛起。美国全神贯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其总的影晌是加速了亚洲世纪的来临,无论是从众所周知的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

最近,棘手的陆战阻碍了我们对海洋和海岸线重要性的认知。海洋和海岸线是贸易和人类居住的主要场所,因此与过去一样,未来的军事行动与经济活动将极有可能发生在这些区域。正是在沿海地区,全球性的问题——诸如人口增长、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淡水短缺,以及受上述各种因素影响的极端主义政治——具有了鲜明的地理特征。英国已故历史学家博克舍 (C. R. Boxer) 认为,处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交汇地带的季风亚洲,在地理上和战略上将成为 21 世纪的中心。<sup>①</sup>

500 年前,达·伽马勇敢地面对暴风雨和坏血病,绕行非洲大陆一周,然后横渡印度洋,来到南亚次大陆。16 世纪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瓦斯·德·卡默斯描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这是那片你梦寐以求的土地,  
印度展现在你的眼前……<sup>②</sup>

达·伽马到达印度,开启了西方在亚洲快速推进的历史进程。

---

①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 - 1825* (London: Hutchinson, 1969), p. 65.

② Luiz Vaz de Camoes, *The Lusiads*, transl. Landeg White (1572;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nto Six: 93

葡萄牙的海上霸权最终让位于其他西方列强——荷兰、法国、英国以及美国，依次称霸亚洲。现在，在中国和印度争夺欧亚边缘地带南部一线的港口和运输路线，以及美国海军未来的实力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由于美国的经济问题及其陆战军事开支的影响，维持了500年的西方优势有可能已经慢慢地走向终结。

与印度洋的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相毗邻的陆地——阿拉伯海的北部是巴基斯坦，孟加拉湾的北部是缅甸，两个国家都极度不稳定，又是人口密集的关键地区——还处于非常动荡的时刻，因此这种逐步的力量转移是不可能发生的。分析家通常不会把巴基斯坦和缅甸归于一类，但是事实上它们应该属于同类。当然，我们还要考虑从索马里到印度尼西亚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未来。除了这些地方都接近印度洋外，它们还有共同的特点：脆弱的制度体系，极差的基础设施，受极端主义诱惑而难以驾驭的年轻的民众。然而，与西方毫无生气的老龄社会相比，他们就是未来。

就像已故比利时学者查尔斯·费尔林敦(Charles Verlinden)曾经谈到的，印度洋南北纵深达80多个纬度，东西跨越100多个经度，“至少被37个国家环绕，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sup>①</sup>我只能拜访印度洋沿岸的几处地方，经历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进一步阐述更广阔领域的图景，以此展示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印度洋地区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理区域，它还是一种印象(idea)，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深刻而形象的关于伊斯兰教的影像，并且将伊斯兰教这个中心与全球能源政治和世界海军的重

---

<sup>①</sup> Charles Verlinden, "The Indian Ocean: The Ancient Period and the Middle Ages," in Satish Chandra,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 (New Delhi: Sage, 1987), p. 27



要性结合起来,以此向我们展示一个多层次、多极化的世界,这要远远多于媒体上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头条新闻所传递的信息;印度洋也是一种观念(idea),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在新奇而又古老的框架下用其独有的传统和特色看问题,而不致陷入全球化这一枯燥却又被视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的思想体系中。

本书以粗略介绍该地区的战略概况开始,随后描述这条漫长海岸线上的特定地区。阿曼是我主要的参照点,在阿曼这一章,我主要考察印度洋的中世纪历史以及第一个西方列强葡萄牙人留下的遗产;在这一章,我也思考海洋和沙漠之间长期以来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导向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然后,我关注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地方分离主义运动的核心地带以及斯里兰卡种族对立的核心地区投资的大型港口建设项目。在孟加拉国这一章,我描述了气候变化、极度贫困和伊斯兰激进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印度,我关注的是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压倒的印度教极端主义;在缅甸这一章,我叙述了印度和中国为争夺荒芜但资源丰富的土地而发生的碰撞,以及这种冲突给诸如美国等西方大国带来的挑战;在印度尼西亚这一章,我探究民主与活力四射的和谐的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这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就我在这里很多地方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人们会结合特定地区的背景和历史,对伊斯兰教进行更加理智的思考和判断。最后,我关注发生在印度洋东端的中国海军扩张,并通过桑给巴尔这个棱镜,捎带介绍一下印度洋西端的非洲复兴。每一处地方,我都试图描述这里不曾停止的历史变化,因为它们塑造了新世纪的轮廓。正是每个地方所面临的多重挑战——宗教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环境的挑战——的相互交织渗透而不是孤立的单一挑战,引发了这样的戏剧性变化。

我所说的季风并不仅仅是一种暴风雨系(storm system)(英语

词典有时会这样解释),同时它也是生活的正能量(life-affirming)和有益的气候现象,它对于几个世纪以来的贸易、全球化、协调和进步来说不可或缺。季风是自然界中一种特有的气流,它使人联想到自然环境对那些生态环境脆弱并日益拥挤的人类生活的影响,像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美国把握季风所代表的含义、认清季风隐含的多重意义的能力,将有助于决定其自身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命运。因此,印度洋可能成为深入思考美国权力未来的关键区域。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中国纵向扩张，印度横向扩张





## 第一章

# 中国纵向扩张，印度横向扩张

在阿拉伯人古老的航海文献中，他们把印度洋叫作 *Al Bahr al Hindi*。印度洋及其支流保留着伟大的伊斯兰教信仰传播浪潮的痕迹，这一宗教传播活动自红海的宗教发源地开始，跨越遥远的距离，到达印度，然后传播至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所以，详细地描述这些海域的发展对历史地理解伊斯兰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地理区域自西向东包括红海、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爪哇岛和南中国海。现今，这里有饱受暴力和饥荒折磨的非洲好望角国家，有面临地缘政治挑战的伊拉克和伊朗，有具有分裂倾向的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巴基斯坦，有经济上迅速崛起的印度和动荡不安的邻国斯里兰卡与孟加拉国，有专制统治下的缅甸（在这里隐约出现中国和印度竞争对抗的局面），还有泰国——中国和日本可能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候为建设通过这里的运河提供资金，此举可能以有利于中日的方式影响亚洲的力量平衡。事实上，运河项目只是若干个规划项目中的一个，其他的还包括大陆桥和输油管道，这些规划旨在连接印度洋和西太平洋。



在印度洋西海岸，有正在崛起但却动荡的东非民主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下的索马里；在距印度洋西海岸约 4000 英里的东海岸，有变化中的呈现后原教旨主义（post fundamentalist）面孔的印度尼西亚，它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任何可以设想的图景能够像印度洋的那样，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个无疆界世界的实质：一方面是文明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却是含混不清的要求世界团结一致的渴望。

与陆地不同，水域实际上不会留下历史的踪迹和信息。但是，用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嘉塔·柏瑟（Sugata Bose）的话来说，海面上来来往往的各项活动使海洋成为“全人类的标志符号”。<sup>①</sup> 印度与中国之间，以及阿拉伯与波斯之间的贸易往来成就了庞大的跨洋联系网络，几个世纪以来，季风将这个网络变得更加紧密；而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其他伊斯兰国家来说，麦加朝圣则加强了联系网络。<sup>②</sup> 这确实是一片全球性的海域，它的沿岸是飞速发展的前“第三世界”各民族的家園，这里没有超级大国，这一点与大西洋和太平洋不同。<sup>③</sup>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为这一地区定调：“冷战结束以后，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的终结，在‘后美国世界’中，这里是地球上值得关注的最具价值的地方。”<sup>④</sup>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转而使用“苏伊士东”这一短语。在 1890 年出版的诗集《曼德勒》中，他首次提出该词。苏伊士东的起点是位于孟

---

①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0, 34.

②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 - 13.

③ Michael Pearson,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12

④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Norton, 2008)

加拉湾的缅甸南部城市毛淡棉（Moulmein），这种表达比以往任何时候用得都多，尽管很少有人理解它。

由于苏联的地理位置和主要港口所在的位置，冷战时期的军事地图高度强调北极地区。美国前任总统乔治·W. 布什在其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中强调了中东地区的重要意义，但是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处在不断变化中，世界各地都有冲突地带：逐渐变暖的北极甚至可能成为争夺的地区。如果以全球作为关注焦点，范围太过广泛，这促使人们在脑海中构建具体的地图，这幅想象的地图囊括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不安定地区，同时也关注全球恐怖主义网络、能源流动和诸如2004年大海啸这样的环境危机事件。“冷战”和“文明的冲突”，这些词语的意义可好可坏，地图也是一样。一幅正确的地图可以立体地展示世界政治关系，并可以借此推断未来的趋势。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情况已经证实：即使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可以促进全球思维，但我们其实还是处在地理的掌控之下。

尤其是美国，由于自身地理位置的缘故，美国过分关注太平洋和大西洋，对印度洋几乎毫不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因为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韩国和中国都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这种偏见在地图绘制过程中更是根深蒂固。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sup>①</sup> 倾向于把西半球放在世界版图的中间，所以印度洋总是位于地图的边缘，并被分到两边。然而，正是印度洋，使马可·波罗使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描述他13世纪末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再到亚丁（Aden）和佐法尔（Dhofar）的旅程。马可·波罗的旅程所及，是整个伊

---

<sup>①</sup> 墨卡托投影，又称正轴等角圆柱投影，是地图投影方法中影响最大的，由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G. Mercator）于1569年创拟。——译者注。



斯兰弧形地带，从撒哈拉沙漠的东部边缘一直向东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群岛。因此，其结果当然是，这片广阔的处于苏伊士运河和东南亚之间的热带海域是对抗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包括海盗）的主要区域。印度洋的沿海地带囊括了索马里、也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这里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基地组织网络覆盖区域，这里还有一个与基地组织毫不相干的组织集团，该集团专门走私印度大麻及其他违禁品。事实上，伊朗曾通过从波斯湾到苏丹的海上航线，经埃及通过陆路运输，为哈马斯组织提供过补给。

这里也是重要的石油运输航线，还有世界商业航行的狭窄通道——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的西侧一端，海路运输原油的40%要经过曼德海峡；而在印度洋的另一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有一半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使印度洋成为全球最繁忙也是最重要的洲际运输线。

自古以来，海上航线就比陆路交通线更重要，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Felipe Fernandez-Armesto）写道，因为它们可以用更少的花费，实现运送更多物品的目的。<sup>①</sup> 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从威尼斯跨越印度洋到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横跨亚洲中部的陆上丝绸之路同样重要。有这样一种说法：“谁掌控了马六甲，谁就能扼住威尼斯的咽喉。”<sup>②</sup> 也有一句谚语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如果世界是个鸡

---

①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New York: Norton, 2006), p. 31.

②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 - 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91, quoting Tome Pires.

蛋，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蛋黄。”<sup>①</sup>

一些数据显示，当今 90% 的洲际间贸易和 2/3 的石油供给是通过海路运输的。最终，全球化依赖的是海运集装箱，而印度洋的集装箱运输占全世界总量的一半。而且，印度洋的边缘地带——从西边的中东到东边的太平洋——为全世界提供了 70% 的石油产品运输。<sup>②</sup> 随着几亿印度人和中国人加入全球中产阶级的行列，石油消费量越来越大，导致波斯湾和南亚、东南亚之间的油轮通道正变得越来越拥挤不堪。全球能源需求量到 2030 年将增长 50%，其中将近一半的消费来自中国和印度。<sup>③</sup> 印度马上将成为继美国、中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耗国，其能源需求的 90% 依赖石油，而这部分石油需求量的 90% 将从波斯湾途经阿拉伯海运达。<sup>④</sup> 确实，2025 年之前，印度将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三大石油净进口国。<sup>⑤</sup> 在 21 世纪中期之前，印度将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为了满足庞大人口的生活需求，除以往从澳大利亚和印度洋其他国家如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煤炭外，印度从印度洋西南部的莫桑比克进口的煤炭量将大幅度增长。在未来，印度籍船只将会满载大量的液化天然气从南非穿越西印度洋运抵印度，与此同

---

①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p. 104.

② Heather Timmons and Somini Sengupta, "Building a Modern Arsenal in India," *New York Times*, Aug. 31, 2007. Quote from Sitanshu Kar, Indian defense ministry spokesman.

③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Paris, 2007.

④ 波斯湾占全球原油储量的 57%。

⑤ Bethany Danyluk, Juli A. MacDonald, and Ryan Tuggle, "Energy Futures in Asia: Perspectives on Indi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and Policies," Booz Allen Hamilton, 2007.



时，印度还会继续从卡塔尔、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口天然气。非洲的贫困状况可能因此得到部分改善，这种改善不是缘于西方国家的援助，而是缘于与前第三世界富裕地区发展强劲的贸易。

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1995~2005年这10年间，中国的原油需求量翻了一番，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间，这种需求还会翻倍。到2020年，中国每天将进口730万桶原油，这一数量是沙特阿拉伯计划产量的一半。<sup>①</sup> 运往中国的石油有85%以上将跨越印度洋的大片地区并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也是中国急于寻找通往太平洋的能源替代运输路线，以及寻找从中亚、巴基斯坦和缅甸的陆路运输路线的主要原因。<sup>②</sup> 中国、日本和韩国对海湾地区石油的需求巨大，导致世界一半的原油运输和近1/4的全球贸易途经马六甲海峡。<sup>③</sup>

防务分析家托马斯·巴内特（Thomas P. M. Barnett）表示：“没有哪一个大洋比印度洋更需要战略上的稳定，可以说，这里是七片海域中最有可能走向核武器化的地方。在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中，在这片海域驻扎海军的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

---

① 2004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一项在沙特南部约15000平方英里面积的空地中开发和生产天然气的合同。中国因为燃烧污染严重的矿物燃料，空气污染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中国将转向更为清洁的天然气燃料。Geoffrey Kemp, "The East Moves West",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6. 无论如何，中国的石油消费增长速度比美国的快7倍。Mohan Malik, "Energy Flows and Maritime Rivalrie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8)

② Andrew Erickson and Gabe Collins, "Beijing'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The Significance of a Chinese State-Owned Tanker Fleet," *Orbis*, Fall 2007

③ Martin Walker, "CHIMEA: The Emerging Hub of the Global Economy," A. T. Kearney report, Washington, D. C., 2008. Ten ships an hour on a 24/7 basis pass through the Malacca Strait.

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sup>①</sup>

美国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中国和印度的地区竞争、美国针对中东地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打击，以及美国企业遏制伊朗等，这些都在印度洋连接在一起。当美国袭击伊拉克或阿富汗时，其海军战舰总是从印度洋出发，同时美国空军从波斯湾的空军基地和处于印度洋中心海浪拍打中的迪戈加西亚岛出发，监视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针对伊朗的任何军事行动及其后续行为，只要涉及石油流通的，都是从印度洋的某个地方出发。对沙特阿拉伯动乱的回应，或者对拥有 2200 万人口和 8000 万枪炮的拥挤、缺水又极易发生争端的也门，美国都采取同样的方法。

2007 年 10 月，在罗德岛纽波特的海军战争学院，美国海军的新海洋战略揭开了面纱，声明暗示了美国海军从此以后将在印度洋及邻近的西太平洋寻求持续的前沿存在，而在大西洋地区并不这样。2008 年 6 月公布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的《构想和战略》，是覆盖到 2025 年的规划，声明中也花费大量篇幅断定印度洋及其毗邻水域将是未来冲突和竞争的核心舞台，美国明确地寻求成为南亚地区的卓越力量。这标志着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不再是北大西洋和欧洲这一重大历史性转移。美国可能不会控制中东地区“大沙场”的内部事务，但像军事分析家拉尔夫·彼得（Ralph Peter）所说的，会通过尝试掌控进出这一地区的门户——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作为补偿。随着美国在门户地区的扩张，印度和中国也将在此扩张它们的海军存在。

印度和中国寻求大国地位的渴望和对能源安全的追求，迫

---

<sup>①</sup> Thomas P. M. Barnett, “India’s 12 Steps to a World-Class Navy,” Proceedings, Annapolis, MD, July 2001.



使他们“将目光从陆地转移到海上”，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詹姆斯·霍尔莫斯（James R. Holmes）和吉原俊井（Toshi Yoshihara）这样写道。同时，他们也提出，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美国能否在公海始终保持优势，只有在公海占据优势才能确保几十年来海洋商业的稳定，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全球化也依赖于此。<sup>①</sup> 如果我们正进入一个由多个国家共享公海控制权而不是像最近一样只有单方称霸的历史时期，印度洋将在这种更加动荡和不稳定的布局中起到中心作用。

中国寻求纵向扩张其影响力，即将其影响范围向南扩张至印度洋的温暖水域。印度则试图横向扩张其影响力，分别向东和向西推进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属印度的边界范围，这个边界与印度洋平行。根据一份报告，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中国航路的脆弱表示遗憾，并把它称作国家的“马六甲困局”——这种过分依赖狭窄且易受人控制的马六甲海峡向中国进口石油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善。<sup>②</sup> 这种担心由来已久。1511年，由于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海峡，明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一度因此被隔断。如今在21世纪，摆脱“马六甲困局”就是要利用印度洋港口运输石油和其他能源产品，再通过公路和管道向北输往中国内地，这样油轮就不必非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才能到达中国。这只是中国迫切想要收复台湾的原因之一，这样，中国就可以重新将海军力量投射到印度洋海域。<sup>③</sup>

---

①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merging Strategic Triangl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2008.

② Juli A. MacDonald, Amy Donahue, and Bethany Danyluk, “Energy Futures in Asia: Final Report,” Booz Allen Hamilton, November 2004. The quote was originally reported by the China expert Ross Munro.

③ Holmes and Yoshihar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ian Ocean.”

中国在军事上针对印度洋的所谓“珍珠链”战略<sup>①</sup>，以在阿拉伯海沿岸的巴基斯坦港口瓜德尔（Gwadar）修建大型港口和情报站为特征，在这里，中国可以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在瓜德尔以东75英里处，巴基斯坦的帕斯尼（Pasni）地区还会修建另外一个供中国人使用的港口，这两处地方将通过新建的高速公路连接。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线上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中国似乎将要建立一个与石油同等重要的煤站，用于船只补给。在位于孟加拉湾的孟加拉港口城市吉大港，中国公司正积极发展集装箱港口设施，可能也会寻求让海军进驻该港。在缅甸，中国已为缅甸军事当局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修建商业和海军基地或对现有的基地进行升级改造，修建从孟加拉湾到中国云南的公路、河道和管道，在孟加拉湾伸出的克科岛（Coco Islands）建立监听站。<sup>②</sup> 上述港口中有的距离中国的中西部城市比这些城市与北京和上海的距离还要近。这些印度洋港口——南北有公路和铁路相连——将有助于中国内地在经济上突破封闭状态。中国正在向南部和西部发展，希望通过一条看起来未必能建成的铁路——跨越某些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段——将其最西部省份和阿富汗喀布尔（Kabul）南部的产铜地带连接起来。

当然，我们必须在判断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上慎之又慎。

---

① 所谓的“珍珠链”战略，最早出现于2005年初曝光的五角大楼一份名为《亚洲的能源未来》的内部报告中。报告首次提出中国海军通过资助等各种方式取得军舰海外停泊基地，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柬埔寨以及泰国等国家的有关港口或机场。这些港口在地图上连起来像一串珍珠，故有此名称。

② 中国在泰国湾的柬埔寨和南中国海也建造了类似设施。MacDonald, Donahue, and Danyluk, “Energy Futures in Asia”; Malik, “Energy Flows and Maritime Rivalrie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实际上，中国为印度洋制订的计划还并不明了，也没有公开的讨论。华盛顿的某些人对“珍珠链”战略的整个概念持怀疑态度，公开的基地建设与中国反对霸权、和平友好的自我形象不符。中国人很少尝试直接控制，总是默默旁观，如同在瓜德尔事件中那样，新加坡港务局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负责港口的运营管理。（可是，一名新加坡官员表示，中国没有动作的原因是新加坡过于弱小，在瓜德尔不能对中国造成任何威胁。）这些港口的许多运输管道线路要经过一些政治上动乱的地区，所以中国并不急于向前推进这些具体计划。实际上，出于安全考虑，中国已经搁置了位于瓜德尔海岸的几十亿美元的炼油项目。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历史联系（这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说明），毫无疑问，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港口项目本身并不是重点，因为所有港口项目的建设都是由当地的发展现状决定的，而中国的利益总是被放在第二位。然而，真正有趣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渴望获得欧亚南部边缘地带沿岸那些友好国家的现代化深水港。在这些地方，中国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经济与外交资源，因此北京在印度洋沿岸的沟通交流中有更大的空间。保护印度洋沿海线路的安全，是处于中国权力核心的官员们推动建立“蓝水海军”的主要理由。<sup>①</sup> 从这里得出的真正教训是，我们正进入一个微妙的世界，印度洋则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相比冷战时期和更早时期建立的牢固的军事基地，如今军民两用设施显得更隐蔽一些，并且完全依赖于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国长期追求在印度洋的存在，以便部署力量，保护自身商业和能源运输舰队。这一点通过投入巨额资金、公开纪念郑和这

---

① Andrew Erickson and Lyle Goldstein, “Gunboats for China’s New Grand Canal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pring 2009.



个历史人物得以体现。郑和是 15 世纪明代的探险家和舰队司令，他的舰队往返于中国、东印度、锡兰、波斯湾和非洲好望角之间。郑和，中国明朝一位回族宦官，其祖上是蒙古贵族，小时候即被掳入明营，遭宫刑，入紫禁城，后因战功被擢升。他率领由百余只宝船和 3000 多人（包括医生、翻译和占星家）组成的舰队，来到中东海岸进行贸易，索要贡品并进行正式访问。<sup>①</sup> 中国对这位印度洋探险家及其生平事迹的反复强调，实际上是想显示这些海域曾始终处在中国的影响范围之内。

在中国彰显自身影响的同时，印度也刻意强化自己在从中东到东南亚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前印度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苏雷什·梅塔（Suresh Mehta）第一次出访的目标是与印度贸易关系迅速发展的西部海湾国家。随着印度在经济上的繁荣发展，与伊朗和重建中的伊拉克的贸易也会激增。就伊朗和印度这两个沿海国家来说，一个在南亚占支配地位，另一个控制了中东。美国并不习惯将这两个国家看作同一类别的国家，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它们确实有共同的利益。和阿富汗一样，伊朗已经成为印度对抗巴基斯坦的战略性后方基地，以及印度未来的能源合作伙伴。2005 年，印度和伊朗达成高达几十亿美元的交易，伊朗将在未来的 25 年里每年向印度提供 750 万吨的液化天然气。<sup>②</sup> 虽然这桩交易还没有得

---

①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y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A Personal History of Bur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p. 66;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p. 79.

② M. Shamsur Rabb Khan, "Time to Revive India-Iran Relations," *IndiaPost.com*, Jan. 27, 2008.

到正式批准，目前仍处在等待过程中，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桩交易将会实现。同样，双方还谈到了从伊朗途经巴基斯坦延伸到印度的能源输送管道，从实现稳定的印巴关系以及连接中东和南亚的方面看，这项计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印度还一直帮助伊朗发展其位于阿拉伯海的恰赫巴哈（Chah Bahar）港口，这也是美国想要孤立伊朗但却无法实现的原因之一。过去，美国的权力依赖于欧亚国家内部的分裂，那时，很多国家都必须经由华盛顿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权益。但是眼下，这里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地区内的进一步整合，这样，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被迫出局了。

人们总是忽略一点，即几百年来印度始终与波斯湾和阿拉伯沿岸国家有着紧密的经济与文化联系。约有350万印度人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工作，每年向家乡汇款高达40亿美元。1990~1991年的海湾危机期间，印度海军未能成功地从伊拉克和科威特撤出印度公民，由此带来的羞辱是目前印度在印度洋上加大力度建设的主要原因。<sup>①</sup>

与此同时，印度向东与缅甸发展了军事和经济联系。民主的印度不能傲慢地摒弃专制主义的缅甸，因为缅甸不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一旦印度态度超然并无所作为，缅甸可能完全被中国接管。实际上，印度希望建设一条连接东西方向的公路和能源管道，这样就可以对以前英印帝国治下的由巴基斯坦、孟加拉和缅甸构成的地域实行软实力控制。

由于扩张势力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多层重叠而导致的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最终将更多地体现在海军领域，而非陆地之上。赵南奇还在中国海军参谋部物流处任职的时候就声称，“我们不能继

---

<sup>①</sup> Kemp, "East Moves West."

续接受印度洋只是印度人的海洋这一说法。”<sup>①</sup> 这一态度尤其适用于孟加拉湾，中印两国都在这里部署了相当的军事力量，因为这里临近缅甸，同样也离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很近，两片群岛离马六甲海峡入口处很近，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与竞争相反，印度和中国在同一海上航道的相互依赖也会带来两国的联合，在某种情况下，两国联合可能隐含着与美国的对抗。换句话说，印度洋将会成为展示全球权力变化的舞台。由于印度洋地区与近东和亚洲中部接壤，因此构成了新的地缘政治大博弈。

冷战迫使地区研究领域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其中中东、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都是独立的单元。但是，通过贸易、能源和安全协议，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和中东越来越联合成一个整体。亚洲重新作为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如同早期历史一样——现在这样的统一通过印度洋地图得以呈现。

在这样一幅图景中，人为划分的区域消融了，甚至包括地处内陆的中亚地区也是如此。当中国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瓜德尔开发深水港口时，在与此相距仅 100 英里的西部的阿曼湾内，印度人、俄罗斯人和伊朗人正在伊朗的俾路支修建恰赫巴哈港口，这一点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恰赫巴哈港口已经成为伊朗军队的前沿基地。[印度也正在积极建设一条从恰赫巴哈到阿富汗西南部尼姆鲁兹省（Nimruz）的新公路。] 瓜德尔和恰赫巴哈都位于主要的海上运输路线上，该路线临近海湾，未来印中之间在这条线路上可能会发生激烈的竞争。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通过专用公路和输油管道，这些线路可以与拥有丰富天然气资源的阿塞拜

---

<sup>①</sup> Ramtanu Maitra, "India-US Security: All at Sea in the Indian Ocean," *Asia Times*, Dec. 6, 2007



疆、土库曼斯坦和其他地处亚欧大陆中部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连接在一起。通过帮助建造连接阿富汗主要环路与伊朗港口的高速公路，印度可能会结束阿富汗对巴基斯坦出海口的依赖。根据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亚研究专家费德里克·斯塔尔（S. Federick Starr）的观点，连通印度洋将有助于勾勒未来的中亚政治走向。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印度来说，伊朗的吸引力部分来自将其作为中亚天然气中转站的可行性。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港口被宣扬为里海石油的“输出点”。<sup>①</sup> 因此，对于诸如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这样远离印度洋的内陆国家而言（这些国家或者碳氢化合物储量丰富或者是运输碳氢化合物的必经之地），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与印度洋连接。

阿富汗是这条通道上尤其关键的国家。也许将来有一天，土库曼斯坦的道勒塔巴德（Dauletabad）气田的天然气会途经这里输送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城市与港口。同时，阿富汗也处在连接中亚和印度次大陆能源管道的中心。因此，稳定阿富汗局势比针对基地和塔利班的反恐战争更重要，这关系到未来欧亚南部的繁荣稳定，也关系到通过共享能源运输路线缓和印巴关系，促进双方和谐共存。

问题在于，亚洲和非洲人口都在高速增长，并且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这些国家也变得更加繁荣。因此，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商贸和能源路线将全面地发展，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组织和联盟。这就是为什么21世纪印度洋的形势与20世纪欧洲和北大西洋迥然不同的原因。20世纪的形势展现的是一个单独国家——苏联的威胁和一种观念上的对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捍卫西欧国家的利益，对抗红军，将苏联军队控制在极地冰冠地

---

<sup>①</sup> MacDonald, Donahue, and Danyluk, "Energy Futures in Asia."

区。因为是直接对抗，而且美国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以说是史上最成功的联盟。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在印度洋建立一个海洋“北约”组织，这个组织由南非、阿曼、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组成，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联盟内部会像希腊和土耳其在北约内部那样争斗不断。但是这种想法代表的是旧模式，并未彻底理解印度洋区域版图所包含的意义。

尽管从战略角度来讲，印度洋可以构成单一的历史文化单元，但是与我们所处的更广阔的世界一样，印度洋并非只有一个聚焦中心，而是有很多焦点。非洲好望角、波斯湾、孟加拉湾等都面临着某些特定的威胁，在这些竞技舞台上，有各种各样的玩家。当然，这里也存在跨国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核扩散和无政府状态的威胁。今后，印度洋上的任何联盟都会像现在的北约一样，在冷战后变得愈加松散且无法聚焦。但是以这片大洋的面积来说——东西跨越7个时区，南北几乎覆盖全球一半纬度——船只在这里航行的速度相对较慢，多国联盟的海军部队很难在需要的时间内赶到危机区域。在2004~2005年印度尼西亚孟加拉湾的海啸抗灾救援中，美国之所以能发挥主导作用是因为恰好有航母舰队在邻近地区执行任务，我们都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如果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当时在其总部朝鲜半岛，那么美国对于海啸的反应将没有那么充分，这就是为什么单一的联盟体系是一种过时的研究世界的方法。

然而，在不同海域和沿海国家之间建立多样的地区或意识形态联盟的设想是富有成效的，这一点已有证据证明。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军联合起来，共同打击马六甲海峡地区的海盗行为。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和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海军在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岸举行联合军

事演习，此举是针对中国在这片海域的战略构思，尽管印中两国在中国南部城市昆明附近也开展过演习活动。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英国、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的联合海军力量，在非洲好望角地区长期巡逻，以打击当地的海盗。

前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海军中将约翰·摩根（John Morgan）这样描述印度洋战略体系：与纽约市的出租车系统差不多，没有中央调度员——没有联合国或北约，海上安全靠市场力量推动。只有在航道需要保护的时候，才会出现联盟，如同出租车在表演前后在戏院周围等待一样。

当美国海军依旧悄然占据这一海域霸权的时候，其他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占优势的。一位澳大利亚舰队司令告诉我：试想，这个世界有着分散的、呈网络状的海上基地，由美国提供补给，有着多重联盟关系；正因为如此，不同国家的护卫舰和驱逐舰能够在这些海军基地“随来随走”<sup>①</sup>。这些海军基地与钻井平台一样，分布在从非洲好望角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广大海域。

即使美国在政治领域的态度倾向于低调，以前的贫困国家也团结互助以反抗美国的霸权，但美国海军以其庞大的规模和快速部署能力，依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毕竟在当今世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原材料，在越南被制成零部件，再加上新加坡的软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资金，整个过程都依赖于航线的安全，而海洋航线的安全保障则由美国和海军联盟提供。印度洋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聚焦点，如同大西洋地区的苏联威胁、太平洋地区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那样，但它确实构成全球体系的微缩模型。

然而，在这个紧密联结的全球体系的缩影中，具有讽刺意味

---

<sup>①</sup> 原文为“plug and play”，为计算机用语，意为即插即用。



的民族主义运动依旧活跃。“亚洲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与别人分享主权”。《澳大利亚》杂志的外国编辑格瑞格·谢里丹（Greg Sheridan）这样写道。“亚洲的政治家在逆境磨炼和强邻环伺下成长起来，他们崇尚硬实力；美国对亚洲的态度要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强硬。”<sup>①</sup>

换句话说，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联合国里的那个小世界。不管怎样，联合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过时的建构，在这一结构中，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印度却不是。2004年12月，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向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海啸受灾地区派遣船只，但并没有事先征求联合国的意见。<sup>②</sup> 输油管道、陆路和海路的重叠布局更有可能形成梅特涅的权力制衡，而不是康德的后民族主义。一个非西方世界——在相当大程度上相互依赖，然而又极力维护主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军事力量也在迅速扩张——在大印度洋地区正在形成。科尔尼公司的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Global Business Policy Council）高级主管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这样写道：

中东地区的能源和金钱与非洲的原材料和未开发的食物潜能，再加上印度和中国的商品、服务、投资和市场，它们的结合似乎不仅仅只是一种三方互惠的合作关系。财富紧跟贸易而来，有了财富，就有了影响力和权力。正像欧洲的大国，最初在地中海附近出现，之后，随着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更大范围贸易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更富更强的国家。因

---

① Greg Sheridan, "East Meets West,"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06.

② Greg Sheridan, "East Meets West,"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06.

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这一次轮到印度洋周边国家扩大影响力并实现他们的雄心。<sup>①</sup>

因此，与古代和中世纪的情况一样，这片海洋又一次处在了世界的中心。为了对那段历史做出评价，也为了逐步梳理印度洋的情况，让我们从阿曼开始我们的旅程。

---

<sup>①</sup> Walker, "CHIMEA."





## 第二部分

第二章 无处不在的阿曼

第三章 寇松的边疆线

第四章 “印度这片土地”

第五章 俾路支和信德

第六章 古吉拉特令人担忧的崛起

第七章 德里观点

第八章 孟加拉国：关于存在的挑战

第九章 加尔各答——下一个全球性城市

第十章 谋与美

第十一章 斯里兰卡：新地缘政治

第十二章 缅甸：印度与中国碰撞的地方

第十三章 印度尼西亚的热带伊斯兰教

第十四章 海上亚洲的中心





## 第二章

# 无处不在的阿曼

阿拉伯半岛南岸是一片有着火一般颜色、几近荒芜的土地，粗糙的平原，宛如刀刻般的白云石、石灰石和页岩耸立其中。空旷的海滩，在几百英里的土地上展示着不经修饰的纯美的壮观景象，完全没有人为的痕迹。这片海域虽然令人着迷，却没有有什么特征能激起历史的记忆，因此这片生动碧绿的水域除了告诉我们这里地处热带之外，并没有传达其他的信息。但是，这里的风却诉说着历史的故事。通常情况下，从赤道北部穿过印度洋的季风就像时钟一样有规律：从东北吹往西南，从北方吹往南方，然后有规律地在4~10月的6个月时间内，风向逆转，从而使得出海船只能够较为快速地行驶较长距离，而且在外逗留一段时间后，能以同样的速度返回家园。<sup>①</sup>

---

<sup>①</sup> 因为对季风的依赖，所以一旦季风无法按时到达就会形成历史性事件。如1630年，印度一些地区——古吉拉特、德干和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没有降雨，干旱导致100万人死亡。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pp. 115-116.

当然，事情并不总是那样简单。用澳大利亚船长、孜孜不倦的印度洋旅行者艾伦·维利尔斯（Alan Villiers）的话来说，东北季风风力较弱，比较干燥，因适合贸易往来而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而西南季风时节则大多是坏天气。因此，在某些海域行驶的航船，有时往返都需要东北季风。但是，对波斯和印度的单桅三角帆船（dhows）<sup>①</sup>而言，这不成问题，迎着东北季风，将巨大的三角帆调至迎风 $55^{\circ} \sim 60^{\circ}$ 角，它们就能够在海上游刃有余地航行。<sup>②</sup>这几乎相当于现代的快艇，也可以算作巨大的科技进步。其重要性体现在，即使船只陷入海员们所说的“靠天气航行”的困难中，他们依然可以从阿拉伯南部直线到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

即使西南季风通常比较猛烈，但季风系统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旅行者可以据此制订确切的旅行计划，海员们也不会总是在不利条件下行驶。<sup>③</sup>所以印度洋并不——至少不像其他大型水域那样——需要等到蒸汽时代才能整合为一体。从一个水手的角度来看，在这样广阔区域内，每年两次的大规模风向变动是相当独特的。在其他地区，风力和风向也都会随着季节而改变，但都不像印度洋季风那样变化那么大。其他主要海域基本上是微风，热带地区东北风和东南风交替，中纬度地区则多是西风，且长年

---

① 印度人称呼更小的、用来捕鱼的单桅三角帆船为“mashua”；较大的用来运输货物或者乘客的单桅三角帆船叫作“jahazi”，这是波斯人的称呼。

② Alan Villiers, *Monsoon Seas: The 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p. 3, 6, 56 - 57 The wind situation was even complex in the bay of Bengal, whose eastern coast was partially closed by the northeast monsoon. See Sinnappah Arasaratnam, *Maritime Ind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

③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New York: Norton, 2006), p. 36.



不变，而赤道地区常年无风。

在阿拉伯海南部沿海地区，夜空晴朗，星光闪耀。这里有大量的鱼，因为没有河流，所以在开阔海洋上的航行技术得以发展。<sup>①</sup>就航海时间而言，东非和印度非常接近。确实，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季风使得从非洲好望角延伸 4000 英里到达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广大印度洋区域——越过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漠和沿海地带——成为规模不大但关系密切的共同体。

这就意味着，这里是贸易世界的先行者。

我曾到过也门边界附近、地处阿拉伯南岸中部的阿曼城市佐法尔。这里就像一幅由海洋和岩石组成的抽象画。在干旱的冬季，除了耐寒的橄榄科乳香属树木从地下孤独地钻出来外，其他地方完全是一片沙漠景象。我从一棵树上割下小块树皮，采集树脂，体会东正教的内部心灵世界。在基督教出现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乳香被用来保存家庭衣物，祈佑幸福，驱除害虫，也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人们在饮用水中加入小块的树脂，给身体尤其是肾脏注入活力，因为人家认为树脂可以通过激活免疫系统驱除疾病，防止恶魔来犯。乳香在古代为葬礼用的柴堆熏香，古代埃及人还利用乳香来保存法老的尸体。在卢克索（Luxor）图坦卡蒙（Tutankhamen）法老的陵墓中就发现有这种树脂，并且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神庙中有专门的房间用于保存这种树脂，并有祭司看管。

按照罗马人、埃及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的生活方式，古代的乳香就像现在的石油一样重要：乳香是那个时代经济活动和航线存在的基础。佐法尔和附近的也门每年向位于地中海的罗马帝

---

<sup>①</sup> Alan Villiers, *Monsoon Seas: The 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 55.

国出口 3000 吨树脂。<sup>①</sup> 一艘艘满载乳香的船只，在如期到来的稳定季风的帮助下，向西南方向驶入红海入海口，然后运往埃及和罗马，向东行驶则到达波斯和印度。几个月之后，当风向改变的时候，船只返航佐法尔和也门港口，这时船上满载非洲的象牙和鸵毛，以及来自印度的钻石、蓝宝石、天青石和胡椒。阿拉伯南部和西南部的海上部落王国——赛伯伊人（Sabaean）、哈德拉毛人（Hadhramauti）和希米叶尔人（Himyarite）王国——因为各自的“熏香公路”而变得富有。直到公元前 100 年，东西方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仍在这里，在阿拉伯南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在埃及和印度还没有开通直航之前，阿拉伯人、希腊人、波斯人、非洲人和其他地区的人就已经往来于此处位于航道中部的中转地做生意。<sup>②</sup>

来自南部的夏季季风（当地人称之为 khareef）带来的降雨能够把我所在的阿曼西部荒芜的小山奇迹般地变成丛林般的绿。古代更加湿润的气候给这里带来了丰富的淡水资源，因为大洋交通，这里也发展了具有复杂文化的城市文明。沿着海岸线行驶，我发现了一个石头小屋。在这里，一位阿拉伯人——穿着飘垂至脚踝的衬衫，戴着刺绣图案的帽子——给我煮了一杯具有印度马萨拉风格的茶，茶里放了牛奶、调料以及足够多的糖。早前，在一家小旅馆里，我享用了混合着咖喱粉的椰子，以及当地用红辣椒和酱油调味的汤。这又是印度和中国对阿拉伯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因为我所处的地方离印度河河口比幼发拉底河河口更近一些。

---

① Juliet Highet, *Frankincense: Oman's Gift to the World* (New York: Prestel, 2006)

② Ministry of National Heritage and Culture, *Oman: A Seafaring Nation* (Muscat: Sultanate of Oman, 2005)

我参观了苏姆胡拉姆（Sumhuram）残破的遗址废墟，这里是乳香运输中心地带富裕的佐法尔港口城市。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这里曾是世界最富裕的港口之一。卢克索女王哈特谢普苏特的陵庙（Hapshetsut）铭文记载，苏姆胡拉姆盛产白色乳香中的“Al Hojari”品种，一种世界上最好的乳香，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提及。<sup>①</sup>这种乳香声名远扬，甚至在中国也很有名。

中国泉州一度从巴里德（Al-Baleed）每年进口约400磅的乳香。巴里德靠近苏姆胡拉姆，是佐法尔的临海居住区，巴里德城墙内有50多座中世纪时期的清真寺遗址。巴里德残存的遗迹范围要比苏姆胡拉姆的更为广泛，这使我能够在脑海中重建这座伟大城市原本的样子。早在公元前2000年，这里就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居民区。1285年，马可·波罗曾经来此地游玩，1329和1349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两次来到这里。他们都是经由海路而来，又由海路离开。1421年，中国舰队司令郑和乘坐“宝船”穿越印度洋来到巴里德，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sup>②</sup>10世纪后期，出生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西（Al-Muqaddasi）在其著作中将阿曼和也门的港口称作中国的“走廊”，甚至红海在那时也被称为中国海。<sup>③</sup>在另一个方向上，公元8世纪中期，来自佐法尔和阿拉伯南部其他地区的阿曼人就开始来到中国。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迁徙

---

①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ch. 37

② “宝船”实际上都是战舰，战舰上配备小口径的枪支、炮弹和火箭。

③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03;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p. 8.



而来的大量阿拉伯人使得远在印度洋另一端的东印度群岛亚齐西北部的苏门答腊港变成“通往麦加的大门”。<sup>①</sup>

印度洋的规模确实很小。

“阿曼无处不在，在中国，在印度，在新加坡，在赞比亚。”阿曼政府官员阿布杜拉赫曼·阿·萨利米（Abdulrahman Al-Salimi）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Muscat）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这样对我说。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是一个以玫瑰香水、枣椰树、黏黏的哈瓦和用铜壶盛装的微苦的豆蔻味咖啡而闻名的城市。萨利米戴着白色的头巾，穿着长至脚踝的长衫。我也和宗教基金会的会长见了面，他的腰间佩戴镶嵌珠宝的宝剑（khanjar）。这是一块自觉地保持了民族传统的地方，这种传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正相反，这种风俗与来自海上的民族认同感紧密相连，在几千年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而非单方向从外部获得——中逐渐形成。阿曼的例证说明，全球化只有建立在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本土特色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最好的效果。在商业力量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只有保留本土特色才能幸存。对于那些第一次来此的旅游者，可能对这个看起来像中世纪的地方感到震惊，但实际上这里与现代世界并不矛盾。

从佐法尔向东北方向行驶到马斯喀特，花费了12个小时。全程都是延绵不断的平坦的或者有沙砾和熔岩点缀的沙漠，这片沙漠与沙特阿拉伯的鲁卜哈利沙漠（Empty Quarter，又名“不毛之地”）相连，平行于海岸线。<sup>②</sup>在过去，这段路程大多走水路。从很多方面来讲，作为水手的阿曼人是本真的阿拉伯人，他们在

---

①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pp. 16-17

② 鲁卜哈利沙漠这片无水荒漠之地是驱使阿曼人走向海洋的另一个原因。

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印度洋西北角的阿拉伯海最初被称作阿曼海。具有传奇色彩的水手辛巴达的大本营虽然在伊拉克的巴士拉，但他很可能是来自苏哈尔（Sohar）的阿曼人。归功于海风和中世纪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航海技术，8~10世纪，辛巴达的大规模航海行为再一次证明了这片海洋并不大。辛巴达第一次航行经过的米拉吉王国（Mihraj）与中国南海的婆罗洲相似；第二次航行遇到的怪鸟被拿来与马达加斯加附近的鸟类进行比对；12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Idrisi）认为第三次航行经过的厄皮斯岛（Apes）是索科特拉岛；第四次航行经过的食人者家园如果不是更加遥远的苏门答腊便应该是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

另一位伟大的阿曼水手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Ahmad ibn Majid）可能在1498年驾驶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的船只从肯尼亚到达印度。<sup>①</sup>阿曼人控制了奴隶买卖，19世纪早期，他们在东非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线上，经营奴隶买卖帝国。在1958年之前，他们还掌控阿拉伯海沿岸俾路支（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瓜德尔港口。印度尼西亚有阿曼人群体，这些阿曼人的祖先帮助伊斯兰教传播到远东地区。

同样地，你也可以在阿曼发现上述各地留下的遗迹。马斯喀特的露天市场里，到处都有19世纪从拉贾斯坦和海德拉巴来的印度教教徒团体。身着长裙的女人和戴着刺绣帽子的男人的着装风格受到桑给巴尔岛和俾路支的影响。阿曼的歌舞也具有桑给巴尔特色。中国的瓷器随处可见。面包师傅多是也门人或

---

<sup>①</sup> 虽然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一史实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这位达·伽马领航员的身份仍然有很多疑问，一位专家认为他是古吉拉特人。Satish Chandra,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 (New Delhi: Sage, 1987), p. 18.

伊朗人。生意人中多数是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人。阿曼士兵身穿的老式盔甲和外套反映了来自印度和南非祖鲁人的影响。来自上述地区的外来语也影响到阿曼人的阿拉伯语，很多阿曼人所讲的阿拉伯语带有斯瓦希里口音。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全球化已经在阿曼和印度洋其他地区出现，这要远远早于世界其他地区经历全球化的时间。全球化为这一地区带来非常先进的发展水平。

西方人视阿拉伯人为沙漠民族，容易受到沙漠极端环境下产生的思想的影响。但他们也是伟大的航海民族，乳香贸易和阿曼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些世界主义的先驱者们早在达·伽马之前，就已经在印度洋这片海域穿梭航行了几千年。当我们回头看伊斯兰扩张历史，“有一个事实凸显出来”，荷兰裔美国学者安德烈·温克（Andre Wink）在他的百科全书系列（*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中写道，“印度洋及其周围的世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印度处于中间，两端是颇具活力的中东和中国——受到要融入伊斯兰教主导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复杂模式的影响。”<sup>①</sup>

一个世纪前，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先生是这样谈论阿拉伯人的，“阿拉伯人创造的伟大帝国充分利用了阿拉伯这片土地上两种可向外流动的方式——一种是马和骆驼，另一种是船。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舰队控制了远至西班牙的地中海地区以及远至马来群岛的印度洋地区。”<sup>②</sup>

---

① Andre Wink, *Al-Hind: The making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vol. 1, Early Medieval India and the Expansion of Islam, 7<sup>th</sup> - 11<sup>th</sup> Centuries* (Boston and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1990, 2002), p. 4.

② 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April 1904.



阿拉伯半岛类似梯形的地理结构促进了这种发展。半岛三面环绕着漫长的海岸线：从苏伊士湾沿着红海顺流而下到曼德海峡（阿拉伯语意为“泪之门”），然后再向东北 1250 英里到达阿曼湾，早期这里是阿拉伯半岛土壤最肥沃、人口最密集的部分（也门、佐法尔和哈德拉毛）；最后沿着波斯湾继续北上到达伊拉克境内的阿拉伯河。阿拉伯河流向底格里斯河，到达巴格达，所以从 8 世纪到 13 世纪的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到蒙古军队的大规模入侵，巴格达都是通过印度洋和中国发生联系的，因为在历史上，海路交通要比跨越荒凉的沙漠地带容易得多。

此外，西部非洲海岸和东部伊朗高原也促进了阿拉伯半岛的发展，因为在红海和波斯湾相对封闭和受到保护的环境中，阿拉伯人可以通过航海不断地与两个古老的城市文明——埃及文明和波斯文明亲密接触。尤其是波斯人，曾经控制了与东方的长距离海上贸易。公元前 6 世纪，大流士一世“下令勘察苏伊士河到印度河之间的水域”。因为阿切曼尼王朝时期的波斯和同样繁荣的孔雀王朝之间有很多的海上交往。<sup>①</sup> 后来，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波斯萨珊王朝很可能已经到达中国的港口。实际上，萨珊王朝治下的波斯是印度洋沿岸一个主要的强权国家，根据中国 7 世纪末到 8 世纪的文献记载，波斯人是广东港船只的船主。<sup>②</sup> 此时，在中世纪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兼容并蓄的影响下，阿拉伯和波斯在文化上相互融合。从非洲跨越印度洋，航行到远东进行贸易和探险活动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航船几乎没有任何差别，都统一悬挂伊斯兰的标志。

---

① Fernandez-Armesto, *Pathfinders*, p. 33

②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pp. 198 - 199. See, too, Hourani, pp. 47, 62; Wink, *Al-Hind*, p. 50.

波斯湾是人类最古老的无障碍水域路线。想要从阿曼航行到印度，如果不选择利用半年一变的季风的协助在无障碍水域航行，也可以选择沿着信德（巴基斯坦东南部城市）和印地（印度）的海岸线航行，从而不必远离陆地，因为南印度是连接印度洋的两片广阔水域——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枢纽。<sup>①</sup> 从南印度或锡兰出发，在季风的吹拂下，航船以左舷抢风航行，可以一路疾驰直达远东。从波斯湾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苏门答腊的航程相对较快，只需要7天——速度是在地中海航行的两倍，这主要归因于季风的作用。<sup>②</sup> 在相反的航向上，从也门或者阿曼向西南方向前往东非的路程相对较短并且更轻松。事实上，公元1200年以后，东非的斯瓦希里海岸线被纳入伊斯兰的海洋控制范围，到15世纪末，至少有30个非洲沿海城市接纳了来自阿拉伯南部的穆斯林移民。<sup>③</sup> 好像在这片海洋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任何群体。

如上所述，引用已故学者乔治·F·胡拉尼（George F. Hourani）的话，古时候阿拉伯南部城镇是所有非洲、埃及和印度之间交往的中转港口。埃及托勒密二世与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和阿育王互派的使节，以及公元前270年或者前271年托勒密二世在其凯旋游行中展示的印度妇女、牛和大理石，可能都通过也门的赛伯伊港口转运到埃及。<sup>④</sup> 《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

---

①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pp. 200, 208, 261

② Fernandez-Armesto, *Pathfinders*, p. 64.

③ Patricia Risso, *Merchants&Faith: Muslim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Indian Ocean* (Boulder, CO: Westview, 1995), p. 46; Philip D.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21

④ George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4, 23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希腊语为《红海周游记》)成书于公元1世纪中期,是由一位精通航海的阿拉伯商人编撰的,据传这位商人古时候活跃于索马里兰(Somaliland)、东非和印度河河口(今天的巴基斯坦)附近。看起来孤立而又遥远的阿拉伯实际上是文明交流的中心地带,这一切都要归因于海上航行。

7世纪伊斯兰教的出现刺激了海上贸易。伊斯兰教是一种道德信仰,它为社会和经济交往提供了完整的框架结构。而且,正如学者帕特丽夏·里索(Patricia Risso)解释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一种“便携式”的宗教。与印度教不同,伊斯兰教并不认同信仰的灵魂局限在特定地区,或者局限于某个特定神的庙宇。所以,伊斯兰教特别适合那些需要进行复杂的交易和游历的人。伊斯兰教是一种围绕着《可兰经》、集体祈祷、规范家庭生活以及禁食猪肉、禁止饮酒等元素而形成的统一文化,因此,它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形成。这些元素将信仰虔诚的人聚到一起,形成社会团体。事实上,在早期伊斯兰世纪,朝圣行为通常被当作商品交易会的一部分,穆斯林商人聚集在麦加做买卖。根据学者阿布-鲁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的说法,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和佛教的“混合与共存”使印度洋有一种“凝聚力”,甚至面积更小的地中海有时也缺少这种一致性,风力将地中海各地分开而不是结合在一起。<sup>①</sup>这个重商主义的社会,非常好地适应了新的标准和实践,推动着伊斯兰教沿南部海域向东传播,使其在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广袤土地上建立自己的霸权。<sup>②</sup>

---

①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p. 242

② Marshall G. S.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 2,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pp. 542 -543.



穆斯林在东非做奴隶和象牙交易，在波斯湾做珍珠和金子的买卖，在印度做大米和棉花的生意，在中国进行丝绸、茶叶和瓷器的交换。<sup>①</sup> 伊斯兰教不仅维持了印度洋范围内成熟的伊斯兰商业社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吸引了一些新的教徒。改宗伊斯兰教有实用主义的一面，因为通过改信伊斯兰教，可以增加阿拉伯人对非洲或亚洲商人的信任。在西部海岸最终被阿拉伯商人突破的缅甸，本地的阿拉干民族经常为了商业利益而使用阿拉伯人的名字。阿拉伯商人通过在印度洋上的经商活动，使一些印度人改宗伊斯兰教，从而建立了从摩加迪沙到马六甲的伊斯兰社会——即从索马里到马来西亚。（这与很多在印度洋地区传教的基督教宗教团体形成鲜明的对比，基督教传教士团体与商业关系不大，有时甚至与欧洲贸易公司的利益相抵触。）<sup>②</sup>

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贸易扩展并不单单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崛起，也有中国崛起的因素。麦地那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国家建立于 622 年，中国唐朝建立于 618 年。唐朝政府重新恢复了官僚统治，中国出现了强大的中央政府，积极寻求发展与印度洋南部地区的贸易关系。这种情况与古代罗马帝国统治印度洋西部，汉朝统治印度洋东部的情况极为相似。直到伊斯兰教涌入之前，中国商人安心地与印度的印度教教徒和佛教徒做生意，而从这以后，在唐朝政府的监管下，中国商人和印度穆斯林、阿拉伯人以及波斯人做生意时变得更为安心。<sup>③</sup> 就此开始形成了西方的中世纪伊斯兰王朝（定都于大马士革的伍麦叶王

---

① Risso, *Merchant & Faith*, p. 53.

② Risso, *Merchant & Faith*, pp. 5-6, 54, 71-72.

③ Risso, *Merchant & Faith*, pp. 23-24.

朝和定都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和东方的唐朝、宋朝及元朝之间牢固的商业关系模式。这一商业关系模式持续了几百年,只是后来到了15世纪,中国转向闭关锁国,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机会变少了,穆斯林商业力量才开始减弱。但是印度洋两端的庞大帝国都在商业上相互依赖,和平和自由贸易还是处于支配地位。

除了对乳香的需求外,对金属、草药等奢侈品的追求也刺激了相距遥远的亚洲各部分之间的贸易。此外,印度向中国出售大米和棉花,而中国向印度出售茶叶。当达·伽马到达印度卡利卡特地区时,对“从中国到尼罗河”的海上交通赞叹不已。<sup>①</sup>穆斯林贸易系统对于中世纪全球化的进程来说至关重要,就好像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对后现代所具有的意义一样。

穆斯林确实随处可见。7世纪伊斯兰教出现的几年里,探险家沙德·伊本·阿比·瓦戛斯(Sa'ad ibn Abi Waqqas)从埃塞俄比亚出发,在中国泉州修建了一座清真寺。15世纪早期,一位印度穆斯林充当郑和宝船的领航员,从印度航行到佐法尔,然后又到了也门,从也门继续向北航行至麦加,同为穆斯林,郑和成为第一位到达麦加朝圣的中国高官。<sup>②</sup>

然而,虽然穆斯林——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穆斯林——处于支配地位,但印度洋却并不只是他们独有的。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宗教的生意人充分利用了印度洋得天独厚的独特环境。甚至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来自今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所在东部海域的马来人,扬帆远航至印度洋另一端,即西部的马达加斯加和

---

① Peter Boxhall, "Portuguese Seafarers in the Indian Ocean," *Asian Affairs*, vol. 23, no. 3, 1992.

② Nayan Chandra, "When Asia Was one," *GlobalAsia: A Journal of the EastAsia Foundation*, September 2006.

东非，并带去了肉桂和其他香料。<sup>①</sup>因为他们所驾木舟的样式独特，被称作瓦克瓦克人（*Waqwaqs*）。这些异教徒借助风力，在一个月內行驶了 3500 英里。<sup>②</sup> 印度教教徒也在这些沿海地区传播他们的宗教仪式、宗教偶像和语言。中世纪早期，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繁荣贸易将所有在印度洋南部做生意的印度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梵文大都会”。<sup>③</sup> 确实，在中世纪以及现代早期，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和缅甸、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处在相反方向的波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片大洋建立了一个贸易路线网络。就其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而言，大概与我们今天的世界相似。因为印度洋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分开来看就成为多个子单元——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等，“自然条件”允许“多个地方霸权国家共存”，阿布-鲁格霍德这样写道。<sup>④</sup> 换句话说，海洋是中立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控制这片海域，当然，欧洲的王国也是如此。

中世纪，西方的霸权还没有建立；就像今天，美国海军的控制权——以其所处的程度来看，是西方统治这些海域的最后阶段——可能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终将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

① 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已经发现了来自古代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陶器和中国的粤陶（*Yueh pottery*），进一步证明了航线覆盖之广大。Charles Verlinden, "The Indian Ocean: The Ancient Period and the Middle Ages," in Satish Chandra,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 (New Delhi: Sage, 1987), p. 50.

②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pp. 24–25, 63.

③ Chanda, "When Asia Was One."

④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p. 253.

## 第三章

# 寇松的边疆线

1907年，乔治·纳撒尼尔·寇松结束英印总督的身份返回英国后不久，在牛津大学每年一次的罗曼尼斯讲座（Romanes Lecture）中，发表了题为《边疆线》的演说。对这个问题，他有毕生的体验。最初，当他还是个年轻人时，就沿着亚洲的大英帝国边疆线游览，后来作为外交官又致力于确定大英帝国在土耳其斯坦的边界。<sup>①</sup> 寇松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自然边疆线——海洋、沙漠、山脉、河流和森林；还有各种人为边疆线——城墙和防御工事、地图上的垂直天文线、边界地区、缓冲国、保护国、内陆地区和影响范围。寇松认为海洋是最“无可争辩”、最“有效”的边疆线，紧随其后的是沙漠。他认为，英国失去了美国，西班牙失去了古巴和菲律宾，拿破仑失去了埃及，荷兰和葡萄牙失去了它们的亚洲沿海帝国，这些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海洋的“干涉”。对于沙漠，寇松指出，戈壁保护了中国西北边界，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受到卡拉库姆（Kara

---

<sup>①</sup> George N. Curzon, *Frontiers: The Romanes Lecture 1907* (1907; reprint, Boston: Elibron Classics, 2006)



Kum) 沙丘的保护, 中东地区和印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波斯和土耳其斯坦广阔的荒地隔离开来, 黑非洲则因为北部的撒哈拉沙漠而与世界其他文明隔绝。<sup>①</sup>

当然, 海洋可以横渡, 沙漠也可以通过铁路或者骆驼商队跨越, 寇松也列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实际上, 海洋作为将人类隔离开来的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同时, 海洋也是连接人类文明的重要方式, 尤其是在评估印度洋这种极具战略地位又极度拥挤的地带时。沙漠也是一样, 它并不仅仅是不可穿越的边疆线, 甚至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寇松的理论正好相反。沙漠对于一个国家命运的影响相比海洋更为微妙; 毕竟, 美索不达米亚东边的沙漠不仅仅是个沙漠, 它也是中东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的障碍。这个沙漠也关系到不同的文化、语言或者方言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不只是地理因素的作用, 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 我们不能夸大这种障碍, 因为历史上一直有阿拉伯和波斯移民团体穿越沙漠。事实证明, 从叙利亚南部延伸到阿拉伯半岛的沙漠起到的隔离作用更小, 因为整个地区通行阿拉伯语。部落和游民穿越从南至北的阿拉伯沙漠, 他们深刻地改变了所经过区域的命运。

因此, 我们有了阿曼的故事, 一个印度洋西部世界的缩影, 因为与阿拉伯海上和邻近的其他地方——索马里、海湾酋长国、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信德, 以及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一样, 阿曼代表着存在于海洋和沙漠之间虽然充满活力但又不宜居住的人类生存地带, 这些地区受到海洋和沙漠的共同影响。

阿曼是一座岛, 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岛屿。在阿曼的历

---

<sup>①</sup> George N. Curzon, *Frontiers: The Romanes Lecture 1907* (1907; reprint, Boston: Elibron Classics, 2006) pp. 13 -16.

史上，与海洋相比，沙漠更多地作为边疆线而存在，这与寇松认定的影响边疆线的因素顺序正好相反。因为风向的可预见性，上千英里的开阔水域非但没有把阿曼和其他地方隔离开来，反而实际上使阿曼和邻国的关系更加紧密，然而其北部上千英里的广阔沙漠却使阿曼在陆地上处于隔离状态。海洋带来了四海一家，沙漠则带来了孤立和部落间的冲突。因为航海的社会在这里存在了 2000 多年，阿曼与也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起，构建了古老的文明集团。阿曼和海湾酋长国不同，它并不是一个相对近期的历史创造。而海湾酋长国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它处在 19 世纪最强大的海上帝国——大英帝国印度洋贸易和交流的路线上：寇松把海湾国家称作“小气的阿拉伯酋长国”，他认为海湾国家的建立是为了阻止相邻海域的猎奴行动。<sup>①</sup> 阿曼也不像沙特阿拉伯那样是 20 世纪家族统治的产物。阿曼的统治王朝——艾勒·赛义德家族的执政时间甚至长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时间。虽然阿曼存在的时间很长，但沙漠地区部落之间的冲突也使阿曼长期衰落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消失不见，且往往由离其最近的强国伊朗控制其政权。海洋、海风和条件出色的港口往往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国家建立的基础，而沙漠则往往倾向于毁灭国家。

据说，阿曼的土地上有 500 个城堡。实际上，我在沙漠地区游览了很多阿拉伯城堡，它们都潜伏在深水港口的后面，经过长期的海风和地震的洗礼，已经裂解为令人心痛的美丽景观，或被塑造成精心制作的美丽形象。每座城堡都拥有精准的数学上的独特性，耸立在曲折的山峰和裸露的悬崖之上。然而，修复工作恰

---

<sup>①</sup> Peter Mansfield, *The Arabs*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1976), p. 371 of Penguin; Curzon, *Frontier*, p. 42

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博物馆修复者力图修复它们，这是一件吸引人的工作——用地毯、瓷器、当地的珠宝、古老的画像和漂亮的斜条格构装饰房间，每块石头和泥塑的建筑物都彰显着这片荒地几个世纪以来的狂放不羁。每座城堡都代表了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孩子，所有人都住在这里：煮沸的黏稠滚烫的椰枣糖浆随时准备从狭窄的缝隙中倾倒在入侵者的头上。因此，沙漠并不仅仅是空旷的、不可穿越的地带，就像寇松所认为的，只有通过铁路才能征服这些地区。事实上，沙漠地区虽然人口稀疏，但却肯定有游牧部落的人在此居住。然而，缺少一个能够让文化扎根进而使政治稳定的城市焦点，这里也是一幅无政府状态的景象。

海洋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未真正渗透到这样一个混乱的内陆地区。事实上，沙漠越深，范围越宽广，潜在的不稳定和暴力的隐患就越多。非洲的萨赫勒（Sahel）地区就是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事实上，这也是阿曼长期以来的故事。<sup>①</sup>

是什么使阿曼这个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世纪因暴力而动荡的

---

①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因为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事先决定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可以改变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当大变动出现的时候。就像海洋环境有时可能会影响沙漠内陆一样，反过来也是如此。例如，13世纪的时候，一条海上线路连接中国的广东和伊拉克的巴士拉，物品从巴士拉被转运到巴格达，从巴格达再通过陆路向西运送至地中海。确实，巴士拉充当了巴格达的港口，阿巴斯哈里发拥有进入波斯湾、印度洋甚至整个东方的伟大港口城市。但是，1258年，蒙古人穿过沙漠，洗劫了阿巴斯巴格达，接着整个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崩溃。结果通向波斯湾上游的海上线路变得不适合贸易，印度洋贸易路线随之从经由阿曼的波斯湾转向经由也门的红海。引自2008年2月9~10日，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何英成（音译，Engseng Ho）在由哈佛大学和迪拜举办的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印度洋的港口城市国家》的发言。

沙漠腹地，发展成一个稳定而牢固的亲西方国家，使得其训练有素的海军驻扎在最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两侧？我们能从阿曼这里学到哪些可以适用于整个印度洋地区的经验呢？

许多因素促成了阿曼作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阿曼人口不到300万，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使得公路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能，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作用。这和其邻国也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门的领土面积与阿曼相当，因为山脉被分割开来，人口2200万。也门中央政府相对较弱，无法控制广大地区，而且因为没有有一个部落或者宗派能够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所以也门必须在脆弱的部落关系平衡中维持和平。也门的安定，问题在于权力的分散，而不是权力的集中。自古以来，处在也门东南部、长达100英里的绿洲哈德拉毛干河（Wadi Hadhramaut）被大片的沙漠和满足石头的高原包围，但是通过商队和阿拉伯海港，它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保持了比也门其他地区更为密切的关系。<sup>①</sup>与阿曼不同，也门依旧是一个规模庞大、难以驾驭的部落王国的联合体。

然而，阿曼这种令人乐观的局面与其说归功于西方的技术规范 and 民主规则，倒不如说归功于某些封建因素的复活，阿曼最高统治者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Qabus bin Sa'id）的独特个人魅力，就与此紧密相关。苏丹卡布斯治下的阿曼谴责华盛顿关于“中东和世界应该如何发展”的见解。阿曼想要展示的是非西方国家的多样化进步之路，与西方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某些理念

---

<sup>①</sup> 印度中南部海德拉巴邦的尼扎姆一定会从哈德拉毛的部落民中征召保镖。我已经在别处详细地写到也门其他地区——见 Robert D. Kaplan, *Imperial Grun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on the Grou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ch. 1, and Robert D. Kaplan, "A Tale of Two Colonies," *The Atlantic*, April 2003。



并不一致。阿曼也展示了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与海洋和沙漠一样，对历史有同样的决定作用——无论是正面的作用还是负面的作用。这是我从印度洋的旅途中了解到的。苏丹卡布斯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使两个不同生存状态的地区——印度洋地区和阿拉伯沙漠地区——团结在一起。一些历史背景方面的知识将在下文依次陈述。

阿曼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因为其官方的边境线虽然只在内陆地区延伸 200 英里，但这样的边境线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沙漠化的内陆地区延伸得更为深入，直至今日的沙特阿拉伯及其以北。除今天沙特阿拉伯本身的人口外，阿曼可能是阿拉伯世界中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地区。但是由于阿曼地处阿拉伯沙漠的边缘，又紧邻印度洋，所以也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庇护所，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巴底斯教派（Ibadis）——7 世纪巴士拉哈瓦利吉派教师阿巴德·阿拉·本·艾巴德（Abd Allah bin Ibad）的追随者。

哈瓦利吉派（阿拉伯语意为“出走者”）否认伊斯兰世界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定都大马士革的伍麦叶王朝的宗教合法性，认为哈里发依靠被征服的非穆斯林人进行统治。哈瓦利吉派主张用圣战的方式与敌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一样——斗争，代表着“部落独立的最极端形式”。学者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写道：“他们不接受任何非自愿接受的权威，并经常性地否决达成一致的合意。”<sup>①</sup> 阿曼的哈瓦利吉派伊巴底斯教派否认伍麦叶哈里发的世袭权力，认为哈里发应由穆斯林民主选举产

---

<sup>①</sup>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st 2000 Years* (New York: Simon&Schuster, 1995), p. 66. See, too, Ayesha Jalal, *Partisans of Alla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生。但是这些伊巴底斯教派的教徒并不像哈瓦利吉派其他教派的教徒那么狂热。伊巴底斯教派禁止教徒杀害与其主张不同的穆斯林，并且对非伊巴底斯教派的教徒持宽容的态度。<sup>①</sup> 阿曼成了伊巴底斯教派传教士活动的大本营，特别是公元750年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政权被推翻之后更是如此。虽然伊巴底斯教派通过给予阿曼人统一的宗派认同而将阿曼内陆地区团结在一起，但也在其他方面造成了阿曼的分裂；伊巴底斯教派在哈里发人选问题上的民主主张导致了很多人血冲突。由于宗教谱系和政治一宗教派别的差异，阿曼沙漠地区的两百多个部落持续不断地发生争斗，即使海岸地区凭借印度洋贸易繁荣起来的时候也是如此。

因此，当阿曼港口挤满货物的时候，内陆的部落却遭受来自遥远的北方沙漠部落的侵略。<sup>②</sup> 因为阿曼国力很弱且不稳定，横跨海湾的强国伊朗干预阿曼内政，促成阿曼部落之间达成停战协议。<sup>③</sup> 1749年，阿曼赛义德王朝的建立者艾哈迈德·本·赛义德 (Ahmad bin Sa'id Al Bu Sa'id) 将交战各方统一起来，并且借此将波斯人赶出阿曼领土。但是自此以后，阿曼也逐渐走向衰落。1829年，苏丹赛义德·本·苏尔坦 (Sultan Sa'id bin Sultan) 亲自率部离开马斯喀特 (Muscat)，向南跨越印度洋，来到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阿曼人凭借可靠的季风给航船带来的速度，逐渐在桑给巴尔安定下来。随后，英国殖民者利用阿曼沿海统治者

---

① Calvin H. Allen Jr., "Oman: A Separate Place," *Wilson Quarterly*, New Year's 1987

② Calvin H. Allen Jr., "Oman: A Separate Place," *Wilson Quarterly*, New Year's 1987

③ 实际上，自古以来，波斯就对阿曼产生影响。由沟渠、小堤坝和储水池共同构成的 Falaj 灌溉体系，作为阿契美尼德 (Achaemenid) 帝国向外扩张的一部分，由波斯居民在公元前7世纪带进阿曼。

的无能，逐渐控制了阿曼事务。阿曼统治者有能力管理远在2000英里外的桑给巴尔岛，并将东非的拉穆（Lamu）和蒙巴萨（Mombasa）以及非洲境内的某些地方划入旗下，却无力击退来自附近沙漠地带的部落的进攻。

阿曼还存在其他问题。英国皇家海军执行废除奴隶贸易的命令，而阿曼恰恰控制着利润丰厚的东非地区的奴隶贸易。<sup>①</sup> 蒸汽时代的到来，使阿曼的航船——欧洲人统一称其为“单桅帆船”（dhow）——在某种程度上过时了。<sup>②</sup>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更缩短了欧洲到印度的距离，逐渐削弱了马斯喀特和阿曼其他港口作为印度洋中转站的重要性。

1913年，阿曼内陆的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发动起义，反抗马斯喀特的苏丹，决心恢复伊巴底斯教派的教长制，因为它可以更好地代表沙漠地区的伊斯兰价值观。在英国的帮助下，1915年，马斯喀特的阿曼苏丹击退了3000多名沙漠地区部落民的进攻。双方的协商一拖再拖，战争时断时续，这严重妨碍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1920年，双方终于签署了协议，同意互不干涉对方内政，实际上，这使马斯喀特和阿曼——分别代表沿海地区和内地——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阿曼的和平局面维持了35年，直到内陆地区丰富的石油储备引发双方新一轮的争斗。在这场争斗中，沙特阿拉伯支持内陆沙漠地区的阿曼教长国，而英国则支

---

① 应该说，从总体上看，阿曼的奴隶主并不像欧洲的奴隶主那样残忍。他们并没有让自己抓到的贫穷的东非奴隶过着行尸走肉式的生活，相反，他们会根据伊斯兰律法，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家庭，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娶媳妇。

② 这一点尤其令人震惊，因为在19世纪之交，在阿拉伯海北部地区，阿曼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海洋强国。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p. 355.

持马斯喀特的沿海苏丹。<sup>①</sup> 虽然英国支持下的苏丹赛义德·本·泰木尔 (Sultan Sa'id bin Taymur) 获得最终的胜利, 但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胜利。20 世纪 60 年代, 佐法尔地区爆发了分离主义的武装起义, 这场运动后来被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控制。起义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苏丹从政治领域退出, 保持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 并且回避发展。沿海和内陆分裂、苏丹和伊玛目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些老问题依旧存在。实际上, 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 阿曼与其说是一个国家, 毋宁说只是一个地理表述。

1970 年 7 月开始, 阿曼真正走上国家复兴的道路。在英国的帮助下, 苏丹卡布斯 (Qabus) 以近乎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的形式, 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父亲赛义德苏丹的统治: 政变中仅有一场小型的枪战。在这场枪战中, 老苏丹脚部中弹, 随后被迫流亡伦敦。29 岁的苏丹卡布斯对佐法尔部落民实行大赦, 并在佐法尔部落民所在的沙漠地区修筑水井、道路和桥梁。投降的部落民游击队员在英国重新接受军事训练, 然后成为国家武装力量中的非正规军。<sup>②</sup> 这位新任苏丹也开始密集会见皇室成员和除佐法尔外的部族成员, 说服他们归顺自己的统治。这是一个传统的平叛策略, 但这种策略一直非常有效。1975 年, 沙漠地区的叛乱活动结束了, 阿曼以现代国家的姿态迎来了发展的时代。

确实, 平息无政府状态必须以部族和部落为起点, 并以这些细小的单位为基础, 继续前进, 就像卡布斯所做的那样。特别是在沙漠里, 到处都是部落。从历史观点来看, 马克思主义者和自

---

①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p. 355.

②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p. 355.



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分别努力以苏联和西方为模型重构社会，他们严重低估了存在于国家层面以下的原始忠诚的存在。像圣·奥古斯丁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在《上帝之城》中解读部落，认为部落是一种基于亲情和种族的狭窄纽带，不带有任何普遍主义的信号。部落也许不能带来最高的善，但部落的存在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无论如何，部落本身的存在自然会成为一种有益的事情。卡布斯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中世纪传统中鼓舞人心的力量，将被海洋和沙漠的分割所困扰的多个部落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国家。

苏丹卡布斯创建了一种新中世纪体系，这一体系以与部落长老定期协商为基础，包含了民主的元素，因此，即使苏丹保留绝对权力，但其所做出的决定很少是武断专制的。这种办法重新恢复了内陆地区伊玛目和沿海地区卡布斯之间的联系，而两者之间的分裂一直是阿曼历史发展的主线。卡布斯也很聪明。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至踝长衫这种男式传统白色长衫已经被西方的涤纶衣服所取代，但苏丹或多或少地使用强制手段要求穿着长衫。这一举动，再加上对传统建筑的赞赏，为沿海地区和沙漠地区的文化统一奠定了基础，而这自然有助于民族国家建设。

在中东地区确实没有像苏丹卡布斯一样的统治者了。现在的他是个消瘦的70岁老人，没有结婚，独自生活，就像一位隐士一样。他身上有种故意的疏离感。他弹琵琶和风琴，爱好西方古典音乐，而他自己就是一位作曲家（他组建了中东地区唯一的一支由本地音乐家组成的古典交响乐管弦乐队）。他通过建立运作良好的政府部门使其统治更为制度化，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在内陆地区开办学校，致力于环境保护，制定法律禁止狩猎。一位专门研究阿拉伯世界的西方学者在私下场合说过，苏丹这位英国皇家桑赫斯特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是“中东地区最见多识广、

最有思想、最博学，也最善于表达（阿拉伯语和英语皆可）自己的领导人，他是这一地区唯一可以真正被称作复兴的人”，是伴随印度洋社会发展的世界主义的化身。

一位美国前任高官注意到，苏丹卡布斯战略思想的广度可与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匹敌。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为拥有这样两位开明且有能力的统治者领导印度洋两处最关键的要塞——霍尔木兹海峡在西，马六甲海峡在东——而感到幸运。甚至从表面来看，李光耀所在的新加坡和苏丹卡布斯所在的阿曼领土面积似乎太小了，这样有才能的领导人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据说，苏丹卡布斯可以从双方观点出发，详细地讨论巴以冲突问题。苏丹也致力于与伊朗发展友好关系，同时，他还为美国提供军事准入协议，以助其驱逐侵占阿富汗的苏联力量，帮助科威特驱逐伊拉克军队。后来，在美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前夕，苏丹又允许多达2万的美军士兵暂时驻扎阿曼。1979年，阿曼是唯一一个承认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签署的（戴维营）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霍尔木兹海峡内油轮能够航行的深水部分悉数位于阿曼境内——使得阿曼自身的战略利益与外部世界的战略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苏丹卡布斯则有天赋可以成为美伊冲突的调停人。就巴以冲突而言，苏丹在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但是，苏丹保持着半隐居的生活方式，并不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他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年老的绅士一样，过着只有书本和音乐的静居生活。对他来说，追求知名度（出风头）是性格懦弱的一种表现。

他极少接受采访，在公共场合露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他没有像其他的独裁者一样，每天都出现在印刷版的报纸中，没有像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或者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那样，其照片出现的频率达到令人厌恶的地步。在阿曼，并不存在对苏丹

卡布斯的个人崇拜，相反，在苏丹身上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当代阿曼所需要的品质。阿曼国内只有很少的军队或者其他武装力量，这与沙特众多的保安和用来保护旅馆及其他建筑的混凝土泽西（Jersey）路障和得克萨斯（Texas）路障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所有的成年人都穿着民族服装，面带微笑，当问及他们的领袖时，也会得到正面积极的回答；谈到民主或自由，一位阿曼朋友问我，“你们所说的我们没有的那种自由是什么呢？”有了美国在伊拉克提供的实证，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行径，我们不能埋怨阿曼人对这个问题的质疑。<sup>①</sup>我在阿曼访问期间，伊拉克战争依然十分激烈。

确实，美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存在过于偏重法律条文的倾向，将民主严格限制在法律和选举的范围之内。他们可能过多地强调选举行为本身，这种对民主的诠释非但没有增强美国的实力，反而有削弱国家实力的危险。在某些社会，尤其是中东地区，民主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非正式的协商，而不是一种官方的程序。如果没有类似阿曼、约旦和摩洛哥这些国家的君主，美国在中东还能有什么位置？更别提那些依然与反西方的极端主义分子斗争的专制君主。美国权力的未来在于必须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经历，而不能只看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美国人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非常幸运，是“一系列好事的组合”，而这些好的事物有共

---

① 一般来说，阿曼缺少政治自由，但基本还是尊重人权的。美国国务院2008年的《阿曼人权报告》指出，在苏丹的权威下，政府高度中央化。“2007年10月，大约有24.5万名选民登记参加议会（Majlis as-Shura）选举。”类似地，阿曼政府也限制出版、言论、结社和宗教权利，然而，最基本的人权基本会得到尊重。在阿曼，没有关于政府随意或者非法滥杀的报告，也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而无故失踪的报告，政府通常能够遵守不能随意逮捕或者监禁的规定。

同的发展源头，即民主和经济发展，或者社会改革。<sup>①</sup> 但阿曼的历史表明，美国人所认可的好事却变成阿曼的坏事，绝对的君主制也能产生好的结果。

阿曼的发展表明，在西方，民主本身即是目标，而在中东，则是通过宗教和部落的权威来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而实现这一切都要靠苏丹个人。当然，也有通过不受欢迎的压制型君主制实现民主的，幸好我们不是沙特阿拉伯人；幸好我们不在也门，那里的部分西部荒野地区存在部落无政府状态形式的民主；幸好我们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不像迪拜。

奇特的是，阿曼的平静得益于伊斯兰教伊巴底斯教派，该教派既不属于逊尼派，也不属于什叶派（非洲北部和东部这一小片土地上也有伊巴底斯派）。虽然因为对民主和无政府主义的看法不同，早期的伊巴底斯教派陷入内部纷争之中，但伊巴底斯教派就像一个多棱镜，也强调消除分歧、实现和解、顾全体面。伊巴底斯派有类似佛教的平静的一面，反对圣战，其中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可以推选代表为政府工作。伊巴底斯教派与至踝长衫、独特的头巾式帽子、镶嵌着珠宝的匕首和建筑物一道，有助于构筑统一的国家。

一定储量的石油和新发现的天然气，也有助于维护阿曼的政治和社会安定。苏丹通过保守的财政计划来经营这些产业。因此，用来计算财政预算的石油价格要远低于世界水平，以便能够有足够的盈余。苏丹本人的生活水平也低于很多美国的首席执行官（CEO）。他的住处并不是很豪华，阿曼的高官并没有配备成队的大型豪华轿车和喷气式飞机。这里并不存在海湾地区其他国

---

<sup>①</sup>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5 -6



家普遍存在的过度奢华。

苏丹的老练机智表现在温和的统治风格上，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时所表现出来的谦逊——几乎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首相们简单自然的风格一样，和伊朗的马哈茂德·内贾德以及委内瑞拉的胡戈·查韦斯之类言过其实的领导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似乎证明了苏丹本人所意识到的人性的懦弱。阿曼之所以能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完美，可能恰恰因为它是海湾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国家。

但是苏丹的政权现在也面临着模糊的威胁：社会变化的加速使阿曼相对隔离的状态岌岌可危。阿曼有半数人口年龄在21岁以下，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身着西式服装，戴着棒球帽。因为波斯湾内部船只航行须付出较高的保险额度，以及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在石油供给方面面临威胁，因此，他们在迪拜和阿曼的港口之间增加了更多的交通联系方式，这样，迪拜俗气的发展模式正在阿曼各地快速传播。迪拜的模式在这一地区经常备受抨击，认为其过于西化，但是就像全球化一样，这种模式有着难以抵御的魅力。为了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也为了使经济发展多元化，阿曼的苏丹现在也只好转向发展大众旅游业，在未经破坏的海岸上为欧洲人建造了很多度假村。当然，欧洲人的到来将会影响阿曼小心翼翼保护的传统文化。

这一激烈的变化发生在阿曼苏丹年届70的时候，谣传他罹患糖尿病，而且没有王位继承人。大家希望王室成员和各地的部落精英通过协商，能够在王储候选人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无人提议举行一次全国性大选，即使通过选举产生的新苏丹反映的是民众协商的结果，是民主的。阿曼并不适合美国式的问责和政策辩论，实行这样一种制度的背景是大众民主。然而民主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制度。只有在精力充沛且思想开明的领导者的掌控下，

阿曼所实行的极端中央集权制统治才能运作良好。但是，如果权力掌握在一个没有活力或者思想顽固的领导者手中，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时，这种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只能预示着灾难。像阿曼这样的专制国家，当一切都运行良好时，这种制度非常有效率，但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往往会变得难以驾驭。我作为外宾待在这里，与其他中东问题专家一样，对这位不为人知的慈祥的统治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我也为阿曼担心，因为这里太过完美。我曾留意缅甸和伊朗混乱的民主以及孟加拉国民主的回归，尽管阿拉伯世界在这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但我感觉，持续的经济增长必将在世界各地催生更自由的社会。信息工程和崛起的全球化需要这样的社会。在未来的岁月里，阿曼将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呢？接下来的几十年，这里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平静了。

宗教捐赠基金会（religious endowment）的神职人员萨尔米（Abdullah bin Mohammed al Salmi）向我解释了政府的观点：阿曼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部落伊玛目和国家元首之间的关系。因此，使沙漠地区的伊巴底斯教派伊玛目与沿海地区的苏丹融合，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民主试验。

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位于马斯喀特，落成于2001年，最能代表当地传统和印度洋世俗的结合。而在其他专制独裁的国家，这种工程很可能沦落为展示独裁者专权的标志，因而工程力图展示的是震慑人的巨大，而不是兼收并蓄，自然更不是文化和宗教作品。

我在想萨达姆·侯赛因位于巴格达曼苏尔（Mansour）地区的清真寺和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库斯位于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国之屋（House of the Republic）。这两栋建筑物都在统治者倒台的时候才完成一半；这两栋建筑怪物都存在不人道的一

面，而且都试图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法西斯式的建筑。卡布斯大清真寺与此不同。虽然它占地面积确实很大——长 3281 英尺，宽 2789 英尺，主塔塔尖接近 328 英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的比例都处理得很好且非常精密，同时也展示出纪念碑式的优美姿态。穿过院子，沿着拱廊，走在像是预先用铅笔在纸上勾画的轮廓一样精巧的尖角砂岩拱道下，就像在体验美学上的梦幻之旅，这一旅程涵盖从北非一端的伊斯兰世界到印度次大陆另一端的伊斯兰世界，其间绕了少许弯路到达中亚和口音很重的伊朗高原。这里有轮廓清晰的高耸的拱门，让人想起伊拉克；层层带阳台的尖塔，让人想起开罗；耀眼的精致的格子细工和五彩绘就的窗户让人联想到伊比利亚和马格里布；叙利亚式的木质雕刻天花板；清真寺的瓷砖令人联想到乌兹别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西部汉志省（Hejaz）清真寺的瓷片；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交替使用的白色和深灰色的石头拱廊；印度淡棕色的砂岩墙（修建清真寺的石头来源于此）；当然，还有伊朗手工编织的地毯和镶嵌着花纹的图案。希腊拜占庭、伊朗的萨非（Safavid）和印度莫卧儿的图像都汇集在这里，展现在带有黄金浮雕装饰的圆屋顶上，这令人联想到 21 世纪海湾地区存在的大胆的抽象现代主义。这与其说是阿曼值得庆祝的事情，不如说是阿曼周围上千英里地区文化艺术统一体值得庆祝的事情。阿曼统治者建造清真寺的主要意图是美丽和比例协调，而不是体现统治者兼建造者的政治合法性。在这座建筑里，几乎看不到苏丹的照片。虽然这是一个清真寺和宗教的结合体，但建筑的基调很明显只有一个：这个世界欢迎你。这是印度洋的精神，而非沙漠地区的精神。

这一能够产生有利影响的精神是贸易发展的产物，也是中世纪伊斯兰教和其他文明交流的结果——奇怪的是，在 21 世纪苏

丹卡布斯的身上展现了这种精神——但是这一精神并不能阻止海洋成为各大国冲突和竞争的地区，对它们来说，阿曼的重要性必将与日俱增。

虽然随着蒸汽时代的来临，阿曼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但现在它正凭借新扩建的集装箱港口慢慢恢复。在佐法尔空旷的沙漠上有大量重型起重机，从几英里外的塞拉莱（Salalah）港口就能看见。塞拉莱市内商业区有大型的露天市场和小吃店。它和边境附近的也门城镇有着如同非洲人民一样的热切关系。塞拉莱市正成为马士基集团（A. P. Moller-Maersk）主要的全球性中转中心，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终端集装箱公司之一。<sup>①</sup> 苏哈尔（Sohar）也同样出现扩张的势头，它位于阿曼的另一端，是水手辛巴达和阿哈默德·伊本·马吉德（Ahmad Ibn Majid）的故乡。现在，苏哈尔制订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发展计划，这里也将成为海上贸易和工业中心，港口建设投资超过120亿美元。苏哈尔有能力处理吃水深度达59英尺的集装箱货船，并且拥有石化、金属装配和后勤等综合设施。

看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所有的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波斯湾——世界的石油中心——日益变得更加拥挤和危险。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着它，过多恐怖分子的袭击策划也可能牵涉一个或多个集装箱或油轮。而且，随着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海湾地区已经不只是西方国家的生命线了，对东方来说它也同样重要。如果波斯湾禁止船只通行，附近通过铁路和石油管道与其相连的港口，会变得更加重要。而阿曼的苏哈尔港口，就坐落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相对稳定的阿曼便成为海湾国家与外部世界联络的替代选择。虽然21世纪的迪拜有可能成为19世纪

---

<sup>①</sup> 这家公司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 Maersk Sealan，是一家丹麦公司。



的亚丁——大英帝国印度洋上重要的煤炭装卸港口——名副其实的接班人，但迪拜位于波斯湾内部，从地理位置上说有一定的脆弱性，再加上去往迪拜的航行需要绕道实现跨洋集装箱运输，因此，这里更多地作为航空中转中心，而不是海上中转中心。<sup>①</sup>然而，佐法尔的塞拉莱还有一个优点，它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中心点附近，距离印度次大陆和红海几乎是等距离的：不论是古代还是 21 世纪，这里都是中转的最佳地点。与迪拜不同，这里的运输路线没有地理上的迂回，因此，塞拉莱提供维修、燃料、仓库以及货运站设施，每年为 1500 多艘船只提供服务。在过去的 10 年中，塞拉莱港口的收入持续呈两位数增长。铁路、输油管道加上大型港口设施，终于征服了沙漠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只留下海洋——自古以来人类凭借季风征服了它——作为最后的赢家。

---

<sup>①</sup> 2008 年 2 月 9 ~ 10 日，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何英成（音译，Engseng Ho），在由哈佛大学和迪拜举办的会议上做了关于《印度洋的港口城市国家》的发言。

## 第四章

# “印度这片土地”

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是由一些小型的童话式的港湾构成的。防波堤延伸进海水中，海面在黄昏下闪烁着银蓝色的光。这片白色的海港景观由莫卧儿和波斯风格的建筑构成，这些建筑有着绿色和金色相间的圆顶，杂乱地蜷缩在陡峭的锯齿状的浅灰色山脉旁。这里，没有大煞风景的设计丑陋的现代建筑。印度好像离这里很近，然而附近的迪拜却由于其迪斯尼式的全球化风格，好像离这里有半个世界之遥。

在马斯喀特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海港的地表，有两块岩石露头，犹如爬行动物后背上长出的角，两座葡萄牙堡垒的斑驳城墙坐落其上。这两座堡垒——贾拉里（Jalali）和米拉尼（Mirani）——分别建成于1587年和1588年，以巩固葡萄牙对海湾地区的掌控和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两座堡垒坐落在苏丹卡布斯的阿兰姆皇宫（Al-Alam Palace）旁边，以其壮观的对称性主导了海岛景观。这两座堡垒的出现极富意义，它们令

人想起防波堤和葡萄牙人修建的规模巨大的堡垒要塞。这些要塞分布在霍尔木兹、马六甲、澳门、莫桑比克，尤其是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卡提瓦半岛（kathiawar）上的第乌。<sup>①</sup> 3英尺厚的外城墙，弯曲的城垛，圆形的塔和螺旋状的台阶，多洞穴的房间和迷宫，它们是建筑工程顶尖的作品，由此可以想象葡萄牙人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征服故事。葡萄牙人的遗迹不仅使阿曼海岸变得美丽迷人，整个印度洋沿岸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如此。

印度洋的近代史时期是从其作为葡萄牙人的皇家湖泊开始的。在1498年达·伽马远洋航行后的20年内，葡萄牙人征服了东非和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之间最重要的航海路线和贸易网络。<sup>②</sup> 这并不意味着葡萄牙人是第一批在印度洋占据一席之地的远方力量，只能说明他们是第一批在印度洋内广泛开展活动的人。

事实上，欧洲参与印度洋事务自古就有牢固的基础。古希腊人曾经向南远洋航行至拉普塔（Rhapta），此地处于桑给巴尔岛附近的东非海岸。希腊人对锡兰也很熟悉。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他的《地理学》（*Geographia*）一书中对此有过相关描述。希腊人从孟加拉湾北上驶入恒河河口，这个地方距离今天的加尔各答不远。<sup>③</sup> 公元前1世纪，希腊航海家依巴鲁斯（Hippalus）通过观察季风的风向变化，绘制了一

---

①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 - 1825*,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H. Plumb (London: Hutchinson, 1969), p. 354.

② Landeg White, Introduction to Luiz Vaz de Camoes, *The Lusia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George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35

幅从红海到印度的直航路线，并把这些知识传给了罗马人。<sup>①</sup>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写道，每年“大约到了夏至日的时候”，一支罗马商业舰队在季风的帮助下从埃及经由阿拉伯到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冬季，在季风转向后又满载着丝绸、宝石、木材、象牙、异国的动物和乳香之类的香料返回埃及。<sup>②</sup> 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可能传到马拉巴尔海岸（托勒密是这样描述的）。<sup>③</sup> 然后，沿着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继续向南，到达印度的东南部，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罗马的双耳细颈瓶以及硬币。<sup>④</sup>

1500年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也门的红海和伊拉克巴士拉的波斯湾上崭露头角。通过占领也门，他们能够控制葡萄牙人进入红海的大门。土耳其人对葡萄牙人发动袭击，波及范围远至东非。即使他们在16世纪的重要时期控制了阿拉伯海北部的船只航行路线，但其想要在阿拉伯和波斯湾周边巩固地位

---

① 虽然对其是否真实存在仍存在争议，但依巴鲁斯可能是埃及—希腊人。他的发现的确切时间难以确定。自尼阿卡斯（Nearchus）以来，人们已经知道季风的风向变化。尼阿卡斯是亚历山大马其顿军队中的一位军官，公元前326年从印度返航。Hourani, *Arab Seafaring*, p. 25; Donald B. Freema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Gateway or Gauntlet?*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 Charles Verlinden, "The Indian Ocean: The Ancient Period and the Middle Ages," in Satish Chandra,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 (New Delhi: Sage, 1987), p. 32

②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 reprint, New York: Knopf, 1993), ch. 2. See, too,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 - 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65

③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p. 265.

④ Burton Stein, *A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Eng.: Blackwell, 1998), pp. 100 - 104, 127 - 128.



并在印度建立国家的企图最终化为泡影。葡萄牙人可以主张是他们最终挫败了穆斯林土耳其的野心,<sup>①</sup> 但是即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清楚地认识到印度洋的重要性——他们一直忙于在全球范围内和葡萄牙人竞争,但他们是一个过于依赖陆地的帝国,以至于很难维持在热带海域的行动。在与地中海地区威尼斯人和中欧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资源集中在与印度洋相距甚远的君士坦丁堡,所以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洋自然成了他们的一个小插曲。<sup>②</sup>

可以将土耳其人的所有成就与葡萄牙人进行比较:葡萄牙的战士和海员们在1510年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在1511年占领了马来海峡的马六甲;在1515年占领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马斯喀特附近);在1518年占领了锡兰的科伦坡。在绕过好望角的航行仅仅23年后,葡萄牙人就来到了爪哇岛。在亚洲修建的欧洲堡垒都是由葡萄牙人设计的。截至1571年,在广阔的印度洋海域上,像贾拉里和米拉尼这样的葡萄牙堡垒要塞有40个左右,挑战并在某些条件下控制着到黎凡特、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东亚的贸易路线。<sup>③</sup> 17世纪出现在地中海地区的葡萄牙人大帆船和战舰,按照船只的标准来说稍显笨重,但是把大三角帆和方帆结合起来,再加上船甲板上安放的大炮,这些船只远远优于土耳其人、埃及人和马来人的有桨单层甲板大帆船和

---

①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p. 323.

② For more details, see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vol. 2 (1949;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p. 1174-1176.

③ A. J. R. Russell-Wood,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808: A World on the Mo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2.

单桅的海盗船，也好于 16 世纪在印度洋见到的中国平底帆船和阿拉伯的单桅帆船。<sup>①</sup>

海上帝国是狂热的冒险者的天堂：他们没有原则地追求财富，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中世纪的冷酷，同时又陶醉在对圣母马利亚的热爱中。信仰和贪婪并行不悖。葡萄牙人只从他们认为的堕落的上帝子民那里攫取财富。这种坚定的信仰伴随他们度过了大洋上的很多风暴，也战胜了连续数月海浪的冲击。葡萄牙人的部队驻扎在船舱里，上百人挤在一起，受到疟疾和坏血病的困扰。在 1629 ~ 1634 年间，5228 名离开里斯本的战士中，只有 2495 人活着到达了印度，其中大多数人死于疾病、暴晒或者船难。<sup>②</sup> 在葡萄牙人的受难史上，他们来往印度的旅程属于圣经式的受难。

印度学者和政治家潘尼迦（K. M. Panikkar）把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和南亚的海事扩张描述为“企图回避中东地区难以对付的伊斯兰陆地强国”，这样他们就可以突破“地中海的地域限制。”<sup>③</sup> 除了这种枯燥的战略逻辑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血气方刚的基督教宗教热情。潘尼迦提醒我们，十字军东征精神在伊比利亚半岛存在的时间要长于欧洲大陆。在伊比利亚，伊斯兰不仅仅只是来自远方的威胁，而是近在咫尺的危险，因为伊斯兰王国在葡萄牙的国门口存在，并且非常活跃。“伊斯兰教是我们在各

---

① “平底帆船”是东南亚语“Jong”的英文形式，10 世纪的中国宋代生产了一系列先进的中国船只。

② 从里斯本航行到印度的果阿，如果中途不经停，通常需要 6 ~ 8 个月的时间。A. J. R. Russell-Wood,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 - 1808: A World on the Mo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7, 58, 59, 73, 119, 219.

③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Allen&Unwin, 1959), p. 17

处都要与之战斗的敌人。”<sup>①</sup> 这一事实最能说明葡萄牙人在大印度洋地区所作所为的冷酷和残暴。作为同时代的葡萄牙历史学家，若望·德·巴洛斯（Joao de Barros）为当地惊人的人口死亡数字进行辩护，他写道：

摩尔人……在耶稣的神圣律法之外，耶稣的律法是真正的律法，是所有人永恒的在地狱之火的诅咒下都要遵守的律法。相比于律法，肉体又有什么权利呢？<sup>②</sup>

具有争议的是，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努力除了成就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之外，一无所成。前七次十字军东征的焦点都在黎凡特（与地中海东部毗邻的伊斯兰土地），而这一次东征却试图征服更远的东方土地，这一地区包括4个伟大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伊朗萨菲王朝、印度莫卧儿王朝和中国明朝，其中3个都是伊斯兰王国。<sup>③</sup>

这些因素都集中在传奇性的人物恩里克王子（infante Henrique）的身上，人们也称他为亨利王子。潘尼迦写道，航海家亨利王子很早就吸收了基督教好战的神秘主义精神和对伊斯兰教强烈的仇外情绪。1415年，作为一名年轻人，亨利王子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针对摩洛哥休达（Ceuta）地区的远征行动——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对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大本营发动进攻。因为711年伊斯兰教就是从休达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所以这一事件有着深远的意义。从那时起，至少在传说里，亨利失去了对有限

①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9), p. 24.

②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p. 190.

③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pp. 17, 24, 313

军事行动的兴趣，开始策划从印度洋基地包围伊斯兰世界的大型战略。这一战略还附带着暗中破坏阿拉伯人在东部香料贸易中担当中间人的角色。这一神话继续发展，因此，亨利王子开始迷恋印度，这引发了他对航海的兴趣。据说他邀请了“数学家、制图专家、天文学家和了解远方岛屿情况的摩尔囚犯”<sup>①</sup>到他位于萨格里什（Sagres）海角的城堡和要塞中，这里位于葡萄牙和欧洲的西南角，三面为海风吹拂下的大西洋所环绕。在大西洋狂暴的海洋环境中，这里诞生了征服另一个大洋的计划。

事实上，就像牛津大学学者皮特·拉塞尔（Peter Russell）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传记》一书中所写的，这些很多都不是事实。这一观点否定了潘尼迦和其他人的看法。亨利眼中的印度不过是今天的非洲好望角，没有到达更远的地方。虽然是一名十字军战士，但亨利可能并没有对打败伊斯兰世界有很成熟的想法，而且他也并没有退隐到萨格里什岛去专心研究制图和航海。<sup>②</sup>但是在亨利死后，关于他航海经历的传说就像所有的传说故事一样越传越多，这是事实：它们显示了一个民族真正的动机和渴望。在这里，这个“民族”就是葡萄牙。

除了寻找粮食、黄金和香料，葡萄牙人确实有想要征服伊斯兰世界的欲望，这种欲望随着1453年穆斯林土耳其人占领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而变得愈发强烈。<sup>③</sup>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史上，亨利不是被当作十字军东征故事中的一员，而是被看作

---

①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p. 25.

② Peter Russell,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A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但是正如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所指出的，土耳其人在达·伽马远洋航行之后占领了埃及和叙利亚，因此，围攻土耳其只是葡萄牙对抗伊斯兰世界的圣战精神的一部分。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vol. 2, pp. 667 - 668.



探险时代的仁爱人士。其实他就是十字军东征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他所谓的航海团队（事实上也许并不存在）为葡萄牙航海家开创性的全球航行奠定了基础。

亨利王子死于 1460 年。以亨利在组织沿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沿岸开展的探险活动中所积累的知识为基础，迪奥戈·康（Diogo Cão）才能够于 1483 年从葡萄牙向南航行直至非洲的刚果河。最终，一位迄今仍不出名的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于 5 年后环绕非洲大陆航行，第一次使葡萄牙人与印度洋建立了联系。迪亚士根据一则小故事将其命名为好望角，因为他想要再次回到那里并成功到达印度。但是在另一次航行中，由于乘坐的船在南大西洋解体，迪亚士因此丧生。1497 年，达·伽马率领横帆式的四艘船绕过好望角，沿东非海岸继续前行，到达马林迪（Malindi），也就是今天的肯尼亚。

在马林迪，阿拉伯人上百年积累下来的关于印度洋的知识——这里的季风、洋流和他们常去的地方——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这个人就是出生于阿曼的领航员艾哈迈德·本·马吉德（Ahmad ibn Majid）。马吉德同意帮助达·伽马。马吉德曾在印度洋上航行了半个世纪，是真正的阿拉伯海洋文化宝库。<sup>①</sup> 他知晓进入底格里斯河和印度河河口的最佳地点；知道穿过莫桑比克浅滩的道路；知道在印度和红海两岸的最佳着陆点。<sup>②</sup> 由于阿拉伯世界的松散和多样化，再加上东非离伊比利亚半岛和中东的距离都很远，所以葡萄牙人能够与马吉德这样的阿拉伯人合作，

---

① 不仅是阿拉伯人，印度人也很早就开始在东非和马六甲海峡以外的婆罗洲之间的大印度洋探险。

② Saudi Aramco World, June/July 1962.

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葡萄牙人仍然计划打败阿拉伯人。

也许是马吉德，或者是由他推荐的另外一个领航员，总之，一位阿拉伯领航员在 1498 年的春天帮助达·伽马顺利越过印度洋，从肯尼亚来到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整个航程仅用了 23 天的时间。有了西南季风的帮忙，这是一段速度奇快的旅程<sup>①</sup>（相比 16 世纪末从威尼斯到圣地耶路撒冷，越过地中海一小段路程需花费两个月的时间）。与其说葡萄牙人“发现”了印度——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很早以前就已经这么做了，不如说葡萄牙人使欧洲重新与印度洋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因为当季风将达·伽马带到印度的时候，他并没有为欧洲重新发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

这是借助一个文明的知识和技能“发现”另一个文明的典型例子。毕竟葡萄牙人得到了马吉德特别的帮助，他们也受惠于这种帮助。更宽泛地说，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给葡萄牙人提供了地图和星盘（六分仪的前身），所以中世纪的地图绘制在这些伊比利亚半岛航海家的帮助下达到了巅峰。<sup>②</sup>

通过打通欧洲到东方的海上通道，葡萄牙航海家在终结人类不同分支相互孤立隔绝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当然，这一过程也受惠于丝绸之路和其他穿越亚洲的陆地路线。但 14 世纪中国元朝全面崩溃，之后帖木儿王朝也走向衰落——更别说波斯萨

---

① 他们在 5 月 20 日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回程中，由于逆风，他们用了 4 个月的时间。几乎一半的人失去了生命，幸存者也因为坏血病而元气大伤。Felipe Fernandez-Armesto, *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New York: Norton, 2006), p. 180.

② 星盘是一个薄薄的铜盘子，铜盘上有一个支杆围绕轴心转动，用来测量已知星星的高度，以计算纬度和时间。在 18 世纪后半期，巴格达出现了这种星盘，星盘由 Muhammad ibn Ibrahim al-fazari 所造，艾哈迈德·本·马吉德使用的就是这种星盘。

非王朝在 16 世纪的崛起引起其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紧张对峙，这些横跨亚洲大陆的陆路交通路线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而且葡萄牙人能够非常容易地通过海路来到东方，这本身也预示着这些帝国将进一步走向衰亡。<sup>①</sup> 随着通向东方的航海路线的开辟，东方世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卷入了欧洲各国间的竞争。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动荡的世界史，而不是单纯的欧洲史，或者印度史，或者中国史。<sup>②</sup> 如果不涉及其他地区，根本无法书写某一特定地区的历史。

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更加显著的效果是削弱了地中海的重要性，转而拥抱面积更加广阔的印度洋，与这一地区丰富的文明建立联系。<sup>③</sup> 达·伽马的成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次航海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的忍耐力：很显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种忍耐力几乎不可思议。在坏血病流行的时代，经年累月在船上航行的想法是疯狂的。确实，这是性格（character）取得的成就，尽管达·伽马的航海不是导致葡萄牙帝国在印度洋兴起的直接原因，却是另一位航海家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Albuquerque）的才智和忍耐力的动力之源。

德·阿尔布克尔克在达·伽马后不久就完成了环绕非洲到印度的旅行，在这次航行中他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即支持那些对葡萄牙人友好的马拉巴尔沿岸的统治者。他发现，像印度洋这样地域广阔的地方不能永远被一个像葡萄牙这样距离遥远而面积

---

① Patricia Risso, *Merchants&Faith: Muslim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Indian Ocean* (Boulder, CO: Westview, 1995), p. 36; Ja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1-42.

② This section draws broadly from Boxer's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③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p. 43.

又小的国家控制，除非葡萄牙不但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还要在那里建立葡萄牙的海外文明基地。葡萄牙仅仅掌握好望角、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这些主要的出海口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在印度建立自己的海外首都。德·阿尔布克尔克在果阿建立了葡萄牙殖民地，这里慢慢发展成为葡萄牙人教堂和城堡的前哨基地。果阿位于今天印度西部贡根（Konkan）海岸孟买的南方。为了控制和发展果阿，再加上对穆斯林刻骨的仇恨，阿尔布克尔克与印度教的查耶那加尔帝国（Vijayanagar）结成战略联盟，将果阿所有的摩尔人屠杀殆尽。因此，虽然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我们却并不能将他浪漫化。

这位有着总督头衔的“东方的恺撒”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从这里他派出远征队尽全力探查和控制东印度群岛。他在索科特拉岛（Socotra）上建立堡垒，试图部分阻断曼德海峡和东印度群岛的联系，切断阿拉伯商人经由红海到达印度的能力。<sup>①</sup>他想要阻止穆斯林使用这片海域的愿望，最终由于葡萄牙资源完全枯竭而破灭。他要在离葡萄牙本土军事基地几千英里之外的地方经营海外军事基地，但是他手下的船员只有4000多人，而且只有一支小小的舰队，更致命的是，他这时已经是五十开外的老朽之人。<sup>②</sup>德·阿尔布克尔克在一个势力衰微的帝国中豪取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海洋范围。从战略角度讲，现在别无选择，只有尽力完成全球海上体系的建设。这一海上体系处于美国的松散领导之下，并且得到印度的协助，但愿也能得到中国的帮助。

---

① William Dalrymple, *The Age of Kali: Indian Travels and Encount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8), p. 238.

② Alan Villiers, *Monsoon Seas: The 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p. 161 -165.



然而，尽管德·阿尔布克尔克取得了非凡成就，但大多数印度洋地区依然如故，即使在葡萄牙帝国的全盛期，印度洋沿海地带的变化也是平缓的。学者菲利佩·费尔南德兹·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写道，“印度本地的帝国和贸易伙伴国仍然占主导，并没有过多地受到边缘地带高速发展的欧洲的影响。”<sup>①</sup> 阿曼沿海地带只有少数几个葡萄牙人的防御工事，而沙漠内陆地区则根本没有。同时，虽然葡萄牙可以阻止红海上的伊斯兰船只以实现包围伊斯兰势力的战略，他们在阿拉伯海击败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舰队，<sup>②</sup> 公海地区也许看起来像是基督徒的势力范围，但绝大多数的海岸线和内陆都不在基督徒的掌控范围之内。

作为最初的现代国家，葡萄牙不仅是最弱的，也是最具中世纪风格的。它的航海家们打开了窥探广阔世界的大门，但是却以野蛮屠杀的行径实现其目标。与其说葡萄牙人发现了东方世界，不如说他们在这片大陆上上演了“海盗式的屠杀”，从而慢慢破坏了以互惠和平的海上贸易为基础的网络，这一贸易网络数个世纪以来将阿拉伯和波斯世界与遥远的东方世界连接起来。但是，因为与葡萄牙人痛苦的交往经历，导致中国和日本陷入与西方敌对的孤立状态。然而，葡萄牙人让东方人认识到的只是中世纪后期的欧洲，还不是真正的现代西方。

为了控制摩洛哥而进行的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战争，使葡萄牙人的感情变得更加冷漠，他们的军人转变为真正的开拓团。<sup>③</sup> 在葡萄牙人那里，现代形式的传教计划被抛弃，开始向曾作为最坏

---

① Fernandez-Armesto, *Pathfinders*, p. 181.

② R. B. Sergeant, *The Portuguese Off the South Arabian Coast* (Oxford, Eng.: Clarendon, 1963), p. 15.

③ Michael Pearson,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125.

代表的宗教裁判靠拢。在这些海员的眼中，因为东方人都是异教徒，所以在叙述掠夺过程的时候，他们丝毫不感到羞愧。英国已故学者普卢姆（J. H. Plumb）曾这样写道：

他们屠杀俘获的穆斯林单桅帆船上的船员，将其中一些船员从桁端抛射出去以练习抛射技术。他们也将一些人的手脚砍下，然后将装满手脚的船只送到当地统治者那里，告诉他们用这些材料烹制咖喱菜肴。葡萄牙人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早期，每当交易的时候，他们几乎都要侵占一些商品……基督的孩子从事血腥的贸易，他们建立教堂、布道团和神学院，因为，掠夺行为毕竟是一场圣战：无论达·伽马得到的奖赏有多大……其余的人可能还在世，而后来的人将会以巨大的荣耀看待它们。<sup>①</sup>

达·伽马到东方寻找“基督教和香料”，所以在返程的船上装满了胡椒，而在印度海岸被击沉的一艘商船上装载着700名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sup>②</sup> 1507年，德·阿尔布克尔克洗劫和焚烧了马斯喀特城。葡萄牙劫掠者占领了锡兰和缅甸的部分地区，把上万居民卖为奴隶。这样的行为，再加上葡萄牙人征服土地面积的扩大，更要求对自己的信仰有精确的把握，正如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在《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

① Plumb in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 xxiii.

②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pp. 172, 198. See, too, Gaspar Correa, *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 (1869; reprint,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Microfilms, 1964); and Nick Robins, *The 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How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haped the Modern Multinational* (Hyderabad, India: Orient Longman, 2006), pp. 41–42.

Wisdom) 中所写, “我们现代人视为棘冠的存疑之心”。这样说来, 葡萄牙人恰恰达不到现代的标准。<sup>①</sup> 英国已故学者 C. R. 博克舍注意到, 尽管他们会感到短暂的疑虑, 但“确信上帝站在他们一方, 上帝将会而且一定会干涉他们的行为”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就像他所写的, 当 1415 年夺取摩洛哥的休达时是如此, 整个 15 ~ 16 世纪葡萄牙人在非洲西海岸和其他地区探险的时候也是如此。<sup>②</sup>

葡萄牙人确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命中注定要投入维护信仰的战斗。葡萄牙人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宗教民族主义, 这种宗教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所有宗教民族主义一样强悍, 而且经常是极端的。<sup>③</sup> 葡萄牙人对印度洋沿岸地区令人惊叹的彻底征服, 与 9 世纪阿拉伯人对北非的征服属于同一类别。在后国家时代的西方, 我们应该牢记, 士气仍然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 尤其是为刻板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支持的士气, 经常是宗教和民族主义结合的产物。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和中世纪晚期的葡萄牙人曾经代表的这种信念, 对今天的我们提出了挑战。在相当程度上, 美国的权力将依赖于它如何对抗那些比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的狂热的敌人。

葡萄牙既是一个奴隶帝国, 也是一个军事帝国。与西班牙在新世界的统治方式不同, 西班牙人在征服墨西哥和秘鲁后, 通过

---

①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London: Jonathan Cape, 1926, 1935), ch. 3.

② 博克舍在其杰作《葡萄牙人的沿海帝国》(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中提出这个有争议的观点, 学者 Holden Furber 对此观点在某些方面提出挑战, 他认为航海时代亚洲和欧洲之间有亲密的合作。Ashin Das Gupta and M. N. Pearson, eds., *Indian and the Indian Ocean, 1500 - 1800* (Kolka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1.

③ Boxer,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p. 377 - 378.

非军事的行政官员控制殖民地（至少最初是这样的），而大部分从里斯本航行至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男性都是士兵。“这是一片征服的新领域”，16世纪晚期果阿一位圣方济会的传教修士这样描述自己的观点。<sup>①</sup>

这一地域——越过好望角，从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帝汶岛——葡萄牙人称之为印度，或者印度总督府（Estado da India）。实际上，他们也称呼整个东方为印度群岛或者印度，就像我们看到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教教徒和其他的商人将这一区域转变为可辨识的文化体系，形成一个整体，在明显的可以感知的意义上说，可预测的季风使这一地区变得更小。

为了进一步理解葡萄牙人为何能够如此迅速地在地球上的这一区域站稳脚跟，我们需要认识到，气候、文化和贸易体系确实将印度洋沿海地带结合成一体，但从政治意义上说，这一广阔的地域是弱小国家组成的集合体，支离破碎，甚至处于半混乱的状态，易受到有野心的外来者的征服和影响。阿曼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当阿曼沿海地区统一起来的时候，内地的沙漠地区却经常制造混乱。

就文化和政治多样性而言，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地图都无法超越16世纪初期的印度洋。这里展现的是受到约束的无政府状态（controlled anarchy）。从西到东，印度洋地区有东非沿海的斯瓦希里城邦国家；其他非常重要的还有基卢瓦（Kilwa）、蒙巴萨（Mombasa）、马林迪（Malindi）和帕泰岛（Pate）。可以这么说，阿拉伯语是他们文化上的通用语，也混合了部分的波斯语。沿着东非海岸继续向北航行，然后转向阿拉伯半岛，

---

<sup>①</sup> Boxer,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 296.



在这里，葡萄牙人遭遇阿曼与其他几个国家和部落，这些国家和部落有一部分是独立的，但大部分受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皈依伊斯兰教的奴隶王朝，13世纪到15世纪统治埃及、叙利亚和汉志地区）的控制。再向东行驶，越过波斯湾，伊朗伊斯兰什叶派新建立的萨非王朝在内陆地区扩张，在其扩张的边缘地带，与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发生冲突，这场冲突很快耗尽了双方的力量。印度次大陆此时还没有被来自中亚突厥族的莫卧儿王朝所征服，因此仍然分属于印度教和伊斯兰王国。印度北部是古吉拉特、德里和孟加拉等伊斯兰王国。印度南部德干高原地区的其他伊斯兰王国之间征战不断，它们也与印度教的查耶那加尔帝国（阿尔布克尔克在果阿建立殖民地的时候，与查耶那加尔帝国联合）发生战争。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遍布印度沿海地区和锡兰各地，锡兰也同样分属于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

至于今日被称为东南亚的地区，用博克舍的话来说，这一地区被一些处于征战状态的国家所占领，由于政权万花筒式的变换，即使想要大纲式地了解其发展线索也都不可能。从马来西亚半岛到印度尼西亚有帕塔尼（Patani）、宋卡（Singora）和暹罗人（泰族）政治影响下的六坤（Ligor）王国，该王国“也受到中国文化和商业联系的影响”。马六甲是半岛最富裕的苏丹国。14世纪，马六甲的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如此，港口依然欢迎印度教商人。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主要岛屿分属于处于交战状态的小国。至于中国，因为舰队司令郑和的缘故在印度洋曾有过很强的实力，但在倭寇和蒙古游牧民族的压力之下，实际上正从印度洋地区撤退。<sup>①</sup>

---

<sup>①</sup> Boxer,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p. 39 - 43.

如果读者开始感到困惑，那就是我要谈到的问题的要点。就像7世纪伊斯兰教占领阿拉伯和北非地区的时候，这里出现了权力真空——当时衰弱的拜占庭帝国和柏柏尔人（Berber）曾在一段时间内控制该地区。葡萄牙人处于攻势的时候，印度洋地区的王国也处于衰落状态，中国明朝、波斯萨非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为国内矛盾困扰。此外，在航海时代，季风使印度洋的政治霸权变得不可能。因为在季风的影响下，单程交通非常迅速，但在某个时段内，季风经月不变，往返航程又变得异乎寻常地缓慢。<sup>①</sup> 因此，葡萄牙人对东方的征服并没有达到填补巨大权力真空的程度，尤其是中国撤退后留下的真空。这样，印度洋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虽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葡萄牙人心胸狭窄而且缺乏文化素养，但也能够做到心胸开阔，而他们集体人格中的这一面被证明是帝国最成功的技巧。<sup>②</sup> 最后，外交官、商人、博物学家和艺术家都加入战士的行列，往返于里斯本、波斯湾和印度之间。很多的旅行者都是受过教育的、求知欲强的人，他们并不把旅程作为最后的拯救之路。“葡萄牙人搜集信息的深度、广度和丰富度是当时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拉塞尔－伍德（A. J. R. Russell-Wood）这样写道。就像马吉德的例子所显示的，葡萄牙人依赖阿拉伯领航员横跨印度洋宽广的水域，从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到锡兰、泰国和东南亚群岛这段航程也由阿拉伯人、古吉拉特人、爪哇人和马来亚人领

---

① Risso, *Merchants & Faith*, p. 52.

② 有些学者主张，葡萄牙人的行为并不比荷兰人和英国人更恶劣，英美人的傲慢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负面形象的原因。Kenneth McPherson, *The Indian Ocean: A History of People and the Se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7

航。葡萄牙人雇用当地军队，对当地的技术和知识有高度的认同感。他们成为印度物品的鉴定家，尤其是家具。拉塞尔-伍德这样写道：“看起来，在葡萄牙人游历的过程中，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都无法逃脱葡萄牙人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sup>①</sup> 有时，他们也会表现得非常凶残，尤其是在非洲，葡萄牙人以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建立要塞和贸易站，但只有在多次谈判失败后，他们才会这样做。<sup>②</sup> 实际上，美国可以从葡萄牙帝国特征中的积极方面学到很多，这些积极的方面在季风的亚洲打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包括很多人皈依天主教，斯里兰卡和马六甲等地坚持使用葡萄牙语等。

葡萄牙人陶醉于他们新发现的财富，坐失良机，掠夺的战利品运回帝国后，并没有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葡萄牙依旧是一个古老的、行将没落的小贵族国家，缺乏 20 世纪才出现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旧时的贫穷促使年轻人沉醉于奢华和远距离冒险。想想里斯本的冬季，用 20 世纪早期葡萄牙哲学家兼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话来说是“Ragged majesty”，即“衣衫褴褛的威严”。<sup>③</sup> 因为天生的保守主义，文艺复兴在葡萄牙只是昙花一现，欧洲的反宗教改革、耶稣会的兴起和宗教法庭，所有这些共同作用，扼杀了远离比利牛斯山脉的这片土地上的启蒙运动。在葡萄牙人的印度洋帝国中，唯一的高等教育机构是耶稣会和其他宗教组织，而这些机构都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穆斯林满足于从黎凡特到远东这一范围广泛的热带海洋地区的移民庇护，停滞不前。

---

① Russell-Wood, *Portuguese Empire*, pp. 15, 18-20.

② Russell-Wood, *Portuguese Empire*, p. 21.

③ Fernando Pessoa, *The Book of Disquiet*, trans. Margaret Jull Costa (1982; reprint, New York: Serpent's Tail, 1991), p. 52.

伊斯兰帝国仅仅比葡萄牙维持的时间长了一些，葡萄牙人的帝国后来被荷兰人和英国人“蚕食”。<sup>①</sup>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最后失败了：葡萄牙帝国的现实和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最终导致基督教世界的分裂。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也完成了希腊和罗马在地中海完成的事业：他们给印度洋地区营造了文化和历史上的统一，至少西方人是这样想的。实际上，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建构的神话是建立在很久以前模糊记忆的基础上，而路易斯·瓦斯·德·卡默斯所著的关于葡萄牙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征服行为的史诗性诗歌《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则是根据特定的历史事件——达·伽马远航至印度——撰写的，达·伽马的航行发生在卡默斯写作之前的几十年。

卡默斯的达·伽马与奥德赛或埃涅阿斯不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合成人物，因此，达·伽马不是浪漫的或悲剧式的，甚至也不是有趣的。就像上文所叙述的，达·伽马最显著的特征只是他的忍耐力：他容忍数年来的不安定、孤独和物质上的艰难——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上，忍受腐烂的食物和令人讨厌的坏血病，在近海战斗中，炮弹又会炸伤身体，而里斯本的同辈人却在享受着家乡晚宴的奢华。<sup>②</sup> “心里诚惶诚恐”，就像诗中描述的，“他已经准备好迎接意外不测的降临。”<sup>③</sup> 在暴风雨中，“大海时而敞开地狱的大门”，“命运的无常使他心乱如麻”，

---

① Russell-Wood, *The Portuguese Empire*, pp. 23, 198.

② C. M. Bowra, “Camoës and the Epic of Portugal,” in his *From Virgil to Milton* (1945; reprint, London: Macmillan, 1967), pp. 99 – 100; Luiz Vaz de Camoës, *The Lusiads*, trans. Landeg Wh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nto Five: 81.

③ Camoës, *Lusiads*, Canton Eight: 86.



达·伽马向人间求援已无可能，只有转向上帝。他呼唤：

到头来您为何把我们抛弃？  
何况我们的事业对您非但不是亵渎，  
而且完全是为了弘扬您的尊荣……

他这样说着，只见狂风  
仍像野牛在吼叫搏斗，  
暴风雨越来越猛烈，  
在桅索之间呼啸；  
可怖的闪电一刻不停……<sup>①</sup>

他们从暴风雨中幸存下来，到达印度。因为卡默斯所描述的探险活动在文学上是非常真实的，所以路索斯（传说中葡萄牙的建国者）的儿子们在广阔而未知的海域中发生的故事，最后分析起来比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近岸”史诗更加不同寻常。<sup>②</sup>就像卡默斯在诗中提出的，奥德赛或者埃涅阿斯“敢于在真正的海洋中航行吗……他们看到了达·伽马所看到的些微内容了吗？”<sup>③</sup>如果困难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就像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所遭遇的情况，很难想象还会有多少奥德赛。可能只有人类踏上通向其他星球的旅程，在旋转的地球上，才会真正体会到葡萄牙海员所经历的遥远而孤独的旅程的痛苦。

① Camoes, *Lusiads*, Canton Eight: 86. Canton Four: 87; Six: 80 -84.

② White, Introduction to the *Lusiads*. See, too, Sanjay Subrahmanyam,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4 -59.

③ Camoes, *Lusiads*, Canton Five: 86.

在诗中，站在那里看守好望角（风暴之角）的巨型食人魔阿达马斯托（Adamastor），唤起了水手的恐惧和怀疑，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向远方探险？然而，他们并没有返回。确实，《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浓缩了15世纪末和16世纪葡萄牙人所取得的成就的精髓：用已故牛津大学学者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的话来说，将西方从“有限的地中海观点”中解脱出来，“转变为面向半个地球视野”。<sup>①</sup>

卡默斯是第一个跨越赤道、造访热带和东方的伟大的欧洲艺术家。在“不可预知的航线上”，只有依赖“凶险海洋上的脆弱的木船”<sup>②</sup>的保护。他对印度洋及其对人类可怕影响的极端而复杂的描述表明他对印度洋的了解之深：

突如其来的霹雳震耳欲聋，  
闪电霍霍把苍穹照得如同白昼，  
暴风雨之夜黑暗恐怖，  
闪电霹雳世界为之崩摧……<sup>③</sup>

卡默斯也对东方做了生动清晰的描述，所谓的东方即印度洋沿岸地区，或者是他简单称之为“印度土地”的地方。他谈到在莫桑比克有用棕榈叶制作的帆船，也谈到当地居民袒露前胸，拿着匕首；马林迪人穿着紫色的有腰带的长袍，国王则穿着柔软而光滑的凉鞋；然后又谈到佐法尔是“祭坛上所用最好、最馨香的香料的来源地”；波斯湾的巴林岛“洋底遍布珍珠，几乎可

① Bowra, *From Virgil to Milton*, p. 86.

② Camoes, *Canton One*: 27.

③ Camoes, *Canton Five*: 16.

以与黎明前的亮光相匹配”；印度王宫“遍布亭阁和舒适的树丛”，馨香的槟榔、香水及胡椒粒、小豆蔻、辣椒和宝石，还有“印度教怪异的神灵形象：夸张的色彩和很多的肢体”。他描写马尔代夫海底植物、帝汶岛的檀香树、缅甸的男人生殖器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铃铛”<sup>①</sup>。因为诗人走过达·伽马曾经走过的航程，所以他的诗中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描述。卡默斯对他在印度卡利卡特王宫参加宴会情况的描述引发科尔特斯远征编年史家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对墨西哥阿兹特克文明奇异怪诞的描述。

卡默斯 1524 年出生，祖籍加利西亚。他在葡萄牙中部城市可因布拉（*Coimbra*）长大，并进入中世纪著名的大学求学。在大学里，因为文艺复兴古典精神全面的影响，他能够埋头于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中。“如果我们记得他是在远离古典书籍的非洲和亚洲的城堡要塞中书写史诗 [书中引用了大量古典和其他文献材料]，那么就可以体会到大学教育对他影响的彻底性。”<sup>②</sup> 英国学者艾德加·普雷斯蒂奇（*Edgar Prestage*）这样写道。

1544 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在里斯本的一个教堂，卡默斯初次见到 13 岁的女孩嘉蒂丽娜（*Caterina de Ataide*），并爱上了她，而女孩却拒绝了他的求爱。然后，他度过了一段消沉的日子，甚至想到自杀。在这段时间，卡默斯可能参加了一场决斗。无论如何，他的鲁莽之举导致其被逐出宫廷生活。1547 年，卡默斯参军，在休达（*Ceuta*）服役两年。在休达期间，卡默斯与当地摩

---

① *Bowra, From Virgil to Milton*, p. 97; *Camoës, Canton One*: 64, and *Ten*: 102, 122.

②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sup>th</sup> ed. (New York, 1910)

洛哥人发生了一场小冲突，导致右眼失明。回到里斯本后，卡默斯因为毁容而受到贵妇们的嘲笑，他因而加入放浪的吉卜赛年轻人的帮派，并一直期待得到政府委派的官职，然而王宫拒绝了他的请求。随后，在一次街头冲突中因伤害一名宫廷侍卫，卡默斯被投入监狱。作为免受牢狱之苦的交换条件，卡默斯再次从军并要求服役5年。这次，他被派往印度，而这几乎意味着死刑判决，因为那一年去印度的四艘船中，只有他乘坐的船安全到达印度。

在离开里斯本6个月后的1553年，卡默斯乘坐的船停靠在果阿——一座军事要塞，由德·阿尔布克尔克建立，驻扎有10万人。从果阿出发，卡默斯沿着海岸继续自己的战斗任务，教训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小统治者。他参与一次返航舰队打击海盗的行动，该舰队横渡阿拉伯海，然后溯流而上到达红海和波斯湾。这一海域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海盗的困扰。接下来，卡默斯也参与了非洲之角、亚丁湾和东非蒙巴萨扫荡海盗的行动。在返回印度后，他继续扬帆远行，这一次向东行驶，来到马六甲和澳门。他的一生就好比葡萄牙在新建立的印度洋帝国制定政策的编年史。所有这些经历都被卡默斯写进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最后一章，他力图将异国他乡的冒险和深深的思乡情绪——即在葡萄牙海员中普遍存在的特有的哀伤情绪，这些海员称之为“萨乌达德”（saudade）——结合起来。

他必须重写史诗中的大部分稿件，因为1559年，作为囚犯的他乘坐的从中国返航印度的船中途失事，卡默斯所写的史诗在今天柬埔寨的湄公河口遗失。船只失事后，他不得不游到岸上，抓住了部分手稿，但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他被监禁的原因尚不清楚，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居住的极端混乱的边界地区的复杂形势或者个人任意妄为所致。他经由马



六甲返回果阿，最后被从监狱释放。他借了一些钱，想方设法进入莫桑比克，在这里又被监禁两年，无法偿还债务。因此，他不得不乞求朋友提供食物、衣服以及回家的船费。在离开家乡 17 年后的 1570 年，他返回葡萄牙时，身上唯一的财富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完整手稿。在里斯本登陆后，他旋即探望他所挚爱的嘉蒂丽娜的墓地。直到最后，他都是一个为情所困的人。

1572 年史诗的出版为卡默斯赢得了大量的赐金，但是他的麻烦和伤心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史诗号召复兴帝国精神，但是此时塞巴斯蒂安国王对摩洛哥的征服出现灾难性后果，葡萄牙军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几年后，1580 年，卡默斯在里斯本死于瘟疫，孤身一人，终生未婚，甚至连一块裹尸布都没有。他被一块借来的裹尸布包裹，葬在公墓。3 个世纪后，据称是卡默斯的遗物被转入葡萄牙国立伟人祠（Portuguese National Pantheon），该祠位于里斯本西部贝伦区（Belem）精雕细刻的尖塔形建筑热罗尼莫斯修道院（Jeronimos）内。他们的石雕像平卧在同样雕刻精美的石棺上，石棺沐浴在壮观的彩色玻璃窗透过的黄色光线下。

推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写作的积蓄能量令人想到另一本伊比利亚半岛的史诗《堂·吉珂德》，该书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出版 30 年后的 1605 ~ 1615 年出版。这两部专著都是经历极端个人冒险和悲剧故事考验的人编写的。与卡默斯一样，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也加入西班牙军队，并参加了 1571 年希腊西海岸的勒班陀（Lepanto）海战。在这次战斗中，塞万提斯的左臂因为受伤而残疾。4 年后，在回西班牙的途中，塞万提斯被巴巴里（Barbary）海盗俘获，被卖作奴隶，最后成为阿尔及尔总督的私人奴隶。经过 5 年的囚禁和几次不成功的逃跑后，塞万提

斯被迫支付赎金赎回自由，而这从经济上毁了他的家庭。虽然两部史诗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并不一样——一个热情颂扬帝国的征服，另一个则是幽默地讽刺中世纪的游侠骑士，但它们共同构成了跨越世界地图的伟大而无畏的电影式旅程。

在诗歌的开头，卡默斯指出，葡萄牙人比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加显赫，“海神尼普顿、战神玛斯也为之折服。”<sup>①</sup> 然而诗歌通过通篇使用古典传统来向古人致敬，古代神灵——充满了美丽、魔力和美妙的对比——帮助决定航程的结果：酒神巴克斯（Bacchus）试图阻止葡萄牙海员；维纳斯和玛斯则支持他们。根据牛津大学学者博拉的说法，与地中海神话故事深远的连带关系帮助卡默斯成为世俗的文艺复兴的一部分，虽然他的诗歌也可以被解读为伊斯兰在地中海和黎凡特长期占据优势后，基督教国家对自己权利的主张。

与葡萄牙帝国一样，卡默斯也充满了矛盾。他是现代主义的第一人，也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人。因为他谴责一些葡萄牙征服者的残暴行为，因此被博拉称赞为人道主义者，虽然他对穆斯林的描述经常是邪恶的、不可饶恕的。他称呼穆斯林为“卑鄙的穆罕默德”。<sup>②</sup> 对卡默斯来说，伊斯兰教简直就是腐败堕落和野蛮，是“狡诈和虚伪”<sup>③</sup> 的混合。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那些帮助葡萄牙人的穆斯林。对两者之间的战争，卡默斯的描述完全是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战斗。<sup>④</sup> 卡默斯攻击宗教改革，认为在基督教应该聚焦于伊斯兰教威胁的时候，宗教改革运动分裂了基督徒：他暗示，基督徒不应该与教皇斗争，他们应该与土耳其人战斗。

---

① Camoes, *Canton One*; 3.

② Camoes, *Canton One*; 3. *Canton One*; 99.

③ Camoes, *Canton One*; 3. *Canton Nine*; 1.

④ Bowra, *From Virgil to Milton*, pp. 133, 136.

诗歌热情赞颂葡萄牙帝国的征服行为，但同时卡默斯对这一事业的态度也是模糊的，因为他谴责自负和虚荣，承认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会形成新的恐惧。就像他在诗中所写：

迷恋那虚无缥缈的幻梦  
既然你把残忍和凶暴  
叫作勇敢和奋发……<sup>①</sup>

葡萄牙人将印度洋强行拖入与欧洲和西方接触的方式，有一点点的美好和浪漫。其实，这是令人毛骨悚然和颤栗的事情，内中充满了痛苦、诧异和残忍。卡默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说明了这一切。诗歌提醒我们，征服行为是怎样经常导致极度的伤心。葡萄牙人征服的地域越广，能够守住的土地就越少。从文化意义上说，印度洋是小的，但是印度洋的地域如此广阔，即使在喷气机时代，一个强权国家要完全控制它也不可能。葡萄牙征服者与后来的荷兰人和英国殖民者一样，既显示了帝国的活力，也反映了所有帝国都容易犯的轻率的毛病。这是美国必须从中好好学习好的。

---

<sup>①</sup> Camoes, *Canton Four*; 99.

## 第五章

# 俾路支和信德

地图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卡默斯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之一就是  
用诗歌的方式将人引向地图。通常，如果我需要激情或者需要灵感，就会从地图中寻找。在地图上，巴基斯坦的莫克兰海岸从伊朗和巴基斯坦交界的边境出发，沿着阿拉伯海，一直到临近印度边界的卡拉奇。“巴基斯坦”寓意印度次大陆，但是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来说，我们都可以认为南亚次大陆实际上起源于卡拉奇以西数英里的哈伯（Hub）河，靠近印度河三角洲。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巴基斯坦境内400英里长的莫克兰海岸成为面积宽广的地理和文化的过渡地带，带有深深的中东文化的印迹，尤其是阿拉伯文化，因为人们从马斯喀特可以直接跨越阿曼湾。644年，阿拉伯人第一次入侵莫克兰，这时距伊斯兰教纪元只有短短22年的时间。<sup>①</sup> 这一过渡地带是古印度（al-Hind）的边界，包括莫克兰海岸和毗连的陆路部分，统称俾路支。公元前

---

<sup>①</sup> Andre Wink,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vol. 1, Early Medieval India and the Expansion of Islam, 7<sup>th</sup> - 11<sup>th</sup> Centuries* (Boston and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1990, 2002), p. 129.



325年，亚历山大大帝惨败后，率领18000名士兵，从印度河出发，穿过这片海浪冲刷形成的盐碱地，一路向西撤退，到达波斯。

俾路支人尤其是其南部靠海部分的俾路支人，是粗犷而多毛的中东土耳其—伊朗（Turko-Iranian）种族的后裔。他们称，几十年来一直十分压抑地处于深肤色、城市化和精于世道的旁遮普骗子的统治之下。旁遮普人居住在巴基斯坦东北部的人口密集地区，靠近印度边界，他们一直控制巴基斯坦政权。然而，在阿拉伯巴基斯坦（Arabian Pakistan）地区，会感到这个印度次大陆上的人口稠密的热闹山区似乎很远。驾车沿着莫克兰海岸行驶，经过多风而开阔平坦的也门和阿曼平原，高耸的、锯齿状、类似砂纸颜色的城墙，从长满棘树的凹凸不平的沙漠上拔地而起。这里的海岸附近非常空旷，你几乎可以听到亚历山大东征军驼队的蹄声。在这样的地质奇观中，你会迷失自己。咆哮的海浪猛烈地撞击着如人工切割般平整的杏黄色沙丘空旷的表面，同时又给易碎的黑色火山熔渣造就的崎岖不平的不毛之地让路。这里比佐法尔更具有巴洛克风格，风力和地震的破坏共同造成了地表的凹凸不平，以及深深的裂缝和圆锥形的凝结物。

连续数小时的路程，唯一可见的文明迹象是零散的茶庄，部分焦黑的石头屋里放置着黄麻编制的床，茶庄里售卖发霉的伊朗压缩饼干和浓浓的泡茶。从历史上看，这一地区与阿曼海岸不同，比较荒凉，故来此地的人也很少。因此，它受印度洋都市化地区影响的印迹也比较少。走进这些路边的歇脚点，坐在老式汽车和摩托车上的大嗓门俾路支部落民，戴着阿拉伯头巾，说着刺耳的喉音字节，演奏声音大得震耳的有节奏的音乐。这种音乐风格与阿拉伯人更为接近，而与南亚次大陆内省弦乐演奏的拉加音乐有所不同。

但是，你不要觉得自己被骗了，这里就是巴基斯坦。从卡拉奇向西直到伊朗边界的高速公路相当现代化，只有几处毁坏的路段等待整修。公路上频繁设有政府检查站。重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伯斯尼（Pasni）和奥尔马拉（Ormara）也逐渐发展成熟，如果印军进入印度洋，巴基斯坦可以从这里进行反击。巴基斯坦政府可能无法控制偏远的俾路支地区大片的沙漠和绵延的山脉，也控制不了俾路支具有反抗精神的部落民和走私犯罪的土匪。但是，政府能够在需要它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出现：开矿、征收土地、建造高速公路和军事基地。

确实，因为政府修建道路和驻军的需要，俾路支人和印度教教徒少数派被迫从这一地区迁移，这些人被怀疑对印度持同情态度。实际上，在俾路支人和印度教教徒眼中，政府所指控的通敌行为只是他们对抗政府的压迫而采取的必要的反抗而已。

仔细观察地图上的俾路支，第一个来此的东印度公司探险家称其为“崎岖而老旧”，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瓜德尔（Gwadar）那样激起我无限的遐想。瓜德尔是一个有着7万人口的港口城市，位于莫克兰海岸线的远端，离伊朗边境很近。<sup>①</sup> 如果迦太基（Carthage）、底比斯（Thebes）、特洛伊（Troy）、撒马尔罕（Samarkand）、吴哥窟（Angkor Wat）是古代闻名遐迩的地方，迪拜、新加坡、德黑兰、北京、华盛顿是现代闻名遐迩的地方，那么瓜德尔完全有资格成为未来闻名遐迩的地方。

想要进入瓜德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需要从巴基斯坦内务部拿到一份特殊的许可证或者“不反对证明”。为了这个许可证，我等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然后，他们告诉我没有得到许

---

<sup>①</sup>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1), p. 103.

可。对这种正常的申请渠道彻底绝望后，我通过一位老朋友找到一位有门路的官僚，他以奇迹般的速度在两天内拿到许可证。因为到瓜德尔很困难，所以，在我到瓜德尔之前，它在我的脑海中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

1958年之前，阿曼一直控制瓜德尔港。1958年，阿曼将莫克兰海岸西部角落的这座港口城市转让给巴基斯坦新政府。20世纪60年代，阿尤布·汗军政府统治时期，巴基斯坦的规划者认识到了它的战略重要性，他们视瓜德尔为空军和海军中心，可以作为卡拉奇的替代选择。瓜德尔与伯斯尼和奥尔马拉一道，可以将阿拉伯海的军事基地连成一线，从而使巴基斯坦成为横跨南亚次大陆和近东的印度洋强国。瓜德尔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有助于巴基斯坦摆脱人为的地缘困境，重获其新的命运。但是，巴基斯坦是一个年轻的、贫穷的、不安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都很薄弱的国家。因此，瓜德尔的发展必须假以时日。

其他希望得到瓜德尔，至少向往瓜德尔环海环境的是俄罗斯人。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占领阿富汗的10年时间里，莫克兰海岸是他们渴望却没有得到的战利品——一个著名的暖水海洋出海口，这也是苏联在阿富汗冒险的战略目的。如果得到瓜德尔，苏联可以从这里向中亚出口储量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这样就可以改变苏联帝国大部分为陆地环绕的局面。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阿富汗成为埋葬苏联帝国梦想的坟墓。对阿富汗的占领非但没有达到扩大帝国的目的，反而毁灭了帝国的梦想。瓜德尔仍然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杂乱地建在沙滩上的渔夫的石头房子——就像一个有毒的圣餐杯。

瓜德尔的故事还在继续。20世纪90年代巴基斯坦处于民主政府统治时期，政府努力控制国家日益紧张的社会和经济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因为城市贫民窟人口的增加和日益严重的缺

水状况而加重，并且已经蔓延到卡拉奇和其他城市。但即使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转向国内政治，他们依然关注阿富汗和能源路线的相关问题。随着苏军撤退而来的阿富汗无政府状态妨碍了巴基斯坦修建通往中亚新石油国家的道路和管道——这些路线本可以帮助伊斯兰堡巩固强大的伊斯兰后方，以遏制印度。这条能源网最后的出口就在瓜德尔。贝娜齐尔·布托政府非常关注阿富汗的混乱局面，其内政部部长、已退休将军纳什鲁拉·巴巴尔（Naseerullah Babar）曾将新组建的塔利班看作解决巴基斯坦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布托政府为塔利班提供金钱、武器、交通工具、燃料、食物，以及来自巴基斯坦清真寺的志愿者，所有这些都使极端主义运动能够在1996年轻松获得喀布尔的政权。塔利班政权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稳定，但是在有些事情上的后果却很严重。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Unocal）和其他几家公司对巴基斯坦的输油管道工程有兴趣。该工程以里海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道勒塔巴德（Dauletabad）油气田为起点，中间跨越阿富汗，最终抵达巴基斯坦的印度洋口岸，例如瓜德尔。但事情的发展却令巴基斯坦感到失望。

1999年10月，陆军上将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中掌握政权，中断了持续数年的民选政府的混乱治理。2000年，他请求中国考虑为瓜德尔深水港项目融资。“9·11事件”后的数周内，不出所料，中国同意援建深水港项目。这样，世贸中心以美国人和乔治·W. 布什政府意想不到的方式遭遇袭击后，瓜德尔已经悄然成为后美国时代世界格局演变的样本。2006年，第一期项目工程如期竣工。2007年，新加坡港务局（PSA）获得为期40年的特许经营。现在看来，瓜德尔港口最终还是走出了梦想阶段，成为21世纪的现实。

因此，现在设想一下，巴基斯坦西南最远端建有业务繁忙的



深水港，该深水港有燃料供给和停泊设备，更大程度上属于中东而非南亚次大陆的一部分。同时，该深水港还有配套的高速公路和油气田输送管道，一路向东北延伸，穿越巴基斯坦——世界上最高的喀喇昆仑山脉——进入中国。在中国，有更多的道路和管道连接到中国的最东边，从而可以将这些生活资料和碳氢化合物输送到中国中产阶级家庭中，用来烹调食物。<sup>①</sup> 这些管道带来的原料也用于发展不稳定的中国西部穆斯林居住区；的确，瓜德尔看起来将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战略利益很好地结合了起来。<sup>②</sup> 同时，这条路线和管道网的另一个分支将从瓜德尔向北通向未来可能趋向稳定的阿富汗，然后继续延伸至伊朗和中亚。实际上，瓜德尔的输油管道将形成一个从太平洋向西延伸至里海的运输网络。这样，无论海路还是陆路，瓜德尔都将成为新丝绸之路上一个生机勃勃的枢纽城市，是地处内陆、碳氢化合物储量丰富的中亚地区的一个宏伟规划项目和出海口，瓜德尔正在成为 21 世纪一个颇具异国情调的地名。

虽然有宏伟的计划，但历史也有诸多的偶然事件和无法实现的规划。当我到达瓜德尔的时候，它的缺陷给我留下的印象与梦想一样多，其中最离谱的不是为它规划的未来愿景，而是这座城市的现状。这里与我想象的雄伟的边界小镇完全一样，坐落在一个视野开阔、气候极其干燥的半岛上，半岛的一边是高耸的灰白色的悬崖，另一边是呈红褐色水质的海洋，孤峰、平顶山峰和尖顶形状的山脊构成了复杂多变的悬崖地貌。山脚

---

① B. Raman, "Hambantota and Gwadar-an Update," Institute for Topical Studies, Chennai, India, 2009.

② Robert C. Wirsing, "Baloch Nationalism and Geopolitics of Energy Resources: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Separatism in Pakista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War College, Carlisle, PA, Apr. 17, 2008.

下的城镇有时被错误地当作用不规则直线围起来的近东城市的遗迹：低矮而廉价的白石头墙突起在沙堆和砾石堆中。随处可以看到坐在断背的厨房椅子上的人们，在竹子树荫下或者麻帆布的阴凉下，喝着茶水乘凉。每个人都穿着传统的服装；这里没有西方的涤纶面料。这让人联想到 19 世纪巴勒斯坦雅法（Jaffa）石版画或者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的绘画《黎巴嫩的提尔（Tyre）》。单桅帆船出现在白色、潮湿、烟雾弥漫的空气中，装满了银色的鱼。渔夫将船停靠在岸上，头上都缠着肮脏的包头巾，穿着纱丽克米兹（shalwar kameezes），祷告用的念珠从他们的口袋中滑落。<sup>①</sup>

实际上，薄雾使海天一体，瓜德尔真的有种梦境般的氛围。如果瓜德尔真如广告宣传中的那样发展，那么现在零星来访的西方人可能就是幸运儿了，因为他们能够见证历史悠久的渔村的最后时光，就像英国探险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在阿布扎比、迪拜和波斯湾及其他有名的港口所经历的一切——那时是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处在石油工业改变一切之前。塞西格是这样形容迪拜的：“在这里，生命还保留着过去的古朴。”他还描述了一群没穿衣服的孩童在浅滩上的单桅三角帆船间嬉戏；荷枪实弹的贝都因人（Bedouin）守在帆船旁；戴着旧式毡帽的喀什加（Kashgai）部落民（即“黑奴”）和索马里人刚刚跳出小船，从亚丁湾来到这里。在迪拜，塞西格感觉穿西方服饰在当地生活并不舒服。<sup>②</sup> 他的游记告诉我们，事物的变化是如此之快。

---

① 类似睡衣的宽松长裤（沙瓦尔），腰部和脚踝部分是紧的，上面是宽松的长衫（克米兹）。

② Wilfred Thesiger, *Arabian Sands* (New York: Dutton, 1959), p. 276.

同时，中国援建的深水港设备齐全，全新的龙门起重机和其他用于货物运输的设备安放到位，令人充满期待。即使在该港口的综合设施孤单而寂寞地挺立在那里，等待来自遥远的首都伊斯兰堡的决定时，人们依旧期待它能够容纳更大的油轮。有人向我展示了一个较大的住宅区建设项目的比例模型，住宅区的道路两旁绿树成荫，还建有万豪度假酒店。“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再回来，这里就会与迪拜一样。你会认不出这里的。”卡拉奇的一个商人这样对我保证。但是，瓜德尔的飞机场太小了，这里甚至没有运送行李的传送带。

除了渔夫在码头靠岸，这里通常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发生。在码头，我看到一堆堆的鲑鱼、红鲑鱼、鲷鱼、斑节对虾、河鲈、鲈鱼、沙丁鱼、鳕鱼被扔进草编的筐里，然后通过灵巧的滑轮组运送到岸上。有人用绳子拖着一条大大的死鲨鱼和同样大的旗鱼，进入一个大型的、恶臭的带顶棚的市场。市场里面堆满了鱼，地面亮光闪闪、又湿又滑，鲨鱼和旗鱼被扔到血迹斑斑的水泥地面上，旁边是成堆的蝠鲼。套上车的驴子耐心地等在那里，随时准备将堆积如山的鱼运送到城市各处更小的市场。在深水港和输油管道下一期项目开工建设之前，传统的渔业还是掌控着这里的一切。码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景观。

我在附近的一个海滩，观看他们制造和修理单桅帆船。一些人用手蘸着环氧树脂，堵上木头船体上的缝隙，其他人则舒服地坐在阴凉处，手里拿着长长的烟，旁边是骨瘦如柴的猫狗。至于谈到作为地缘政治神经中枢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没有发电机，没有电钻，工匠只能通过类似弓箭状的手动钻孔工具钻孔，看起来好像在弹奏弦乐器。几个人工作两个月能够制造一艘40英尺长的渔船，渔船的使用寿命是20年。柚木木材是从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船只的外面涂抹着一层鱼肝油用于防水。新造的船

在每月的月初和月圆之夜下水，以达到利用潮水上涨的目的。这就是前现代社会的阿拉伯人的生活状态。

萨利姆·穆萨（Salem Musa）是位缠着头巾的俾路支老人，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和祖父都以造船为业。他深情地回忆瓜德尔脱离阿曼统治“解放”的日子，因为“我们能够不受限制地在海湾周围海域自由航行”。他对未来既充满希望，又心怀恐惧：对俾路支人来说，变革意味着失去更多的自由，就像旁遮普人和巴基斯坦的城市居民突然来到这里，并接管这里的城市所做的一样。“他们没有机会”，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官员对我说，他指的是瓜德尔的渔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将彻底摧毁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在带顶棚的集市里，有很多无人光顾的售卖茶叶、调味品和干货的店铺。店铺里满是尘土的罐子里装满了陈旧的糖果。在这里，我遇到更多留着胡子、缠着头巾的老人，他们以怀旧的心情谈起阿曼的苏丹（卡布斯的父亲赛义德·本·泰姆尔，Sa'id bin Taymur），谈到阿曼在其治下尽管贫穷落后，但瓜德尔却繁荣昌盛。他们中的很多人拥有阿曼和巴基斯坦双重国籍。老人们带领我穿过死气沉沉、粗麻布覆盖的街道，沿着容易断裂的泥砖建筑一直前行，饿得半死的母牛和山羊紧紧地挤在残垣断壁的阴凉处。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小型的灰泥粉饰的前苏丹王宫前，宫殿有悬浮的木质阳台。苏丹经常造访瓜德尔，就住在这里。王宫与瓜德尔的其他事物一样，即将倒塌。海水流经每个转弯处，下午15时左右，呈现出碧绿的颜色。

在另一片海滩，我看到很多奇特的驴子——是我见过的最小的驴子——从水中蹦出来，奔向沙滩，拉着由小男孩驾驶的吱嘎作响的小车，车里装满了鱼，这些鱼是从波浪中浮动的渔船上卸下的，小车上挂着俾路支黑色、白色、黄色和绿色的旗



帜。从海洋中走出来的迷你驴！瓜德尔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穿越时空。

相反，在几英里外远离城市的一大片沙漠地区，围起一块地准备建立新工业区和其他项目。工地的旁边是成排的民工临时安置房，等待建设工程上马。“只是在等待新的飞机场”，另一个来自卡拉奇的商人对我说，“在港口综合设施下一阶段项目开启后，你将看到迪拜奇迹也会在这里发生”。但是，每个从商业中心的角度出发与我讨论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海湾酋长国，尤其拥有睿智、高效和高度合法性政府的迪拜，统治的只是城市国家，没有内陆地区，因此，他们不会面对巴基斯坦军人政权和民选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和麻烦。数十年间，巴基斯坦的军人政权和民选政府很少是高效的，而且其合法性经常遭受质疑。但他们必须管理范围宽广的山区和蜿蜒的荒原沙漠，而这些区域恰恰经常受到战争和叛乱的困扰。

海湾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注定如此。它是理想条件下施行善政的结果，而这些条件巴基斯坦非常缺乏。

瓜德尔能否成为新丝绸之路的枢纽，取决于巴基斯坦自身能否防止蜕变为一个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由于“伊斯兰教”炸弹（“Islamic” bomb）、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侵扰的巴基斯坦西北边界地区、运转不畅的城市，以及以领地为基础的种族集团——俾路支人、信德人、旁遮普人、普什图人，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建立统一身份认同的黏合剂，巴基斯坦经常被看作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核武化的南斯拉夫。因此，瓜德尔是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这种考验并不是针对它的道路和能源运输状况，而是针对它作为整个阿拉伯海地区——半个印度洋——稳定的指向标。如果瓜德尔开发失败，对于像我一样的西方来访者而言，留下的只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渔村港

口，但是对巴基斯坦而言，则意味着更多令人焦虑的发展趋势，而这也会影响到周边国家。

实际上，没有人看我的“通行证”（non-objection certificate）；即使我没有证明，依旧可以进入瓜德尔。但是在瓜德尔待了几天后，我力图引起当地警察的关注。在这样做之后，他们坚持陪伴我。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一卡车穿着黑衣、拿着自动步枪（AK-47s）的警察陪伴。你想跟当地民众交流几乎不可能，因为我的警察护卫队会立即围住我想会见的任何人。警察告诉我，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但是瓜德尔并没有恐怖分子，只有贫穷的俾路支渔夫和他们的家庭成员。除了入境困难之外，在我对这个国家多达9次的访问中，瓜德尔无疑是巴基斯坦最安全的地方。

很显然，本地人并不喜欢警察。“我们俾路支只想要自由”，在我的“安全护卫队”听不到的时候，当地人告诉我。你可能会认为瓜德尔人特别希望经济发展能够给俾路支人带来他们渴望的自由。但是，他们却告诉我，更多的发展将意味着更多的中国人、新加坡人、旁遮普人和其他外来人的到来，他们将会使瓜德尔真正转变为国际港口和中转中心，而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俾路支人非但不能从日益上涨的地价中获益，相反，很多时候，他们反倒会被完全剥夺对土地的所有权。

颇有影响的卡拉奇调查性杂志《先驱报》（The Herald）曾发表封面故事《上地大劫掠》。文章称，瓜德尔大型项目计划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大的土地骗局”。<sup>①</sup> 杂志详细叙述了一套贿赂体系，来自卡拉奇、拉合尔和其他重要城市的有影响力的人物通

---

<sup>①</sup> “The Great Land Robbery: Gwadar,” *The Herald*, Karachi, Pakistan, June 2008.

过贿赂税务工作人员，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登记在他们名下的土地，然后将这些土地转卖给开发商，用于住宅区和工业区的开发。实际上，据说上万英亩的土地被非法分给非瓜德尔的公务员和军队官员。这样，贫穷而未受过教育的俾路支人则被排除在瓜德尔未来繁荣发展的大门之外。也是因为这样，瓜德尔成为令俾路支人痛恨的旁遮普人控制巴基斯坦的活动舞台。瓜德尔极有可能成为连接印度洋和中亚的大型枢纽城市这一事实，反倒可能造成巴基斯坦的进一步分裂。

巴基斯坦的阿拉伯海沿岸长期受到分离主义运动的困扰，俾路支和信德作为种族—地理实体有着丰富而古老的历史，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要远远少于1947年它们被纳入巴基斯坦以来所面临的矛盾。对俾路支人和信德人来说，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是一件令人尴尬的甚至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数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反抗旁遮普国王的统治，但在新建立的巴基斯坦，他们依旧处在旁遮普人的统治之下。旁遮普人敬奉往昔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的历史记忆，而俾路支人和信德人则视之为遭受压迫的象征。除了莫卧儿统治时期外，中世纪阿拉伯人的统治时期和11世纪伽色尼的马哈茂德短暂的统治时期，信德和俾路支都是独立国家。例如，信德人就有自己的地方王朝，他们称之为“Sindhu Desh”。<sup>①</sup>

实际上，俾路支和信德已经恢复了未来结成联盟的谈判，并得到了印度人的支持。这两个地区具有互补性，俾路支自然资源丰富，而信德是工业基地。最近这几十年，600万俾路支人发动了4次针对巴基斯坦军队的叛乱，抗议巴基斯坦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歧视。其中，最惨烈的是1973~1977年的一场斗争，大约8

---

<sup>①</sup> Selig S. Harrison, "Ethnic Tensions and the Future of Pakistan," 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08.

万名巴基斯坦军人和 55000 名俾路支战士分别投入战斗中。俾路支人对那时的记忆痛苦不堪。南亚研究专家塞利格·S. 哈里森 (Selig S. Harrison) 写道, 1974 年, 因为找不到藏在山区的俾路支人游击部队, 巴基斯坦军队轰炸、扫射和焚烧了约 15000 个俾路支家庭的住所……以迫使游击队员从藏身之所出来, 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孩子。<sup>①</sup>

哈里森所说的“缓慢的种族灭绝”, 最近几年又在继续。2006 年, 巴基斯坦 F-16 喷气式战斗机和眼镜蛇武装直升机攻击了俾路支人的村庄, 数千俾路支人被迫逃离。这之后, 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绑架行动, 俾路支年轻人常常无故消失。最近, 至少有 84000 名俾路支人因为冲突被迫背井离乡。<sup>②</sup> 也是在 2006 年, 巴基斯坦军队杀害了俾路支人的领导者纳瓦布·阿克巴尔·汗·布格蒂 (Nawab Akbar Khan Bugti)。但是, 随着政府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残忍, 俾路支战士已经团结在一起形成真正全国性的运动。装备得更好的新一代, 大多出生于俾路支首府基达 (Quetta) 或者其他城市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 波斯湾的俾路支同胞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但是, 俾路支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先解决长期困扰他们的部族世仇问题, 否则巴基斯坦军队中的旁遮普人等可以利用他们彼此的矛盾, 实现各个击破。

据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的报告, 如今的反叛运动已经打破地区、部落和阶级的界限。<sup>③</sup> 根据巴基斯坦

---

① Harrison, “Pakistan’s Baluch Insurgency,” *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ober 2006.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akistan: The Forgotten Conflict in Balochistan,” (Islamabad/Brussels, Oct. 22, 2007)

③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akistan: The Forgotten Conflict in Balochistan,” (Islamabad/Brussels, Oct. 22, 2007)



人的说法，印度情报机构也在帮助俾路支人，因为如果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被分离主义的反抗运动所牵制，印度可以从中受益。<sup>①</sup> 巴基斯坦军队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让激进的伊斯兰力量直接对抗世俗的、民族主义的俾路支人。在原教旨主义的反抗运动乱成一锅粥的地区，用俾路支活跃分子的话来概括，“俾路支人是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唯一世俗的反抗运动，并且没有宗教极端主义的前科。”<sup>②</sup>

俾路支人只占巴基斯坦全部 1.72 亿人口的 3.57%，但是巴基斯坦的很多资源都在俾路支，包括铜、铀以及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虽然俾路支的天然气产量占全国的 1/3，但因为贫穷，俾路支人只消费其中的小部分，即使是在巴基斯坦这个世界上最依赖天然气的国家之一也是如此。<sup>③</sup> 此外，正如塞利格·哈里森所解释的，中央政府为俾路支天然气所付的费用极少，同时拒绝给予其发展援助。

因此，瓜德尔的不动产丑闻和对旁遮普人接管的担心，形成了俾路支反抗征服史上的高潮。为了体会隐藏在其后的情感，我在莫克兰海岸的另一端卡拉奇与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会面。

第一次会见的地点在卡拉奇克利夫顿（Clifton）街区的肯德基出口处，肯德基的入口处有带着滑膛枪和警棍的私人保安把守。这样的快餐连锁店，带有明显的美国标志，是恐怖主义袭击者非常中意的地方。肯德基里面都是年轻人，有的人穿西方服

---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akistan: The Forgotten Conflict in Balochistan," (Islamabad/Brussels Oct. 22, 2007)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akistan: The Forgotten Conflict in Balochistan," (Islamabad/Brussels Oct. 22, 2007)

③ Wirsing, "Baloch Nationalism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Resources."

装，也有的人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色纱丽克米兹（Shalwar kameezes），有的人下巴剃得光光的，也有的人留着穆斯林风格的长胡子。尽管有风格上的冲突，但他们都具有一种圆滑的乡下习气。每个人面前都放着盛有鸡肉的盘子和百事可乐，吃饭的间隙忙着发短信和打电话。扬声器里播放着鼓乐，这是一种具有印度、巴基斯坦和旁遮普风格的班格拉（bhangra）音乐。在这个高档消费场所，有5个人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他们穿着又脏又皱的纱丽克米兹，戴着缠头巾和遮阳帽，腋下夹着一堆文件，其中就包括《先驱报》关于瓜德尔的封面故事的复印件。

尼萨尔·俾路支（Nisar Baluch）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他是俾路支福利社团（Baluch Welfare Society）的总书记，一头乱糟糟的黑发，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当他与我讲话的时候，手指不断敲击桌面。“巴基斯坦军队是最大的土地掠夺者”，他开始了自己的讲话。“他们把俾路支沿岸的土地作为薪酬发给旁遮普人。”

“旁遮普人的军队虽然穿着制服，但他们实际上是恐怖分子”，他继续说道。“在瓜德尔，军队的行动就像黑手党，伪造土地记录。他们说，没有文书能够证明我们俾路支人对土地的所有权，虽然我们已经在在那里生存了几个世纪。”他对我说，他本人并不反对发展，并且支持俾路支人与巴基斯坦当局对话。“但是当我们谈到自己的权利时，他们斥责我们是塔利班。”

“我们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他继续说道，声音始终低沉，即使他的手指敲打桌面的频率加快后也是如此。“除了斗争，绝无其他选择。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瓜德尔。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机构都与瓜德尔罪行有牵连。”

紧接着他发出警示：“不论他们如何努力，试图使瓜德尔变成迪拜，都是白费。瓜德尔人会抵制这些努力。未来通往中国的

输油管道将不会安全。输油管道必须经过俾路支地区，如果我们的权利受到侵害，那么那里的任何事都是不安全的”。

这一威胁并不是孤例。其他民族主义分子威胁说，今后俾路支反叛分子肯定会伏击更多的中国工人并杀掉他们，那将是瓜德尔的终结。<sup>①</sup>

会见尼萨尔·俾路支只是我会见纳瓦布·海尔·巴克什·马里（Nawab Khair Baksh Marri）的热身，后者是俾路支马里部族的族长。60年来，这位族长一直与政府军周旋，他的儿子最近被巴基斯坦军队杀害了。<sup>②</sup> 马里在他位于卡拉奇的豪华别墅里迎接我。他的豪宅有结实宏大的外墙，巨大的植物和华丽的家具，用人和保镖在花园的地毯上休息。马里本人又老又瘦，拄着手杖，身着长袍，戴着米黄色的遮阳帽，凹口（indentation）很宽，与信德人所戴的遮阳帽类型有很大不同。在我们面前，摆放了很多本地佳肴。马里说一口清晰但不流畅的耳语式英语，当这一切与他的服饰和环境结合时，马里确实有一股非凡的魅力。

“如果我们继续斗争”，他轻声告诉我，“那我们将会发动像巴勒斯坦那样的起义。俾路支的年轻一代将会继续进行游击战争，这就是我持乐观主义的原因。巴基斯坦不是永恒的，也不可能永远持续。英帝国、巴基斯坦、缅甸，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历史存在。1971年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后”，他继续用温和而说教式的语气说，“这个国家唯一活跃的是旁遮普军队日益膨胀的权力。东孟加拉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孟加拉人在数量

---

① Wirsing, "Baloch Nationalism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Resources."

② 2007年11月，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杀死了纳瓦卜扎达·巴拉克·马里。马里有6个儿子，他是最小的一个。

上足以与旁遮普人较量，但他们还是选择退出。现在留给俾路支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战斗”。

他告诉我，他不喜欢、也不信任巴基斯坦境内的非俾路支人。他看不起已故的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信德人贝娜齐尔·布托。他解释道，毕竟20世纪70年代，在她父亲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统治时期，“我们的人被扔出直升机，被集体屠杀、焚烧，指甲被拔出，骨头被打断……因此，我对她没有敬意。”

我问他如何看待旁遮普人主动示好与俾路支人修复关系，他依旧用自己和蔼而庄严的声音回答说：“我们对这些旁遮普人说，不要管我们，滚开，我们不需要你们指引方向，我的兄弟。如果旁遮普人继续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占领我们的土地，那么最后我们的名字就会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他解释道，俾路支处于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三个国家的交会处，只有这三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权力削弱的时候，才能最终获得胜利。在他看来，瓜德尔只是最新的旁遮普人的阴谋，它不可能持久。俾路支人将会炸掉新建公路和未来通往外地的输油管道。

他的言语中有大量直白的攻击性词汇，完全不顾政治上让步妥协的技巧，他好像对政治并不抱希望。当我即将离开他的豪宅时，深有感触的是，瓜德尔能否发展显然取决于伊斯兰堡政府如何决策。如果政府没有与俾路支相关各方达成完美的交易，那就会激怒像马里和尼萨尔·俾路支这样的人，那么，因为地方叛乱的破坏，靠近伊朗边界的大型港口项目将会真正变成沙漠中的消失之城。然而，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允许俾路支人在巴基斯坦民主和分权的大框架内建立地方邦国，那么，我看到的小渔村将会让路给生机勃勃的阿拉伯海的鹿特丹，它的触角将向北延伸至撒马尔罕。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注定发生的。

俾路支位于中东的最东段，它影响着阿拉伯半岛、信德和蜿蜒曲折的印度河谷地。从地理位置上说，这里是印度次大陆真正的发源地。当然，历史和地理情况要更加复杂。虽然在程度上不如莫克兰，但信德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更有长时间被入侵的记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人曾在公元8~9世纪征服了信德，之后，在城市开展商业活动。<sup>①</sup>也许，我们考察印度次大陆起源的最好方式不是考察其固定的边界，而是考察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

“India”和“Hindu”这两个词都来源于信德（Sindhu）这个词，在波斯语中，Sindhu变成了“Hind”，而在希腊语和罗马拉丁语那里，则变成了“Ind”。印度河（西方古典世界的统治者都是这样称呼印度的）和信德的疆土一度向北延伸数百英里，从阿拉伯海沿岸无规划的城市国家卡拉奇到肥沃的旁遮普平原和喀喇昆仑山，即突厥控制下令人眼花缭乱的陡峭的“黑色石子（Black Gravel）”山脉，紧邻喜马拉雅。<sup>②</sup>

卡拉奇是一个不合乎审美标准的地方，至少对西方人没有吸引力。欧洲城市意味着城市生活的纵向发展——古老的人类居住地发展成有限而亲密的空间——而卡拉奇则是未来的横向城市，拥有很多小的居住中心，且相对而言，很少有真正的核心。从烤肉店的屋顶，我注视着大量污水被排放到港口，港口上放满了巨型的起重机；在另一个方向，我看到成排廉价的、有裂缝的粗糙石灰外表的公寓街区，在充满燃油灰污染物的薄雾里，晾晒的衣

---

① Wink, *Al-Hind*, pp. 173, 175.

② 旁遮普在受波斯语影响的乌尔都语中意为“五河之地”——比亚斯河（the Beas）、拉维河（Ravi）、杰赫勒姆河（Jhelum）、萨特累季河（Sutlej）杰纳布河（Chenab），这五条河的源头都在喜马拉雅山的湖泊中。



服成为一道彩色的风景线。参差不齐的棕榈树和红树林沼泽旁边堆满了煤渣块。这座城市缺少焦点或者明显的城市天际线。成堆的垃圾、小石头、破旧的轮胎、砖头和枯树桩，仅仅有助于界定城市空间。到处都是私人保安，道路两旁是卖酒的商店和激进的伊斯兰学校，上一次来这里，我曾经拜访过这些学校。实际上，充满矛盾反倒是这座城市的可取之处。与南亚次大陆的其他城市相比，由于没有过去的历史包袱，卡拉奇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更有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充分利用都市生活和建筑设计领域内的国际趋势。我们都知道卡拉奇的恐怖分子，这确实是事实，但这等规模的城市总会有多个层面。我反而被这座城市迷住了。

卡拉奇的众多建筑项目都有来自海湾地区的金钱资助，但是这些工程项目之间并没有建筑上的协调性。大理石建成的高高的坚固外墙、门铃和武装门卫，显示着这是一个隐藏着财富的城市。豪华的商店和西方连锁酒店在随处可见的贫民窟中伸出一角。贫民窟的大街上，成群的流浪狗和灰胸脯的乌鸦四处游荡。戴着黄金珠宝饰品、穿着华丽丝绸的妇女与驼背人和残疾人分享人行道。因为贫富混杂，所以邻里都是以富有或贫穷，而不是以好或坏来区分。富有的人通常取名 Clifton 和 Defense，尽管从字面上看，这些名字没有任何特殊含义。

穆斯林呼唤祷告的声音像潮水般穿越城市的空旷空间，偶尔会遭遇几个高高的障碍物。卡拉奇并没有拉合尔那样的传统，但信德人和莫哈吉斯人（mohajirs，来自印度的穆斯林移民）以及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之间的种族暴力冲突却显而易见。看起来，这个阿拉伯海港口城市的未来取决于两股可以解决分歧的活跃力量：激进的伊斯兰教正统主张和极度现实的物质主义，沙特阿拉伯和迪拜分别代表着这两种版本的发展道路。实际上，

卡拉奇与附近阿曼的马斯喀特所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完全不同。卡拉奇——社区稠密，耀眼的白色，优雅的莫卧儿风格——通过深厚的建筑传统展现的是一个坚定的、开明的政府，保护其城市免受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影响，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为全球化所吞没。与阿曼不同，这里很少看到国家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说，卡拉奇的确是一个巴基斯坦城市。与拉合尔和其他伟大的莫卧儿时期的印度都市不同，卡拉奇在次大陆分治时，只是一个孤立的沿海居住区，仅有40万人口，在没有令人骄傲的认同感或者令人骄傲的过去的情况下，卡拉奇成长为拥有16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

卡拉奇有一半人口居住在违章的临时窝棚里，这些窝棚被称作凯奇阿巴地（Katchiabadi）。只有50%的城市用水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经常停电，当地用一个奇怪的词来称呼这种现象，叫作“分区停电”。<sup>①</sup>然而，我认为，卡拉奇会因为其多样性而得到拯救。毕竟，这里是一个港口，有充满活力的印度教教徒和索罗亚斯德教教徒社团（他们死后将尸体放在叫作“天葬塔”的山上）。任何一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此还没来得及深入发展，就已经受到其他宗教信仰的限制。卡拉奇临海，经受着印度洋各种互相抵触的力量的影响，这一事实可能将最终保护卡拉奇摆脱那些最坏的影响。

尽管有种族冲突的传统，但是卡拉奇平时看起来还是平静的。一天，我开车出去，经过内海海湾和盐池，经过外面堆放着煤渣、挂着脏兮兮标志牌的废弃商店——完全是不景气和贫穷的状态，然后，在莫诺拉（Manora）岬角的海滩上，我发现了很多正在野餐的家庭，享受着阿拉伯海含硫的、多泡沫的海浪拍打

---

<sup>①</sup> Aryn Baker, "Karachi Dreams Big," *Time (Asia)*, Feb. 8, 2008.

岸边的声音，没有任何的防波堤阻止海浪。当时正好是星期五晚祷之后，海滩干净整洁，完全不像卡拉奇其他地方的海滩。孩子们骑着骆驼在岸上来回地走，骆驼配有色彩华美的刺绣马鞍。家庭成员成群地挤在沙滩上，微笑，拍照。年轻人聚集在速度减缓的水域上，傻傻地站着。一些妇女穿着线条优美的时髦纱丽克米兹（shalwar kameezes），化着浓妆。其他人则从头到脚穿着黑衣。

眼前的景象使我想起几年前在也门木卡拉（Mukalla）港口经历的一切，该港位于佐法尔以西约350英里的地方。木卡拉的海滨分为两部分：专供男人和十几岁的男孩所用以及供妇女和儿童所用。女人都用面纱遮面，而大部分的男人们则留着胡子。这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共享空间，成群的无产阶级信徒享受着傍晚吹来的第一缕海风。<sup>①</sup>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与这些人和平相处。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力量，依托于深沉的、执着的宗教信仰。

卡拉奇与木卡拉的海滩景象所展示的是一种朴实的亲密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卡拉奇所展示的景象更加国际化，只有黄褐色、结构复杂、破旧的印度教寺庙不起眼地矗立在背景中。这里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卡拉奇是一个中等大小、多宗派的渔业社会，像是孟买和印度西海岸其他城市的卫星城，并且这一切似乎在卡拉奇开工建设前已是如此。可以看到，在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建国后，卡拉奇从印度分割出来。由于与印度其他商业中心失去了基本的联系，卡拉奇变成了一个孤立的伊斯兰城邦，失去了多样化的精神资源，也包括印度教精神。因此，虽然卡拉奇发展

---

<sup>①</sup> Robert D. Kaplan, *Imperial Grun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on the Grou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p. 37.

成现在这样的大都市，但缺乏内涵。也许，以迪拜或者其他海湾城市国家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是解决卡拉奇问题的最终答案。卡拉奇失去了印度，但是作为近邻却获得了海湾国家。

卡拉奇年轻的市长赛义德·穆斯塔法·凯马勒（Syed Mustafa Kamal）对我说，信息技术中心会使卡拉奇成为海湾国家和亚洲交流的中介。<sup>①</sup> 但是，其他人对卡拉奇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更多地与俾路支人的想法一致，但与年轻市长的看法也不是完全对立。他们将卡拉奇看作是独立的，或者至少是自治的信德的首府，并不认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最终是南亚次大陆仅有的政治组织。

我想起信德被入侵者占领长达 6000 多年，正因为如此，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其他的征服者才能实现种族融合，信德才能保持稳固的文化和历史认同。信德一直是英印省孟买管区的一部分，1936 年正式成为英印省。信德加入巴基斯坦不是因为它是穆斯林聚居的地区，而是因为新国家许诺给予其自治地位，但是它从来没有在事实上获得这个地位。“相反，我们成为旁遮普人的殖民地”，信德人不断重复这句话。对信德民族主义者来说，阿拉伯海也许能够回到葡萄牙人到来之前的中世纪过往时光，那时，这里只有辖区和领地，卡拉奇和喀布尔与拉合尔和德里联合，这种联合关系与德里、班加罗尔和南印度其他地区联合一样。在这样的历史天空中，再加上全球化的辅助，就像他们告诉我的，信德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可以分别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进行交易，而不需要伊斯兰堡从中协调。

虽然某些意见听起来似乎不可原谅，但他们的怒气也都有合

---

<sup>①</sup> Robert D. Kaplan, *Imperial Grun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on the Grou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p. 37.

理的原因，因为它直接反对人口稠密的旁遮普中心地带政治生活的极端中央化，而极端中央化使巴基斯坦的旁遮普丧失了活力。

阿里·哈桑·项迪奥（Ali Hassan Chandio）是信德进步党（Sindh Progressive Party）的副主席。我们的会见地点是一间空旷的、墙上趴着壁虎的房间，季风轻轻地吹进敞开的窗户。这里距迪拜公司承建的新购物中心和公寓综合区不过只有几个街区，在那里，卡拉奇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都被彻底清除了。项迪奥对我说起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真纳是巴基斯坦的建立者，梦想建立一个不同民族都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但是，真纳在巴基斯坦建立后不久就去世了，军队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印度没有政变，但在巴基斯坦经常有军事法律管制。我们希望旁遮普人的军队返回他们的兵营。只有巴基斯坦像印度一样民主，信德才能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项迪奥强调，“尽管印度也发生战争和暗杀以及其他的暴力事件，但它仍然是南亚国家效仿的榜样。”与我在阿拉伯海沿岸会面的所有俾路支和信德民族主义者一样，项迪奥也公开以积极的言辞评论印度，他以及其他将印度看作自己反抗政府的联盟者，因为政府使他们感觉自己像是囚犯。实际上，他们都对我说，需要开放与邻国印度最具经济活力的古吉拉特邦的边界，古吉拉特邦吸引的投资占全印投资总额的1/4。古吉拉特是他们的近邻，其实力使他们颇有挫败感。

信德人进步阵线（Sindhi Lives Progressive Front）的领导人巴希尔·汗·库雷希（Bashir Khan Qureshi）在卡拉奇东郊的家里与我会面。那里塑料袋随风飘舞，到处都是乌鸦，屋里烟灰缸里的烟灰已经溢出，风扇吹着风，噪声很大。巴希尔·汗·库雷希长得很高，也很英俊，说话的声音可以轻易盖过周围的噪声。

他对我说，“巴基斯坦本身就是契约破裂的产物。”他从少



数派俾路支人和信德人的观点出发，反复向我讲述巴基斯坦的历史，尤其关注 1971 年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这一段。孟加拉人的做法给了其他少数派以同样的希望。巴基斯坦如果再发生一次政变，库累希说，在俾路支和信德将发生内战。

也许因为这个房间里的气氛阴冷才导致他这样想，但我感觉这种气氛会被燥热的沙漠吞没。我怀疑他所说观点的正确性，因为他对信德的界定过于简单。只有你相信信德人是一个凝聚力强且界定清晰的单元，它才能完美地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但是，事实上，信德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卡拉奇，信德人只是少数派。分治后，几百万印度穆斯林逃难到这里，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集团。此外，这里还有普什图人、旁遮普人、印度教教徒和其他的少数派。以往的暴力冲突显示，信德人只有在城市冲突中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还没有提及信德集团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这两派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周期性的暴力冲突。最近几十年，因为移民带来的社会变迁，使至少在卡拉奇的信德人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就像因为大量的普什图人涌入后形成的基达俾路支人的概念）。与瓜德尔一样，卡拉奇未来可能成为自治的城市国家。未来，在中央控制更为宽松和民主的巴基斯坦，信德和俾路支可能获得自治。但是，我感觉，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现存的实体，不可能如此安静地退出历史舞台。历史上的莫卧儿王国和侯国的关系可以用来笼统地比喻将来的巴基斯坦和信德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地区的人口混居在一起。未来数十年，巴基斯坦的政治结构将是极其微妙的。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巴基斯坦国父）是巴基斯坦的创立者，很多人称其为世界上最危险和最具威胁的人，他被埋葬在卡拉奇中部一个占地面积很大、干净整洁、风景优美的公园里。

公园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一旦进入其中，你会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其余地区是多么的贫穷和混乱。陵墓是一个子弹形的穹顶，安插在向内倾斜的大理石外墙上。陵墓的几何设计非常严格，立体形状使人联想到纯粹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陵墓内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又使人联想到购物中心，或者海湾地区新机场的免税区。陵墓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外部轮廓分明，内部却是令人奇怪的空虚。就像从真纳陵墓联想到卡拉奇糟糕的混合区，发现真纳所倡导的现代国家原则，到目前为止并不适合这个混乱世界的基本现状。

我发现，巴基斯坦对真纳思想有三派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是官方的观点，宣称他与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一样，是20世纪争取穆斯林权利的伟大英雄。持第二种观点的是一些勇敢的巴基斯坦人，但更多的是西方人。他们认为真纳是一个自负的人，他不明智地建立了一个可怕的国家。最近几十年，阿富汗发生的暴力事件多与巴基斯坦有关联。第三种观点虽然很有意思，但是也是最具颠覆性、最有见识的一种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真纳是印度社会中多种身份属性的复合：伦敦—孟买的知识分子，来自古吉拉特的商人，来自卡拉奇的帕西人的儿子。与阿塔图尔克一样，阿塔图尔克在受到萨洛尼卡（Salonika）世界主义影响的氛围中长大 [而不是在日后其统治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褊狭的伊斯兰世界环境下长大]，真纳是印度伟大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产物，因此，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世俗主义者。然而，他依旧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以确保少数派免遭不稳定的多数派的统治。虽然这种想法看起来可能具有误导性，有政治机会主义的成分，但是，它却为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保持世俗精神留有一定的余地，这一点非

常像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可能需要穆斯林的价值观念，但用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则不是必需的。而且，这样的国家可能具有高度的省自治，以迎合以地区为基础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和信德人的民族主义。

就像我在上面提到的，这种观点极具颠覆性，因为它直接对伊斯兰堡的统治阶级——将军和政治家，将国家变成现在这样提出了质疑。因为真纳在巴基斯坦成立后不久的1948年即去世，因此，我们无法推断如果他活得更长，巴基斯坦会变成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认为，真纳的基本原则遭到违背。巴基斯坦非但不是具有相当灵活性的国家，反而维持着一种令人窒息的伊斯兰教氛围。在这种环境下，伊斯兰极端主义获得政治让步，军队和政党彼此耍手段以获取政治地位，实行禁酒的政策，农村地区的女子学校遭到焚毁。至于自治，那只能是幻想，这一点在我与俾路支人和信德人的会面中已经非常清楚了。

真纳的陵墓像一个有两层支撑的建筑，就像巴基斯坦本身具有国家所需的全部矫揉造作的特征——伊斯兰堡的公共体系兼具莫卧儿和斯大林的风格。但是，在巴基斯坦各民族眼中，巴基斯坦政府依旧缺乏政治合法性。

“印度次大陆只出现了一个自由、世俗的政治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莫罕达斯·甘地只是来自南非的英国的代理人，一个说着漂亮言辞的反动分子。自真纳之后，我们一直处于旁遮普恶棍的统治之下，这些人是美国的傀儡。你知道印度河河水为什么这么浅吗——因为旁遮普人在上游偷走了我们的水源。信德是巴基斯坦唯一古老而合法的国家。”

说这话的是拉苏尔·巴克什·帕利朱 (Rasool Baksh Paleejo)，他是信德民族主义分子中的左派，曾被巴基斯坦军方和民选政府关押。2000年，我们两人会面之前，有些人曾告诉我，与他谈论政治可以看出他是海德拉巴城（位于印度河上游，卡拉奇的东北部）最有智慧的人。2008年，我再一次来到海德拉巴，又一次见到他。我想看看他的观点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是否复杂化了，但他的观点并没有变化。公路紧靠着沙漠，他的房子就位于公路的尽头，隐藏于高墙之后。跟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一样，我感觉到的是一种极端隔绝。他的脸庞仍然清瘦，雕刻般棱角分明，一头浓密的白发。他破旧的房子摇摇欲坠，家里的家具破烂不堪，地毯上布满灰尘。客厅的一角挂着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胡志明和纳吉布拉 (Najibullah) 的照片，纳吉布拉是20世纪80年代亲苏联的阿富汗领导人。大约10年前，在我第一次与帕利朱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阅读了马克思卷帙浩繁的巨著。这次会面，我问他最近在看什么，他提到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 教授与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教授合著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的对外政策》 (*The Israel Lobby and U. S. Foreign Policy*)。这本有争议的著作于2007年出版，该书称美国过度支持以色列有损美国的外交政策。

接着，他向我讲述“犯罪集团”“旁遮普寄生虫”“帝国主义的无能人”“布什法西斯主义分子”和“犹太人—资本家—塔利班”，这些集团都剥削信德人。他说，印度穆斯林移民、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都是“被美国利用的工具”。然后，他的声音变得平静，谈到中世纪早期莫卧儿统治的黄金时期。“莫卧儿人不是偏执的人。他们与印度教教徒结婚，任用印度教将军。他们没有家园，本质上是突厥游牧民族。”他似乎在暗示这才是他向往

的时代。如果巴基斯坦消失，融入更加多元化的印度，他或将热烈地大书特书。

在我看来，帕利朱的观点暗示种族民族主义道路的终结。他将整个世界简化地理解为受苦受难的一方和有计划的阴谋者一方。他和其他我会见的俾路支和信德民族主义分子其实都是长时间军事统治的产物，军事政权为不同思想交流提供的空间有限，因此，正常的政治发展无法生根发芽。这样，根本无法实现政治发展过程中正常的互相妥协（give-and-take），反而出现我们——他们这种不合理的在意识形态上根深蒂固的分裂。

公平地说，军事统治在巴基斯坦并不是偶然的。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的沙漠边缘地带，英国文官系统只延伸到位于肥沃的旁遮普平原的拉合尔，靠近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东部边界。但是，巴基斯坦的其他部分——俾路支和西北边境省崎岖的边界地区，远离印度河的信德的荒芜的盐碱地，以及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环抱的克什米尔——从来没有真正处于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统治之下。这些地区与英印其他地区相比非常落后，因此当 700 万穆斯林难民逃离印度来到这个新的地域的时候，军队自然成为最高统治者。确实，在这些不毛之地，部族和种族认同非常强烈，当文官政治有机会执政时，往往变成复仇和龌龊交易的官僚平台。在新成立的国家，文官政治家的交易物不再是过去的水井和大片沙漠，而是面粉厂、电网和运输系统。因此，军人被迫定期进行自我整顿，但是这样的行动注定走向失败，因为军队本身就是腐败的国中之国。而在民众的心目中，他们只是一个种族集团，即旁遮普人。因此，必然会刺激各种具有分裂倾向的民族主义运动。



巴基斯坦现在别无选择，只有中止军人统治，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国家可能年复一年地陷入腐败、低效和不稳定的民选政府的统治之下。因为非常明确的是，虽然民选政府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它使印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地区强国。巴基斯坦——并不像海湾国家那样有开明而高效的家族独裁者以及像印度那样有长时间实行的民主制度——的未来政治还有一条异常艰苦的路要走。就像孟加拉湾上游不稳定的缅甸一样，巴基斯坦——位于波斯湾和印度之间的中心沿海地带——是阿拉伯海地区稳定的关键。

然而，就像阿曼的故事一样，沿海地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深入内陆，以了解真实的巴基斯坦。地图指引着我继续向北前进，沿着印度河上行，进入信德腹地。

印度河从特达（Thatta）开始进入印巴边界的三角洲，因此，位于卡拉奇东部的特达是观察印度河最后的地方。据说，在亚历山大的军队沿着莫克兰海岸向西行军之前，曾在这里休整。在飓风到来之前，印度河是一幅破败和荒凉的景象：宽广的、浅灰色的海水，围着沙洲打旋，海水的颜色甚至比灰烬和煤灰的颜色更加令人感到难受。生命的主宰者如此无趣，以致只留下了热的气息。离开特达，印度河蜿蜒向北百余英里，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创造了河谷文明，该文明足以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文明相提并论。

在埃及，居民主要沿着尼罗河上下游迁移，这使其政治单元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是，美索不达米亚河流域不像尼罗河那样“平行且平和地按照人类的交通路线进行迁移”，而是如20世纪中期英国游记作家芙瑞亚·斯塔克（Freya Stark）所说：“按照人类注定的前进方向”——这就是说，移民路线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形成了一个直角，这就使美索不达米亚

平原容易发生战争和外敌入侵。<sup>①</sup> 印度河流域也是如此。印度河出海口位于南亚次大陆的西部边缘，这里的政治单元经常受到来自阿富汗、伊朗和俾路支高原以及蛮荒之地的入侵者的破坏。因而就边界薄弱而言，这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达特的沙·贾汗大清真寺见证了历史的沧桑。1586年，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大帝将注意力转向信德。在印度河流域的一场恶战中，阿克巴大帝征服了那里的地方势力。1593年，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后，达特的信德统治者亚尼·贝克（Jani Bek）在拉合尔对阿克巴表示臣服。确实，征服信德坚定了阿克巴重新夺回阿富汗坎大哈的决心。<sup>②</sup> 莫卧儿帝国兼容并蓄的特征在这座清真寺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示。清真寺展现了从现代伊朗直到印度这一广阔领域的艺术风格。该寺由阿克巴的孙子沙·贾汗在1644~1647年兴建，他也在阿格拉修建了泰姬陵。在祈祷广场，你会感觉自己在伊斯法罕（Isfahan）或者设拉子（Shiraz），甚至可以想象自己在赫拉特（Herat）或者布哈拉（Bukhara），而其中波斯和突厥的影响最为显著。清真寺装饰有各种各样蓝色、青绿色的彩釉和嫩黄色藤蔓花纹，然后是简朴而精致的传统工艺，令人眼花缭乱的半圆形穹顶和后圆顶（quarter dome）又一次令人联想到近东和中亚。在这座清真寺，你可以认识到，信德是西方所有沙漠和高原地区调制的精美作品，来自这些地区的入侵者共同造就了信德独一无二的身份认同。巴基斯坦或许是因为对抗印度而建立的，但是作为次大陆的一个边界地区，其物质文化展现的却是大中东的混合物。

---

① Freya Stark, *East Is West* (London: Jon Murray, 1945), p. 198.

② John F Richards, *Mughal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1

离沙·贾汗大清真寺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就是马克里山（Makli Hill）的万人冢：萨马（Samma）、阿鲁浑（Arghun）、塔尔汉（Tarkhan）和莫卧儿时期的坟墓都是由砂岩和釉砖建成。上述王朝兼有突厥和蒙古人的血统。然而，印度也有很多类似建筑，这表明了很多我们认为是印度本土的建筑实际上却是近东文化融合的产物。<sup>①</sup> 这里到处都是用砖砌成的台基、长方形的柱子、壮观的围墙和破裂的球形穹顶（cracked bulbous dome）。翘起的釉砖的颜色像老式睫毛膏，有些接近柔和的蓝色。这些孤独的墓碑耸立云霄，每个墓碑都占据着独立的小山。一些墓碑上的浮雕花纹精美、细致，近乎拜占庭式的威严壮观。其他的墓碑则具有凯尔奈克（Karnak）法老建筑的比例和复杂性。这些宏伟豪华的陵墓与巴基斯坦其他的历史和文化遗址一样，矗立在贫瘠的不毛之地，周围遍布垃圾。与陵墓本身所讲述的王朝历史不同，这里好像60年以来始终没有政府，只有劫掠者。

印度河转向北方，我沿着河流继续前行，穿过一大片盖满灰尘的黏糊糊的土地，这些灰尘产生于泥浆的裂缝。因为这样的地貌，这里所有的事物看起来都移动得很慢。这里是真正的古代大河沿岸文明：麦田和稻田、香蕉树和芒果树、大面积的海枣林，中间穿插着水渠。这里到处都是黑水牛，它们身体的一部分浸在泥浆里，虚弱得令人心痛的驴拉着满满一车木头，不远处的单峰骆驼拉着砖车。从俾路支到旁遮普南部季节性迁移的大量吉卜赛人沿着路排成一排。在海枣丰收的季节，他们来到这里，制造糖浆和油，以及其他与枣相关的副产品。这些人密密麻麻地站在泥浆里，但看起来并不比其他人贫穷。稻田呈现半透明的各种淡黄

---

① 这里是葡萄牙人劫掠的另一个地方，葡萄牙人沿着印度河航线，来到达特，洗劫了这座城市，杀死数千人，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纳贡。

绿色和绿色，穿着华丽、闪亮纱丽的女人，姿态优美地依次走在稻田间的田埂上。然而，因为灰蒙蒙的天气，整个景色还是缺乏颜色，尤其在下雨的时候更是如此。

离开阿拉伯海，我继续向北前进。越是向北，天气越热，风则变得很小，气温在华氏 100 度上下。我进入的住宅和招待所都有空调，但因为限电，空调并没有开。商店和汽车上都贴着贝娜齐尔和佐勒菲卡·阿里·布托的照片。信德是这两位被杀害的前总理的大本营。1979 年，贝娜齐尔的父亲佐勒菲卡·阿里·布托被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将军绞死；2007 年，他的女儿贝娜齐尔又死于暗杀者的子弹。然而，有些地方张贴照片并不一定代表民众对父女二人的忠心。据报道，很多人张贴照片和贴纸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免遭劫掠。他们告诉我，照片是防范暴徒的保险措施。

我于傍晚抵达了海尔布尔（Khairpur）。塔尔沙漠（Thar Desert）横穿印巴边界，除了这个沙漠外，海尔布尔向东一无所有。印巴分治之前，这里有很多印度教人口。我发现，这里的穆斯林依然保留印度教的传统，如与长者打招呼时行触脚礼。对这座人口拥挤的小城市而言，这一小小的动作对文明的意义重大。我发现，即使热气如水般湿重，即使这里缺少国家管理机构，这里所有的民众都热情而亲密。在这里，自来水极为珍贵，而部族和氏族之间长期争斗，冲突双方配备突击步枪反复仇杀。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发展不够。我回想起瓜德尔的情况：瓜德尔人还生活在田园诗般的传统文化中，游离在贪婪的现代国家之外，摆脱印度洋商业，轻松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瓜德尔人发现自己受到现代性的威胁，国家也若隐若现地试图控制这里。相比之下，内陆的信德则因为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文明的彻底衰落，因此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走向穷途末

路，也只能依靠国家的支持。

威廉姆·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是记者、历史学家和南亚次大陆专家，在我之后不久也访问了信德，他的视角更具经验性。在他看来，信德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比以前更加安静和安全”。<sup>①</sup> 确实如他所写，信德温和的苏非文化为对抗巴基斯坦其他地区的宗教极端分子提供了办法。学者安德雷·温克（Andre Wink）认同这一点，强调信德自古以来是“异端”和“自由思想家”的避难所，例如伊斯玛仪派。<sup>②</sup> 就像俾路支和信德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反复向我强调的，他们所开展的运动本质上是世俗主义运动，与伊斯兰正统教义没有关系。

上述一切都是正确的。此次巴基斯坦之旅恰逢乔治·W 布什任期即将结束，我对巴基斯坦总的印象是，美国未给予其适当的重视，同时面临着国家失败的风险。8年前，我在布什总统上任伊始曾来过这里，因而能够识别这些年中这里任何点滴的进步。因为巴基斯坦及其稳定的局势曾在布什外交政策构想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因此，巴基斯坦没有实现发展进步，是谴责布什外交战略以及布什政府将精力转移到伊拉克的罪状之一。以前，我本人是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确实，我并非只有到了巴基斯坦才能了解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毕竟，这些年，我定期行走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报道这些地区的混乱状态。但是要面对面地了解这样的失败，看看时隔8年之后的巴基斯坦在面对动乱时的脆弱，就必须直接面对更多无可辩驳的事实。

---

① William Dalrymple, "Pakistan in Peri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 12, 2009.

② Wink, *Al-Hind*, p. 213.



游历巴基斯坦后可以切身地认识到，美国想要控制半个世界以外拥有 1.72 亿人口的城市化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有责任在自己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帮助。实际上，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袭击之后，美国纯粹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花费大力气经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是，即使其在未来的岁月里成功地帮助阿富汗实现稳定，那么结果却是为通过能源管道实现印度洋—中亚地区的整合提供了条件，最终，中国得到的利益将比美国多。换句话说，瓜德尔港口项目所体现的，与其说是奥萨马·本·拉登的追捕行动，不如说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地缘政治世界。

青铜时代的摩亨佐·达罗（印度河前之丘）城市遗迹，既是对周围事物的贬损，也是对它们的整合。摩亨佐·达罗是那个时代财富和完美的象征，现在则更多地作为印度河河谷文明极端贫困的标志——即使建立遗址的目的是强调印度河河谷的悠久文明，以及其重新复兴的潜能。遗址中，到处都是印在砖块上的正方形和椭圆形，体现了令人吃惊的几何上的完美无缺。位于印度河较上游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是哈拉帕文明的两座主要城市。美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瑟夫·A. 泰恩特（Joseph A. Tainter）将哈拉帕文化描述为“高度集中的社会，国家控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磨谷物、手工制砖、批量生产陶器、收集木材和建造住宅。”<sup>①</sup> 南亚史专家伯顿·斯坦因（Burton Stein）的解释与泰恩特稍有不同，他认为哈拉帕城市与摩亨佐·达罗一样，其核心都是“酋长的联合，而不是统一的

---

① Joseph A. Tainter,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

国家”，每一个城市都是通向农村腹地的“通道”。<sup>①</sup> 不管怎样，那时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有固定的边界，从俾路支到古吉拉特的广大地区——从阿富汗南部到印度西北部——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

20 世纪，对摩亨佐·达罗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发现了 12 万平方英尺、由极薄的烧纸砖建成的暗褐色和玫瑰色的精致而复杂的工程遗址，这些烧制的砖块用来建造房屋、铺设街道和排水沟，可以追溯至 5000 年前。这里只是这座位于印度河岸的古代城市的 1/10，它们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罗马或伦敦面积的两倍。<sup>②</sup> 在黑暗简陋的博物馆里，我可以暂时躲避外面的酷热，这里的雕像具有典型的苏美尔人特征：修剪整齐的胡须和眯成一道缝的眼睛。大约公元前 4500 年，苏美尔人的一个分支跨越伊朗高原和俾路支沙漠，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这里。<sup>③</sup>

我又被贵霜时期的佛教舍利塔所吸引，重新回到遗址，这座塔大约建于 2 世纪——即摩亨佐·达罗衰落后的 16 个世纪之后。舍利塔高耸于遗址之上，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我在想，如果有这样一座令人振奋的舍利塔可以瞻仰，谁还会需要帝国大厦或者迪拜塔（Burj Dubai）。虽然它与摩亨佐·达罗的青铜时代文明没有关系，但却与周围的遗址融为一体，仿佛一尊亨利·穆尔（Henry Moore）的雕刻作品，突出了遗址的对称性和完美的角度，然而，它的完美和对人间万物敏锐的洞察

---

① Burton Stein, *A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Eng.: Blackwell, 1998), p. 22.

② W Gordon East, *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65), p. 142.

③ Asif Raza Morio, *Moen Jo Daro, Mysterious City of [the] H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Larkana, Pakistan: Editions, 2007)

还是令人震惊的。舍利塔是贵霜王朝的产物，贵霜人是印欧人中最东边的一支，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曾统治印度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部分地区，因为宽容和随和而闻名，其世界观中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教众神。这是哈拉帕文化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一个例子——虽然身为印度洋的一部分，但并不局限于此。

摩亨佐·达罗 (moenjodaro) 的北面是拉卡纳 (Larkana) 和伽里—库达—巴克什 (Garhi Khuda Baksh)，这里是布托家族的墓地所在，也是巴基斯坦最封建的地区之一。用记者玛丽·安妮·韦弗 (Mary Anne Weaver) 的话来说，“家庭生活有围墙的大院里，院墙周围设置了步枪射击点；这里的地主通常很残暴，农民都是农奴；在这里，女人都养在深闺里，男人则享受着威士忌，快乐地狩猎”。<sup>①</sup> 穿过间隔出现的荒野和辛苦劳作的驴子及水牛工作的农田，布托家族墓地白色的穹顶使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走到近前细看，白绿相间的陵墓上的青绿色并不均匀，有裂缝的彩釉被乱糟糟的白色灰泥和涂料弄脏了，墙上还留有父亲佐勒菲卡和女儿贝娜齐尔旧时海报的碎片以及贴着贝娜齐尔的大海报。这个穆斯林墓地充分表现了对偶像的崇拜之情。确实，这里是著名的兼有苏非派和什叶派风格的地方——佐勒菲卡·阿里·布托陵墓周围环绕的柱子令我想起位于德黑兰南部的阿亚图拉·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 墓。信徒们来到那里吃午餐，坐在刺绣的地毯上度过一整天。这里没有值得观看的景观，没有特别的风景需要详细叙述。家庭成员的棺材成排放置在地板上。祷告大厅很简陋，具有部族特征。贝娜齐尔·布托在

---

<sup>①</sup> Mary Anne Weaver, *Pakistan: In the Shadow of Jihad and Afghanis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p. 181.

哈佛和牛津接受教育，但是在这个家族墓地，没有丝毫西方氛围。这里由普通民众管理，也欢迎民众前来瞻仰。一个留着胡须的老人呆坐在那里，向贝娜齐尔的棺材扔玫瑰花瓣，棺材由一两片地毯覆盖——正式的陵墓将在稍后建造。以她的形象做成的吊饰和照片正在出售，新婚夫妇来到这里参观她的陵墓，立誓效忠。

贝娜齐尔·布托——尽管受过西方教育，但依旧是顽固封建的信德家族的女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者和辩论家，但缺少行政统治能力，没有处理好国家事务。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两个任期里，她的治理仅仅是导致巴基斯坦更大范围腐败和混乱的起点，全国范围的腐败和混乱最终导致巴基斯坦恢复了军人统治。由于她曾经信誓旦旦的言辞和承诺，伊斯兰极端分子谋杀了她，他们将她看作危险的民主和现代化的象征。但是，仅仅有象征是拯救不了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家极其需要的是布托所缺乏的管理能力。无论如何，如果巴基斯坦想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应该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分权化的国家。

人类学家约瑟夫·A. 泰恩特写到，文明是“脆弱的非持久的现象”。<sup>①</sup> 在青铜时代，摩亨佐·达罗是一个高度中央化的城邦，而城邦内也许是松散而多元的农业联盟。那将是我们所称的巴基斯坦的未来：或者实现其创始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分散化的四海一家的理想，或者将进一步走向衰落。这就意味着，不论以何种方式，俾路支和信德必须崛起，以便为莫克兰沿岸的阿拉伯港口城市提供充足的本地认同，这些港口城市的命运将有助于决定巴基斯坦遥远的内陆城市的命运。19世纪的

---

<sup>①</sup> Tainter,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p. 1.

旅行家和语言学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在信德旅居5年后这样写道，延伸至伊朗的莫克兰沿岸成排的港口可能会“轻松聚拢整个中亚贸易”，孟买将是这个覆盖范围广泛的贸易网所指向的中心。<sup>①</sup> 虽然这种看法在那时是一种帝国主义观点，但在目前边界变得日益脆弱的时代，它也有成功的希望。

---

① Richard F Burton, *Sindh; and the Races That Inhabit the Valley of the Indus; with Notices of the Top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London: Allen, 1851), pp. 3, 362.



## 第六章

# 古吉拉特令人担忧的崛起

如果说现代印度精神存在地理上的中心，那这个中心就是古吉拉特。古吉拉特邦位于印度西北，与巴基斯坦的信德省接壤。圣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是古吉拉特人，于1869年出生在阿拉伯海沿岸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Porbandar）。印度独立运动期间的标志性事件是被称为创世神话的“食盐进军”。1930年，甘地带领数千人从高僧修行所（Sabarmati Ashram）出发，向南穿越古吉拉特邦，行走241英里，到达甘贝湾（the Gulf of Cambay）海滨村庄丹地。在丹地，甘地公然违抗英国法律，在海滩上抓起一把盐，以此挑战殖民当局对食盐生产和销售的垄断。“除了空气和水，盐可能是生活中最离不开的必需品。盐是穷人仅有的调味品”，甘地写道，因此“从穷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盐税是所有税收中最不合理的。既然独立运动本质上是为了这片土地最贫穷的人，那么就应该以消除这一不公平的食盐专卖法为起点”。

甘地普世哲学的本质是与穷人保持一致，这一点可以浓缩为

下面这段话，这也许是甘地所说的最具有政治意图的话语：“我不相信多数原则。从本质上讲，为了满足假定的51%的人的利益，49%的人的利益可能甚至应该被牺牲掉。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原则，对人性是有害的。唯一真实而高贵的人类原则应该是为了所有人的最大幸福。”

因为资本主义只为大多数人带来好处，而不是给所有人带来好处，所以，为了保护穷人免遭资本主义的掠夺，印度应该在独立后选择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虽然印度教教徒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几千万穆斯林的权利不应而且一定不能被践踏。事实上，虽然印度到处浸透着宗教和神秘主义的氛围，“最大幸福”迫使新生国家和执政的国大党明确宣布实行世俗的国家道德原则。尽管外表形象更似一个半裸的村夫，但甘地却是印度洋普世精神的象征，这一点大部分为独立后的印度政党所继承。

但是，在这个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种族和宗教冲突迅猛发展的新时代，印度精神也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转变，这种转变部分是对因全球化而产生的社会同质化的激烈反应。古吉拉特邦——印度屈指可数的几个有着长期印度洋商业历史和传统的地区之一，又一次成为印度不稳定的核心地带，而这一次却不可思议地威胁到印度崛起为全球大国的地位。

我解释一下：我非常看好印度，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表现出了足够的弹性以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骚乱和地方混乱局面，这一点是中国威权体制无法望其项背的。归根结底，印度民主是一种温和主义力量。而且，印度是众多宗教的发源地：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犹太教、索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在印度也存在于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西藏的达赖喇嘛在印度居留几十年；印度选举了三位穆斯林总统。如果没有自由和选择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下面所写的内容应该被看作一个内容繁杂且

具有警戒性的故事，而不应视其为印度衰败的预言。相反，它是对印度现存问题的调查。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印度的故事可能会更美好。

印度是 1.54 亿穆斯林的家园，是继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后的世界第三大穆斯林人口国家。宽容的教派关系是印度稳定和繁荣的必要条件，因为全印度，尤其像古吉拉特这样商业化的邦，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在日常的商业交易中必须打交道。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印度造成的损失，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即使如此，最近古吉拉特——当然在印度其他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开始出现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彼此隔离的情况。他们的孩子离开建立在教派融合基础上的学校，并且首次在缺少信奉其他宗教的朋友的环境下长大。大部分穆斯林摒弃了南亚次大陆宗教融合的传统，开始蓄须、戴无边帽、穿长袍。“古吉拉特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分隔是分治以来最严重的”，住在古吉拉特的历史学家杜真卓拉·特里帕蒂（Dwijendra Tripathi）对此深感遗憾。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现象竟然发生在古吉拉特经济繁荣之时，这里有崭新的购物中心、多厅电影院、私人港口和高速公路，并且将自己定位为跨印度洋贸易路线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邦。

然而，在经济发展之外，古吉拉特的宗教冲突有更加特殊的源头，即“2002”，古吉拉特人和印度其他地区的人都简单地用“2002”称呼这一事件。2002 年在本地词汇中获得的符号意义，可能类似于“9·11 事件”引起美国人的反弹性反应。“2002”意指无法忘怀、永远铭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暴行；2002 年的暴行是对甘地食盐进军行为的丑陋的玷污。印度不同宗教集团、种姓集团和部落集团之间经常发生引人关注的暴力事件，但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更大的混合——印度令人赞叹的民主

制——消化吸收。但 2002 年发生的这些事件声名狼藉，是所有暴行中最令人震惊的。

地方人权组织所称的“大屠杀”，肇始于戈特拉（Godhra），原因是 2002 年 2 月 27 日 58 名印度教乘客在此被烧死。戈特拉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小镇，从古吉拉特开往印度中北部北方邦的列车途经此站。纵火的伊斯兰教徒显然受到古吉拉特印度教教徒的嘲弄，这些印度教教徒前往北方邦阿约迪亚示威，要求在被捣毁的莫卧儿时代的清真寺上重建印度教神庙，途中经过戈特拉。在此关键时刻，上任不久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发布命令，宣布 2 月 28 日是哀悼日，这就意味着被烧乘客的葬礼可以在古吉拉特最大的城市阿迈德巴德的街道上举行。《金融时报》驻印度记者写道：“这明显是在诱导暴力事件的发生。”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在《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sup>①</sup>一书中写道：“数千名印度教教徒包围了艾哈迈达巴德以及古吉拉特其他城市中的穆斯林居住区，形势剑拔弩张。”恰逢暴乱期间，莫迪引用牛顿第三定律，“每个作用力总有一个与之大小相等的反作用力。”此言一出，解除了杀戮者的后顾之忧。暴徒们联合行动，强奸穆斯林妇女，然后将煤油倒进妇女、儿童的喉咙，最后纵火焚烧他们。暴徒们往往强迫穆斯林男性观看他们仪式性的杀戮行为，然后再处死他们。对死亡数字和冲突细节的披露引起极大的争议。一些报道称，400 名妇女被强奸，2000 名穆斯林被谋杀，20 万穆斯林无家可归。

根据报道，这些杀戮者戴着橘黄色的围巾，穿着卡其色短

---

<sup>①</sup> Edward Luce, *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Strange Rise of Modern Ind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pp. 158 -162.

裤——这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国民志愿团（RSS）的制服，手拿刀剑和汽油桶，来到现场。他们拿着选民登记册和打印的资料，以确定穆斯林家庭的具体位置。他们甚至有穆斯林店铺的地址——虽然这些店铺打着印度教教徒合伙人的招牌。卢斯、著名作家潘卡基·米什拉（Pankaj Mishra）和其他许多人认为，施暴者策划之精密、效率之高暴露了官方的失职。“在几周前，就有人调查穆斯林住在哪里”，艾哈迈德巴德非政府人权组织领导人普拉沙德·查科（Prasad Chacko）说。“警察也是共犯。他们借口让人们表达自己的情绪而袖手旁观。即使不考虑死亡数字，单就杀戮行为的性质而言，这就是一起由政府主导的种族屠杀。”

确实，警察袖手旁观，任由屠杀行为发生。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描述，在某些情况下，警察还帮行凶者指路，告诉他们穆斯林居民的住址。对 20 万无家可归者，古吉拉特邦政府的救助很少，甚至不提供救助，对于死者和商业损失的赔偿也是如此。很多世俗的非政府组织作为旁观者，无法参与救济活动，因为他们担心救济活动可能会激怒政府。伊斯兰慈善组织——伊斯兰促进会、传教团（*Tabliqi Jamaat*）和印度伊斯兰贤哲会（*Jamiat Ulema-e-Hind*）——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但随着暴力行为的发生，这些组织后来成为穆斯林青年激进化的工具。曾经因为在教派冲突中家喻户晓的言辞而闻名全印的莫迪，后来称这些穆斯林救济营为“制造婴儿的工厂（*baby-making factories*）”。<sup>①</sup>

古吉拉特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头目索菲亚·汗（*Sofia Khan*）对

---

① Citizens for Justice and Peace, “Summary of the CJP’s Activities Between April 2002 and October 2003,” Mumbai.



我说：“若干年后，2002年教派冲突事件肯定会反复，因为古吉拉特邦政府卷入到教派仇杀中，而且至今邦政府也并没有就这一事件公开致歉。”退休法官拉梅什·梅塔（Ramesh Mehta）愤然指出：“没有任何的道德审判。”一位印度教社会活动家冷漠地向我进行合理化分析：“如果在戈特拉的火车没有被焚烧，随后的骚乱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古吉拉特全境，尤其是在受教育的印度教教徒中，我听到的都是这种观点。几十年来，虽然事实上印度的政党都打教派牌——有人可能认为1984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被锡克教保镖刺杀后，国大党也煽动了反锡克教的暴力冲突，但是古吉拉特当局却是采取公然而明显的方式，协助发起针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在暴力事件发生后，就像社会活动家、曾救助暴力事件受害者的约翰娜·拉康特（Johanna Lokhande）告诉我的，“当地政府完全反对需要司法公正审判的意见”。

可以明显看出的是，2002年的事件可能会继续发生，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首席部长莫迪在这些年里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他既没有道歉，也没有表示对2002年发生的此类事件的遗憾，相反，他却因为这一事件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英雄，数次当选首席部长。甚至，因为他看上去清廉、高效以及知人善用，从而使古吉拉特成为人人向往的发展新区，吸引的内部投资比其他邦都多。如果从巴基斯坦的信德转到印度的古吉拉特，看到双方在印度洋地区部署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能力，你会真切地赞成巴基斯坦表现欠佳，而印度则是成功国家的典范。这个也许并不十分准确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莫迪的治理方式。

最近几年，全印的移民纷纷涌入古吉拉特，在该邦新建的工厂里寻找工作机会，这些移民既包括印度教教徒，也包括穆斯林。莫迪的古吉拉特具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所具有的一些特色。同时，在剧场背景的衬托下，他的催眠术式的演说也使人将他比作

希特勒。莫迪不但是当今印度最危险的且具有号召力的政治家，而且可能是自20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之后出现的唯一有号召力的印度领袖。

当然，纳伦德拉·莫迪既不是李光耀，也不是希特勒。他就是莫迪，是新生的混合型政治家——一方面像是首席执行官，具有难以置信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有狂热的信仰追求，是暴力的煽动者。他本人既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会令人感到不安。大众媒介的发展导致领导方式的变化，就像巴拉克·奥巴马在新千禧年给数百万人带来希望一样，莫迪则表明新世纪也会出现状况：掩藏在冷静的高效率官僚的外表下顽固地坚持宗教区分的心理。这也是莫迪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代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甘地的精神，他是印度洋故事中的重头戏。

领导者通常都会在详述问题前，先概括说明一下围绕这个问题的地理、政治及社会情况。因此，在深入研究纳伦德拉·莫迪的性格并叙述和他长时间的对话内容之前，先描述一下古吉拉特给人的印象。古吉拉特是21世纪印度和印度洋的缩影。

历史学家瓦詹德鲁·特里帕蒂（Dwijendra Tripathi）说，古吉拉特有“优越的地理优势”。它位于印度洋海岸线的中心点附近，而且距离伊朗和阿拉伯半岛也很近，便于精炼上述地区的石油并出口。因为濒临卡奇湾和坎贝湾这两个优良的港湾，古吉拉特拥有印度最长的海岸线和最好的天然良港。这一宽广的海岸线向西延伸到中东和非洲，因此，有史以来古吉拉特就是贸易集散地，有大量的流动人口。<sup>①</sup> 卜默斯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The*

---

① Andre Wink,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vol. 2, The Slave Kings and the Islamic Conquest, 11<sup>th</sup> - 13<sup>th</sup> Centurie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69.

*Lusiads*) 中写道:

看信德这片沃土  
 幽深的卡奇湾  
 涨潮如洪流  
 退潮迅而捷  
 看充满宝藏的坎贝湾  
 海洋啃噬着海岸线  
 我经过的一千个城市  
 以舒适期待你的光临<sup>①</sup>

确实,古吉拉特人是优秀的水手,在他们的经营下,坎贝湾成为西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最东端,同时又是东印度洋群岛贸易的最西端。<sup>②</sup> 在古吉拉特和印度西海岸可以发现黎凡特人(Levantine)的钻探设备和中国的平底船。<sup>③</sup> 因此,古吉拉特一直处于数个贸易体系的影响之下。<sup>④</sup> 此外,从阿拉伯半岛到东南

① Luiz Vaz de Camoes, *The Lusiads*, trans. Landeg White (1572;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nato Ten; 106.

② Marshall G. S.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 2,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p. 546; Alan Villiers, *Monsoon Seas: The 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 109.

③ R. A. L. H. Gunawardana, "Changing Patterns of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ir Impact on Pre-Colonial Sri Lanka," in Satish Chandra,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 (New Delhi: Sage, 1987), p. 81.

④ S. Arasaratnam,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As hin Das Gupta and M. N. Pearson, eds.,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1500 - 1800* (Kolka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亚群岛，都是古吉拉特优良棉织品的销售市场，因此，自中世纪以来，古吉拉特港就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在英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古吉拉特人将棉布卖到也门换取银币，然后再将银币借给英国商人购买也门咖啡。这样，在英国人偿还借款后，他们就可以得到双倍的利润。<sup>①</sup> 这种商业上的敏锐洞察力和喜欢创新的偏好逐渐被大胆的冒险精神所取代。19世纪早期，基本由什叶派伊斯玛仪分支组成的较大的古吉拉特社团开始出现在马斯喀特、亚丁、东非和爪哇等地，其中又以马六甲和桑给巴尔最为集中。<sup>②</sup> 甘地在南非开始从事律师职业并成为政治活动家，与其说是印度传统，不如说是在印度洋地区扎根的古吉拉特传统。后来，当美国开始吸引印度人并且放松签证制度的时候，古吉拉特人蜂拥而至，成为汽车旅馆的老板、硅谷软件业巨头。据估计，纽约印度移民中的40%是古吉拉特人。其中，帕特尔（Patels）姓氏的人最多，他们本是村官，19世纪聚敛了大量财富，从而成为掌握土地的绅士，之后，他们到非洲和美国寻找商机。

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都将信仰作为构建商业网络的工具，这一网络可以为有利的商业互动提供社会和文化框架。这样，在古吉拉特，忠诚团结的不同种族和宗教团体始终可以在四海一家的框架内驾轻就熟地进行商业活动。尽管古吉拉特邦在计算机办公和经济自由度指数上领先其他各邦，但它同时也拥有最严格的饮

---

① Engseng Ho, "Port City States of the Indian Ocean,"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Dubai Initiative, Feb. 9 - 10, 2008.

②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75. Charles Verlinden, "The Indian Ocean: The Ancient Period and the Middle Ages," in Chandra, *Indian Ocean*, p. 49.

食限制。在甘地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公开禁酒，素食也比其他邦更为流行（部分是由于耆那教影响的结果）。古吉拉特人消极地将食肉传统与中世纪晚期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征服者——莫卧儿人联系在一起。

古吉拉特的历史发展不但取决于阿拉伯海和更广阔的印度洋，而且也取决于它作为南亚次大陆边界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因为这样，古吉拉特持续受到来自北部和西北部的穆斯林的入侵，文献记载的入侵行为所造成的破坏要比印度其他邦都严重。其中，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突厥—波斯（Turko-Persian）统治者伽色尼国王马哈茂德的入侵。1026年，他从阿富汗东部进入古吉拉特，完全摧毁了位于海边的索姆纳特（Somnath）印度教神庙。无论何时，只要跟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谈论2002年的事件时，他们都会提到伽色尼国王马哈茂德和莫卧儿人所犯下的罪行。对印度教教徒而言，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历史，恍若昨日发生。确实，伊斯兰建筑奇才建造了泰姬陵，并带来了一种精致而奢华的文明，这一文明混合了波斯、中亚和印度北部的物质文化，但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观念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历史片段。分子生物学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维贾伊·乔提齐威尔（Vijay Chauthaiwale）对我说，“印度的穆斯林必须与对巴卑尔和阿克巴的回忆脱钩，必须与恐怖主义脱钩，并且应该成为完完全全的印度人”。

纯粹的印度。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显示了对历史的着意篡改，印度媒体和学校教科书对这一观点的传播也负有部分责任。尽管伊斯兰移民造就了印度令人艳羡的多元文化，印度语和古吉拉特语中都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外来词汇——但他们依旧遭到排斥和诋毁，因为伊斯兰教统治者给印度教教徒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痛苦经历以及对城市和宗教圣地的劫掠（虽然在印度历史上，



伊斯兰统治者内部武装冲突的次数可能要多于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sup>①</sup>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眼中,甚至因实行宗教多元主义而闻名的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阿克巴大帝虽然是一个穆斯林,但是他接受印度教,晚年试图创建全新的宇宙宗教以解决宗教分裂问题)也只不过是另一个穆斯林征服者而已。

如果以世界观来衡量,包容性的世俗的印度历史已经不复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尼赫鲁统治时期,国大党支持世俗主义的印度历史观。这一看法缘自甘地温和的人本主义观点,不能将任何人排除在国家实体之外,并且力图消除不同宗教集团之间的历史隔阂。最初国大党借以立身的合法性与充满传奇的执政风格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迪拉·甘地宣布实行威权的紧急状态法令而遭遇毁灭性打击。随着国大党的衰败,需要新的方法动员印度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于是,古吉拉特因为其成功的商业历史,中产阶级的崛起速度要快于印度其他各邦。

这种逻辑偏偏又获得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的支撑。信息技术使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摆脱了地方多样性,分别开始标准化并意识形态化:如同中东地区什叶派穆斯林一样,全印的印度教教徒也团结一致,穆斯林逊尼派当然也是如此。但是对印度教教徒来说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因为在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印度教只是一系列地方崇拜的联合,统一的印度教只是一种词汇的表达,而非事实上的统一。<sup>②</sup> 与此同时,教育让民众首次了解自己的历史,他们也因此感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历史创伤感。“印度教教徒穷人对伽色尼国王马哈茂德根本一无所知。现在不同了,中产

---

① Dwijendra Tripathi, "Crisis of Indian Polity and the Historian,"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Amritsar, 2002.

② See in this context Susanne Hoeber Rudolph and Lloyd I. Rudolph, "Modern Hate: How Ancient Animosity Get Invented," *New Republic*, Mar. 22, 1993.

阶级了解这段历史”，当地一名人权人士这样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但在穷人和文盲中得到最强的支持，甚至在诸如科学家、软件工程师、律师等受教育阶层也是如此。其实，从基地组织（al - Qaeda）到穆斯林兄弟会，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也存在这种现象。在中产阶级和中上资产阶级新右派眼中，印度在建立国家之前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在国家与少数派达成妥协之前，独特的印度文明没有受到外界的污染，印度文明就是印度教文明，尽管事实可能要复杂得多。

中产阶级的印度教教徒力图复兴民族辉煌的努力，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穆斯林中产阶级中同样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三国都热衷于发展核武器。不论印度的孔雀王朝，还是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于数百万刚刚脱离贫困并开始接受教育的民众来说，核爆炸是辉煌的古代帝国的召唤。

在印度，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经济改革进一步点燃了民众的热情，印度也真正进入全球化先驱者的队伍中。因为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成为过去，这样，每个集团都需要加强集团认同，以此标记在乏味的世界文明之中。最近，印度教教徒在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突然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因此更易于接受排外主义的思想意识。在这一点上，海外古吉拉特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在西方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后，他们转回印度亲属那里寻根，这也是因为与广阔世界的碰撞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褊狭化。在这场考验中，印度教特性以强有力的姿态崛起，作为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在崛起。

印度教特性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23年的一本《谁是印度教教徒》的小册子中，这本小册子由独立运动活动家V·D·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rvarkar）所写。但在最近10年，随着印度经济开放，印度教特性才开始真正为人瞩目，经济开放的社会

效应给所谓的印度教组织提供了发展壮大机会。印度教组织包括国民志愿团、印度人民党和世界印度教大会。其中，建立于1925年的国民志愿团是母组织（mother organization）。国民志愿团是一个规模庞大，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又是非正式的、自愿互助型的组织。分子生物学家乔提齐威尔解释说，国民志愿团真正表达了印度教教徒的心声，而这些声音在国大党亲穆斯林的政策下是被压制的。早些时候，穆斯林入侵印度。他说：“穆斯林征服印度后，我们迷失了。英国征服印度后，我们再度迷失。我们是一个屡遭蹂躏的社会。我们需要以印度教教徒的身份团结起来。”

在国民志愿团追随者的记忆中，国民志愿团在1947年印巴分治的时候，履行了拯救巴基斯坦众多印度教教徒的英雄使命。翌年，因暗杀甘地的戈德塞（Nathuram Godse）曾是国民志愿团的成员，国民志愿团遭取缔。但是，20世纪60年代，国民志愿团开始走向复兴。国民志愿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尤其是从事社会改良的运动，这一点与中东穆斯林兄弟会比较相像。在印度教部落地区，国民志愿团启动人道主义计划，力图消除不可接触制，以便使印度教内部更为平等。20世纪70年代，国大党的社会影响力慢慢下降，而国民志愿团的社会影响力却逐步上升。印度人民党的建立是为了在政治层面向全国推进国民志愿团的理念。我在古吉拉特拜访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人权组织，都称国民志愿团是法西斯组织，在对印度教教徒兄弟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的面纱后，隐藏着“文化民族主义”的意图。据报道，2001年古吉拉特地震后，国民志愿团只为印度教家庭提供救助。

国民志愿团的核心是宣传干事（pracharaks），他们是国民志愿团话语的传播者。这些人通常不结婚，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组织。他们生活简朴，虽然负责指导数百人，而自己却默默无闻，

力图消除自我。普通的宣传干事通常在婚前从事两到三年服务工作，然后恢复正常生活，其他的宣传干事则与神职人员一样。但是，纳伦德拉·莫迪却与众不同。1950年，他出生在古吉拉特一个中等种姓家庭，在2001年末成为首席部长前，他担任宣传干事的工作差不多有10年。莫迪至今未婚，独居，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国民志愿团。

莫迪——印度教思想家和古吉拉特公司富有革新精神的首席执行官，是此时古吉拉特历史和地理绝妙结合的杰作，充分显示了古吉拉特既有严格的社会认同，又具有与西方标准媲美的创新企业精神。莫迪非常诚实，别人赠予他的礼物通常整齐地摆放在邦政府的国库中，这与印度政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腐败和裙带关系有着天壤之别。在去村庄的途中，怀孕妇女通常会抚摸莫迪的脚，期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同他一样。

莫迪的办公室位于政府办公楼较高的楼层。巨大的政府办公楼建于40年前，由廉价的石头砌成，办公楼的正面脏兮兮的，周围是政府其他部门的办公楼，与甘地纳加尔的其他建筑一样，巨大而丑陋。艾哈迈德巴德市北部是规划中的政府办公区域，那里是前社会主义印度不合理的建筑计划的残留。古吉拉特人口尽管只占全印总人口的5%，但实际人口数量达到5000万，比韩国全国的人口还要多，因此，古吉拉特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

莫迪办公室外面吵吵嚷嚷，身着昂贵西装的西方商人和投资者在会见首席部长后聚在一起叽叽喳喳。下午17时整，我被领进莫迪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的后面，那里还有许多桌子，但椅子上都没有人。他穿着传统的宽松裤子和修长优雅的棕色柯蒂(korta)，兜里插着笔，这是穆斯林莫卧儿人带到印度的传统服饰。他戴着金属丝边的眼镜，留着修剪整齐的黑白混合的胡子，

有一张英俊的、受欢迎的脸庞。在他前面，放着一堆文件，在我开口发问之前，他将材料塞给我。很显然，他只有有限的时间进行有限的交流。“我听说你对这里的发展感兴趣，这就是你的答案。”他给我的不是普通的宣传材料，而是助手整理的一长串原始数据。自2002年以来，古吉拉特的GDP年均增长10.2%，新建了8所大学。印度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中，有一半以上属于古吉拉特。古吉拉特在消除贫困和电力生产上都位居印度第一。与我旅程中所经历的一样，古吉拉特和临近的巴基斯坦的信德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信德，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电力供应。古吉拉特的新堤坝工程和微灌系统，也与信德有很大的差异。自英国统治以来，信德严重缺水和水坝破损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智利和中国的情况在我的脑海中闪现。1973~1974年担任总统的第一个月，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镇压了数千人，然后开始致力于经济的蓬勃发展，整个国家因此而受惠。1989年风波后，邓小平开始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在有记录的经济史上，这次改善比以往任何一次所用的时间都短。在这两个案例中，执政者都在随后推行了一揽子改革计划。虽然这种做法令人反感，但它确实发挥了作用。2002年以后，古吉拉特没有再发生一起教派冲突。虽然我们不愿承认，但这的确是事实。

我问莫迪，你是否想在古吉拉特创建另外一个新加坡或者迪拜？从某种肯定的意义上来看，你所创建的古吉拉特肯定与印度有所差别。

莫迪回答：“不，新加坡和迪拜都是城市国家。这里可以有很多的新加坡和迪拜。卡奇就将会会有一个新加坡。”他不屑地挥舞着手臂，“古吉拉特国际金融科技城（GIFT, the Gujarat International Finance Tec-City, 计划在附近修建的高新技术城）



将会成为迪拜那样的城市。从整体来说，古吉拉特类似韩国。全球商业是我们的生命源泉”。他继续说道，并扬了扬眉毛以示强调。莫迪说话的方式中带有一种老到的夸张，从中你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能够感动民众或者掌控会议。每逢他张开嘴巴，立刻会展现自己真正的吸引人的风采。

虽然是从默默无闻的宣传干事起家，但莫迪依旧野心勃勃。韩国可是世界上第十三大经济体，然而我能够理解莫迪为什么用韩国做比较：韩国是一个大半岛，与古吉拉特一样，濒临重要的海道。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不是民主政权，而是在朴正熙温和威权主义治下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的且中产阶级充满活力的国家。我向莫迪表达了以上观点。他说，自己没有兴趣谈论政治，只对发展感兴趣。当然，政治会建构自由，莫迪突然对政治不感兴趣并不令人意外。莫迪的治理方式是非民主的，但非常高效：这种统治风格强调依靠具有依赖性且相对独立运作的官僚机构，而这些人则完全由莫迪本人掌控，甚至连他自己所属的政党都被排斥在一边，几乎达到无视的程度。

据透露，莫迪只是把 GIFT 作为其长远战略规划的一部分。GIFT 是一个将古吉拉特打造成印度洋经济中枢的主要项目。2007 年 6 月，莫迪亲自为这座金融服务中心奠基。这个高新技术城占地 500 英亩，是伦敦造船厂的两倍，比巴黎拉戴芳斯新区大 25%，甚至比上海和日本庞大的金融中心还要大。GIFT 将会具有自己的特色：11 层的摩天大楼，风景优美的绿色地带，最新的公共运输系统，达到西方环保标准的废物处理系统，拥有尖端的宽带连接和数据整合的信息大厦，带有季风暴雨排水系统的城内交通，让 5 万居民和每天 40 万工作人员走路上班的概念。GIFT 注定会成为未来之城，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媲美。而现在，莫迪只是将 GIFT 作为他计划中“更大的韩国”之中的

一个迪拜城。

莫迪以说教的口吻，简明扼要地向我介绍 500 年来古吉拉特的国际贸易史，介绍帕西人以及其他如何来到古吉拉特海岸，并融入当地的印度教文化中。我问他组成古吉拉特人口 11% 的穆斯林的贡献是什么。“我们是追求精神的、敬畏上帝的信众”，他回答，“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素食主义者。耆那教和佛教给予我们积极的影响。我们想在这里修建一座佛教寺庙以表示对佛陀遗物的尊重”。然后，他马上催促我提出下一个问题，表示对这个问题他已经没什么可说的。当然，穆斯林是肉食者。

我问他，担任首席部长的 7 年间，有没有对自己做过的或者未曾做过的事情感到遗憾。我设计这个问题的目的，是间接地给他一个对 2002 年事件表示遗憾的机会。然而，这一次他还是表示无话可说。我只好单刀直入，问他是否对 2002 年发生的一切感到遗憾。他的回答是：“对这一事件有众多的观点。我该如何判断呢？”他说，一个委员会将会对他在骚乱中的角色做出裁决。实际上，来自古吉拉特官僚机构的委员会已经撇清了他在 2002 年事件中的不当行为。

“对莫迪来说，不会有羯陵伽效应”，一位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穆斯林哈尼夫·拉克达瓦拉（Hanif Lakdawala）告诉我。拉克达瓦拉指的是公元前 3 世纪阿育王治下的孔雀王朝为了征服印度东海岸国家羯陵伽而发生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阿育王的军队杀害了 10 万人。这次屠杀使阿育王愧疚难当，发誓不再进行军事扩张，此后阿育王转向非暴力和推动孔雀帝国的和平发展。

然而，如果往好处想，我怀疑莫迪私下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遗憾，至少部分地感到遗憾。如果当众承认错误，会降低他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无论如何，在印度政治环境下，很少有人承认自己犯错误。但是据大家所说，在骚乱发生后，他缄口不语，一天到晚忙于发展，每天晚上的睡眠不足4个小时，早上5时起床，接收邮件，阅读地方报纸。结果，他走访了全邦7000个村庄中的3000个，发展了自己的基层沟通网络，以检查邦官僚机构在基层的运作并通过“精简的政府，高效的管理”的口号，把权力下放给官僚系统中最低层的人——那些与公民接触最多的负责人。艾哈迈德巴德的“慕达拉通信研究所”（Mudra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所长阿图尔·坦登（Atul Tandan）对我说，“你必须将莫迪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管理能力分开来看。因为在他身上没有任何腐败的痕迹，莫迪办事效率高，人们相信，那是因为他的决策只看重结果”。确实，甚至很多穆斯林也因为莫迪所取得的成绩而倾向于尊重他，例如采取严厉的措施禁止赌博、打击犯罪，因为这些行为也干扰了穆斯林的生活。

然而，我始终认为，即使不用直接承认在2002年事件中犯下的罪行，莫迪依然可以用很多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巧妙地表达对这一事件的悔恨。在很多有机会表达的场合，莫迪都没有兴趣这样做。难道这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行事方式？在许多中立的观察者看来，莫迪在阻止国民志愿团的大肆屠杀方面所做甚少，这就是一种有目的的放纵屠杀行为，在骚乱被用来巩固权力和迫使对手集中精力应对后，他又转向抓发展。但是马基雅维利——其作品或者被误读，或者根本没有被仔细地读过——是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的。马基雅维利认为应该用最小的残忍获得最积极的集体效果。因此，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任何多于绝对需要的残忍都不是美德。

“我来自穷人家庭”，莫迪告诉我，“如果我能成为一名教

师，家里人会很高兴。但是，我却参与到爱国主义运动中，加入国民志愿团。在这里必须牺牲个人。作为一名宣传干事，我穿着白色的衣服，像一个印度教僧侣。我的印度教哲学是：恐怖主义是人道主义最大的敌人”。我觉得他是指伊斯兰恐怖主义，他们对印度境内大多数的大规模暴力袭击事件负有责任。莫迪将自己与甘地进行比较：“英国统治时期，很多人从事民族独立运动，但甘地却将独立运动转变为群众运动。而我也将经济发展转变为一场群众的心理运动。”他的话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我开通了免费电话号码，打电话的人可以听到我的录音，可以对政府的不当行为表示不满，而且相关部门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对这些做出回应。”

他列出了一系列成就：现代化的道路；配备双层车厢的私人铁路；31000 英里的光纤网络；1367 英里的煤气管道；遍布 7000 个村庄、长达 870 英里的饮用水管道；农村地区 24 小时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印度第一个有私人港口的邦；完全整合的海岸发展计划；两座液化天然气站和两座新的即将投入运营的天然气站。统计数据 and 明细对他来说拥有一种有节奏的、能吸引人的效果，所以，他将每件事情都量化。

他也提到塔塔汽车公司（Tata Motors）将在古吉拉特建新厂，届时将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新厂将生产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Nano”，售价只有 2500 美元。吸引或许是全印最具声望的塔塔集团到古吉拉特邦投资是莫迪最为成功的一件事情，艾哈迈德巴德周围的广告牌都在赞扬莫迪的成就，这也见证了在他周围形成的个人崇拜。“长期以来，沿海地区都在孟买治下”，他说，“但是现在这块沃土重新回到古吉拉特。古吉拉特将成为连接东西的中心点，连接从非洲到印尼的广大区域。”

他是一个工作狂，我所搜集到的所有信息中没有他的私人生活。他分配权力，也控制权力。他怎么可能与2002年的大屠杀毫无关联？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一些开明的、无种族偏见的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和少数几个外国作家告诉我，莫迪的个性里有法西斯主义成分。人权组织工作人员索菲亚·汗更直接地说：“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我们穆斯林并没有依赖他为生。我们居住的地区被称作小巴基斯坦，而印度教教徒则住在有大型购物商场和多厅电影院的地方。”

莫迪是法西斯主义者吗？我认为最终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我们可能过多地受到根植于早期历史阶段的领导模式的影响，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有助于进一步阐述莫迪所代表的领导模式可能带来的危险。学者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告诉我们，虽然20世纪前半期欧洲正统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起源于战败或者起源于取得的胜利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法西斯主义有不同种类。<sup>①</sup> 耶鲁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胡安·林茨（Juan Jose Linz）提出，法西斯主义是“反民主的运动，它用自己所反对的事务定义自己”，就法西斯主义憎恨精英和世界主义者这一点而言，法西斯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莫迪不憎恨精英，他发展基础设施以吸引商业投资的执政理念也表明他的观点是积极的。法西斯主义也有自己独特的形式，用“吟诵、仪式和衬衫”表示自己的身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吸引了无数的青年人。法西斯主义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感召力，这无法通过意识形态加以理解：对残暴行为和男子气概的仪式性迷恋，与美化军人相结合，强调行动高

---

<sup>①</sup> Walter Laqueur, 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Analyses, Interpretations, Bibliography* (London: Wildwood, 1976)



于理智。法西斯主义的要点是行动，而不管结果如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制服、游行示威、集会和歌曲都提到对集体无限的热爱和对个人的恨。<sup>①</sup> 因为民主保护个人权利，法西斯主义必然是反民主的。确实，法西斯主义的产生经常伴随着威权领导的出现，这个威权领导既冷酷无情，又具有领袖魅力。结果真正令人恐怖。罗马尼亚的铁卫军、匈牙利的镰刀十字党、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都强烈反对正统基督教和天主教，这也导致了最令人恐怖和夸张的针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暴行。尽管轴心国战败，但因为技术带来的社会控制，对法西斯主义的向往并没有中止。<sup>②</sup> 莫迪现象表明，尽管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的杰作中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而地理因素的影响也时过境迁，但对意识形态的争夺还在继续。

因此，2002年2月，莫迪似乎顷刻间成为一个十足的法西斯分子，然后又迅速转变立场，不再热衷于此。普拉沙德·查科解释道，“莫迪和希特勒的不同之处在于希特勒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政治发展的最终结果，而莫迪知道印度教特性只是一个阶段，不可能持久，因此，现在他集中精力搞发展，而不是操纵宗教分裂”。事实上，莫迪最近在追捕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并逮捕了印度教大会的一些成员，而当初正是这些人将他扶上台。他不能或者不愿意为2002年的事件道歉，是想借此表明他的立场和其他主张印度教至上的人一样强硬，这是他使自己能够在全国被接受的办法，甚至也许有一天会运用于竞选印度总理。记者兼历史学

---

① Juan J. Linz, "Some Notes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ascism in Sociolog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ee, too, Zeev Sternhell's "Fascist Ideology." Both in Laqueur's *Fascism*.

② Thomas Pynchon, Foreword to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 - Four* (New York: Penguin, 2003)

家阿奇尤特·雅格尼克 (Achyut Yagnik) 这样解释。<sup>①</sup>

21 世纪伊始，世界范围和地区范围内发生文明冲突的总体环境有助于莫迪实现自己的野心。不论是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还是伊朗的威胁、巴基斯坦可能的混乱状态，或者克什米尔和印度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都使莫迪及其同伙从中获益。全球形势提醒印度教教徒——居于压倒性多数的印度选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多么令人忧虑，而莫迪则是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强有力的防波堤，这一点不需要通过任何特定的行动来证明，只要看看他的威权统治所产生的氛围。对印度来说，未来的中心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恐怖主义时代是否会导致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教徒陷入绝望和仇恨。根据 2009 年全国大选的结果，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在 2002 年的事件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莫迪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这样做确实是正确的。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存在感到忧虑，但更担心巴基斯坦的解体。尽管教派冲突必然会给印度带来更大的威胁，并且这种威胁甚至要大于水源短缺所带来的威胁，但伊斯兰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威胁却有助于印度教民族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我所采访的 2002 年冲突中的穆斯林受害者并未如想象中的那样极端化，他们只是感到自己不再是印度的一部分，重新退回到自己的社区，不敢走进印度教教徒中去。

与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并存的是人们对秩序的渴望，这种渴望被严重低估，却可以被明显感知到。印度作为经济和海军强国的崛起引发世界将其与中国比较，两者的比较又会引发印度人的失望，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失望。中国威权政

---

<sup>①</sup> See Achyut Yagnik and Suchitra Sheth, *The Shaping of Modern Gujarat: Plurality, Hindutva and Beyond* (New Delhi: Penguin India, 2005)

府能够把事情做好，印度却是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才会有发展，印度的发展很少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人权组织官员哈尼夫·拉克达瓦拉（Hanif Lakdawala）告诉我，因为印度城市可怕的混乱，“至少有几个城市甚至愿意接受独裁者，或者至少是比较强硬的领导”。

2002年以来，莫迪的表现离完美无缺还相差甚远。虽然古吉拉特依旧是国内交易的主要目的地，但正是因为2002年事件，美国拒绝给莫迪发放签证。这对吸引外国投资有不利影响，而该邦的外国投资在全印位列第三。尽管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古吉拉特在人的发展上依旧处于较低水平：5岁以下儿童差不多有一半营养不良，3/4的妇女贫血，识字率也仅有67%——仅比全印平均水平略高。据传，GIFT也不能完全投入运营。随着全球经济低迷，GIFT腾飞所需要的外国投资无法到位。

实际上，真正阻碍莫迪实现飞速跨越梦想的——将古吉拉特改造为如同新加坡、迪拜和韩国等许多地方一样的全球贸易中心，毫不夸张地说，你可以感觉在哪里都一样——是古吉拉特的自然风光。以甘地纳伽尔为例，它本是古吉拉特的政治之都，设计规划是将其建成管理良好的现代化城市，脱离本地的传统环境。然而，这里的绿色植物生长过于茂盛，根本无法修剪，母牛和水牛到处游荡，道路两旁遍布棚屋。我感觉，在甘地纳伽尔城内，只有信息技术公司所在的一小块区域给人以印度之外的感觉，或者至少感觉到了班加罗尔的办公园区。

艾哈迈德巴德笼罩在催人泪下的烟雾中，尽管该城的交通拥堵情况要好于超级堵塞的孟买和加尔各答，但道路上挤满了突突作响的摩托车和三轮车，时断时续的人行道充满了危险，不时会遇到迷路的母牛和乞丐。1411年，古吉拉特苏丹艾哈迈德·沙

(Ahmed Shah) 建立了艾哈迈德巴德。20 世纪 50 年代，该城成为国际知名建筑师重要的活动场所，因为西方精英将新独立的印度看作人类的希望。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1887 ~ 1965 年) 负责设计纺织工厂联合会大厦，路易斯·康 (Louis Kahn) 负责设计印度管理所，巴克敏斯特·富勒 (Buckminster Fuller) 设计了穹顶。除了几处亮点外，拥有 450 万人口的艾哈迈德巴德城与其他印度城市一样，依然饱受困扰：除了少数几个确实华美的中世纪穆斯林建筑外，很少有标志性或者出类拔萃的建筑，新贵们建立的迪拜风格的玻璃和钢铁的混合建筑是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开放政策的结果。因为艾哈迈德巴德不是英国殖民者的政治中心，所以这里并没有殖民时期的建筑以协调廉价而单调的苏联式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群，杂乱而锈迹斑斑的指示牌使艾哈迈德巴德更加面目全非，这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独立后长期统治所留下的视觉遗产（尽管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领导）。当然，甘地纳伽尔是这种沉闷乏味而令人崩溃的现代主义的最差代表。

印度城市人口占 37%，再过 20 年，该比例可能达到 50%。本地建筑师比马尔·帕特尔 (Bimal Patel) 解释，印度领导人面临的真正的治理难题是使类似艾哈迈德巴德这样的城市在外观上更吸引人、更宜居。虽然莫迪精力充沛，但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或者努力不够。从一定程度上说，GIFT 说明莫迪只是在逃避该做的事情。鉴于全球范围新郊区的蓬勃发展都同时伴随着老城区商业的衰退，莫迪的逃避是可以理解的。

在莫迪的支持下，沿流经艾哈迈德巴德市的萨巴尔马蒂 (Sabarmati) 河而建的 6 英里长的保护区和滨水区工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由帕特尔设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首席部长都会

避免卷入艾哈迈德巴德和其他古吉拉特城市的地方政治，更不会与这些人共同努力以实现改变。因为大多数的权力都掌握在邦级政府手中，城镇的权力少得可怜，因此印度城市中的政客通常具有两面性，他们既固执又软弱。莫迪与其他邦政府的领导人一样，都没有真正致力于市政共识的建设（consensus building）以消除城市的混乱，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印度的新城市精英或许要求现实的地方政治——无论是多么的混乱和令人失望，要致力于运用真正的特权。

这并不是说，在莫迪的治理下，艾哈迈德巴德老城区作为少数几个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混居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人口占全市人口的9%）能够在私下场合与公共社区实现真正的融合。另外，在艾哈迈德巴德游览的两周多的时间里，我遇到的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萨尔凯吉·洛扎（Sarkhej Roza）墓园。这座墓园建于15世纪，是献给艾哈迈德·沙的精神导师谢赫·艾哈迈德·凯图（Sheikh Ahmed Khattu）的清真寺和陵园。从中世纪穹顶和回廊俯视池塘，很多家庭在野餐，年轻的夫妇在窃窃私语，孩子在玩球，还有祈祷聚会。由雅致的灰泥和格子形图案构成的墓园，混合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风格，是一座印度—萨拉辛风格（Indo-Saracenic）的建筑。但至少公园和滨水区项目完工前，艾哈迈德巴德其他地方并没有这样的文化混合。很显然，我在萨尔凯吉·洛扎墓园所看到的这些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为了饱览古吉拉特风光，我乘坐10个小时的公共巴士从艾哈迈德巴德南部到达第乌（Diu）。在古吉拉特卡提瓦（Kathiawar）半岛的最南端，有葡萄牙人的历史遗迹，这与我所讲述的印度历史故事有特殊的关联。

我驶过起伏不平的道路，道路两旁是望不到尽头的小屋，



吱吱嘎嘎、布满灰尘的运货车驶过，棚屋，粗麻布和生锈的波状铁皮建造成的斜坡屋顶，这就是印度农村的景象。虽然印度的景色呈现给我们的常常是丰富多彩的基色，尤其是在茶几的画本里看到的风光，但实际上我在这里经常看到的是沉闷的灰色和棕色的场景。尽管在很多地方，我发现了专门铺设的人行道，到处都有自来水和电线，但与路上看到的景象一样简陋。我从旅途中了解到，印度较穷的邦如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然而，像韩国一样？不可能，至少几十年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印度能够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和中心国家，但它却不可能达到东亚小虎的经济发展水平。“莫迪非常善于夸大其词”，一位记者告诉我，“但无法完全兑现自己的承诺”。

在葡萄牙人的印度洋帝国中，第乌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1509年，在一次关键性的海战中，佛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从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的手中获得该地。他成功说服当地的穆斯林统治者支持自己，而没有帮助他们的宗教同胞。这次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葡萄牙对这些水域的航海控制权。诗人卡默斯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歌颂了这样的征服和背信弃义的行为：

这些葡萄牙人，他们预言，  
在坎贝湾海岸发动突然袭击，将  
给古吉拉特人带来巨大的恐慌  
就像萦绕于希腊人心头的伟大的赫克托……  
坎贝的国王，为了自己的荣耀，  
将会向富裕的第乌要塞投诚，  
以保护自己的王国

免遭横扫一切的莫卧儿王朝的蹂躏<sup>①</sup>

海浪温柔地拍打着葡萄牙要塞的城墙，经过几个世纪的岁月的磨蚀，城堡的颜色已经变成一种棕黄色和似铅的浅黑色。要塞是城堡建筑的典范——长长的防波堤；两个入口；从岩石中挖掘出来的护城河；两边各建有7个防御工事，每个都以基督教圣徒的名字命名。野草爬过石头，野猪四处游荡。成群结队的印度男性青年对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的历史解说无动于衷，沿着石头建成的防御工事闲庭信步、高谈阔论。看起来，他们对这样一个巨大的稀奇事物的重大意义毫无所知，只是简单地爬到建筑物的最高点——孤单的白色十字架的旁边。这里不销售任何语言的导游手册，也不收门票费，甚至连一个看门的人都没有。宏伟的葡萄牙教堂，搭配哥特式的门面，同样凄凉地矗立在那里，墙壁已经褪色，呈松散的鳞片形状。如果鸽子翅膀的振动靠墙壁太近，你甚至可以看到墙壁上的灰泥掉落，并听到灰泥掉落的声音。在教堂内部，当你绕过乱糟糟的废物堆、丛生的白玫瑰和夹竹桃后，有凉爽、昏暗且芬芳的教堂内室。这里有助于祈祷者为所爱的人祷告，使其免于大海的蹂躏。虽然这些建筑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更像是中世纪前的遗迹，与当地的环境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帝国兴起又衰落。只有它们的思想能适应臣民的需要，才能得以延续。除了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外，葡萄牙人很少留下新思想，而天主教在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中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因此，这些遗迹注定只能是凄凉的，带有令人缺憾的美丽。相比之下，英国人给印度带来了相当大的发展，港口和铁路形成了现代

---

<sup>①</sup> Camoes, *The Lusiads*, Canto Ten: 60, 64.

国家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人带来了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印度人早已有土生土长的异质性传统和多元主义，议会民主制能够成功地满足他们的需求。<sup>①</sup>实际上，印度教的万神殿信奉多神教而非一神教，致力于实现自由的真理。因此，虽然有缺点，但英国人带来了一种能够推动印度实现强大的思想。如果没有道德的成分，想实现印度的强大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会从进步的印度人那里体会到。

现在，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印度已经在向西和向东分别渗透，但是，只有在教派的和谐共存成为可能时，印度才能如人们一直在讲的那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换句话说，印度尽管有经济增长的亮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它只是另一个严重混乱的发展中国家，缺乏起码的国家安定。幸运的是，印度的民主力量在经历六十多年的混乱后依旧存活着，在国大党的统治时代结束后，联合政府的稳定便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力量奠定的基础足够在全印政治中拒斥莫迪，或者一旦莫迪在某个时刻真的从甘地纳伽尔来到新德里，这些力量可以削弱莫迪可能产生的最坏的影响。毕竟，第乌的教堂和军事要塞成为废墟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过时的思想，而是因为它们根本不代表任何思想；然而，自1930年甘地的食盐进军以来，印度一直有自己的思想。莫迪的管理才能要么适应并服务于这个思想，要么他只能待在现在所待的地方。印度教在其他地区的教派思想并没有古吉拉特人那样强，而这将会成为莫迪的困境。2008年11月，通过海路抵达孟买的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袭击了孟买的酒店和其他场所，而此后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团结一致的表现应该被看作是对莫迪的

---

<sup>①</sup> Amartya Sen, "Why Democratiz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Westernization: Democracy and Its Global Roots," *New Republic*, Oct. 6, 2003.

警示。

如果他那时还没有领悟到这个警示，那么，在2009年5月的印度大选中，国大党领导的联盟在与莫迪的印度人民党的对决中获得了绝对的胜利，他一定可以体会其中的暗示。确实，这些选举所显示的是莫迪的衰落，而确定无疑的是印度昂首挺进21世纪的标志。从各个方面看，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发展趋势，但我依然认为，虽然存在穆斯林的威胁，但大多数印度教教徒最终并不愿意屈从于仇恨。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印度的民主精神，就它能够解决的困难而言，民主精神真的让我们赞叹。那是印度真正的力量所在。

但是，至少古吉拉特，和平并不会那么容易来临。我从第乌租了辆车，沿着海岸线一路向东驾车行驶两个小时到达索姆纳特。伽色尼国王马哈茂德破坏了这里的印度教神庙，随后其他的入侵者也相继毁坏该庙。神庙的重建工作始于1947年，而现在的神庙则是第七次重建的结果。

这座印度教神庙位于广阔的海上景观的边缘，这些景观因为酷热而变得毫无生气。神庙内有巨大的颜色暗淡的赭红色高塔和一组半圆球形的圆屋顶，正面盘绕的苍茫的宇宙场景非常复杂，以至于产生了与雕刻一样无限的符号意义，祈祷者跟随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祈祷。每当月圆之时，这里便成为极为吵闹的场所。数百信徒将他们的包挂在一个破烂的衣帽架上，鞋子随处乱丢，杂乱地堆在一起。与其他很多宗教圣地一样，一些乞丐缠着我，到处都是小贩。标志牌写着：进入神庙内，禁止携带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但我对自己说，我比他们更了解这些。我把自己的黑莓手机放在大口袋里，我并不信任那个有些混乱的衣帽架，希望形式化的、懒散的第三世界搜身检查不会发现。然后，我排在长长的单线队伍

中准备进入神庙。在入口处，我遭遇到野蛮的搜身，黑莓手机被发现了。被大声教训后，工作人员示意我重新回到衣帽架那里。“穆斯林恐怖主义”，一位信徒警觉地说。我从衣帽架返回后，又重新排队进入神庙。

黑暗将我包围，信徒们亲吻着放满鲜花的母牛偶像。当挤作一团的人群来到内殿的时候，周围的气氛令人窒息，我感到自己仿佛侵扰了这个地方的神秘。尽管非宗教信仰者（nonbelievers）<sup>①</sup>表面上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但我知道此时自己处于群体哲学家艾利亚斯·卡内蒂的单一有机体之外，卡内蒂用单一有机体称呼那些放弃个性、陶醉在集体符号内的群体。<sup>②</sup>这个内室是信仰搏动的中心。有些人伏在地上，在石头地板上祈祷。这里并不像梵蒂冈那样吸引外来者加入，梵蒂冈因为面向全球的旅游业而冲淡了其宗教氛围；这里也不像加尔各答的伽利（Kali）神庙，那里经常欢迎外国人，“导游”会与之攀谈，要求捐款。在这里，也有我在阿曼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所经历的赞颂印度洋地区物质文明的普世主义，只是显得无关紧要。波兰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的黑圣母教堂（Black Madonna）和伊拉克纳杰夫（Najaf）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Imam Ali Mosque）分别是天主教和伊斯兰什叶派的圣地，我在这两个地区同样经历了极端和与世隔绝的感觉。伊拉克纳杰夫的清真寺清楚地表示，非信仰者不允许进入清真寺，我不得不偷偷藏匿在运送土耳其商人的大巴上才得以进入。

在这里，你会情不自禁地理解印度教教徒对穆斯林破坏这座

---

① 这里的非宗教信仰者应该是指非印度教教徒。——译者注。

②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New York: Viking, 1960)



神庙的宗教情绪，索姆纳特是印度 12 个光照林伽之一（光照林伽是湿婆神的象征）。尽管感情犹如过电一般噼啪作响，这时我脑海中却浮现出人权官员哈尼夫·拉克达瓦拉以哀怨的口吻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今天，我们这些贫穷的穆斯林对伽色尼国王马哈茂德的所作所为能怎么办呢？”

# 第七章

## 德里观点

在与古吉拉特相关的所有印度洋历史时期中，最重要的阶段是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这也与我们要进行的更大的战略性讨论一致。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Akbar）于1572年进入阿默达巴德（Ahmadabad），并于两年后完成了对整个省份的占领。莫卧儿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阿拉伯海沿岸这个发达重镇的统治者。古吉拉特不仅为莫卧儿提供了那个时代次大陆最繁忙的港口，也为其奉献了拥有广袤富饶农田的海洋帝国，与此同时，古吉拉特还是纺织品生产的中枢。阿克巴将古吉拉特与印度河—恒河平原和即将被其占领的孟加拉连接起来，建立了横跨印度洋上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两个最大海湾的次大陆帝国。正是通过对古吉拉特的占领，阿克巴阻止了印度的瓦解，也挽救了印度进一步落入占据果阿（Goa）并觊觎阿拉伯海岸其他港口的葡萄牙人的手中。

几乎没有哪个帝国能超越莫卧儿帝国在艺术、宗教和文化上的折中主义。从1500年代至1720年，他们统治着印度和部分中亚地区。此后快速衰落下去。尽管莫卧儿帝国是印度洋世界的一

部分，但从早期全球化的视角看，它却是一个亮点。以泰姬陵为例，莫卧儿帝国第五代皇帝沙·贾汉（Shah Jahan）为了纪念1631年6月17日死于难产的爱妻慕塔芝·玛哈（Mumtaz Mahal，终年14岁），在流经阿格拉（Agra）的亚穆纳河（Yamuna River）岸边修建了白色的大理石陵墓。陵墓融合了杰出的波斯和土耳其蒙古建筑艺术所有自由释放的美与对称，同时也不乏印度式的精巧与才华。圆形的穹顶和四个细长的尖塔，仿佛能克服地球引力而漂浮于地面之上。关于泰姬陵的浪漫传说使人忘记了泰姬陵的修建者沙·贾汉是一个极端正统的穆斯林。按照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历史教授理查兹（John F. Richards）的说法，沙·贾汉的统治代表了次大陆主体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仰徒之间的紧张关系。<sup>①</sup>

莫卧儿是“蒙古”一词的阿拉伯和波斯变体，适用于除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以外的所有的外部穆斯林地区。莫卧儿帝国的奠基者巴布尔（Zahir-ud-din-Muhammad Babur）是一个察合台突厥人（chaghatai turk），于1483年出生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费加那（Fergana）的一个谷地里，成年不久就试图夺取帖木儿（Tamerlane）的故都撒马尔罕（Samarkand）。在被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后代穆罕默德·谢巴尼·汗（Muhammad Shaybani Khan）彻底击败后，率众南下，占领了喀布尔（Kabul）。随后，巴布尔又从阿富汗高原挥师旁遮普（Punjab）。从此，他掀开了征服印度次大陆的序幕。莫卧儿帝国或称帖木儿帝国，从巴布尔之孙阿克巴大帝之时就已经成型，包括拉其普特人（Rajputs）、阿富汗人（Afghans）、阿拉伯人（Arabs）、波斯人

---

<sup>①</sup> John F. Richards, *The Mughal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2.

(Persians)、乌兹别克人 (Uzbeks)、土耳其人 (Chaghatai Turks)、印度的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印度教教徒, 以及其他的群体。在宗教方面, 阿克巴统治的 49 年 (1556 ~ 1605) 也同样见证了一种类似的普世主义 (universalism)。可能由于存在阅读障碍, 阿克巴并不识字, 但他却研究比较宗教思想。随着对印度教和基督教敬仰的增加, 他对自己信奉的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痴迷程度在下降。理查兹教授在其丰富但不失简约的莫卧儿帝国史中写道, 在晚年, 阿克巴转向了一种“自我设想的兼容并蓄的对光和太阳的崇拜”<sup>①</sup>。而且, 正如那些细微画作所展现的, 阿克巴支持一种“非常宽松, 甚至融合的政治形式”, 仿佛以一个传统的印度土邦主的方式在统治。<sup>②</sup>

贾汉·吉尔 (Jehangir) 和沙·贾汉 (Shah Jahan) 继位后,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奥朗则布 (Aurangzeb), 他把帝国回归为一个狂热的逊尼派神权政体, 不过他仍然容忍其他派别与宗教的存在。莫卧儿印度与波斯萨非王朝 (Safavid Persia) 关系紧张, 就有这种极端宗教影响的因素存在。尽管波斯的管理者是莫卧儿贵族中最大的群体, 但萨非王朝的波斯人是狂热的什叶派, 对统治印度的逊尼派的帖木儿表示极度的蔑视, 这种极度的反感又被令人不舒服的文化相似性进一步强化。然而这两个帝国拥有一条共同的边界, 这就是今天阿富汗的西部地区。正是通过这一地区, 莫卧儿的统治才真正将印度与近东 (the Near East) 连接起来。

正因为如此, 莫卧儿帝国对于理解 21 世纪的印度、巴基斯

① John F. Richards, *The Mughal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5.

②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 - 17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59 - 60.

坦和阿富汗，可谓至关重要。“印度次大陆”的概念本身就给我们灌输了地理逻辑，以及印度作为分离的但不可侵犯的政治单元的必然性。这种特性是由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塑造的：东、南、西三面被印度洋包围，北面被喜马拉雅山阻断。而且，我们也或多或少地倾向于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看成各自分离的单元，彼此有各自的历史的和仿佛天然的合理性，即使与印度相比这种合理性并不显著。然而，除了北部的印度中心地区，莫卧儿曾经统治着今天的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即便当时莫卧儿在征服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上的马拉地（Maratha）部落时困难重重。

莫卧儿人似乎无处不在。他们攻打阿富汗北部的乌兹别克人，在阿拉伯海沿岸的俾路支、信德和古吉拉特，印度东部的奥里利萨省和孟加拉省，以及缅甸西部的狭长的阿拉干（Arakan）都拥有强大的基础。<sup>①</sup> 换言之，莫卧儿人将中亚和印度洋统一起来，囊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并延伸至东南亚。伊斯兰教是黏合剂，将这些伸展的地区联结在一起。

喀布尔和坎大哈（Kandahar）是这个以德里为基地的庄严王朝的自然拓展，然而印度教占据优势的南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班加罗尔，印度高技术之都——却并非如此。奥朗则布，这个“世界占有者”，已是八十多岁的老者时仍在打击印度南部马拉地人的反抗。在他的统治下，17世纪晚期的莫卧儿帝国进入了扩张的巅峰时期。1707年，奥朗则布死于德干高原的军营中，他至死也未能征服这些反抗的马拉地人。实际上，印度南部长期而顽强的反抗，销蚀了莫卧儿精英的凝聚力和士气。奥朗则布投

---

<sup>①</sup> 从12世纪末期直至莫卧儿人入侵，孟加拉始终处于德里苏丹国的统治之下。



入过多的精力专注于马拉地反抗者，而置帝国在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于不顾，这为荷兰、法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沿岸立足创造了机会，并最终导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sup>①</sup>

利用铁路系统和其他现代工具，英国人统一了次大陆，即使从诸多历史与文化的原因来分析，一个稳定而统一的印度似乎也会必然出现。然而正如奥朗则布的经历所展示的，这并非必然的。就此而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以及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边界都不具有它们今天所代表的含义，而这也不是必然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苏嘉塔·柏瑟（Sugata Bose）写道，英国人和我们所指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目前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天堂，这片区域“根本不是边疆”，而是印度—波斯和印度—伊斯兰连续体的“心脏”，近千年来一直从中亚高原延伸到次大陆湿气弥漫的低地。<sup>②</sup> 因此，只要以地理、历史和文化中的任一因素为指导，将阿富汗从巴基斯坦中分离出去的企图可能就是徒劳无益的。在阿富汗的成功意味着稳定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而不只是阿富汗。事实上，诸如跨境恐怖袭击等负面原因，或诸如道路修建和油气管线铺设等积极因素，莫卧儿帝国这片广袤的地区或许可以达到新的统一，最终将信德与古吉拉特，以及中亚和次大陆再一次连接起来，将南亚锚固在大中东之上。

对莫卧儿帝国的追忆使人联想到，一个新的无边界的世界正在浮现。在这个世界里，以前的冷战的分野在整个亚洲消融。正如在首都新德里一样，我在整个印度感受不到紧张。在沙·贾汉

---

① Richards, *The Mughal Empire*, pp. 239, 242.

②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6.

和他的儿子奥朗则布统治时期，德里是伊斯坦布尔与东京之间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城市里现存的英国人建造的建筑物，再次强化了这种强烈的思绪。在新德里的行政中心地带，散步可能是困难的。尽管有很多树，但行政中心的有些部分建于宽广的地面上，拥有很大的露天空间，然而往往阴凉不足。行政中心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出至此。行政中心核心建筑的视觉效果是如此优雅而又不可抗拒，与莫卧儿帝国要塞的建筑风格极为相似。沙·贾汉的红堡（Red Fort）位于老城区，长1.5英里，建于17世纪中期，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都展示出非凡的镇静和彻底的均衡。这个位于新德里的由砂岩建成的政府建筑，呈不同的赭红色，有长长的城墙、孤鸽栖息的门廊以及纵深不同的遥远的东方式的圆顶，就像天空中排列的行星，传达着一种超越纯粹野心的政治权力，是如此的实在与自信。

苏格兰学者、印度专家威廉·达尔林普（William Dalrymple）透过新德里建筑的全貌，隐约地唤起了自己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模糊记忆。两国都与英国在印度的威权主义处于同一时期，两国也都与大英帝国一样，幻想着威权永存。<sup>①</sup> 据说，英国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将钟刻在总督府（Viceregal Lodge）——现在则是印度总统的官邸——的圆柱上，因为只要这些钟沉默不响，那么英国的统治将永远不会终结。实际上，几年前，寇松勋爵（Lord Curzon）仍在宣称，“帝国始终在大声召唤……帝国的边疆在继续呼唤”。<sup>②</sup> 然而，在欢庆英国人

---

① William Dalrymple, *City of Djinns: A Year in Delhi*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3), pp. 82–82.

② George N. Curzon, *Frontiers: The Romanes Lecture 1907* (1907; reprint, Boston: Elibron Classics, 2006), pp. 57–58.

放弃印度仅仅 20 年后，这些庞大的建筑，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所有的权力和假设，都成为现在印度军队机构和政府各部的办公室。

中央权威脆弱的教训似乎已经内化于现在占据着这些建筑物的人们的心中。我几次造访印度，与印度军队高官和文官有过几天的接触，这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尽管他们对将印度的权力投射到整个印度洋世界有所规划，但他们也对印度自身边界的脆弱深感忧虑。印度国内的冲突就更不用说了，也是他们忧虑的对象。我所听到的声音中，坚定的雄心混杂着一种审慎的悲剧感。英国人曾经臆想联翩，然而现在的“房客”则假设不多。

这些建筑物坐落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按照建筑、文化与历史的维度，德里是土耳其—波斯所代表的中亚与印度恒河平原的交汇点，是亚洲内陆与印度洋世界边缘的汇合处。正因为如此，自中世纪以来，德里曾是亚洲权力的所在地。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印度将会在 21 世纪脱颖而出，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关键性“摇摆国家”（swing state）<sup>①</sup>。寇松勋爵在一个世纪前就写道：

印度的中心位置，它的极好的资源，它的众多的人口，它的规模宏大的贸易港口，它的军事力量储备，……这些全

---

① “swing state”，即摇摆州，是美国大选中的一个特有说法，指竞选双方势均力敌、无明显优势的州。在美国历届大选中，“摇摆州”的选票一般都是竞选双方争夺的重点，尤其是“关键摇摆州”（key swing states）的选票，最终往往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这里将印度喻为“摇摆国家”，意指印度成为国际社会竞相拉拢的对象。许多印度学者也认为，作为“摇摆国家”，印度必将对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发挥重要影响。——译者注。

都是极具价值的宝贵财富。在西面，印度必须对波斯和阿富汗的命运施加更加显著的影响。在北面，印度要能抵御来自西藏的任何竞争对手；在东北……印度能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且，印度是暹罗（Siam）（泰国旧称）独立存在的保护者之一。<sup>①</sup>

英国人以及巴布尔（Babur, 1526 ~ 1530）之后的莫卧儿帝王也许再也没有来到那里，但印度现在的统治者们正处于相同的地理位置。通过访谈，我了解到，他们看待外面的世界，与那些英国人和莫卧儿帝王们也很相似。

莫卧儿王朝（the Mughals）是一个起源于中亚的以陆地为基础（land-based）的帝国，而英国则是一个以海洋为基础（sea-based）的帝国。现在，印度正在更多地以一种英国的方式崛起。正如英国皇家海军曾称雄海洋并为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提供保护一样，印度的崛起——至少从军事的角度看——是其海军的崛起。被喜马拉雅山以及一些失败的国家——从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到缅甸——所包围，印度完全可以向海洋方向投射其实力。印度扼守着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这条重要航线的要冲，在这条航线上，存在对海军或集装箱运输的恐怖主义威胁。诸如马来西亚和中国，都“对美国借海洋安全之名推行其地缘战略目标有所保留”，印度则能够扮演中国平衡者的角色，尽管印度实际上从来没有宣称自己可以发挥这种作用。<sup>②</sup> 美国著名印度政策分析家斯蒂芬·

---

① Lord Curzon of Kedleston, *The Place of India in the Empire* (London: John Murray, 1909), p. 12.

② Parag Khanna and C. Raja Mohan, "Getting India Right," *Policy Review*, February/March 2006.

菲利普·科亨 (Stephen P. Cohen) 认为, 新德里的官员们自冷战时期就已经对乔治·华盛顿 1796 年告别演说的训诫铭记于心: 与美国一样, 印度也可以安居于自身的地理范围之内, 位于喜马拉雅山和广阔的印度洋之间, 既能够实施控制与支配, 也可以超然地置身事外。<sup>①</sup> 冷战时期, 这意味着印度奉行的不接触政策 (unengagement), 现在, 则意味着印度人将自己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

中国的政策人士越来越担心印度海军实力的提升。<sup>②</sup> 中国分析人士章明 (Zhang Ming) 甚至担心, 印度可能将由 244 个岛屿组成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作为一条“金属链”, 锁住马六甲海峡的西部入口, 而中国在原油运输上却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章明进一步认为, “一旦掌控了印度洋, 印度将不可能满足于现状, 将会不断地寻求扩展其影响力, 其东向战略 (eastward strategy) 将会对中国产生显著的影响”。章明的结论是, “印度或许是中国最现实的战略敌手”。<sup>③</sup> 这也许与华盛顿理论界中职业的“担忧人士”如出一辙。但政策精英出于严肃的目的而感到担心, 尽管章明对印度的威胁担忧多少有点夸张, 但他的顾虑恰恰反映出北京正在十分严肃地将新德里看成一个主要的海洋国家。

冷战时期, 日本加入了美国反抗苏联的联盟, 但印度决

---

① Stephen P. Cohen, *India: Emerging Pow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1), p. 55.

② James R. Holmes, Andrew C. Winner, and Toshi Yoshihara, *Ind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131

③ Holmes and Yoshihar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merging Strategic Triangl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2008. From Ming’s articles, “The Indian Navy Energetically Steps Towards the High Seas” and “The Malacca Dilemma and the Chinese Navy’s Strategic Choices.”



不会以这种方式正式地加入美国反对中国的任何联盟。对于这场博弈是如何的微妙，我们还不能给出确凿的警告。日本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且与苏联海港接近；但印度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结盟政策”彰显出了其独立的特性，而且远离中国的主要军港。<sup>①</sup>不只是建筑，新德里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使我们毫无疑问地认识到印度的潜能，即凭借自身实力成为“后莫卧儿”（post-Mughal）和“后英国”（post-British）国家的潜力。

印度海军参谋长苏里什·梅赫塔（Suresh Mehta）将军神态平和、举止平缓，但他是我见过的最乐观的将军，已经完全摆脱了印度尤其是印度军队深陷其中的棘手的陆地边界划分困境。印度海军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位列世界第三或世界第四，未来更加光明。<sup>②</sup>

梅赫塔将军以及其他人告诉我，印度经济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工业产出的增长则达到10%。到2020年，印度的中产阶级有可能从目前的2亿增加到5亿，全球经济危机会减缓但不会停止这种增长趋势。<sup>③</sup>到2050年，印度将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这将允许印度的国防预算增长10%，尽管相对来说，其国防预算还不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国防预算中，有20%将拨付给海军，其中又有一半投资于新舰船。<sup>④</sup>海军军官们说，至2015年，印度计划拥有两个航空母舰

---

① Holmes and Yoshihar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ian Ocean."

② Geoffrey Kemp, "The East Moves West,"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6.

③ 2032年左右，印度有可能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④ 在印度国防预算中，海军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翻番。Walter C. Ladwig III, "Delhi's Pacific Ambition: Naval Power, 'Look East,' and India's Emerging Influ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sia Security*, vol. 5, no. 2 (May 2009)

打击群，2022年拥有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并且正在建造或正在购置6艘新潜艇和31艘新水面舰艇。同时，印度正在讨论装备7艘载有宙斯盾战斗系统（Aegis combat system）的护卫舰，而宙斯盾战斗系统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海军使用的整合式水面舰艇作战系统。这些行动催生了几个新的造船厂，科钦（Cochin）北部的马拉巴尔沿岸也新设立了一个海军训练学院。2008年，印度效仿美国领导的海军联盟的做法，在新德里主办了“印度洋海军研讨会（IONS）”，研讨会邀请了27个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参与，不断增长的海军实力有了崭露头角的舞台。研讨会只是一个小小插曲，实际上印度将花费400亿美元购买武器，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购市场之一。<sup>①</sup> 中国也许完全有理由对此表示担心。

每年有上百万艘船只通过印度洋上的各个海峡，未来的重点是能源供应的安全。与此同时，从印度的战略视角出发，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只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始终试图将印度禁锢在自己的次区域之内。1950年中国对西藏——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传统缓冲区——的进军，就确立了这种趋势。1962年中印战争后，导致两国之间2500英里长的边界<sup>②</sup>存在争议，而且中国的胜利——在印度人的眼中是一个耻辱——仍然是印度人难以挥去的记忆。中国仍然占据着喜马拉雅山西部的阿克赛钦地区（Aksai Chin），对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声索主权，并称其为中国的藏南地区。在陆地方面，印度面临着一个“围堵战略”：中国武器出口的最主要受益者是巴基斯坦、孟加

---

① Heather Timmons and Somini Sengupta, "Building a Modern Arsenal in India," *New York Times*, Aug. 31, 2007.

② 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争议地区约12.5万平方公里。——译者注。

拉国和缅甸。<sup>①</sup> 当尼泊尔的国王贾南德拉（Gyanendra）于 2005 年取消政党和议会成为一个独裁者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是中断就是减少了与尼泊尔的军事联系，但此时的中国则显著地加强了与尼泊尔的联系，其目的似乎只是平衡印度的影响。<sup>②</sup>

中国人在缅甸修建了港口和公路，在斯里兰卡修建了燃料储备设施，在塞舌尔和马达加斯加也有了立足之地，而且增加了对其的援助。中国人希望巴基斯坦的瓜德尔（Gwadar）成为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港口。但对于其能否在瓜德尔获得成功，印度人并没有静观其变。只要占据一个通过海峡与大陆相连的岛屿，目前中国人便很难防御瓜德尔。<sup>③</sup> 面对中国与巴基斯坦在瓜德尔港口项目上的合作，印度人投入 80 亿美元在卡尔瓦尔（Karwar）——位于印度西部阿拉伯海岸果阿（Goa）的南部——修建了庞大的海军基地，第一期工程已经于 2005 年完工并交付使用。印度的卡达姆巴海军基地（INS Kadamba）将会成为继孟买北部和孟加拉湾两处基地外的第三大海军基地，最终设计可以停泊包括潜艇在内的 42 艘战舰。印度建设卡达姆巴海军基地，目的在于缓解孟买基地的拥堵，避开商业船只的干扰并提升印度海军舰船的机动性。<sup>④</sup> 印度不想让中国和巴基斯坦守卫或者事实上封锁其从瓜德尔进入阿曼湾的入口，因为与中国的“马六甲困局”一样，这会给印度带来“霍尔木兹困局”。<sup>⑤</sup> 除了美国的霸权，由中

---

① Daniel Twining, "The New Great Game," *Weekly Standard*, Dec. 25, 2006.

② Greg Sheridan, "East Meets West,"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06.

③ Holmes, Winner, and Yoshihara, *Ind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p. 142.

④ *Defense Industry Daily*, June 6, 2005.

⑤ Mohan Malik, "Energy Flows and Maritime rivalrie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8).

国—巴基斯坦—印度组成的三角正在崛起成为阿拉伯海的决定性地缘战略焦点。<sup>①</sup>

在阿拉伯海的南面、紧临非洲的印度洋西部地区，印度正在建设海军中转站和监听站，与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岛国建立了军事联系。中国也以与这些国家开展积极的军事合作加以反击。

中国的战舰驶入了西印度洋，而印度的战舰现在也进入了南中国海。印度不断增加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海军合作，以期在印度洋东部的十字路口对中国形成阻滞，通过对毛里求斯的实际控制在印度洋的西南对抗中国。印度的海军军官实际上掌控着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两国的海岸警卫队。

2007年，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五国海军在马拉巴尔（Malabar）沿岸举行了联合演练，印度海军军官否认演习的目的是针对中国。在马拉巴尔的演习——一位印度军官称之为“民主国家的音乐会”——中，五国派出2万名官兵参加了高级别的复杂操演，然而印度与中国之间只有最基本的军事演练，即陆地搜救，而且两国都有目的地隐藏了各自先进的装备系统。

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指出，“印度从来没有等待得到美国的同意才去制衡中国”，这证实了中国战略分析家的担心：认为自中国进军西藏那天起，印度就始终在制衡中国。<sup>②</sup>

印度对中国的疑虑，源于中国的成功。中国是一个“房间

---

① Adam Wolfe, Yevgeny Bendersky, and Federico Bordonaro, *Power and Interest News Report*, July 20, 2005.

② Daniel Twining, “The New Great Game,” *Weekly Standard*, Dec. 25, 2006. 印度只是在2005年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作为回报，中国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

里的大象”，它促使印度和美国相互接近。<sup>①</sup> 分析家拉贾·莫汉和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写道：“没有哪个国家像印度那样密切而妒忌地注视着中国的完全而惊人的崛起。”<sup>②</sup> 英国记者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也指出，印度“想与中国和美国保持等距离……实际上，这仍然符合华盛顿的目标”，仅仅通过经济增长和“与外界交往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自信”，“自然成为平衡中国的角色”。<sup>③</sup> 正如我前面所说，印度仍将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冷战时期它向苏联倾斜，而现在它将向美国倾斜。

对印度战略家而言，中国仍是一个难题。只不过对印度的安全部门或对任何其他人而言，这个“难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发生在印度的爆炸并不是以中国为基地的恐怖分子所为，而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所为。除美国之外，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印度与中国经济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由于两国的人口因素，中国和印度将来总有一天会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关系。<sup>④</sup> 两个亚洲人口大国，似乎注定要在某些基本的和关键的层次上展开合作，这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以至于人们还不能清晰地做出判断，即中国是否会始终挑衅性地在印度洋上公然建立海军基地。

然而从中国海军的观点来看，印度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地区国家，并有可能在本世纪末成为一个大国。印度的大部分问题集中在陆地上，而不是在海洋中。在我访问印度的时候，印度陆军总

---

① 一些印度分析家倾向于指出，中国反对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售应用于印度核项目的铀，表明中国反对印度实力的崛起。

② Parag Khanna and C. Raja Mohan, “Getting India Right.”

③ Edward Luce, *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Strange Rise of Modern Ind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p. 287.

④ Edward Luce, *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Strange Rise of Modern Ind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p. 275.



参谋长迪帕克·卡普尔将军（General Deepak Kapoor）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能力，而中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必须学会相处。”然而，印度陆军已经注意到，中国在西藏修建了3个机场，其作战弧覆盖了整个印度；也注意到中国修建了进入西藏高原——它使中国心脏地区与印度次大陆分隔开来——的公路和高海拔铁路；此外，中国还修建了39条从中国内陆到达有争议的中印边界的运输线路。<sup>①</sup>

然而，正如我所说的，中国的威胁只是刚刚露出端倪。在印度将军们的眼中，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nter Services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ISI）所代表的现实威胁相比，中国的威胁还微不足道。在新德里，对中国的讨论还只局限于比较抽象的大战略范畴，但关于巴基斯坦的讨论则是具体而详细的。但即使让新德里的人夜不能寐的所有问题都指向了巴基斯坦，他们还是竭力地把自己与中国相比。另一位印度陆军军官告诉我，“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一向我行我素”。在新德里的眼中，它几乎就是一个恐怖主义机构，除了黎巴嫩的什叶派真主党（Shiite Hezbollah），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机构能与之相比。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是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关键支持者，帮助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分子。总之，它使圣战分子（jihadis）渗透进印度。一位印度情报官员说：“极端势力正顺着印度河东下，事情将会变得更加糟糕。”他说这些话时还是在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发生之前。事实上，孟买恐怖袭击来源于海上渗透，这意味着国家的海洋疆界也是不安全的。因此，印度海军除了担心中国以外，在国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纵然巴基斯坦军队部署在远离印度边界的俾路支斯坦

---

<sup>①</sup> Twining, “New Great Game.”

(Baluchistan) 和邻近阿富汗的西北边境省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以应对本国境内的叛乱分子与恐怖分子, 但孟买恐怖袭击还是发生了。一种趋势非常明显, 即: 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威胁很少是过去几年或者几十年中来自巴基斯坦军队的传统威胁, 更多的是穆斯林恐怖分子渗透形式的非传统威胁。与此同时, 印度人在谈论曾经被自己打败的巴基斯坦军队时, 态度相当轻蔑。一位军阶较高的印度军官就认为, 巴基斯坦军队“不是一个专业化的军队, 因为它长期卷入政治”。而且, 他补充说, 巴基斯坦的政治结构不能“解决或处理它自身的恐怖主义因素”, 所以形成了一个圣战分子与官僚机构本身就紧密结合的环境。孟买袭击完全说明了这一切。事实上, 尽管面对这个严重的威胁, 印度的选民在 2009 年的大选中拒绝了莫迪 (Modi) 和其他印度民族主义者, 这进一步显示出印度的崛起。大选结果预示着这个国家有足够的自信, 不向极端主义屈服。

因为需要一个对抗巴基斯坦的后方基地, 印度军队迫切期待一个亲西方的、没有塔利班的阿富汗。卡普尔将军说, 从印度的视角来看, 美国承担在阿富汗的长期义务比在伊拉克的更加重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 (M. K. Narayanan) 在另一次会议上也说, “阿富汗卡尔扎伊政权 (Karzai regime) 的存续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利益。”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的, 也是印度的。毫无疑问, 几十年来, 阿富汗始终是印度与巴基斯坦间接争夺的对象。对巴基斯坦来说, 阿富汗代表着关键的战略资产, 其与那些苏联时期的中亚伊斯兰国家一道, 将为巴基斯坦提供联合宗教阵线以对抗印度教徒占统治地位的印度, 阻碍其竞争对手接近这些能源丰富的地区。相反, 对于印度来说, 一个对印友好的阿富汗意味着将在巴基斯坦的西部边界形成压力, 正如印度自己在巴基斯坦的东部边界形成压力一样。如此, 印度应对巴基斯

坦时就获得了某种战略优势。

20世纪80年代，印度支持喀布尔世俗的亲苏联的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政权，而巴基斯坦则支持伊斯兰叛乱者，试图推翻穆罕默德·纳吉布拉政权。因为美国当时的利益在于与巴基斯坦结盟，因而怂恿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支持叛乱分子，而大多数叛乱分子后来则成为塔利班（Taliban）和基地组织（al-Qaeda）的盟友。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10年后发生了“9·11事件”。对美国来说，世界变了。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而言，阿富汗的重要性仍旧。就像巴基斯坦仍然有必要支持伊斯兰叛乱分子以推翻世俗政权一样，印度还必须支持喀布尔的相对世俗的政权。<sup>①</sup>因此，美国现在的利益，或多或少是与那一代人之前存在的苏联加盟国结盟。

除巴基斯坦外，卡普尔将军还担心查谟—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这个火药桶。查谟—克什米尔是印度仅有的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邦，它的得失将会在印度这一地区——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地区——引发连锁的分离主义反应。<sup>②</sup>同时，毛派（Maoist）引发了尼泊尔的动荡，一半的尼泊尔人口居住在靠近印度边界的地区，在印度安全官员看来，尼泊尔正处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和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之下。即使印度安全官员的判断有些夸张，但他们坚持这种看法本身也表明，他们的国家在这个特别前线是不稳固的。尤其是在尼泊尔的毛派的地位得到加强的背景下，或许会激励活跃于印度中东部地区的毛派纳萨尔武装（Maoist Naxalites）的恐怖袭击行动。

---

① 巴基斯坦总是指责印度利用在阿富汗新开设的领事馆来支持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

② Stanley Weiss, "India: The Incredible and the Vulnerabl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23, 2008.

印度陆军军官们完全困扰于印度的陆地边界，对许多事情表示担心。他们谈到了位于印度西南部的岛国马尔代夫，那里逊尼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上升；他们谈到了在缅甸——一个中国高度卷入的国家——境内操控的活跃于印度东北部的反印度种族的叛乱团伙；他们谈到了来自邻国孟加拉国的 1000 ~ 1500 万非法移民；他们谈到了位于印度东南的斯里兰卡战争，这场战争直到 2009 年才结束。一位陆军军官说：“我们并不奢望有一支美国那样的快速反应部队，但我们还有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因此需要大量的陆军。”

后来，讨论的气氛轻松起来。军官们谈到了土库曼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与印度之间的能源管线。中亚地区是一个印度由于担心陷入包围而不准备让给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地区，而印度最近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的军事基地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们还谈到了海湾地区和东南亚对印度安全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这些讨论的结论就是，尽管印度可以向外更远地显示力量，但在自家门口是软弱的。一位军官说，“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和斯里兰卡，混乱，混乱，混乱……每个人都希望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奉行强硬的对缅甸和对西藏政策，但我们与这些地方有陆地接壤的边界，并且也不能容忍这些地方出现权力真空。”时任印度外交秘书希夫香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也指出，印度并不会拘于礼节并以美国的方式做出黑白分明的道德宣言，因为美国受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庇护而印度则不然。另一位军官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那些建立并运作于缅甸的 18 个叛乱组织”。印度在邻海的半岛南部地区最强大，然而在北部、东部和西部则最为脆弱。

“印度拥有 1.55 亿穆斯林人口，我们的关切实际上是原教旨主义。我们如何确保事态不会失去控制？”另一个军官对我

说，“基地组织作为一种想法和态度比作为一个组织更为危险。”人们确实担心，邻国的不稳定将会成为一种常态。“我们的平静与和平处于危险之中。”事实上，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印度仅次于伊拉克，是每年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sup>①</sup>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提到，2006年7月发生在孟买的列车袭击事件，7次爆炸共造成两百多人死亡，七百多人受伤。他说，这次列车袭击事件就是“在几个国家策划的”。他还指出，本地区“根本没有充分的情报共享”。像世界上其他极少数国家一样，印度易成为恐怖主义目标，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议题上，印度是美国的天然盟友。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中心，就在印度自己的后院——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sup>②</sup>

在带有拱廊和莫卧儿彩饰的印度外交部宾馆中，印度外交秘书梅农借用了学者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的词语，称印度是一个“桥接国家”（bridging power）。也就是说，印度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介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介于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之间，介于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介于经济和海军的崛起与大量贫穷人口和脆弱的疆界之间。<sup>③</sup>与传统的实力考量相比，印度文化的影响似乎始终更为广泛而深远。

“桥接国家”是一个好概念，但它对决策有何帮助？在一个更加不利的安全环境下，印度或许被迫做出要么此类要么彼类的选择。而且，印度在主张自己实力的时候通常都表现出一定的矛盾心理。对印度来说，将更加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融入其对外政策

---

① Parag Khanna and C. Raja Mohan, “Getting India Right.”

② 按照印度的观点，印度面临着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导弹威胁。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印度也是美国的联盟之一。

③ Sunil Khilnani, “India as a Bridging Power,”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5.



谋划，还是一种正在掌握之中的技艺。<sup>①</sup>

印度是极其自相矛盾的。与曾经的英国相比，印度在次大陆有更大的优势地位，尽管遭受陆地疆界的困扰，然而印度却是次大陆唯一一个不失败的国家。而其他所有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缅甸在内，都是次大陆极其混乱的国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几乎没有任何地缘意义。它们都是人为形成的构造，其政治版图几十年和几个世纪以来都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尼泊尔及其十几个种族团体，曾经被一个印度教君主体制整合在一起，后又被可怕的谋杀撕裂，最后又被一个脆弱的新生民主所取代。斯里兰卡的种族斗争曾导致长达一代人的战争，至今战争的灰烬仍未冷却。缅甸崎岖的地理地形使其成为若干个种族叛乱团体的天堂，而这也导致了缅甸的军事苛政。只有印度——尽管有不同的语言、宗教和种族——支配着从喜马拉雅山到印度洋的次大陆，为其提供了地理上的存在逻辑。民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它使所有的团体在这个体制中都有利害关系。尽管有纳萨尔恐怖分子，但印度具有天然的稳定性。换句话说，印度不会分崩离析，即使它想如此。

尽管印度的海军军官已经在注视着遥远的莫桑比克和印度尼西亚等海洋国家，并且这些居住在令人叹为观止的政府建筑中的人还带有一种英国人由于推崇实力政策而缺乏的谦虚和谨慎，然而，印度每天都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现在的印度人也许比他们的前辈能够更加长久和更加富有成效地占据这个中亚与印度平原相交汇之处——一个极佳的栖息之地。毕竟，治理国家的真正艺术在于战略性思考以规避灾难。

---

<sup>①</sup> Harsh V Pant, "A Rising India's Search for a Foreign Policy," *Orbis*, Spring 2009.

印度占据着印度洋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和中国注定要在此相碰。正如美国在发展一种新的两洋——太平洋与印度洋，而不是太平洋与大西洋——海军一样，在以下的章节中将会看到，中国也许也会发展一种两洋——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军。印度洋毗连西太平洋的区域将成为世界的战略中心。但是，在我们完成这种描绘之前，有必要仔细地审视一下印度洋沿岸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孟加拉湾的那些沿岸国家。我们就从印度的邻国孟加拉国开始，它也曾是莫卧儿帝国的组成部分。

## 第八章

# 孟加拉国：关于存在的挑战

按照艾伦·维利尔斯（Alan Villiers）的话说，在世界众多海域中，印度洋是唯一一个“被围绕的”大洋。印度洋被亚洲大陆包围，倒三角形的印度半岛形成两个大海湾——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而其他大洋则纵贯北南，从寒冷的北极延伸到冰雪覆盖的南极。<sup>①</sup> 阿拉伯海朝向中东地区，而孟加拉湾则朝向东南亚，莫卧儿人在这两个地区都曾有过短暂的驻留。然而，是季风真正地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季风以它那广袤的地理跨度跨越了国家的疆界。在卡拉奇的巴基斯坦人注意到，西南季风沿着位于阿拉伯海的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喧嚣北上；同样，孟加拉人也可以看到，西南季风翻腾着掠过缅甸南部的安达曼海（Andaman Sea），在孟加拉湾的顶部回归平静。我的几次孟加拉湾之旅几乎都是在春夏季风降雨期间。在这个季节，这里的海滨比西边的阿拉伯海岸更加阴暗，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不愉快。

---

<sup>①</sup> Alan Villiers, *Monsoon Seas: The 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 5.

初夏进入孟加拉湾的西南季风带来了新的降雨。这也是产生热带气旋的季节，海洋仿佛要把自己全部倾泻到人的身上。连续几天，天空低沉，云层幽暗激荡。没有阳光，景色——无论本来是多么的绚丽多彩，布满木槿的山丘，鲜橙色的芒果，女士身上飘动的纱丽——在颗粒状的雾气中变得模糊。泥土色是主色调，但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首先感受到的是凉爽，而不是铅灰色的昏暗，周身充满能量，衣服不再吸满汗水，双膝不再躲避酷热，身体极力想推开的沉重而闷热的空气也不见了。

季风，来源于阿拉伯语的 *mausim*，意为“季节”，是地球上“最大的气象系”之一，因地球的自转和气候产生。在夏季，位于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附近的印度洋北部海岸的陆地热量增加，产生相当高的温度，并在其表面附近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域，导致冷空气从海洋方向流入。来自海洋的冷湿空气与亚洲大陆的干热空气相遇后，冷湿空气上升，产生云和雨。<sup>①</sup>事实上，季风还是一个数学问题，它的两个支流大约6月1日到达科摩罗角（Cape Comorin）和孟加拉国，5天后到达果阿和加尔各答（Kolkata），再过5天到达孟买（Mumbai）和比哈尔（Bihar），六月中旬达到德里（Delhi），7月1日左右到达卡拉奇（Karachi）。季风的可靠性让人敬畏，农业与地方经济因此依赖于它。风调雨顺的季风意味着繁荣，由于可能的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天气类型的转变，则会给沿岸国家造成灾难。已有的统计证据

---

① 由于树叶通过蒸腾作用将水返回到天空，所以森林在水的循环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人为的发展吞噬着森林时，威胁到农业赖以生存的季风。关于这种形式的气候变化，目前的讨论还比较少。Alexander Pearson,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9-20.

表明，全球变暖已经导致更加不稳定的季风类型。<sup>①</sup>

当西南季风达到孟加拉国时，我正乘一条浅底小船通过一个村庄，但这个村庄现在已经被水淹没。一条因长期侵蚀而形成的一英里宽的水渠，将大陆与“char”——由淤泥形成的三角洲岛——分隔开来。或许将来某个时候，这个由淤泥形成的三角洲也会消失不见。墨黑色的云团从孟加拉湾飘来，由朽木造的小船开始奋力拍打着波浪。积聚了几天的酷热，雨像钉子一样打在我们身上，饱含泥沙的渠水不断喷入船舱。我与船夫和翻译奋力将船划到三角洲岛，然后开始从船舱往外舀水，费了很大气力才舀完。

几天后，为了观看一些土坝坍塌，我骑着摩托车沿着冗长的河堤前行。由于坝体坍塌，十几个村庄已经被迫撤离。由河堤围成的棋盘状的稻田在湿雨中像镜子一样闪着光亮。如果不是有以前的图片做对照，我所看到的景象——几条崩溃的土坝——也就不那么富有戏剧性了。

气候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平面上升几乎无法让人有直观的感觉。北极冰川融化的图片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也只是因为北极本身使我们印象深刻。突然的变化也许是以地质学的时间来衡量的，对我们来说，这些变化仍然以极慢的速度发展。河流一夜间改道，水压增加也可导致大坝瞬间坍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必须在其发生的时候亲临现场才能感受深刻。

在季风开始的数周内，从孟加拉的一端到另一端，我看到了很多戏剧性的事件，它们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独特的事实：再遥远而荒凉的土地也从来不缺少人（或者孟加拉人）。即使是在三角

---

<sup>①</sup> Interview with Jay Gullede, senior scientist,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2009.



洲上，我也能看到人们在耕作每一寸冲积而成的土地。在这个肮脏潮湿的地带，到处都有人。狭窄而凹凸不平的小路，肮脏而拥挤不堪的渡场，瓢泼大雨中乞丐和小商贩梦游般穿梭于汽车之间。

我穿过一些城镇。就像在地图上一样，这些城镇都有名无实，充其量是一些位于菠萝蜜树、芒果树和荔枝树下锈迹斑斑的瓦楞铁和竹子隔间。城镇中的男人穿着传统的笼基（longyi，一种缅甸男子穿着的传统裙子），戴着棒球帽，而妇女则长年累月地穿着穆斯林的宽松长衫，只露出她们的眼睛和鼻子。城镇之间有众多水坑相连，水坑表面覆盖着一层绿藻和风信子。水坑的沙土被取走以垫高公路，以保证路面始终高出不断提升的海平面几英尺。

在孟加拉国，土地非常珍贵。旱季，人们疏浚河道以获得更多的泥土。泥土是一种不断流动的东西。房屋被拆后，房屋位置的沙土通过泥浆泵输送到新的地址。“这种景致是短暂的，今年是水坑，明年也许就成为土地，反之亦然。”在首都达卡（Dhaka）的一位美国国际发展组织的官员这样解释道，“男人可以挖个坑，出售泥土，然后在这个新的池塘内养鱼。”

人们竭尽全力去开发每一寸土地。一天，我看到一个男人躺在担架上，他被一只大孟加拉虎伤了脸和耳朵。这种事经常发生，捕鱼者不断地涌向孟加拉虎的最后庇护地——一块位于孟加拉国与印度边界地区的红树林沼泽地，而海平面上升导致的盐分已经使鹿——老虎的食物——的数量大幅减少。人和老虎都无处可去了。

我们的地球始终是不稳定的。综观整个地质历史，洪水、侵蚀、飓风和海啸几为常态，却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个地球上环境如此脆弱的地区人口竟然仍然如此稠密拥挤。尽管世界人

口的增长率持续下降，但在一些国家中，由于人口基数已经很大，其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著。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大自然（Mother Nature）与以前相比可能会杀死更多的人，或使更多的人无家可归。2004年12月发生的印度洋海啸，只是未来灾难的序幕。

人们有时信口评论，孟加拉国由洪水导致的无数人流离失所，没有自家门口有人被杀或无家可归更具新闻性。这样的对比不仅是残酷无情的，还无视一些地区已迫在眉睫的自然灾害。美国海军也许是为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平衡中国而进行部署，但它更有可能是为了应对环境突发事件。环境突发事件使孟加拉国以及它所导致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迫。

在孟加拉国，有1.5亿人蜗居在与海平面等高的地区，哪怕是最轻微的气候变化，也会威胁到无数的生命，更不用说全球变暖带来的巨大威胁了。孟加拉国高级研究中心（BCAS）的主任阿蒂克·拉曼（Atiq Rahman）写道，至2030年，孟加拉湾的海平面可能上升8英寸，这将摧毁一千万人。21世纪，部分格陵兰岛冰川的融化将会导致一半的孟加拉国土淹没在海水中。尽管许多学者激烈地讨论这样的统计与景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孟加拉国最有可能成为这个星球历史上最大的人道灾难的发生地，并且据我所知，灾难将毫无例外地影响那些居民中的最穷困者。

然而，正如孟加拉国案例所展示的，未来并不完全是海平面的上升。未来还取决于它们与诸如宗教极端主义、民主缺陷等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孟加拉湾的北部，恒河（Ganges）、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和梅克纳河（Meghna）等无数的支流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年轻和最富活力的河口三角洲。三角洲的面积与美国

的艾奥瓦州——每年有 20% ~ 60% 的地区发洪水——一般大小，却生活着相当于美国一半的人口，甚至比俄罗斯的全部人口还多。仅孟加拉国的穆斯林人口（占全部人口的 83%）就将近埃及或伊朗的两倍。人们认为孟加拉国很小，仅仅是因为它的三面被印度包围着。实际上，孟加拉国是广阔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水上文化”。据我所知，乘小船和其他交通工具游览孟加拉国需要许多天。

春天，喜马拉雅山冰雪融化，三条大河河水高涨，来自北方的洪水最先到来。进入六月，发自南边的季风呼啸而至，从孟加拉湾一路北上，持续三个月。河流和海洋中涌来大量的水时，老天有时也来添乱，灾难的威胁——不管是上帝所为还是人类所做——随之而至。尼泊尔、印度和中国都被人为的森林滥伐所困扰，结果不是导致沙化，就是导致泥土流失，或者造成积水存于某一地点，形成水浸或涝，阻止这些水流入大河。而且，印度和中国都从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中取水灌溉，这进一步限制了从北方流入孟加拉国的淡水量，导致孟加拉国的干旱。同时，在孟加拉湾的南部，全球变暖似乎已经造成海平面上升，导致海洋中生成的飓风进一步深入内陆。盐分——全球变暖在孟加拉国的主要表现——毁坏了树木和庄稼，污染了水井。由于经印度和中国流入的淡水不足，形成的水文真空只能加速海水向北流入乡村。

与作为一个拥有严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国家相比，孟加拉国是一个人类如何与极其恶劣的环境相适应的典范，天气与地理始终致力于将这里的村庄分隔开来。16 世纪当中亚的莫卧儿人到来后，这里才有了可以信赖的政府。但无论是莫卧儿人还是后来的英国人，他们都没能真正渗入乡村地区。这里的主要公路，都是在独立以后建立的。因此，这是一个从来都不等待上级官方提

供任何援助的社会。由于洪水和季风雨造成的隔绝与孤立，促进了国内最底层组织的发展。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更多的是集体公社，而不是等级制度，其中妇女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距达卡西北4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个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混居的地区，其中一个村庄的妇女将她们自己组织成不同的委员会，生产篮子和纺织品，并将利润投资于新的水井和公共厕所，她们给我看了自己做的硬纸板地图，上面标明了这些设施的安装地点。这些妇女得到一个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帮助，而这个地方非政府组织与“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CARE）建立了关系。这个组织的启动资金来源于外部，但组织的重要地位却来源于内部，是土生土长的。

在西南部的一个经常有老虎出没的红树林沼泽地带，我发现一个渔村，那里的人们生活在用竹子和茅草搭建的河边棚屋里。在这里，我观看了一个由地方非政府组织表演的节目，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包括通过集水盆地储存雨水，以及植树以预防水土流失等。数百村民观看了表演，我是唯一的外国人。他们给我看了自己建造的集水设施，这可以将雨水导流进水井。

通过一种类似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一种完全自愿的方法，孟加拉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从独立初期的7%降为现在的1.5%。这对于一个将儿童作为重要劳动力的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脊髓灰质炎有几次几乎被完全根除，仅仅是因为来自印度的反复再感染才导致失败。尽管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孟加拉国已经从一个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饥荒国度，发展为一个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将问题解决得如此之好，这主要归功于各种非政府组织。诸如“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无国界

医生”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等项目的救济资金的发放, 已经使 NGOs 成为一个大众熟知的缩写字母。同时在孟加拉国, NGOs 也代表一个新的组织生命形式, 这里, 无数的地方非政府组织填补了遥远的运作不良的中央政府与村级委员会之间形成的管理真空。

由于有些非政府组织是带有营利成分的非营利单位, 由此引发了孟加拉人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在道德上的问题。以穆罕默德·尤努斯 (Muhammad Yunus) 为例, 由于他以及他的“格莱珉银行” (Grameen Bank, 意为“农业银行”) 在孟加拉国开创了为贫穷妇女提供的小额信贷项目而赢得了 2006 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他同时也提供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服务。还有就是“孟加拉农村促进委员会” (BRAC), 它除了慷慨的救济工作外, 还运营着奶制品、家禽以及服装等商业项目。与格莱珉银行等企业一样, 孟加拉农村促进委员会的总部办公室占据着一座摩天大楼, 而这座摩天大楼是达卡最昂贵的地产。然而若过分关注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营利色彩, 也就忽视了它们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种事情可以导致另一种事情,” 孟加拉农村促进委员会的副执行董事穆什塔克·乔杜里 (Mushtaque Chowdhury) 解释道, “为了不依赖西方的救济, 我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设立了自己的营利性印刷厂, 后来还建立了一个牛奶消毒车间, 我们向购买奶牛的贫穷妇女提供贷款。”

移动电话让第三世界国家不再需要建立有线的通信基础设施。孟加拉国也向我们展示出, 非政府组织是如何绕过那些经常失灵的第三世界政府而发挥作用的。因为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得到国际援助的支持, 它们已经接受了国际准则, 甚至要高于孟加拉私人企业的接受程度。

一边是全球性的社团, 一边是村庄, 这种联系使孟加拉的非



政府组织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本国环境困境的全球意义。在西南地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对我说，“跟我来，跟我来，我让你看看气候变化”，他指的是由于海平面上升已经部分坍塌的一个桥。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被侵蚀的堤岸都是对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有力控诉。然而，在几乎所有方面，孟加拉国的穆斯林是支持美国的，他们不喜欢以前的殖民主义英国，经常遭到近邻印度和中国的威胁，并且继续对巴基斯坦保持敌意，这种敌意来源于 1971 年的解放战争。

然而，严格来说，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必须让其他国家看到其在与全球变暖作斗争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否则就会遭受谴责。孟加拉国的案例显示出，气候变化——一种新的有力的政治因素，关乎更多的正义与尊严的需求——是如何导致第三世界陷入苦难的。美国权力的未来，与如何就自己关心的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与孟加拉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沟通直接相关。就像美国战舰的数量一样，这个问题也同等重要，或许会更重要。

如果不是采取一种温和与协调的穆斯林方式，非政府组织也不会出现在孟加拉国的村庄中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穆斯林进入孟加拉的时间比较晚，始于 13 世纪早期居住在德里的土耳其人的入侵。然而，孟加拉的穆斯林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印度教化的混合文化。在孟加拉国穆斯林村庄里，*Matbors*，也就是村庄的头领，并不拥有阿拉伯村庄首领所具有的权威。而且，在村庄头领之下，社会组织的其他阶层中，妇女可以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西方化的救济工作者给予这些委员会成员以权力，而委员会成员也始终乐于接受西方的思想。

然而目前，孟加拉国这种温和的穆斯林正让位于一种比较严酷和强硬的瓦哈比教派（*Wahabist*）的主张。贫穷的国家不能对

金钱说“不”。孟加拉国拥有众多难于管理的星罗棋布的岛屿和水湾，这里已经成为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天堂。与那些西方化的非政府组织一样，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是“替代政府现象”的另一版本，正在填充因中央政府弱化而造成的真空。在沙特阿拉伯以及从阿拉伯半岛归来的孟加拉国人的资助下，伊斯兰孤儿院、宗教学校以及飓风避难所——像“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或“拯救儿童”等非政府组织一样运作——正在整个孟加拉国迅速发展。

然而伊斯兰激进化并不代表这是孟加拉历史上某种独特的东西，其仍然属于严重伊斯兰化的印度洋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正如摩洛哥伟大的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于14世纪从阿拉伯来到孟加拉以祈求著名圣人沙阿·贾拉勒（Shah Jalal）的祝福一样，21世纪的现在，沙特阿拉伯人的思想和圣经文句渗透到孟加拉，除此之外，在阿拉伯半岛工作的孟加拉人回到故乡，也带回了新思想。<sup>①</sup>

在首都达卡、港口城市吉大港，以及整个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妇女穿起穆斯林长袍（burkas）和纱丽（shalwar kameezes），而不是十年前的牛仔服和T恤衫。按照吉大港某私立大学副校长阿努帕姆·森（Anupam Sen）的说法，孟加拉国的宗教学校数量远远多于世俗学校。他告诉我说，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全球化的伊斯兰”而非“独特的孟加拉”——正在这里浮现。因为南部地区的盐化以及西北地区的干旱，人们离开越来越让他们感到失望的农村而进入城市，进入城市的人口每年达到3%~4%，而伊斯兰在城市获得了特别的意识形态优势。在这一过程

---

<sup>①</sup>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 - 17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306.

中，他们居住在不知名的无限伸展开来的贫民窟中，失去了与自身部落和大家庭的联系。在这里，全球变暖和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间接地供养着伊斯兰极端主义。

阿蒂克·拉曼警告说：“在乡村地区没有混乱，那里的社会是健康的，但在不断扩大的城市地区，我们是混乱的。”孟加拉国恢复民主选举已经15年，但城市混乱局面是中央政府可耻的失败。

已经临近21世纪第二个十年，但孟加拉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民主危机的一个典型缩影。与美国入侵后伊拉克民主的戏剧性失败不同，孟加拉国的民主危机堪称典型——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就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官方上赞同民主，但公民社会的有识之士在政治进程中几乎发挥不出任何作用，人们更信任军方，而不是其他任何政党。尽管许多人拥护历史性的自由主义，但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对选举感到恐惧，害怕这将导致帮派暴力。“我们有最好的宪法，有最好的法律，但没人遵守这些，”一个商人抱怨说，“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最好的政府就是上台执政第一年的军人政权，而一年以后，军政权也会失败。”

2006年秋季，孟加拉国的政治体系似乎濒临崩溃的边缘，罢工、游行示威和谋杀不断，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军方成为看守政府的幕后力量。当时，执政党正在准备即将举行的大选，而反对派则正谋划着一系列帮派武力攻击。此时，民主已经让两个封建王朝式的政党走到前台，一个是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领导的人民联盟（Awami League, AL），另一个是卡莉达·齐亚夫人领导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BNP）。谢赫·哈西娜是孟加拉国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的女儿，穆吉布·拉赫曼在1975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杀。而卡莉达·齐亚夫人是孟加拉国又一位奠

基者齐亚·拉赫曼将军（Ziaur Rahman）的遗孀，齐亚·拉赫曼在1981年的另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杀。两个女人之间的个人仇恨来源于齐亚·拉赫曼——齐亚夫人的亡夫——赦免了杀害谢赫·拉赫曼将军——哈西娜的父亲——的凶手。这与巴基斯坦的情况极为相似，孟加拉国的政治是一种由于家族仇杀驱动的莎士比亚戏剧一样的政治。

由于人民联盟和孟加拉民族主义党都比较弱小，双方都需要与各式各样的伊斯兰势力联合，因此对诸如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这些“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伊斯兰祈祷团已经将孟加拉国作为一个中转站和训练基地。2007年，得到军方支持的看守政府绞死了“圣战者大会党”（Jama'atul Mujahideen）——一个地方性伊斯兰极端宗教武装组织，在2005年实施了几千起恐怖袭击——六名成员，因为人民联盟和孟加拉民族主义党都受限于其与伊斯兰联盟伙伴的关系而不能做出判决。我到访的那个时期，孟加拉国正处于一种怪异的平静状态，与几年前相比整个国家的秩序有所好转，没有恐怖袭击，没有港口罢工，到处都有军队设置的关卡，数百政治家受到腐败起诉而被捕，政党中的技术官僚得到提升。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对回归过去的两党制度没有热情，尽管没有人希望军方在国家的事务中继续公然地扮演这样的角色。军方最终交出手中权力，谢赫·哈西娜当选为总理。但在谢赫·哈西娜选举获胜后，她也不得不处理准军事边防部队发动的军事叛乱。

孟加拉国的情况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国家的治理程度要比一个国家拥有哪种形式的政府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从人权的角度，一个不能控制其国民的民主政府可能比可以控制其国民的独裁政府更加糟糕。而且，我们不需要拿伊拉克这种极端的例子来证明这个结论，因为孟加拉国这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将会很好地

印证这一切。有效运行的机制——而不是那些纯粹的选举——很关键，尤其是在复杂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越快，其所需求的机制也就越多、越不同。<sup>①</sup> 在孟加拉国，军方干政归根结底是对有效机制缺失的一种必然反应。

从长期来看，民主或许是医治激进伊斯兰的一剂良药，然而在短期内，孟加拉国最担心的应该是激进伊斯兰利用政治真空妨碍军方回归军营之中。孟加拉国是一个有 80% 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2 美元的国家，但伊斯兰祈祷团每个月却为其成员提供 1250 美元的预算。成为伊斯兰祈祷团成员不只是有金钱上的激励，孟加拉国还有一个很容易渗透的边界，印度一方的管理能力极差，于是这里存在十几个地区叛乱组织。军事清剿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认为伊斯兰祈祷团已经化整为零并活跃于边境地区。

孟加拉国也许注定要被一个文官和武官组成的传统的土耳其式的国家安全机构所主宰，文官表面上拥有统治地位，但军方则是幕后的主使。吉人港前市长马穆杜尔·伊斯拉姆·乔杜里 (Mahmudul Islam Chowdhury) 告诉我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是民主的人质。你们的英国议会—美国国会 (Westminster-Capitol Hill) 体制在我们这里并不奏效。但我们穷，需要援助，所以也需要举行选举。”他认为，印度的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印度有很多由不同政党占支配地位的地方政府，在这个多层的体系中，邦和自治地区政府与联邦政府实现了共同繁荣；但在孟加拉国，中央政府并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即让反对党掌控任何大城市。所以，所有的权力都攥在中央政府手中，导致乡村的委员会

---

<sup>①</sup>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 9, 47



填充了最底层政府的真空，非政府组织和伊斯兰则努力填补广阔但极为关键的中间地带。

博里萨尔（Barisal）——孟加拉南部一个港口城市——就是这种真空地带的代表。博里萨尔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河床干涸，由于缺少可行的处理设施而到处充斥着垃圾和污水。实际上，博里萨尔的现状也与那些非法的高层建筑有关，这些建筑将更多的人口聚集在城市的中心地区。另一位官员、地区环境主任艾哈迈德·凯西（Ahmed Kaisea）告诉我：“法律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没有被很好地执行而已。”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似乎并不忙，没有电话打进来，办公室也没有电脑。由于时常整天没有电，因此这里的网络受到供电的严格限制。与我所见到的许多官僚一样，他有一间办公室，但这间办公室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管理。

由于城市比农村需要更多的诸如下水道、街道照明、交通信号等基础设施，像博里萨尔这样不受控制的增长——部分原因在于对农村地区环境的掠夺——已经使政府机构越来越难以应付。

孟加拉国的乡村在努力寻找不被水淹的旱田，而城市则是一种“三轮车经济”（rickshaw economy），在达卡这个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就有几十万辆三轮出租车。许多三轮出租车的司机是易遭受洪涝灾害的农村地区的移民，他们从与政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黑手党一样的老板那里租来三轮车，每天支付相当于1.35美元的租金。三轮车司机通常要向客人收取相当于30美分的车费，一天的利润大约有1美元。他们的妻子把砖码砸成修路的材料，也通常能挣得1美元，而他们的孩子通常在捡垃圾。这就是典型的孟加拉国家庭。这个经济环境也极其适合激进伊斯兰的发展，激进伊斯兰为这种苦难提供了现实的解决之道和精神上的奖赏，仅仅对定期选举寄予厚望则不能提供这一切。孟加拉国

的奇迹并不在于孟加拉国（也包括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的激进，而在于它们如何还仍旧保持温和。

在国家的层面，孟加拉国存在凝聚力，这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是语言的民族主义使然。与巴基斯坦和伊拉克不同，孟加拉国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不需要把伊斯兰作为整合不同种族或宗派团体的黏合剂。而且，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暴力斗争的基础之上的。1947年，孟加拉穆斯林人反抗英国和印度，以求建立东巴基斯坦（East Pakistan），然后是1971年反对西巴基斯坦穆斯林的解放战争。解放战争见证了西巴基斯坦军队在达卡犯下的强奸与杀戮，西巴基斯坦穆斯林拼命地将乌尔都语强加给孟加拉人。从“东巴基斯坦”（Pakistan，意为“穆斯林圣洁的土地”）变为“孟加拉国”（Bangladesh，意为孟加拉人的土地），语言取代了宗教，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

然而，语言这个社会组织原则并不是不可侵犯的。印度疆域广阔，是亚洲次大陆最大的国家，拥有地理逻辑优势。而孟加拉国并不具有这种优势。尽管孟加拉国很小，但从自身的角度看，它又是极其广袤的。“在达卡，无论是谁执政——不管是民主还是军方——都会忽视我们这里的吉大港。”一位地方律师对我抱怨，显然地带有一种在东南部港口城市普遍存在的情绪。“我们有吉大港自己的方言，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种葡萄牙语、阿拉伯语、阿拉干语、缅甸语和孟加拉语等的混合体。”他继续说道，“我们与孟加拉国的其他地方相连，同时也与缅甸和印度相连。如果将来有一天缅甸开放了，我们也修建了新的公路和铁路与印度和中国的西南相连，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只要给我基本的权利和尊严，我就会热爱这片土地。否则，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这位地方律师并不是呼吁分离，但他也确实暗示，在地区政治、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其自身特性这股强劲旋风的冲击下，位于

印度次大陆的这块领土——从孟加拉、东孟加拉、东巴基斯坦，再到孟加拉国——可以再次发生嬗变。毕竟，综观吉大港历史上曾经隶属的王国，从三摩坦吒国（Samatata）、诃利鸡罗国（Harikela）和特里普拉国（Tripura）到阿拉干（Arakan）等，其与孟加拉国的东南部地区长期以来是与缅甸始终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与印度的联系也是这样。

他谈到一个包括吉大港和山区（Hill Tracts）的新的微型国家（mini-state），这个微型国家位于缅甸和一个大印度（a Greater India）之间，博里萨尔和孟加拉国西南部的库尔纳地区（Khulna）曾与加尔各答（Kolkata）一起构成印度的一部分。他还提到了数千名工作在邻近地区的吉大港人，这些人是为数不多的富裕的孟加拉裔移民的一部分。他并不是一个煽动者，他只是在深夜里自言自语，就像雨水涌入附近的小巷，是这个国家的长期失稳让他自然而然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律师款待我的，是宛如他办公室内堆到屋顶的文件夹一般浩瀚的历史。这些历史表明，吉大港的身份更多地是由孟加拉湾和更广大的印度洋世界来定义的，而不是由孟加拉国来界定。尽管15世纪早期是伊斯兰孟加拉苏丹国的一部分（在16世纪的某些年代也曾如此），但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这个城市及其腹地由阿拉干国王统治着”，而这主要是一个佛教王国，与缅甸而不是与孟加拉结盟。对于来往于麦加（Mecca）的朝觐者来说，吉大港是一个重要的南亚和东南亚港口，同时也是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果阿之外的葡萄牙人经营自己商业和军事生意的另一个基地。<sup>①</sup> 葡萄牙著名诗人卡默斯写道：“看吧，吉大

---

①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 - 1760*, p. 235.

港，孟加拉最好的城市。”<sup>①</sup>

在中世纪的某个时期，从印度洋对岸来了12位苏非派圣徒，他们宣讲伊斯兰，帮助建立了这座城市，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皮尔·巴德尔·沙阿（Pir Badr Shah）。传说，为躲避恶灵之城，他乘坐石片，从阿拉伯海漂流至此。携带着香料、棉织品、宝石和矿物的阿拉伯商人穿梭于阿拉伯与东南亚之间的印度洋，而皮尔·巴德尔·沙阿是这股潮流的标志性人物，他带来的瓦灯（earthen lamp）向四面八方传播着光明，<sup>②</sup>驱赶罪恶的黑暗，为航海人提供帮助。这个瓦灯或许会被误认为是他在山坡上为引领航海者进入港湾而点燃的烽火，然而无论如何，从孟加拉湾东岸远至南部的马来西亚，他都是一位被水手尊重的人。

位于吉大港的老城堡区的一个发霉的半球形屋顶下，有一个黄铜制成的笼子，里面摆放着圣人的石棺，石棺的旁边是一个污迹斑斑的玻璃罩，瓦灯和石片就静静地躺在里面，笼罩于荧光之下。玻璃罩的周围是机织的地毯、简易的席子和绿色的地砖，这些在多数家庭的厨房或浴室都极为常见。换句话说，皮尔·巴德尔·沙阿的陵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美感，然而在日落时分，拜祭者蜂拥而来。男人们裸露着上身，下着传统的笼基，浸浴在汗水与雨水中，绕墓而舞。身披纱丽的妇女则静静地躺在石头铺成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蜡烛和鲜花，我仿佛置身于印度教的庙宇之中。对于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来说，皮尔·巴德尔·沙阿都是神圣的。人们可能会把他与印度教诸神相混淆，佛教徒和中国人则

---

① Luiz Vaz de Camoes, *The Lusiads*, trans. Landeg Wh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nto Ten: 121.

② Suniti Bhushan Qanungo, *A History of Chittagong* (Chittagong, Bangladesh: Signet, 1988), p. 468. 我参考了这本书中相当多的历史背景资料。

尊崇他为一个大神。这个城市里的其他苏非派圣者的陵墓，也得到同样的崇拜。与孟加拉国相比，吉大港是一个更大更全球化的世界窗口。

虽然作为一个更大的窗口，但吉大港几乎没有任何标志性的建筑。阴暗潮湿，霉气凝重，绵延数英里的低矮建筑锈迹斑斑。除了几处清真寺外，几乎没有任何建筑可以被认为有特别的历史形式。我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建筑，不如说仅仅是一些临时的必需品集合——小的建筑需要满足当下的需求。建造这些建筑的人明显缺少一种可以流芳后世的奢华感，更不用说存在某种美感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样草率的建筑仍然代表着比乡村——他们从那里移民到城市——更上一层楼。吉大港与皮尔·巴德尔·沙阿墓一样，尽管丑陋，但充满活力。它的历史与民间传说涉及广阔的领域，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是极其缺少传统的，以至于几乎这里的一切都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从屋顶望去，吉大港就像被涂上了焦油与炭灰，当季风薄雾遮住了美丽如画的吉大港山区的景致时，“山峦似乎触到了天空”，一位17世纪的葡萄牙旅行家这样描写道。与我在一起的是丹比尔·乌尔·伊斯拉姆·希迪奎（Tanbir ul Islam Siddiqui），一个名为“改变制造者”（Change Makers）的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改变制造者”有一个主要的目标，那就是使孟加拉国民知道他们自己的宪法。孟加拉国有一部相当好的宪法，但由于几年来军方和文官统治者多次违宪，宪法的存在对那些统治者而言简直就是一个难堪，他们几乎把宪法当成国家机密，普通民众很难获得宪法文本。因此，“改变制造者”致力于将宪法传播给孟加拉国民。丹比尔对自己面临怎样的挑战并不存在幻想。

注视着呈现颗粒状景色的吉大港，丹比尔告诉我说：“对于



民主的争论，军方统治对我们有利，对精英也有利。这里几乎所有的人，在得到圣人庇佑的同时，关心的却只是一日三餐。如果军方能维持港口运转，能让公共汽车和工厂正常运行，他们就心满意足了。真正的斗争，并不是谁在统治，而是使民众去关注谁在统治。”

吉大港坐落在孟加拉湾，城市从港口发展而来，而港口本身则位于卡纳普里河（the Karnaphuli River）上方9英里处。由于灌溉项目和上游水浸，流向下游的水量严重不足，不能冲淡因海平面上升导致的盐化。这与孟加拉海岸其他地区的情况大同小异，结果是沉积物堆积，导致河床变浅，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船舶航行之需。而且，港口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公路网络为停靠在码头的船只提供支撑。因此，尽管吉大港位于中东和远东之间，地理位置极佳，并且几个世纪以来曾是最有吸引力的货物集散港，但它的未来并不确定。

随着中国在邻近的缅甸修建深水港口设施，未来的几十年将会看到缅甸的卡车运输服务于孟加拉国的这个地区。达卡的民选政府已经在位15年，但在吉大港并没有什么政绩。没有大规模的疏浚，也没有新的公路网。历史将会南移至缅甸。达卡是统治吉大港的指令的发出之地，但它却抛弃了吉大港。

私人公司也可以疏浚并升级港口。尤其是中国人，已经瞄准了吉大港，正在帮助修建集装箱港口。一天早晨，我看到当地的工人们涌入一家韩国公司的建筑内，这家公司有一大片靠近港口的土地，这里有韩国标准的效率和精密的构造等。黄麻、纺织品、皮革、茶叶和冷冻鱼类，从这里出口到韩国，而孟加拉国的劳动力则加工用于出口到世界各地的运动服装，他们的工资相对于韩国国内的工资要低。政府的失败并无必要导致哪怕是边界的虚拟改变，但却让自身的责任让渡给了私营部门。

印度和中国正紧张地注视着孟加拉国的命运，因为孟加拉国是21世纪两个崛起中的大国之间重新建立历史性贸易路线的关键。正如吉大港的律师所暗示，这条路线将穿过缅甸和印度东部地区，需要先横越孟加拉国，然后才能到达加尔各答，使中国封闭的西南地区获得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通向孟加拉湾和广阔印度洋的通道。

这种情况能否发生，或许取决于环境与达卡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稳定的孟加拉国是这条贸易路线所必需的，尽管这条贸易路线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正是语言和文化的融合这股超越边界的全球统一的力量，使地图上的许多界线最终都变成了未定界线。

事实上，在我从吉大港顺着孟加拉湾与印缅边界之间一条狭长的地带南下的过程中，我所听到的全是缅甸难民以及由他们引起的麻烦。孟加拉国的东南部地区，深陷缅甸的现实影响之下，而缅甸——一个高压的军事国家，深受种族问题困扰——遭受劫难的日子似乎也并不遥远。孟加拉国的这个遥远偏僻之地，几乎标志着印度—欧洲文明的终点，也是亚洲堡垒的东端，在这里，外来的波斯语仍然与当地语言整合为一体。在这里，孟加拉国并不是一个“肢体不全的废人”，而是一个逃离更加动荡与混乱的缅甸的避难之所。

稻田纵横交错，长而尖的绿色植物缠结而杂乱，刚直的香蕉树叶刺破了天空中的云幕，气球形的木菠萝倒挂于树上，这个半没于水中的景色更像是东南亚，而不是印度次大陆。这里的一切都是乌黑的和雾状的，仿佛是从泥水中筛出来的。许多稻田是光秃的，成为盐化的牺牲品。

代格纳夫（Teknaf）是一个边境城市，河流、海洋与森林汇合于此。在一个肮脏的日光灯照明的房间内，一位警察局局长和

一位情报官员对我抱怨：“所有的罪犯和无国籍的人都来自缅甸，他们强奸、抢劫、乞讨。”由于罗兴亚人（Rohingyas）——来自缅甸西部阿拉干地区（Arakan）的穆斯林避难者——愿意以更低的工资做同样的工作，导致本地的孟加拉国人失业。在这里，穆斯林的团结正在削弱。一个地方政客告诉我：“罗兴亚人参与武器走私、毒品贩卖等各种形式的犯罪，如果你抓到三个罪犯，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罗兴亚人。”

在孟加拉国的东南部地区，有25万左右的罗兴亚人，其中成千上万的罗兴亚人待在难民营中。据谣传，沙特阿拉伯的非政府组织正在招募罗兴亚人参与恐怖主义项目。一个当地人甚至声称，“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雇用一个罗兴亚人去杀任何你想杀的人”。这些故事真正告诉我的，并非那些难民是罪犯，而是孟加拉国人厌恶这些罗兴亚人。

罗兴亚人是阿拉干地区佛教、印度教和穆斯林文明这个美丽混血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阿拉干，波斯与印度的影响与暹罗（泰国的旧称）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影响相交汇。缅甸学者、驻联合国官员丹敏吴（Thant Myint-U）写到，由于传统的贸易路线曾辉煌一时的阿拉干，因为目前的孤立以及失去印度洋的世界主义，是导致“缅甸现在贫穷的原因之一”。<sup>①</sup>阿拉干人曾经在西北拥有吉大港，东南握有勃固（Pegu），尽管有一段时间他们曾受到莫卧儿苏丹国以及以曼德勒（Mandalay）为据点的缅甸国王们的压迫与残忍的征服。它历史悠久，在梵文与伊斯兰知识中也饱含其文化。

我参观的位于代格纳夫附近的一个罗兴亚人村庄，是我见

---

<sup>①</sup>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A Personal History of Burma* (New York: Farrar and Giroux, 2006), p. 72.

过的全世界范围内最糟糕的难民营，甚至包括我在最为穷困的非洲看到的。这个村庄收留了大约一万人，有很多小孩子。用竹子和塑料搭建的临时房屋一间连着一间，刚刚过去的热带风暴掀掉了近十分之一房屋的屋顶。痢疾、皮肤病和呼吸道感染是常见的疾病，一位来自“无国界医生”的慈善人员这样告诉我。我被难民围住，他们反复向我讲述发生在缅甸的强奸与强迫劳工等事件，仿佛回到了18世纪晚期，成千上万的罗兴亚人聚集在阿瓦（Ava）的庭院中，为了修建建筑与灌溉工程。<sup>①</sup>罗兴亚人的亚洲人特性并不明显，尽管他们的肤色与孟加拉国人极为相似。他们体现出印度次大陆与东南亚之间在人种和文化上的联系，结果导致不但这里的人歧视他们，连缅甸也歧视他们。只有拥有更加灵活通融的边界的世界，才能使罗兴亚人获得自由。

向北返回吉大港，我乘坐的公共汽车在新形成的一个接一个的沼泽中艰难前行。进入季风季节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没有飓风，没有热带风暴，只有大雨和泥石流，而这已经在近48小时内夺去了120多人的生命。公共汽车在抬高的路面上驶过，黑褐色的污水一直喷溅到汽车顶篷的波纹铁上。在其他地方，男人们在没腰深的水中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笼基。所有的树干都被冲入河中，顺流而下，但桥下的河水仅仅涨了一两英尺。成群的年轻男子聚集在桥上，他们拿着绳子，搜寻着从桥下漂流而过的木柴。不久，他们便堆积了许多木柴，然后进行干燥。就像我所说的，这只是季风季节的开始，进入7月和8月后，将会有更多的降雨。

---

<sup>①</sup>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A Personal History of Burma* (New York: Farrar and Giroux, 2006), p. 110.

社会通常以最为巧妙的方式尽善尽美地解决各种问题。移动电话中一连串的短信，警告前面将有危险；海岸上升起信号旗，预先警告正在来临的洪水。在一些地区，作为越来越先进的早期预警系统的一部分，灾难供应补给已经提前就位。如果发生大的灾难，孟加拉国的陆军和海军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然而，在其他许多方面，是村庄和非政府组织在应对这个自然的世界。



## 第九章

# 加尔各答——下一个全球性城市

低垂的季风云遮住了天空，就像在十一月份的午后。我再一次行走在被垫高的路面上，路的旁边是阴湿的、起泡的绿色水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三轮出租车、稻田、山丘、竹子和木菠萝树。翻来覆去地提到这些，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是仅够维持生计的农业经济，这里的大多数人生活在用竹子搭建的简陋棚屋中，这里的森林被砍伐。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正是这样的一种景象，与中国的情形一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印度洋霸权的继承人——财富的源泉。孟加拉的富庶——拥有大量的、稠密的和努力工作的人口，贮存并生产大量的基本商品，例如稻米、糖、香料、菜油，占公司全部贸易的50%。<sup>①</sup> 同样，由于其纺织品交易，孟加拉也是早期各帝国的财富中枢。“一块如此富庶的土地，它胜过他们全部”，葡萄牙著名诗人卡默斯

---

<sup>①</sup>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1), pp. 220, 272.

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The Lusiads*）中这样写道。<sup>①</sup> 这里是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贸易网络的交会之地，中世纪伊斯兰教在此传播开来，砍伐森林，随后农业得到扩展。就像现在，去森林化以及低质量城市化的扩张，正在导致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宗教信仰的强化。用砖砌成的清真寺千篇一律：形状方正，半球形屋顶，偶尔点缀赤褐色的装饰。学者理查德·M. 伊顿（Richard M. Eaton）对我们说，清真寺造型的灵感来自曲线形的茅草覆顶的竹棚的形状，以及前伊斯兰的佛教寺院的造型。对东孟加拉来说，即使是那些最漂亮的清真寺，也带有某种杂乱狂野的成分，这与季风的严峻考验有关，因为这里接近恒河三角洲。<sup>②</sup>

从孟加拉国的达卡向西南行驶七个小时，公共汽车来到了孟加拉国与印度的边境城市贝纳波尔（Benapole）。成群的乞丐、挑夫、人力车夫在等待着旅客到来，然后便是讨价还价。我选定了一个人力车，来到半英里之外的真正边境，付了相当于50美分的车费。第二个人运送我的行李，用的是一架吱嘎作响的木制牛车。而第三个人则拿着我的护照。关键的一点是，要尽可能地雇用更多的人。我雇用了半打的人。一些人递给我——更确切地说是卖给我——需要填写的表格。尽管存在难以理解的混乱，但这里确实有一个体系。后来，我的护照出现在一个肮脏的棚屋内，已经盖上了印章。一溜儿的工作人员小心谨慎地检查我的护照和行李，似乎一个外国人不坐飞机而乘公共汽车来到加尔各答一定有值得怀疑之处。

---

① Luiz Vaz de Camoes, *The Lusiads*, trans. Landeg Wh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nto Seven; 20.

②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 - 17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2 - 13, 19 - 20, 61 - 62, 313.

一个小时后，我步行通过一扇肮脏的生锈的铁门，进入了印度。在那里，一个同样的、到处是垃圾的车站迎候着我。临时搭建的棚屋，遭受苍蝇烦扰的骨瘦如柴的狗——我小心翼翼，生怕踩到这些狗的身上。在一条小巷中，我紧挨着一个年轻人蹲在地上，填写完入境表格。这个年轻人刚刚给我们散发了表格，他也为我兑换了钱币。边境的两侧，我没有看到一个妇女。

陆地边界暴露出这个国家赤裸裸的现实。有一次从墨西哥过境到美国，仅仅数英尺的距离，我就从一个充满乞丐、斑驳的马路和锈迹斑斑建筑物的世界，来到了另一个与之格格不入、有着精确标准的防护型建筑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来到了一个让人神经高度紧张的发达国家。对于孟加拉国，陆地边界向我展示的并不奇怪——一个饱受贫穷折磨的国家，制度脆弱；然而对于印度，它向我展示的是，印度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还需要走多么长的道路啊！鉴于媒体对印度经济的乐观报道，而印孟边界两侧的情形完全相同，这才是让我最为震惊的。

然而，当我重新登上汽车开始向加尔各答进发后发现，印度的农村比孟加拉国更有戏剧性的变化。孟加拉国绿色植物锦簇，风景仍旧如前，原木堆到处可见。然而在这里我看到，屋顶不再是波纹铁，取而代之的是陶瓦。这里有晒衣绳和盆栽的鲜花，阳台随处可见，尽管有些发霉但很优雅，甚至还有一些山墙窗子，还有实实在在的茶馆。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家庭生活的迹象使孟加拉国的城镇显得破烂不堪，而这种状况还四处蔓延。我注意到，这里的妇女穿着牛仔服，头顶封闭水罐。是的，我不再置身于一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之中了。这里有银行柜员机，并且许多标志是英文。在孟加拉国，人人都讲孟加拉语，所以不需

要像印度一样把英语作为一种交际的混合语，而印度有多种语言和方言。

三个小时后，公共汽车到达了加尔各答的市郊。

英国旅行作家吉奥弗雷·摩尔豪斯（Geoffrey Moorhouse）在描述那些通常肢体不全的人（Brueghelesque）——他们在这个14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到处恳求救济——时评论说，“整个印度都有乞丐，但加尔各答的乞丐规模之大，其他地方望尘莫及”，<sup>①</sup> 这个城市的名称本身就让人联想到绝望。“加尔各答”（Calcutta）这个词取自“迦梨”（Kali），迦梨是印度教的疾病、死亡和毁灭女神。在18世纪中期强化了英国对孟加拉统治的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把它称为“世界上最坏的地方”，<sup>②</sup>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把它称为“恐怖的黑夜之城”，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印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则说它的“巨大而发抖的贫民窟”对英国的统治是个耻辱。<sup>③</sup>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则在《欢喜城》（*The City of Joy*）中对加尔各答当代的贫穷做了详尽的描述。<sup>④</sup> 正是在加尔各答，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花费了毕生的精力照顾着穷苦之人，这进一步证实了加尔各答的极端凄惨的状态。

然而要评判一个地方，所有的一切，还要看到达这里的游客来自何方。从邻国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乘汽车来到加尔各答，

---

① Geoffrey Moorhouse, *Calcutta: The City Reveal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p. 93.

② Geoffrey Moorhouse, *Calcutta: The City Reveal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p. 18.

③ David Gilmour, *Curzon: Imperial Statesm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4), p. 145.

④ Dominique Lapierre, *The City of Joy* (New York: Doubleday, 1985)

就像冷战期间我几次从东柏林进入西柏林一样。在这里，灰色已经褪去，没有了达卡的锈迹，全球性产品的巨大广告牌在夜幕中发光，就像电脑屏幕一样。在达卡，吱嘎作响的老式两轮出租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在加尔各答，老式过时的汽车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这里有结实的黄色大使牌出租车，有小巧而敏捷灵活的印度制造的风神牌家用轿车（Maruti）（带有反应转换装置，通常还带有一个天然气贮气罐），当然也有许多豪华的交通工具。

然而，在加尔各答看到的出租车，向我们展现的画面是标志性的剥削的景象，比在达卡看到的任何景象都更糟糕：一个人并不仅仅是被另一个人运送到某处，而是被一个实际上自己也拼命地爬上山坡的人运送的，他就像一只赤足的动物，吃力地拉着他的出租车。

加尔各答也是令人厌恶的。有一天，我走出一家窗子上胡乱地贴着信用卡标签的漂亮的“espresso bar”（意大利浓缩咖啡），这家咖啡馆供应一种兼有印度和世界混合风味的摩卡饮料和干酪蒂卡（paneer tikka，一种印度食物，包括干乳酪和肉丁）。当我离开空调房间来到酷热的街道上时，我小心翼翼以免踩到睡在街边人行道上的一家人。这家人就睡在放于人行道上的硬纸板上，而这里的人行道也是男男女女撒尿的地方。一个年轻的男人尾随着我，过了几个街区，我仍未能将他甩掉。就像纪录电影制片人那样，他将“场记板”放在我的面前，并且拼命地恳求我雇用他。“先生，我知道我这样侵犯了您的隐私，但我还能怎么做呢？也许您很生气，我不会再烦扰您，但您要给我一个工作。”他穿着破旧，但整洁而利索，试图给我留下好的印象。在美国，我们可以充分享用厂家和募捐者邮寄的各种邮件和电话销售，我们既可以撕掉宣传单，也可以直接挂断电话。但在加尔各答，这



些你并不需要的恳求，却以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方式显现在你面前。这里的街道恳求，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推荐。看来，逃避是不可能的。

加尔各答的情况说明，贫困既不是奇异的，也不是迷人的。贫困可以是呆滞的，麻木的，没有意义的，单调而无聊的。穷人与死人一样，除非他们以“可憎的方式”与你正面遭遇，否则他们是不可见的，就像一个“敞开的坟墓”。威廉·沃尔曼（William T. Vollmann）在他的《穷人》（*Poor People*）一书中这样写道。通过有意的重复，《穷人》向我们展示出，贫穷是多么的悲惨和多么的索然无味。贫穷不是奇异的，它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它就是可怕的糟糕。<sup>①</sup>

种姓制度（caste system）以一种反常扭曲的方式，赋予一个人某些权利，因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困的耻辱。20世纪中期的法国印度学家玛德琳·比亚尔多（Madeleine Biardeau）写道：“印度人的个体只存在于他所在的种姓内部，在种姓之外，他便失去了自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一个不存在的人。”她解释说，在传统的印度，“人本身什么都不是”。即使是那些拥有大房子的人，家庭成员也倾向于居住在同一间房屋，其他房间则空闲着。“恐惧是使他们居住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一种不能解释的无名的恐惧；其实相当简单，就是恐惧独处。”

尽管这些词语是比亚尔多在50多年前写的，但她预见到了未来。因为种姓制度深深地根植于村庄中，它最终将不能在城市地区得以延续。在城市，因为缺少生存空间，家长制的家庭将

---

<sup>①</sup> William T. Vollmann, *Poor People* (New York: Ecco, 2007), pp. xiv, 111, 123-124, 239.

“越来越少”。<sup>①</sup> 羽翼丰满的个人认同的成就还没有达到，但种姓制度已经被淡化，印度将出现几十年的喧嚣状态，新的以及更加激进的群体认同——例如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激进的伊斯兰——将填补由此造成的空白。

加尔各答的扩张性贫穷阻止了嬉皮（hippie）在这里的发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之风席卷了整个亚洲，从恒河流域向东到达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Varanasi），然而并没有继续向东到达加尔各答，而是折向北方，到达尼泊尔的加德满都（Kathmandu）。摩尔豪斯在《加尔各答：重现之城》（*Calcutta: The City Revealed*）一书中写道，“只是一面之交”，这个城市“就足以摧毁对温文尔雅和兄弟之爱的所有浪漫的憧憬”。<sup>②</sup>

孟买贫民窟容纳的贫民数量是加尔各答贫民窟的四倍还多，因而实际上孟买贫民窟的状况可能更为糟糕，但孟买贫民窟与比较富裕的城区是相互隔开的。然而在加尔各答，由于城市地理因素，避开穷人简直太困难了，乞丐和贫民窟的居民（street people）几乎遍布整个城市。

六月季风刚刚开始的日子，是体验加尔各答的两个相互分离的不平等的世界——有空调的世界和无空调的世界——的最佳时间。在这个时期，通常是令人窒息的酷热过后，大雨倾泻而下。有空调的世界，也是一个具有向上趋势和世界文明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构成了街道悲惨的现实。街道边，大约150万加尔各答人与空调咫尺之隔，但他们在有生之年也不可能享受到空调的惬

---

① Madeleine Biardeau, *India*, transl. F. Carter (London: Vista, 1960), pp. 65, 73.

② Geoffrey Moorhouse, *Calcutta: The City Revealed*, p. 128.

意。通向“爱思巴苏咖啡馆”的门，或者通向陈列着企鹅出版社（Penguin）平装书的迷人的书店的门，形成了一道难于跨越的边界，就像地图上画出的边界一样。

在加尔各答的北部，人行道被数英里长的用防水油布和粗麻布搭建的坡形棚屋占据着。每个棚屋里都生活着一家人，大孩子照看着小孩子，母亲们做女佣，而父亲们则做建筑工人。这样的景象看起来很悲惨，但如果你蹚过人群，穿过半开的门或在这道链条下方，就会发现另一个加尔各答：迂回曲折的美丽的被废弃的宅第。这些宅第是由18、19世纪印度王公（rajahs）和商人建造的，墙体因日晒雨淋而变成黑色；建筑砌砖复杂，具有伊斯兰、印度教和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廊柱庭院爬满植物。其中最大的就是大理石宫（Marble Palace）。在大理石宫阴暗的房间里——感觉像是一个连着一个的肮脏的蒸汽浴室——挂着积满灰尘的比利时镜子，摆放着古典的雕像和中国的花瓶，悬挂着水晶玻璃的枝形吊灯，此外，还有鲁本斯（Rubens）绘制的四幅画、水烟筒，以及平板画等。就像这个杂乱无章的、各处似乎都要冒汗的大理石宫一样，加尔各答是一个腐烂的且异常混乱的城市，贫穷只是它的外表而已。

人行道生活的恐怖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加尔各答真正的故事，还在于它转变为一个世界性城市。移民国外的人返回家园并投资大型购物中心和饭店，在此过程中执行他们从西方学到的服务标准。2008年初，在加尔各答南部，一个90万平方英尺的大型购物中心开业，这是印度最大的购物中心。在城市东扩的过程中，出现了20家新的多厅电影院。豪华的公寓，例如“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和“银泉”（Silver Spring），也不断地出现在靠近城市中心的位置。城市规划员桑陀什·高师（Santosh Ghosh）解释说：“如果你认为英帝国是第一个走向全球化的国

家，那么加尔各答——当时作为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首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和植物园——就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当时的新加坡和吉隆坡还是村庄。现在，加尔各答终于再一次处于追赶的进程中。”

在冬天的回访中，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混居的加尔各答正在欢庆圣诞节，我从中看到了全球化的精髓。街道挂满了彩灯，到处都在卖装饰品，制作印度教神灵的作坊也用泥巴和稻草造出真人大小的圣诞老人。在平安夜，成千上万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加尔各答人聚集在圣保罗教堂。这是一个19世纪由英国人建造的哥特式教堂，有无数的墙饰，以纪念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统治数百年期间所发生的各种战役和冲突。圣诞的世俗化，以及对英国遗物的一丝模糊的怀旧情绪，使这里的节日带有一种国际性氛围。

加尔各答的变化步伐仍没有中国的快，但它已经进入了正确的轨道。除了到处存在的穷人，加尔各答也有中产阶级。现在，由于其消费主义的购物狂热，人们可以更容易地看到中产阶级。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一份最新的研究指出，印度消费者的自由花费占平均家庭消费的比例已经从1995年的39%上升为2005年的52%，到2025年，这一比例有可能上升到70%。什卡·慕克吉（Shikha Mukerjee）管理着一个非政府组织，并一直生活在加尔各答。他认为，相比之下，上层人士过着一种不够安全但更加疯狂的生活，那种有着仆人的悠闲的富裕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此同时，家庭轿车也在增多，这导致了我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感受到的更加持续的交通堵塞，与雅加达（Jakarta）同样严重，且比德黑兰（Teheran）、曼谷（Bangkok）或开罗（Cairo）更为严重。

“主要的变化并不是那些迷人的大型购物中心，而是那些低档的商品中心，”慕克吉接着说道，“人们自己创造就业，他们

修改服装、修理器具，等等。我有一个裁缝，他每天从偏远的贫民窟来到人行道上占据一个地方摆开缝纫机，而他的顾客则来到这里找他。裁缝告诉我，他正在攒钱。这就是近一段时间的加尔各答。”事实上，在人行道上，有出售面条和咖喱菜肴的汤屋。它们在这几年的扩展说明，一个已经摆脱了极度贫穷的低层中产阶级正在上升，而他们在工作日需要这些廉价的膳食。

“锡亚尔达（Sealdah）有我的隐私，一个童年时代的梦魇”，苏坎塔·乔杜里教授（Sukanta Chaudhuri）告诉我。锡亚尔达是一个火车站，在20世纪40年代印度分治后，这里收留了成千上万的从伊斯兰的东孟加拉过来的印度教难民，这些难民极度贫困，无处可去。即使是在今天，锡亚尔达火车站也是一个令人紧张不安的地方。这里是所有从欠发达的印度东北部来的火车的终点，成群的旅客被卸在站台上，与站台上另一些携带手提箱的人群显然格格不入。

“但是你知道吗，”头发灰白的英语教授说道，“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能在某处安顿下来。他们并没有死去，也没有去乞讨。并且，即使是现在，也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乔杜里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人解释说，加尔各答的街道并不是一个尽头，而是一个通往劳动阶层的中转站，这有点儿像土耳其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但印度比土耳其要贫穷得多，因而这个中转站相对要严酷一些。“如果我每隔十年返回一次，会发现这里的贫穷仍旧如前，因而会想，这里没有任何变化。但街道上的人们是不同的。他们来自北方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以及孟加拉国，没有生活之所，在街道上还可以赚到点儿，甚至能存点儿钱，然后再离开。”与贫穷一样，机会也改变着贫民窟。事实上，如果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存在某种趋势的话，那就是断断续续的转变——以它自己的将日渐破败的市区改造为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的方



式，将用泥（kutchā）、粗麻布和厚纸板（jhupri）制成的临时房屋改造成永久的混凝土（pucca）房屋。整个地区的面貌正在改变中，加尔各答看起来并不像是狄更斯（Dickens）笔下描述的梦魇，它更像是另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尽管贫富差距悬殊。

然而，我还是不确定，也感到不舒服。对我来说，仍然会不假思索地否定加尔各答的街道是一个通往更高阶层的有益的中转站。毫无疑问，在很多时候，它确实如此，然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它并非如此。加尔各答的街道说明，尽管印度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主要国家或至少是一个地区大国，但它仍是一个包藏着苦难故事的麻烦国家。

从一定程度上说，用我熟悉的西方式分析来看，加尔各答经常是这样一派景象：这个地方的社交活动嘈杂、没有感情，惨不忍睹的贫困状况带来的视觉冲击令其黯然失色。在《那些日子》中——一个关于19世纪加尔各答的详尽的普鲁斯特研究，孟加拉国诗人苏尼尔·甘歌帕德亚（Sunil Gangopadhyay）写道：

大的、小的以及中等的房屋在整个城市迅猛增长，以容纳那些新生代的务工的巴布们（working babus，对男人的尊称，意为先生），他们精神饱满地从乡村移民而来。纺织工、理发师、洗衣工，以及榨油工随之而来，以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求。不仅仅是在孟加拉，在奥里萨、比哈尔甚至遥远的北方邦，永久性的定居已经剥夺了许多贫穷农民的土地。那些成千上万的失地劳动力蜂拥来到城市周边，随时准备从事任何形式的仆人工作……<sup>①</sup>

---

① Sunil Gangopadhyay, *Those Days*, transl. by Aruna Chakravarti (New York: Penguin, 1981, 1997), p. 581.

在一个始终不可能回避穷人的穷人的城市里，城市割据——伴随着卫星城和封闭社区而形成的经济阶级的分层——最终让回避最穷的人变成可能。这个新兴的向上移动的阶层倒不是特别地惧怕犯罪，因为加尔各答尽管贫穷，仍是一个相当安全的城市。这有点深奥。在这里，财富在过去往往是私密的，但新富裕阶层现在则想炫富，而这会反过来导致一个过去并不存在的安全问题。因此，富裕的人需要躲进受到保护的小区，在这里他们可以展示自己的财富。随着封闭社区的出现，对私人安全守卫的需求呈爆炸性增长，而这些私人安全守卫本身也成为新富阶级的一个符号。

在规划社区时，还有一个动机。正如乔杜里教授告诉我的，“新的上层阶层害怕见到丑陋的东西”，他们想从街道上遍布的穷人中“净化出自己”。他们只想看到那些同样富裕的人，总是表现出穷人是不可见的，而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来真正实现这一点。

那些新富阶层极力躲避加尔各答的街道，那些街道是大都市中的农村生活的生动表现：妇女们在人行道的抽水泵前排起了长队，就像在农村的水井前排队一样；在村子里，家庭生活暴露于房门之外，没有隐私的概念，没有浴室，做每件事情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而由于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比较热，生活在街道上的人通常也是半裸，洗漱之时毫无尴尬之意。

总之，当加尔各答的新富淡化了其印度人的身份特质，他们便越来越不能容忍城市街道上所展现的印度乡村生活。然而，只要这些被迫生活于街道上的人拥有通往上层的机会，他们就会继续从附近饱受贫穷折磨的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流向这里。尤其是这里的新建筑吸引着廉价劳动力。

然而，这些继续生活在街道和贫民窟（bustees）的人，也

妨碍了政府新卫星城和封闭社区计划的实施，尤其是妨碍了目的在于吸引诸如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外国投资的经济特区（SEZs）的发展。在西孟加拉邦，共产党执政三十多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共产党政府。然而，为了争取那些对其中央集权政策不满的选民，孟加拉的共产主义者被迫走上一条程度更甚的中国式私有化道路。在西孟加拉邦，处处可以看到为发展项目而征收土地，这已经在加尔各答导致了暴力示威活动。在一次事件中，车辆被焚，挡风玻璃被打碎，人群投掷石块，结果是政府出动军队沿街道巡逻。需要军队恢复一个大城市的和平，这在近些年中并不多见。

当然，在中国，也许征收土地更为容易。因为当地政府可以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做事，并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民主的印度，尤其是在加尔各答，这行不通。德里曾长期处于莫卧儿皇帝的统治之下，而加尔各答只是英国人于17世纪晚期在热带沼泽上建立起来的一个贸易前哨，并且始终是一个社会矛盾的冲突之地，而这种冲突趋势又被工业革命进一步激化。工业革命时期，加尔各答出现了大量的黄麻和纺织工厂，拥有全国最多的钢铁工业，最终导致西孟加拉邦成为印度的鲁尔（Ruhr）。拉马斯瓦米（V. Ramaswamy）——一个总部设在加尔各答的商务主管和基层组织者——告诉我说，加尔各答始终处于印度贸易工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心，“在加尔各答继续驱逐穷人只会导致暴动和破坏性暴力事件的爆发”。至于对加尔各答成为世界性城市的热切期望，其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转变过程不可能是完全平和的。例如，2006年12月，西孟加拉邦政府认为两轮人力车（rickshaw）是“不光彩的工作”并试图取缔时，城里的一万八千名车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加尔各答，或许仍将是一个冲突的城市。

2001年，“Calcutta”（加尔各答）被正式更名为“Kolkata”，这反映了本地的孟加拉语发音。对于在“Calcutta”概念中成长的几代人来说，这个新名称极为别扭，因为它既不能唤起对英国统治的回忆，也不能使人联想到这个城市声名狼藉的贫穷。尽管那也许会更好。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化已经大大地鼓舞了地方主义。“Kolkata”，作为一个面向印度东部、孟加拉国、缅甸和中国西南部的新的全球货物集散地，也许仍会流行起来。古代和中世纪的贸易路线再次受到重视，而且加尔各答也正在慢慢地重新获得其1947年印度次大陆分治——建立了东巴基斯坦，也就是后来的孟加拉国——后所失去的中心地位。特别是，中国的西南地区没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其最近的出口是孟加拉湾。然而在中世纪，茶叶、马匹和瓷器贸易都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进行的，目前，缅甸和孟加拉国出口天然气到中国 and 印度，印度有铁矿石出口到中国，而中国则有各种各样的制成品出口到印度。尽管两国之间海军的紧张对峙气氛在增加，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样的连接交往也许会形成一个包括印度、中国、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天然气联盟”。

城市规划员莫尼蒂普·察托帕得哈亚（Monideep Chattopadhyay）告诉我说，“加尔各答会再一次成为印度通往东南亚尤其是通往中国的门户”。在印度，加尔各答是唯一一个有中国城（Chinatown）的城市。2007年，加尔各答设立了一个中国领事馆。新机场也会允许中国佛教徒香客经过加尔各答到达位于比哈尔邦的圣地菩提伽耶——释迦牟尼悟道成佛之处。这些纽带尤其是陆路联系重新获得生机，将会使饱受叛乱之苦的印度东北部地区获得开放。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暴力和欠发展状态在加尔各答的贫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实际上依靠抢劫加尔各答繁荣的偏远地区维持着自己的居民，而不是迫使其中的许多人由于赤

贫而移民到邻近的大城市。

加尔各答亚洲研究所 (Maulana Abul Kalam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研究员金苏克·查特吉 (Kingshuk Chatterjee) 说,“加尔各答有可能成为印度的哈佛”。他认为,加尔各答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是全国最好的,而孟加拉人在孟买和德里最好的大学中都各占有一席之地。他说,现在需要的,就是西孟加拉邦执政的共产党左派联盟停止按照自己的政见在地方大学中实施行政任命。高水平的教育有可能使加尔各答发展成为另一个印度信息技术中心。“忘记特蕾莎修女吧,想一想信息技术以及那些拥有可支配收入的年轻人”,一个地方新闻记者这样喊道。

对于加尔各答来说,这种最夸张的愿景不是没有可能实现的,因为目前,这个城市有一种其他印度城市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极度缺乏的东西,那就是充足的淡水。与达卡一样,加尔各答位于广阔的孟加拉河口三角洲之上。真正了解这一点,与从字面上去体验它,是绝对不同的。这种不同的体验正如我在从孟加拉国乘汽车来到加尔各答后,选择乘船从恒河的一个主要支流胡格利河 (Hooghly River) 返回加尔各答。乘船每到一地,都会给人一种特别的感受,对于加尔各答尤其如此。加尔各答位于胡格利河东岸,这里与其他沿河城市不同,尽管有沿河的台阶,但并没有海滨长廊;没有西濒阿拉伯海的孟买那样迷人的温暖海洋的味道。然而,没有胡格利河,这里也就不可能有加尔各答。

在河流专家高塔姆·查克拉布尔蒂 (Gautam Chakraborti) 的帮助下,我用了相当于 340 美元的价格,在闹市区附近的奥特拉姆 (Outram) 码头租了一条 47 英尺长的木船。这是一次恍若时光倒流的旅行。加尔各答位于孟加拉湾以北 60 英里,随着城



市的发展，港口不得不阶段性地向海洋方向移近，寻求更深的港口以适应越来越大的货船。因此，原来的河边笼罩着一种被遗弃的氛围，然而在过去，它是繁忙的。河两岸成片的绵延开来的棕榈树和孟加拉榕树非常醒目，远处城市的景象若隐若现。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出，加尔各答曾是最早的贸易港口，当时的孟加拉是世界上最大的蚕丝产地，比波斯和中国还要早。数百艘桅杆帆船——包括从美洲来的斯库纳纵帆船（schooners）和从中国远道而来的船——经过加尔各答并往返于胡格利河上。就是在此处的河岸上，18世纪和19世纪曾建造了大量高桅长帆的快速帆船，将鸦片从恒河上游的巴特那（Patna）和比纳里斯（Benares，瓦拉纳西的旧称）经过新加坡运往中国的珠江（Canton River）和香港。<sup>①</sup>

1530年，第一批葡萄牙船队顺胡格利河而上，他们从事棉花和布匹生意。后来，沿河出现了许多葡萄牙人的居住点，特别是在胡格利河的沿岸港口以及赫吉利（Hijli）。到1628年，有多达上百艘的葡萄牙人商船载着稻米、黄油、食油和蜡往返这些港口。葡萄牙人对沿海的孟加拉拥有微弱的优势，在孟加拉省东部的吉大港设有一个办事处。为了对抗葡萄牙人，荷兰人、丹麦人、法兰德斯人以及法国人不久也从德里的莫卧儿皇帝那儿获得了沿河进行贸易的许可。英国人也挤进了这个进程，尤其以约伯·查诺克（Job Charnock）为代表。查诺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本地地区的资深代理人，一个基本上已经入乡随俗的

---

<sup>①</sup> Basil Lubbock, *The Opium Clippers* (Boston: Lauriat, 1933), pp. 13 - 14, 16 - 17, 28. For an example of the profits, opium purchased for 70 rupees in Bengal could be sold for 225 rupees in Batavia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See 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 - 1800* (London: Hutchinson, 1965), p. 228.

经验老到之人，他接受了印度文化并与一位印度寡妇结了婚。在其亡夫的葬礼上，在寡妇按传统殉夫自焚（sati）之前，<sup>①</sup>查诺克救下了她。查诺克试图为公司在孟加拉建立一个未来有可能发展成为马德拉斯（Madras）或孟买那样的贸易据点，经过一连串的失败后，终于在1690年在胡格利河东岸的河湾处——现在的加尔各答所在地——建立了一个贸易站。这里的海拔高度足以抵御洪水。

事实上，加尔各答仍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比欧洲殖民者建立的魁北克（Quebec）、詹姆斯敦（Jamestown）和圣达菲（Santa Fe）还要年轻。加尔各答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投机之地，它没有经历中世纪的发展阶段，而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建筑与文化不仅给欧洲的城市，还为亚洲和次大陆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优雅气质。在加尔各答，穷困和财富可谓泾渭分明，而这种状态在印度其他大而古老的城市很难见到。

加尔各答的历史就是胡格利河的历史，一侧是加尔各答，另一侧则是豪拉工业区（Howrah）。透过河岸上的灌木丛，可以看到被废弃的古老的英国式花园洋房。放眼望去，处处都是悠闲的田园生活景象——人们在河边台阶上淋浴、洗衣服。位于加尔各答一侧的苏里南码头（Surinam Dock）是一个空旷之地，勾起了人们对这个地方曾受奴役的记忆。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契约劳工，也就是奴隶，在19世纪被运往位于南美洲北部海岸的圭亚那（Guianas），并且在加勒比盆地形成一个印裔散居区。巨大的头巾帽形状的碇泊桩倾斜着插入水中，锈迹斑斑，早已废弃不用。加登里奇码头（Garden Reach）曾经是闹

---

<sup>①</sup> Simon and Rupert Winchester, *Calcutta* (Oakland, CA: Lonely Planet, 2004), p. 32.

市码头之一，但现在已经变黑、坍塌，成为废墟。过去的黄麻作坊现在已经被森林覆盖，黄麻工业已经转移到孟加拉国。胡格利河看上去是如此的平静，就像一个烟雾缥缈的静物画，尽管实际上它并不平静。前往孟加拉湾的大部分路程都需要向导。七英尺的大潮从孟加拉湾逆流而上，隐藏的沙洲使它变得异常凶险。尽管胡格利河流经加尔各答的部分有四分之三英里宽，但适合航行的河道很窄，那些暗藏水底的沉船则进一步恶化了河道的通航状况。

来自缅甸和马来西亚的货船迎面驶来，这些货船满载圆木。随后，我们又经过一个带有传统液压起重机的传送船，它航行在河流的豪拉工业区一侧。而带有龙门起重机的大型货船则不能向北上行到这里，因为这里的河床太浅，它们要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将集装箱转到传送船上。由于新的更靠近孟加拉湾的港口的出现，闹市区的码头尽管仍然存在，但规模已经变小。这些新出现的港口相互之间相隔几英里，加尔各答被认为是一个拥有不同吃水深度的港口，最大和最深的港口是位于孟加拉湾附近的霍尔迪亚港口（Haldia）。随着城市的扩展，钻石海港（Diamond Harbor）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航运工业区。

在距离城市几英里远的河流下游，胡格利河变宽，变成一个与亚马孙河规模一样的内海。按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eay）的话说，在一片“令人作呕的翠绿”中，这里的文明沦落到最低的限度：除渔村外一无所有，还有一条条小木船搁浅在棕榈树林掩映的岸边。<sup>①</sup> 高级文明的唯一迹象，就是位于两岸的

---

<sup>①</sup>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 193.

几乎延伸到孟加拉湾的一个个砖窑，这些砖窑为加尔各答的日益扩张提供了建筑材料。即使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已经威胁到大城市的生存，但加尔各答充足的淡水资源满足了它的扩张需求。由于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2007年巴厘岛气候变化会议将加尔各答列为最易受到沿海洪灾和风暴潮威胁的十大城市之一。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到21世纪末期，在最易受到威胁的十大城市中，加尔各答将上升到首位。

在英国的铁路系统于19世纪后半期在印度得到扩展之前，很多时候需要乘船从孟加拉湾沿着胡格利河北上才能到达加尔各答。除了那些砖窑外，河水和丛林等景色也许与现在没什么不同。因此，当我乘船沿着越来越宽的河面继续南下，在接近钻石海港后掉转向北然后返回加尔各答时，不禁想到了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他是加尔各答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或许也是最为生动的人物，当初，他也是沿着这条河流北上首次来到加尔各答的。

并不仅仅是由于同一条河流，才让我联想到克莱武，更重要的是他是我思路的一个最佳对应。乘船旅行是一堂生动的课程，告诉我们地理是多么的重要。事实上，21世纪印度洋的中心地位是由其地理位置和人口因素决定的。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知道，历史是否仅仅是巨大的客观的力量——地理的、文化的、经济的以及技术的力量——的结果吗？或者说，历史是否也是那些普通的和杰出的人物——这些人在很多情况下以绝对优势成功地克服了那些客观力量——的记录？历史是否还是一种好运与不幸的记述？就像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所指出的，他只赞成依靠能力（Virtù，能力的含义包括道义上的优越性），而不是依靠幸运成为君主，这一点很重要。罗伯特·克莱武爵士的生涯——好运与不幸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个体理论”的生动阐释，否定了巨大的客观力量决定未来这一信条。<sup>①</sup>

事后来看，由于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在整个印度洋范围内的海洋权力上升，大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如果没有克莱武爵士，英国能否以曾经的方式获得对印度同样程度的控制，想必是值得商榷的。人们甚至认为，没有克莱武的个人魅力，英国根本不可能控制印度。克莱武的事例证明，不应该向命运屈服，一切皆有可能。

对克莱武一生最重要的记述是由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于1840年写的长篇随笔，这时几乎是年轻的克莱武占领加尔各答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sup>②</sup> 麦考莱的随笔很长，仿佛时下杂志的封面故事。但随笔看起来丝毫不过时，并不是由于它的主题，而是那种沉稳而自信的韵律。

正如麦考莱告诉我们的，克莱武于1743年起航来到印度，18岁的他服务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而此时的印度正处于政治混乱之中。在广袤的次大陆上——北至南纵贯两千英里（比哈德逊湾到墨西哥湾还要宽），东西横跨一千五百多英里（几乎是纽约到丹佛的距离）——莫卧儿王朝处于完全的混乱之

---

① 艾略特（T. S. Eliot）使用过“巨大的个人力量”（vast impersonal forces）一词。See Isaiah Berlin's essay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Four Essays on Liber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② 由 Preston C. Farrar 编辑的麦考莱的随笔 *Essay on Lord Clive* 于1840年出版，1910年重印。从许多方面来看，克莱武对印度表现出一种屈尊俯就，参见 Salman Rushdie, *The Moor's Last Sigh* (New York: Pantheon, 1995), p. 376; 关于克莱武的整个生平，参见 Robert Harvey, *Cliv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British Empero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中。在成为独立的世袭领地集合体的过程中，许多领地遭到了马拉特人的围攻。马拉特部落战士不仅占据着孟买东部的山区，纵横于整个德干高原之上，而且以海盗式的海军称雄印度西海岸。麦考莱写道，这块混乱的大陆居住着十倍于阿兹特克（Aztecs）和印加（Incas）——西班牙人征服了这两个地区——的人口，这里的文明程度甚至与西班牙人自己的文明程度一样高。<sup>①</sup> 因此，很难相信单一的来自地球另一面的外部势力有一天将会支配这些精明的人。<sup>②</sup> 然而，克莱武，一个充满领导魅力、活力四射、情绪化、作恶多端并且无所畏惧的人，却能够做到。

克莱武在加尔各答的胜利始于马德拉斯（Madras）。在马德拉斯，21岁的克莱武担任书记员，是东印度公司中职位最低的岗位。由于英国与法国和被称为卡纳蒂克（Carnatic）<sup>③</sup> 的印度东南部当地王公之间爆发战争，克莱武便加入军队。正是这些黑色土地上的战争，使欧洲贸易公司凭借自身的实力变成了拥有领土的强权。实际上直到此时，心怀在莫卧儿王朝废墟之上建立欧洲帝国野心的，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个名为约瑟夫·弗朗索瓦·杜普雷克斯（Joseph Francois Dupleix）的法国人。杜普雷克斯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使自己和他本国的代理人成为南部印度的主人。几年后，杜普雷克斯开始从抚慰本地势力转变为用武力夺取

---

①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edi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roduction by Preston C. Farrar (1840; reprint,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0), pp. xxx, 3, 16-17.

② 然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克莱武征服了孟加拉，英国对次大陆的掌控主要局限于北部印度、孟买以及卡纳蒂克海岸的平原地区。有一段时期，印度南部的其他地区还处于封建以及马拉他人联邦的割据状态下。

③ 据一种解释，Carnatic 一词可能来源于当地德拉威语（Dravidian）词汇“kar”（黑色的）和“nadu”（国家），意指这一地区的黑色土地。

他们手中的权力。<sup>①</sup> 而且，这一时期也是欧洲对本地民众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时期，在欧洲，战争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而在印度这样的地方，战争仍是一种游戏。<sup>②</sup>

对法国统治构成唯一障碍的是切西纳普里（Trichinopoly）要塞，要塞距孟加拉湾 70 英里，被英国的代理人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占据着。1751 年夏季，在法国的协助下，杜普雷克斯的同盟者春达·萨希巴（Chunda Sahib）对要塞进行了围困。情势是可怕而危急的。麦考莱写道：“此时，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英国年轻人（克莱武）的勇气和天赋，瞬间扭转了命运的形势。”<sup>③</sup>

克莱武指挥着两百英国士兵和三百印度佣兵（服役于英国军队的印度本国士兵），但他并没有向要塞进军，而是在一场闪电风暴中挥师攻打阿喀德（Arcot）的首府，迫使春达·萨希巴从切西纳普里增援阿喀德，由此来保存英国的力量。但法国人立即围困了阿喀德，而克莱武以及他的随从们只能坚守在城堡中。克莱武的防守力量有限，正如麦考莱所描述的，城墙被毁，沟渠干涸，防御的壁垒太窄小以致不能容纳他们的枪支。当死亡和饥饿开始蔓延时，这一小队人马对长官克莱武的忠诚，甚至超越了恺撒的第十军团（Tenth Legion）或者拿破仑的旧羽林军（Old Guard）的忠诚度。<sup>④</sup>

虽然缺乏训练，但克莱武天生就是一个军事天才，因为带兵

---

①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 289.

②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 281

③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 22.

④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p. 24 - 25.

的关键就是领导才干或者无畏的决心，也就是说，拥有将士兵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能力，尤其是在困境之中。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交战或对峙中，扭转战争平衡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即兴发挥和纯粹的运气。<sup>①</sup> 克莱武运用智慧和忍耐力，在阿喀德成功地坚守了 53 天。26 岁的克莱武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独自扭转了与法国人交战的不利形势。马德拉斯及其所辖的领地不久就是大英帝国的了。

1753 年，克莱武得胜返回英格兰。而年纪两倍于克莱武的杜普雷克斯——同样的杰出，同样的老谋深算——则于次年羞辱地回到法国，被剥夺了可观的财富，后来默默无闻地死去。

1755 年，克莱武再次起航前往马德拉斯，并于次年到达这里，掌管圣戴维堡（Fort St. David）。他的任务就是完成对那里的法国人的驱逐，然而他却深深地卷入远至孟加拉北部地区的事务。这一地区是印度最为富庶的地区，曾是莫卧儿人发动对德干地区战争的主要经济来源。麦考莱在其无与伦比的散文中写道：

在那些曾经臣服于帖木儿家族（the House of Tamerlane）的省份中，最为富庶的就是孟加拉……恒河经无数水道注入海洋，形成广袤的细而松软的平原，即使是在热带的天空之下，深绿色平原就像在生机盎然的英国的四月。稻田的产量在上升，香料、蔗糖和菜油的产量也是惊人的，河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鱼类……这条伟大的河流不仅肥沃了土壤，同时也是东部商业

---

<sup>①</sup>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 290.

的主干道。在河的两岸以及那些支流水系，有最为富裕的市场，最为辉煌的都市，以及最为神圣的印度圣地。在大自然的慷慨施舍面前，人类残暴的世世代代的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曾有过回教徒（Mussulman）暴君和马拉他人（Mahratta）海盗，然而在整个东方，孟加拉仍被誉为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sup>①</sup>

这也是一片横跨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的污秽而潮湿的沼泽，英国旅行作家杰弗瑞·摩尔豪斯（Geoffrey Moorhouse）引用一位地理学家的话说，沼泽由“新泥、老泥和湿地”组成。<sup>②</sup> 在这块肥沃而腐烂的广袤沼泽上，加尔各答是商业中心，是胡格利河上的一个港口，而胡格利河则注入孟加拉湾。在这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回教王公（总督）的庇护，回教王公则以莫卧儿名义领袖之名统治着孟加拉、奥里萨和比哈尔这片土地。1756年，回教王公阿里翰迪·汗（Aliverdy Khan）去世，他的不到20岁的孙子苏拉贾·多拉（Surajah Dowlah）继位。麦考莱把苏拉贾·多拉描述成一个残酷的、自私的和常常醉醺醺的堕落者，对英国人充满仇恨。而且，他的周围全是“渣滓无能之辈，除了滑稽可笑的举动以及卑躬屈膝的奴性，可谓一无是处”。<sup>③</sup>

结果，在找到一些借口后，那个回教王公指挥着他的军队向英国人在加尔各答的要塞威廉堡（Fort William）进发。然而，对杜普雷克斯及其军队挥之不去的恐惧，不仅已经使驻扎在马德

---

①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p. 36 - 37.

② Geoffrey Moorhouse, *Calcutta: The City Revealed*, pp. 25 - 26.

③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 39.

拉斯的英国人变成了贸易者，也让他们变成了战士和政治家。在加尔各答，英国人似乎拥有使他人敬畏的品质。威廉堡一触即溃，麦考莱所称的“那个重大的罪行”发生了，成为英国历史中的传说。这或许略带夸张。<sup>①</sup>

1756年，季风雨直到6月21日才到来，这也意味着6月20日之夜是这一年之中最为糟糕的闷热之夜，湿度极大。这一夜，印度王公的卫兵将几十名英国的男人和女人困于“加尔各答的黑洞”中，这是一个十八英尺长的没有空气的立方体。按麦考莱的描述，在卫兵第二天早晨打开牢门之前——回教王公“放荡淫逸之后轻松地醒来”并且“允许打开门”，大多数人就已经死去。<sup>②</sup> 据称有146人被投入这个黑洞，但实际数字很可能是64，其中有21人存活。<sup>③</sup>

发生在加尔各答的事件于八月传到马德拉斯，要求报仇的呼声是普遍的。克莱武被任命为九百个英国士兵和一千五百个印度佣兵的将领，发兵惩罚回教王公。麦考莱指出，回教王公“拥有的臣民比路易十五（Louis the Fifteenth）或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Empress Maria Theresa）的还要多”。<sup>④</sup> 10月，克莱武的军队沿着孟加拉湾向北航行，然而由于逆风，他们绕道锡兰和缅甸海岸，直到12月才到达孟加拉。克莱武迅速击败了驻守在威廉堡的印度守军，重新征服了加尔各答。回教王公请和，但想到这个王公的人格和先前的行为，克莱

①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 40.

②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 41.

③ Geoffrey Moorhouse, *Calcutta: The City Reveal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pp. 44-45. 约翰·西番雅·霍尔维尔 (John Zephaniah Holwell) 是其中的一个幸存者，一名杰出的出版家，他对事件的重述使事件的恐怖传播开来。参见 Keay, *Honourable Company*, p. 304.

④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 43.



武拒绝与他讲和。然而在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急于恢复商业活动，而且在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也渴望军队和武器归来。因此，克莱武同意举行谈判。对此，麦考莱解释道：

随着谈判的进行，克莱武的人生揭开了新的一章。到目前为止，他还只是一名战士，拥有卓越的能力和勇气去执行他人的计划。但从此以后，人们主要把他看成一个政治家……他的新能力是毫无疑问的，他展示了极强的能力，也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他现在开始介入的交易也为他的道德留下了污点，这也是毫无争议的。<sup>①</sup>

事实上，克莱武既不狡猾也不奸诈。据麦考莱看来，他本质上绝对与无赖相反。克莱武的活力——战场内外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来源于低劣，而是来源于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精力和热情，当其面对风险时尤其如此。事实上，没有证据显示，他曾经对英国人做出不得体的举动。事实表明，“他道德上的污点”主要局限于与印度人交往：“他认为东方政治是一个游戏，没有什么是不公平的。”<sup>②</sup> 换句话说，他的不道德并不是其人格的本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代表一种老谋深算的战略决策。

他似乎设想，如果他接受被对于早已摆脱的羁绊所束缚，如果他继续讲真话又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如果他对从来不信守不利约定的联盟者履行了所有约定，那么面对

---

①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 44.

②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 45.

这样的（印度）对手，他就什么都不能实现。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妥协都是极其错误的。因此，这个人在其他生活方面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英国绅士和战士，但在与印度阴谋家交手过招后，他把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阴谋家……<sup>①</sup>

同时，回教王公苏拉贾·多拉要不是老谋深算，则什么也不是。他一方面与驻守在占德拉哥（Chandernagore）附近的法国人暗地里谋划将克莱武驱逐出加尔各答，一方面又与克莱武达成了一个条约。英国人获悉了回教王公的计划，在法国人从印度东南部的卡纳蒂克（Carnatic）基地派出增援力量以前，成功地袭击了占德拉哥。“通过剥夺法国人最赢利的买卖”，凯伊写道，“剥夺法国人为位于卡纳蒂克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和毛里求斯（Mauritius）兵营提供给养的基地，它削弱了”法国在印度洋的整体地位。<sup>②</sup>

克莱武不顾一些英国同僚的反对，决定支持米尔·贾法尔（Meer Jaffier）——回教王公军队的主要指挥官——领导的反对苏拉贾·多拉的军事政变。当一位卷入政变阴谋的孟加拉人威胁如果他不能得到许诺的钱财就会告发时，克莱武筹划了两个条约：一个真实的条约，根本没有提到给那个家伙的酬劳；另一个是包括奖赏的假合约。当一个英国军官出于良知拒绝签署虚假条约时，克莱武干脆强迫这个军官签上他的大名。克莱武的顾忌只限于与自己同种人的交往，最终使他招致严厉的批评，

---

①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p. 45 - 46.

②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 315.

并备受谴责。<sup>①</sup>

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尽管克莱武情绪低落、心情消沉，但人们并没有担心和非议他在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他的虚张声势完全地运用于战斗之中，而这——其他任何单个事件无法相比——将决定印度次大陆的命运。苏拉贾·多拉和克莱武的军队已经集结，彼此相距几英里远，当时商定，一旦交战开始，米尔·贾法尔将与他的士兵叛逃至英国人的一边。然而，米尔·贾法尔的恐惧压倒了他的野心，他胆怯而又犹豫不决。

然而对于此时的克莱武来说，做出跨过河流与强大于自身二十倍的敌军交战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他召集了一个战事会议。大多数军官建议放弃战斗，克莱武立即同意了。“从此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麦考莱写道，“除了这个战事会议，他再也没有召集过类似的会议。而且……如果他采纳了会议的建议，那么英国人也不会成为孟加拉的主人”，更不会最终成为印度的主人。据麦考莱描述，克莱武撤退到树荫下，深思了一个小时。“他返回后决定冒最大的风险，并且下令所有的人必须准备于翌日跨过河流。”他决定，不管发生什么，完全由自己负责。<sup>②</sup>

明天就是计划渡河日期，克莱武的军队在日落之后于普拉西（Plassey）附近的芒果树林中安营扎寨。克莱武卧于帐内彻夜未

---

① 主要参见 Nick Robin, *The 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How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haped the Modern Multinational* (Hyderabad, India: Orient Longman, 2006)。然而，约翰·凯伊（John Keay）并不认同，他指出，“在革命的背景下，与那些其他人（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密谋相比，这一点点的表里不一根本不值一提”。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则同意这种观点。参见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p. 317; Robert Harvey, *Cliv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British Empero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② Ibid., p. 51.

眠，侧耳倾听敌营鼓钹之声。很难想象，此刻的他陷入的巨大压力和由此产生的焦虑。

第二天早晨，1757年6月23日，两军会战于普拉西。回教王公拥有骑兵一万五千人，有武装着长枪、刀剑和弓箭的步兵四万人，但只有一万二千人的军队参与战斗。而英国人率领的军队只有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士兵是英国人。两军都用大炮轰击对方，但苏拉贾·多拉的阵地未能正确开炮，“而那些英国人的大炮则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击毙了一些苏拉贾·多拉军队中最为杰出的军官。回教王公的军队开始退却，而克莱武的一个军官则抓住了有利时机，命令全面进攻。战斗仅仅持续了一个小时，正如麦考莱写道：“损失二十二名士兵，五十名战士受伤，克莱武便打散了一个将近六万人的军队，征服了一个比大不列颠还要大、人口还要多的帝国。”<sup>①</sup>

英国人取得胜利后，米尔·贾法尔取代苏拉贾·多拉登上了王位。由于犯有罪行，多拉被杀头。不管多拉是多么的罪有应得，但其被处决还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行为。英国人并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们却为处决设定了政治背景。

刺激英国敏感神经的更加棘手的问题，是易手钱财的数额。

---

<sup>①</sup>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pp. 52–53. 马克·吐温补充道，克莱武曾说，“我用三千人彻底打败了六万人，建立了帝国”。参见 Mark Twain, *Following the Equat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ch. 54. 一些作家宣称普拉西 (Plassey) 并不是一个战役，而是一个“交易”，其中回教王公的内部敌人与东印度公司谈判导致王公失败。参见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9), pp. 78–79. 然而罗伯特·哈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参见 Robert Harvey, *Cliv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British Empero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p. 221.

米尔·贾法尔顺着河流向加尔各答运送了 80 万英镑银币，其中克莱武自己取用了 20 万到 30 万英镑。克莱武简直是“走在金堆和银堆之间，头戴镶嵌红宝石和钻石的王冠”。从严格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并不非法。克莱武并不是一个帝王，他只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而且公司已经示意，本地王公贵族的慷慨赠予也是其机构发家致富的途径。麦考莱甚至认为，奇怪的是，克莱武居然没有拿取更多的钱财。麦考莱写道：

我们不能宣告一种在本质上不是邪恶的行为为一种罪恶……按惯例，他的服务无论得到怎样的酬赏，都应该由他自己的政府给出，或者得到他自己政府的完全同意和认可。<sup>①</sup>

克莱武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风险承担者，在野蛮的边远地区环境中制定自己的规则，他所具有的使他能奠定英国在印度基础的特性，同时也是我们所忧虑的。然而正如麦考莱所指出的，在克莱武回到英格兰后所受到的非难中，也确实存在伪善的成分。“在英格兰，痛责克莱武的贪婪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行为，然而面对穆希达巴德（Moorshedabad）的金银财宝时，众多控诉克莱武的人中不只是一人显露出如此的克制。”<sup>②</sup>

而且，也并非克莱武一人始终甘愿冒名誉扫地之险投入到下一场游戏之中。1759 年，当七艘荷兰商船从爪哇（Java）来到胡格利（Hooghly）时，克莱武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本可以接受他们的到来。作为平衡英国人的力量，米尔·贾法尔对荷兰人表

---

①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p. 59 - 60.

②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 61.



示支持，而克莱武也不想因此损害与王公的关系，况且，伦敦已经卷入了与法国人的战争，不愿承受多一个敌人的风险。然而，克莱武清楚荷兰人的存在将对大不列颠对印度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产生威胁，于是独自下令攻击。荷兰人溃败了。

事实上，1765年，英国当局将克莱武派回印度，以治理他离开孟加拉后所发生的腐败和混乱。孟加拉的腐败和混乱也是体制的结果，而克莱武应对这一体制的建立担负一定的责任。尽管他在印度只待了十八个月，但在那段时间克莱武完成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全面改革，包括与当地居民相处的方式方法。克莱武改革的核心是其对腐败的理解：给予人们权力，而同时又让他们贫穷，这是招致猖獗腐败的诱因。因此，克莱武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高公司雇员的薪水。他按雇员级别，给予他们一定份额的食盐贸易收入。这一措施对克莱武的名誉产生了很大损害。克莱武最终的悲剧在于，他往往知道需要做什么事，并且做事也从不退缩，但需要做的事情从来都不是出于纯净的心灵。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克莱武来说尤其如此。他的选择和诱惑，连同其结果，都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麦考莱再次写道：

如果一个人在星期天的早晨卖了啤酒，毫无疑问，他已经冒险挽救了一个同类的生命……然而，我们不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另外一种人——他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普通克制、经受过极端诱惑的考验，有资格享用那些绝非普通的放纵方法。<sup>①</sup>

---

<sup>①</sup>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ssay on Lord Clive*, p. 97.

在某种意义上说，克莱武为英国献上了印度，但由于其在这一过程中的做事方式，英国并没有表示出感激之情。因此，在中年时期，他注定要受到责难的烦扰，以至于其狂躁的忧郁性格最终击倒了他。他开始染上吸食鸦片的习惯，并于 49 岁那年自杀（尽管一些人认为他或许是被谋杀的）。<sup>①</sup>

当克莱武于 1774 年死去时，他是自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15 年前战死于魁北克战役之后最伟大的英国将军（即使詹姆斯·沃尔夫的腐败也同样被指责为非英国）。<sup>②</sup> 在西方军事指挥家中，几乎只有克莱武的身边没有经验丰富的将军们为其参谋。他是一个军事上的自学成才者，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其他雇员不同，他超越了商业目标，看到了政治和地理的极端重要性。麦考莱写道：“我们所能回想起的人中，在同样的年轻时期就具有相同的军事天赋的，只有拿破仑·波拿巴。”<sup>③</sup>

麦考莱甚至认为，要是克莱武在中年时期没有生病、产生抑郁情绪并吸食鸦片，要是克莱武在击败加尔各答附近的荷兰人后仍一如既往，他或许会被派去指挥驻扎在北美的英国军队，而美国革命的历史或许将重写，独立甚至有可能延迟几年。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要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被迫与罗伯特·克莱武在战斗中相遇，将会发生什

---

① Harvey, Clive, pp. 375 - 376.

② Nick Robins, *The 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How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haped the Modern Multinational* (Hyderabad, India: Orient Longman, 2006), p. 168.

③ Nick Robins, *The 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How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haped the Modern Multinational* (Hyderabad, India: Orient Longman, 2006), p. 103.

么事情,<sup>①</sup> 因为历史并不仅仅是地理和其他客观力量的结果。

傍晚时分, 我返航到河的上游, 再次进入加尔各答。我的船经过豪拉大桥 (Howrah Bridge)。这座大桥是城市的标志,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英国军队进入缅甸而建造。从任何角度来看, 大桥都似乎像一个巨大的“模型建筑装配玩具” (Erector Set), 占据了半个天空, 桥的钢铁材料使它周边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大桥之上, 行人摩肩接踵, 而汽车则一辆接着一辆, 当人群拥过胡格利河, 河水夹杂着泥沙顺流而下。即使是在桥下面的水面上, 人群和汽车的噪声就像是一辆通过的火车永无休止地发出的噪声。新的高档的摩托车紧挨着人力出租车。人们携带各种各样的东西, 从公事包到鸟笼子, 头上顶着柳条箱和篮子。在加尔各答一侧的大桥入口前, 是一个熙熙攘攘的花市, 有小山一样的金盏花和玫瑰花瓣。沿街叫卖的小贩什么都卖, 从剃须刀到纺织品。乞丐的恳求以及放肆的哀求从未间断。这里, 没有人放弃。

---

<sup>①</sup> 但是对于美洲的殖民主义者, 克莱武赞成一种自由的、较少对抗的方式来应对。参见 Robert Harvey, *Cliv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British Empero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p. 349。

## 第十章 谋与美

加尔各答市有两处显眼的历史遗迹，彼此相距不远，又各与一位伟人相关。这两位伟人所代表的主张与理想将在 21 世纪影响整个印度洋地区甚至更大范围的世界政治与文化。其中一位是大英帝国的政治家，另一位则是文学艺术巨匠。一位是权力政治的实践者，专注于在不同的政治军事力量和其他赤裸裸的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纵横捭阖；另一位则倾心于美学，认为意识的终极目标是对美的欣赏。一位代表着印度次大陆的英国遗产；另一位则象征着印度的遗产，是印度国境之外许多人魂牵梦萦的所在。一位引领我们探讨印度的外交政策；另一位则激发我们求索公平与尊严，对此需要美国更好地理解。两位伟人都是加尔各答的图腾：加尔各答（Calcutta），这个英属印度帝国的首都，加尔各答（Kolkata），这个千百万想要闻达于世的人们的家园。

第一处历史遗迹是总督官邸（印地语为 Raj Bhavan），一百多年以前，这里是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的家。

直到 20 世纪初印度迁都德里，加尔各答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亚欧大陆一颗勃动的核心。与这种以印度为中心的帝国主义联系最为密切的人莫过于乔治·寇松，他在 1899 ~ 1905 年间任印度总督。可以很贴切地说，寇松在印度和加尔各答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总督官邸建成于 1803 年，是一座华丽的砖砌建筑，具有英国乔治王朝时代的艺术风格，其设计蓝图正是寇松祖先于 12 世纪在德比郡的住宅凯德尔斯顿庄园（Kedleston Hall），这一巧合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

尽管印度人并不情愿被英国统治，但他们在心中为寇松保留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他致力于从废墟中拯救这个国家的建筑与古迹。印度的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经这样说道：“在其他几位总督都被遗忘之后，寇松将被铭记，因为他修复了印度所有的美好之处。”<sup>①</sup>

作为总督，寇松将孟加拉分为东西两部分：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加尔各答失去了一片有利可图的以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腹地，为东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及后来孟加拉国的诞生开创了先例。尽管如此，在一些领域内对寇松的关注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冷战终结之后。20 世纪 90 年代初曾任印度外交部部长的迪克希特（J. N. Dixit）甚至称寇松为“最伟大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之一”。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教授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则辩解道，所有梦想着一个大印度——以静默和非正式的方式影响南亚和印度洋的大部分地区——的他的同胞都会发现寇松是“战略灵感的源泉”<sup>②</sup>。

---

① David Gilmour, *Curzon: Imperial Statesm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4), p. 181

② C. 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enguin, 2003), p. 204



1909年，寇松写道：

在现代条件下，印度一定是亚洲大陆最伟大的国家，而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sup>①</sup>

寇松所指的印度，也是他所统治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四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也即从伊朗边境到泰国海湾的所有大陆领土。在寇松看来，这个大印度在西部和北部天然地需要一些缓冲国以抵御俄国和中国。因此，循着寇松的这一思路，普什图族的西北边境省于1901年形成，由此，英属印度可通过控制与阿富汗毗邻的部落地区对阿富汗施加压力。今天，西北边境省依然保留着那时的名称，而其今日对巴基斯坦的意义也与过去对英属印度如出一辙。

但寇松寻求的不仅是掌控中亚，大卫·吉尔莫（David Gilmour）在他的传记《帝国政治家寇松》（*Curzon: Imperial Statesman*）中提到，寇松还想要掌控波斯。在寇松任印度总督期间，英属印度是阿拉伯湾的主要强国，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湾地区的酋长国保持着特殊而牢固的贸易联系。这种联系反过来又利于印度向更远处的东非扩展经济影响。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阿布扎比和沙迦）旧称为特鲁西尔酋长国（Trucial States），得名于他们与英国签订的停战协定（truce），在海湾地区遏制海盗，保护从欧洲经中东到印度的贸易航道。同时，在英属印度的东部边境缅甸，有一些印度商人和投资者向缅甸农民提供贷款和其他服务，这也有助于巩固并

---

<sup>①</sup> C. 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enguin, 2003), p. 204.

延伸总督的统治。波斯和阿富汗是英国在西部和西北部抵御俄国的缓冲国，而缅甸的掸邦则是在东边抵御法国及其在东南亚的帝国的缓冲区。

身处加尔各答的总督要服从位于唐宁街 10 号白厅的英国政府的命令，因为印度已建立起大英帝国的权力架构。<sup>①</sup> 总督凭借其头衔已经具有重大影响力，从亚丁湾到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的事务都在其影响力的辐射范围内。根本上说，这种力量源自印度自身的辽阔富饶，而印度与伦敦的联系就像其中的杠杆。今天，如果将伦敦换成华盛顿，或者，也许换成印度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三角关系，就会形成像一些印度人界定的“新冠松式”的形势。

在印度的战略思想家中间出现一种倾向，他们期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而外交政策则应顺应经济的增长，这种思想倾向就是新冠松主义。将这种思想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相比很有趣。毕竟，这两种思想都向往国家的伟大卓越，是建立在一种帝国式的视野之上的宏观想法。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寻求将美国的国家理想和治理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新冠松主义者则乐于与不同于印度政治体制的非民主体制国家形成联盟。新冠松主义者懂得底线的含义。他们寻求的印度作为强国的复兴主要是在印度具有影响力的地缘范围之内。

从本质上说，这种愿景不像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大印度”（Greater India, Akhand Bharat）那样肤浅，因此也不应该将两者混为一谈。新冠松主义者更倾向于印度次大陆的西部边境，寻求向中东扩展毕竟印度的影响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则

---

<sup>①</sup> George Friedman, "The Geopolitics of India: A Shifting, Self-Contained World," Stratfor, December 2008.

倾向于东方，向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扩展，毕竟这些地区曾深受印度梵语文化的影响。但在20世纪90年代，代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寇松的威望不减，他的言论常被引用、提及。

在冷战期间，引用寇松的言论曾引起对印度外交政策的非难，据1998~2002年间任外交部部长的贾斯旺特·辛格所说，当时由于尼赫鲁专注于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解放事业，印度失去了在次大陆盲区的大部分影响力。结果，像西边的阿曼和东边的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不再将印度视为其安全的来源而加以认真对待。但是，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印度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框架下的开放，新冠松主义者寻求为印度界定一种新的“前进”战略，使印度的力量明确地集中于亚洲和印度洋，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分散在全世界。

公平地说，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源于当时印度的国内情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刚刚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帝国主义留下的创伤还未平复。沙西·沙洛尔（Shashi Tharoor）——尼赫鲁传记的作者——解释说，当时的国内条件造成的结果是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能不适合一个已成形的国家，反而更适合解放运动。<sup>①</sup> 但是当英国统治的痛苦记忆退去后，其积极影响显现出来。因此，新冠松主义的观点代表的远远不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印度版本，而是对老总督的实力政治的回归。这些英国总督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立场与印度当今的统治者完全相同。加尔各答阿萨德亚洲研究所（The Maulana Abul Kalam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的雷（Jayanta K. Ray）告诉我说，总督“对于在

---

<sup>①</sup> Shashi Tharoor, *Nehru: The Invention of India* (New York: Arcade, 2003), p. 185.

整个亚洲投射软实力有着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有时比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更为出色”。

新冠松主义的政策寻求的不是通过征服来削弱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的边界，而是复兴与这些国家的商业合作，并辅以公路和地区能源管道的发展。特别是缅甸，将很有可能成为印度和中国争夺的区域。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国与缅甸之间深入的交通和商业联系迫使拥有民主政体的印度不顾缅甸军政权可憎的本质而投标参与缅甸的发展项目，训练缅甸军队，并减少对缅甸持不同政见者的境遇的批评。如果缅甸能够放宽限制，真正开放其边境，从地理和历史联系的角度讲，印度一定比中国更具有优势，尽管当地人对20世纪初的印度商人并不友好。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宣称，与印度邻国的“更多的联系”可以将“次大陆的每一个次区域”变成“互相依赖、互惠共荣”的网络。这可以解释为，印度的经济规模要远远大于任何邻近的国家，由此，更多的经济合作将自然地产生一个温和的霸权。而坚持政治的首要地位不仅不必要，有时还会事与愿违。

实现这一愿景的难点在于，国家的内部局势要稳定，这样才能充满活力地致力于外部事务，但印度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条件。美国媒体集中报道印度高科技的“班加罗尔”现象，而更紧迫的现实则是，这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混乱社会，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仅有1美元。正如第七章中提到的，印度被政治暴力包围，既有政府和心怀不满的团体及种姓之间的冲突，还时而发生伊斯兰恐怖主义事件。在印度东北部的八个邦，当地的部落为实现自治而发动了不少于15起叛乱。这个国家缺乏内部的稳定，因此不能靠向其邻国开放边境来赢得在其边界之外更大的影响力。

以孟加拉国为例，这个伊斯兰国家三面被印度包围。穿过孟加拉国是人员和货物从印度一地到另一地最便利的路线。这也将有助于印度不稳定的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还能为孟加拉国赢得数量可观的交通费用。实际上，这里将会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从缅甸经孟加拉国向印度输送天然气。由于孟加拉国的政治体系崩塌，其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更多的经济合作与印度形成联系。但加尔各答人所害怕的正是这一点。尽管老一辈人，包括1947年印巴分治的难民，对于失去的腹地仍怀有思乡之情，但其他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一代，看待孟加拉国的态度与许多美国人看待墨西哥的态度相似：恨不得在那个地方竖起一堵真正的墙。“把所有激进的毛拉锁在边境的那一边”，加尔各答一位著名的记者这样对我说。目前，已有一千万孟加拉人作为经济难民生活在印度，印度人不想要更多的孟加拉难民了。加尔各答和西孟加拉的印度教精英看不起东孟加拉的穆斯林农民，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可追溯到19世纪。但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印度旁遮普邦的旁遮普人，对在印度西部边境的另一边——巴基斯坦居住的旁遮普人，却有一种基督教的普世的情结。不过，总体而言，分治形成的边界相关问题仍然是印度要努力应对的。

大印度要将其经济活力向东投射到东南亚、向北投射到中国、向西投射到中东，就必须首先在次大陆自己的后院采取这样的措施。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豁达的胸襟，而现在的印度却做不到。

但是在作为陆地强国的大印度之外，却有着更大范围的印度洋沿岸地区可以考虑。寇松专注于陆上强国，因为在他的时代，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但是印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在必须考虑其在海洋和在海洋另一



端的陆地上的作用。拉贾·莫汉写道，印度正在抛弃其看待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曾有的那种感情用事和第三世界主义的情绪。现在的印度是从战略和原材料的角度来看待非洲。印度海军现在巡逻在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航道上，煤炭正从这里运往印度，其数亿人口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当你想到印度海军还偶尔护送美国军舰通过马六甲海峡，一个强国正在崛起的图景即完整地呈现在眼前，从世界第三大洋的一端直到另一端。

当然，在印度洋处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美国海军。尽管印度海军显然不是美国的手，但作为地区的重要存在，新寇松主义者需要与美国结成事实上的军事联盟。“事实上的”这个词非常关键。我在加尔各答和新德里一再听闻，正如冷战期间印度不结盟一样，未来也应保持不结盟的状态。尽管印度需要向美国倾斜以施展自身的力量，但却不能承担明显地疏远中国所造成的后果。印度既要与中国竞争影响力，又要发展丰富的贸易往来。

最后，比任何其他战略观点更甚的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将使其与美国结盟，也会逐渐将周边国家纳入印度的轨道，这些国家正在尽力复制印度那种不具有强制性，却能够适当地起到作用的政府治理模式。具有家长式领导作风的寇松总督从未从印度政府的角度思考，因此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但是，可以肯定，寇松的思想对于涉及印度洋及其以外的印度外交政策将具有指导意义。他的时代中帝国主义的战略要求，正是我们的时代中印度民族主义所需要的。

“民族主义是个虚假的神灵，缺乏美感。”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曾这样说道。泰戈尔是孟加拉诗人、短篇小说家、作家和

艺术家，1913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sup>①</sup> 在加尔各答北部这位诗人杂乱的故居中，这句话在所有展览品中格外醒目。泰戈尔故居的庭院中，一盆盆绿植摆放得错落有致，墙壁上装饰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风格的画作，房间里回响着根据泰戈尔的诗歌创作的乐曲。这座故居位于寇松那高耸的、冷冰冰的总督官邸对面，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具有魔力般的魅力。

有着长长的白色胡须的泰戈尔肯定有某种魔力，但是有些人把他说成神秘主义者、来自东方的救世主，却是低估了他，暗示他的作品有些杂乱无章。<sup>②</sup>

哈佛大学学者阿玛蒂亚·森也认为，许多西方人都将泰戈尔看作某种“布道的精神导师”，这种对泰戈尔的理解狭隘得令人惊讶。<sup>③</sup> 事实上，泰戈尔作品中那种深深根植于印度和孟加拉土地中、精心设计又无比自然的普世主义可能正是其魔力的来源。正如在亚洲主义、多极均势政治时代中寇松是最终的实用主义者一样，尽管已离世近 70 年，泰戈尔毕生对超越民族主义的追求为其在全球化时代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的确，要深度评价泰戈尔的作品就如同要对已离世的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作品进行深入评价：这如同宣布这位被神话了的自由的个人在历史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与伯林的人文主义哲学相比，泰戈尔的诗歌、90 多部短篇故事和小说在

---

① 泰戈尔 (Tagore) 是孟加拉语 Thakur 的英文转写，是对印度婆罗门或男性神祇的敬称。

② Simon and Rupert Winchester, *Calcutta* (Oakland, CA: Lonely Planet, 2004), p. 78.

③ Amartya Sen, "Tagore and His Indi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6, 1997.

艺术上具有同样的意义。泰戈尔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那些令人着迷的作品赢得的读者的眼泪如同季风季节中的滂沱大雨。与伯林相同，他从不说教，他的作品中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或哲学”。<sup>①</sup> 他毕生的作品中突出地用辛辣的笔触记述了个人的渴望与憧憬。故事通常发生在乡下的一派田园风光中，情节却常令人心情紧张：不能实现自己抱负的年轻人期待得到他本应该拥有的那个女子的爱；医学院里的一具骷髅原本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拥有自己的希望和梦想；穷困潦倒的小职员晚上待在加尔各答的锡亚尔达车站，只为省点电费；在加尔各答挣不到钱的少年患重病生命垂危，思念乡下的妈妈；街头小贩与一个小女孩交好，因为这小女孩让他想起远在阿富汗的女儿；九岁的娃娃新娘在练习本上写字，以此逃离她的孤独；一位夫人爱上了自家门阶前的流浪少年；浑身赤裸的男孩咳嗽不止，挨着妈妈重重的耳光，在泰戈尔看来，这男孩承受着宇宙中所有的苦痛。

故事继续讲述，字里行间充满怜悯和同情。泰戈尔对渺小得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倾注了全部的关注。在他看来，这些小人物的希望、梦想与恐惧充满了整个世界，由此可见泰戈尔人性的光辉。泰戈尔作品中没有宏大与华丽，却总以亲切著称。作为一位地道的孟加拉作家，泰戈尔经常写到季风（“莲花季风开始狼吞虎咽，大口吞下了花园、村庄和田地”）和石阶码头，那些台阶向下延伸到河边，人们在那里洗澡、洗衣服、说闲话。这些石阶码头在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中是到达和出发的地点，既是具体的实体，也具有象征意义。<sup>②</sup>

① Rabindranath Tagore, "Passing Time in the Rain," in his *Selected Short Stories*, trans. William Radice (New Delhi: Penguin, 1991), appendix.

② 参见小说 *Little Master's Return* 和书中译者的介绍。

除了与伯林具有可比性外，在神秘主义方面以及对农村背景下的教育的兴趣，泰戈尔可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比。与泰戈尔一样，托尔斯泰也出身贵族地主家庭。他同样对官方教育不满，并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Yasnaya Polyana）建立了一所学校，正如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北部西孟加拉的圣蒂尼克坦建立的学校一样。这两位绅士赞美农民，同时对城市中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却多少不那么同情。

首先，正如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泰戈尔对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和英国文化（即西方文化）表现出来的和谐包容的态度，与那些认为当代世界存在“文明的冲突”<sup>①</sup>的观点正好相反。在《吉檀迦利》中，泰戈尔宣称他所寻求的世界是这样的：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隘的国家之墙分割得支离破碎……<sup>②</sup>

泰戈尔所指的“狭隘的国家之墙”代表着封闭的民族主义思想。尽管泰戈尔热爱日本文化，但加尔各答他的故居的墙上镌刻着他对日本的描述：

日本在海战中击败了中国，但日本应该意识到将胜利的纪念物像刺手的荆棘一样在全国展示是野蛮而丑陋

---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② 引自 Sen, “Tagore and His India”。

的。人们经常在形势的推动下做出残酷的行为，但人的本性是将其忘记。人们为了纪念那些与人类永存的东西而修建了寺庙和修道院，而其中要被纪念的肯定不是暴力。

这就是泰戈尔的基本观点。战争可能是必要的，但太可悲了，不应该修建任何纪念碑来纪念战争。战争、军功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比错误更糟糕，就像民族主义一样，“缺乏美感”。也就是说，美，是道德的，也是普世的。任何不合乎道德标准的、不是普世的都不可能是美的。

泰戈尔确实具有先见之明。他的有生之年（1861 ~ 1941）正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而他却超越了民族主义，看到超越国家的、更为宏大而坚实的集合——人道主义。他并不反对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只是反对将其作为最高利益。泰戈尔理解通往爱国主义的那种渴望，正如圣奥古斯丁理解通往部落主义的那种渴求一样。在上一个经典的时代，部落主义以和平的方式团结了各大群体的人们。但他们都懂得这种期盼只是一个通向更高境界的石阶。

泰戈尔的作品和思想中经常将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融合在一起，他是一位终极的融合论者。在他的视野中，没有美丽的孟加拉风景，只有壮丽的“地球”。<sup>①</sup> 同样地，哈佛大学的学者苏伽塔·柏瑟（Sugata Bose）写道，泰戈尔也热爱旅行和朝圣，曾去过伊朗、伊拉克、东南亚和日本等地。泰戈尔与寇松一样，也有大印度的构想。但与寇松和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那种整体的政治、战略视野不同，泰戈尔的大印度构想融合了多种文化，例

---

① See the letters, Appendix B, in Tagore's *Selected Stories*.



如，“天下苏非诗人的兄弟情谊在阿拉伯海上架起桥梁”。<sup>①</sup> 泰戈尔脑海中的亚洲是一幅天衣无缝的织锦画，各个国家、各种文化重叠在一起，相互交织。例如，一个大印度之中融入大波斯，以及大马来和大巴厘文化，在泰戈尔熟悉的东孟加拉的乡村，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也以同样的方式互相渗透。在泰戈尔的世界观中，没有边界，只有过渡区。在人们讨论未来的库尔德斯坦、逊尼斯坦、普什图尼斯坦、大阿塞拜疆以及其他近东地区版图变动中新出现的名词时，泰戈尔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在他看来，世界是一幅整体的、多维度的地图。对他来说，像库尔德斯坦这样的地方一直存在，它涵盖了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这样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这些国家相互争夺的地方。泰戈尔作为印度雅利安人，可以讲与伊朗人有着“血缘关系”，这正是其中的原因，而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sup>②</sup> 在一个人的世界观中，如果所有的血缘关系都得到了认同，这种关系便是很容易得到认可的，文化和精神关系也是如此。泰戈尔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过，如果成为全球主义者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认同，泰戈尔也并不是彻底的全球主义者。他从直觉上把握了这一精髓：只有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才能欣赏其他文化。他理解普世性只能根植在众多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地方主义中。换言之，在21世纪初，他也是一位极为开明的人，苏伽塔·柏瑟认为，泰戈尔正代表了印度洋世界的精神。

在一首签名为“1932年5月24日，巴格达”的诗中，泰戈

---

①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35.

②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1

尔描写了去往伊拉克的旅程。他写道：

夜晚过去：  
 在房间黑暗的角落里，  
 燃着黑烟的亮光被熄灭。  
 在东方的天空中，  
 在这欢乐的日子里，  
 世界之灯光明灿烂。  
 愿所有沿着同样的道路  
 前行的人们  
 正确地彼此感知。<sup>①</sup>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冠松主义的观点被接受的话，泰戈爾的观点也必须被接受，因为只有超越狭隘的国家观念，印度才能够得到邻国的信任，从而切实地扩展其影响的辐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必须跟随着地理与文化。正如拉贾·莫汉在与我的一次谈话时提到的，“加尔各答将永远是距离拉萨最近的出海口。因此，正确的目标就是通过大胆的想法克服边境的障碍，使得在地理上连接西藏与印度成为现实”。具有道德意识的权力政治正是印度以及西方在与中国的更为广泛的竞争中所需要的，最温和、最具有世界主义的视野的那种力量将最终占据上风。

---

① Reprinted from Rabindranath Tagore, *Particles, Jottings, Sparks: The Collected Brief Poems*, trans. William Radice (London: Angel Books, 2001). See, too, Bose's footnote, p. 312, and Chapter Seven, on Tagore, near the end of *A Hundred Horizons*.

## 第十一章

# 斯里兰卡：新地缘政治

我站在这一片广阔的荒漠上，翻开的土地一直绵延到地平线，卡车排成长长的队列，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压出的车辙将泥土从建筑工地的一处运往山上的另一处，头戴安全帽的中国监工在酷热和灰尘中指挥着车流行进的方向。我眼前出现了一座幽深的人造峡谷，谷底平平，裂开大口，还有两条堤坝，其中一条有十个足球场那么长。这一壮观的疏浚工程其实是在内陆更远处修建了一条新的海岸线，这里将很快成为汉班托塔（Hambantota）海港的内港。汉班托塔毗邻斯里兰卡的最南端，附近就是世界主要航道，每年有逾三万船只经过这里，将燃料和原材料从中东运往东亚。

根据规划，到2023年，在汉班托塔将建成一座液化天然气精炼厂以及航空燃料储备设施，还将建成三座码头，海港由此具备转运能力。这里还配备了陆上码头，以修造船舶，更不用说还有燃料库和燃料补给设施了。<sup>①</sup>

---

<sup>①</sup> B. Raman, "Hambantota and Gwadar - an Update," Institute for Topical Studies, Chennai, India, 2009.

对于这项历时 15 年的建设工程，斯里兰卡人既感到骄傲，又有些敏感。骄傲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终于能够超越民族冲突、摆脱了成为笑柄的历史，正式作为国际海上贸易的战略节点崛起。敏感是因为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中国人在建造并资助这个海港。因此，对进入港口有着严格的限制。为了看到这一壮观的建设项目，我不得不进入一片禁地，最后被抓了起来。我被汉班托塔警察局扣留了七个小时，直到交了费才被放出来。<sup>①</sup>

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一样，汉班托塔地区的海滨风光壮丽迷人，惊涛拍岸之声如雷鸣一般，笃定将成为 21 世纪的名胜之地。这也延续了这个小镇在古代的地位。这里曾经属于鲁呼纳王国 (Ruhuna)，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今天，这个小镇仅有两万人，几条街道上的店面热闹忙乱，小小的港湾里并排停靠着四条木制的渔船，潮水低落时，渔船被冲到岸上。（在很多情况下，船主是马来裔穆斯林。）<sup>②</sup>

我住在海滨一座宾馆里，除我之外仅有两名客人，真有一种荒凉的天涯海角的感觉。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摧毁了原来的宾馆，后又在其遗迹上建造了现在的这所宾馆。海啸还毁灭了海滩上的所有船只，还要等待国际社会的援助来修建新船。海啸使斯里兰卡 3.5 万人丧生，40 万人无家可归。的确，汉班托塔是当前印度洋里的一幅历史缩影，经历了海啸的灾难，又受益于中国的崛起。

---

① 在被扣留期间，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这可证明当地警察机构的专业水平，至少在我的案子是这样的，科伦坡的美国大使馆也从中调解。

② 汉班托塔 (Hambantota) 的意思是舢板港，指古代这里的那些平的木船，这些船现在仍在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使用；hamban 是腐烂的舢板。Ramya Chamalie Jirasinghe, *Rhythm of the Sea* (Hambantota, Sri Lanka: Hambantota District Chamber of Commerce, 2007), p. 23

在海港项目开始之前，汉班托塔只不过是斯里兰卡一个偏僻的小镇，20世纪初伟大的英国文学家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曾是这里的政府官员助理，这就是这个小镇唯一知名的事件。伍尔夫后来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成婚，并成为著名的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的社长。在汉班托塔的日子里，他搜集素材，后来写成了一本出色的小说，于1913年出版，名为《丛林中的村庄》（*The Village in the Jungle*），描述了锡兰这个角落里农村生活的残酷。事实上，就在小镇的后面依然还有书中描写的干旱带，断续的棕榈树林，黏腻的红色土地。

塔西姆（Azmi Thassim），当地商会的领导，骄傲地给我讲述了伦纳德·伍尔夫在汉班托塔的故事，他坚持认为这个海港项目是斯里兰卡的，而不是中国的。他提到了汉班托塔的海上战略地位及其靠近海滨处的水深，认为这将使这里成为几十年来新建港口的理想位置；实际上，在中国和斯里兰卡2007年签署其影响深远的协议之前，加拿大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绘图工作。“我们缺少资金和技术，因此要寻找外国的援助。”他说，汉班托塔已经计划建设一座会议中心和一座新机场，而中国人可能并不愿意介入，就像海港项目一旦完成，可能并不是由中国人来运转港口。

在很重要的意义上，这位商会领导的话没错。中国在印度洋的行动并不是咄咄逼人的构建帝国的计划，而更像是一个低调的大战略，在关系到其军事和经济利益的任何可能出现的地方利用合法的商业机会。中国熟练地顺应着经济发展的潮流，而不是事先凭空编造。正如在瓜达尔，将由新加坡港务局来管理中国人修建的港口，在中国的目标和最基本的现实之间至少会有一层间隔。中国不需要管理任何港口，而只需要港口目前的发展水平和



燃料存储设施来为其商船队服务，可能还有战舰，在北京努力要与其保持良好的外交和军事关系的地方。汉班托塔和其他类似的港口将构成一系列存储中心，大量的中国制造的货物在运往中东、南亚及东南亚市场的途中可以暂时存储在这里。因此，中国用软实力建造的精致却又难以琢磨的帝国如今已开始孕育，汉班托塔正是其象征。<sup>①</sup>

在古典时代晚期的世界中，锡兰位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枢纽地带，是中国和中东之间的贸易中心。乔治·霍拉尼（George Hourani）这样写道，中国船只向西曾行驶到锡兰，从锡兰再往西，则由波斯人和阿克苏姆人（来自今日的埃塞俄比亚）掌控着贸易。<sup>②</sup> 中国的郑和将军打破了这一格局。他将锡兰用作航海基地，向西最远航行到非洲之角，两次到达该岛。1410年，他在这里竖立了一块刻有三种文字的石碑。整整五百年后，在斯里兰卡和印度次大陆最南端附近的加勒，这块碑被挖掘出土，上面铭刻着中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祈求印度神灵保佑建立在贸易之上的世界和平。此前一年，中国人侵入锡兰，并最远到达中部的佛教圣地康提（Kandy），抓捕了僧伽罗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因为他们在几年前没有交出圣物佛牙。<sup>③</sup>

15世纪，中国占领了锡兰三十年。这是在欧洲人，即包括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轮番占领的历史时代之前，这一时代终结于20世纪中期。在锡兰落入西方监管之前中国人就到达这

---

① 关于中国软实力的报告，可参见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George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40

③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6), pp. 80, 92.

里，这一事实使中国当前在斯里兰卡和印度洋的政策与当地的历史相一致。北京斥巨资举行的对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活动正显示了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看法。

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活动揭示了中国已准备好“在印度的南部门阶落脚”，一位印度海军军官这样表述。中国要在汉班托塔建设一个以深水港为特色的耗资以十亿美元计数的开发区，我已看到港口的建设，此外还有燃料存储设施、炼油厂以及那位商会领导没有提到的其他基础设施。<sup>①</sup> 有朝一日，当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巡航，保护从沙特阿拉伯运往中国的石油供给时，这些综合设施可以提供燃料补给，让中国船只停靠修整。在印度洋的主要交通航线中，汉班托塔与600年前郑和的舰队登陆处附近的岛屿属于同一个部分。由于印度自身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口的政治敏感性，印度向科伦坡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受限。与此同时，中国和巴基斯坦一道弥补了这一不足。中国已向斯里兰卡提供了战斗机、装甲运兵车、高射炮、对空监视雷达、导弹以及火箭筒。中国向斯里兰卡的援助从2005年的几百万美元跃升至2008年的10亿美元；与此对照，美国仅向斯里兰卡提供740万美元援助。由于僧伽罗人政府在内战中针对泰米尔人的人权问题，2007年美国暂停了对其的军事援助。中国也参与了当地的油气开采，并耗资4.55亿美元建设火力发电厂，却没有道德上的顾虑。<sup>②</sup>

欧洲殖民主义已在60多年前终结，美国的精力转移到其

---

① Sudha Ramachandran, "China Moves into India's Backyard," *Asia Times*, Mar. 13, 2007; Bethany Danyluk, Juli A. MacDonald, and Ryan Tuggle, "Energy Futures in Asia: Perspectives on Indi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and Policies," *Booz Allen Hamilton*, 2007.

② Harsh V. Pant, "End Game in Sri Lanka," *Jakarta Post*, Feb. 25, 2009.

他地区，而中国现在重新回到位于印度洋贸易航线核心的这个岛屿。中国给予斯里兰卡的军事援助，包括6架免费供给的F-7战斗机，对于向有利于斯里兰卡政府的方向终结泰米尔人叛乱中的军事僵持状态起到了关键作用。<sup>①</sup> 美国相对忽视了斯里兰卡这个远离中东的印度地理轨道中的小岛，而中国人正确地将其视为21世纪亚洲边缘地带周边的交通航线的关键。因此，当美国人在阿富汗疲于奔命时，中国人则悄无声息地在印度洋沿岸建设港口。即使美国的努力获得成功，也只意味着得到了通过输油管道与印度洋相连的中亚，而形成了经济利益勃动的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将在其中泰然自若地继续获利。

但中国最终面临的挑战与美国一样，因为尽管中国努力帮助斯里兰卡（以及巴基斯坦），也并不能保证中国能够使用自己建立的港口设施。这将由在中国期待利用这些港口的时刻其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环境来决定。中国有可能最终发现自己与美国处于同样令人沮丧的位置，由于不可预知的紧张的政治关系而不能在需要时使用港口和基地。这也是印度洋世界的真实的教训：只有微妙的关系，而不是公开的结盟与基础安排。我提到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深入的活动是因为这是我在当地所看到的，但西方不必对此过于担心。

在长达26年的斯里兰卡内战的过程中，西方战略家深陷道德窘境，这里整整一代人经历着人权灾难，即使在新的地缘政治考量中斯里兰卡的重要性凸显时也是如此。因此，当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为中心的世界中重要性增长的同时，也应该使这个小岛在

---

<sup>①</sup> Jeremy Page, "Chinese Billions in Sri Lanka Fund Battle Against Tamil Tigers," *The Times* (London), May 2, 2009

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不再那样默默无闻。<sup>①</sup>

“锡兰”这个词，尽管是一个葡萄牙语词汇的误读，但却是那样的体面而优雅，使人脑海中浮现出最纯净的极乐世界的景象。绵延的海滨，茂密的原始森林，闪闪发光的茶园，还有那白色的佛塔，令人感觉犹如飞升至天堂，斯里兰卡的景色的确不会令人失望。中世纪的阿拉伯航海家将这块在印度东南方垂落的梨形的泪滴称为“意外发现的珍宝”（serendip）或“宝石之岛”。一位18世纪的英国作家由此造出了“意外发现珍宝的能力”（serendipity）这个词。1972年以后，这里更名为斯里兰卡，这是僧伽罗语，意为“灿烂的土地”。

但斯里兰卡却是那些被黑暗笼罩的地方之一，如同塞浦路斯、科索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 Karabakh）一样，对于发展中世界而言，这倒并不是不寻常的。即使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的行为狭隘而丑陋，也并不影响地球的壮丽。在每一个这样的地方，全新的历史难题使政治图景如谜题一般，探寻解决问题之道的可能性就犹如在迷宫中寻找出口一般。当地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样一个偏执的观点，正是海岛的地理条件形成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及岛上起伏的山脉造成的地区间的隔离——这也正是斯里兰卡的魅力所在——促成了斯里兰卡政治的特点，偏执与狭隘。

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占斯里兰卡2000万人口的四分之三还多，却生活在恐惧中，担心被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压倒。泰米尔人尽管只占斯里兰卡人口的18%，但在理论上却可以发动住在保克海峡另一端的印度东南部的6000万与他们同民

---

<sup>①</sup> 美国之外的其他媒体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都对斯里兰卡进行了与美国媒体相比更为深入的报道。

族同信仰的同胞。泰米尔人侵犯僧伽罗人唯一的故乡，且并不只是古代历史上的事件，还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今的泰米尔恐怖主义即为明证。斯里兰卡学者西尔瓦（K. M. de Silva）写道：

斯里兰卡位于南印度的海岸附近，特别是距离（印度的）泰米尔纳杜邦极近，只被一片狭窄的浅湾分隔开来。这种地理位置更加强了僧伽罗人内心作为少数派的感觉。他们通过宗教——上座部佛教和语言——僧伽罗语得到民族特质的认同感。佛教在斯里兰卡繁荣发展，而在其发源地印度却已消失，但他们以此为傲。他们的语言僧伽罗语根植于古典印度语言，但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是斯里兰卡的语言了，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并不流传。<sup>①</sup>

实际上，僧伽罗人有一种历史使命感。西尔瓦曾写道，（僧伽罗人）在印度教复兴运动浪潮的侵袭下维护上座部佛教，而南印度正是这种浪潮的发源地。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似乎是一个孤独的民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多少同胞。他们已经被大部分信奉印度教的印度的众多人口推到了最后的堡垒——斯里兰卡南部三分之二的领土。因此，为了他们民族的家园，僧伽罗人必须寸土必争，维拉孔（Bradman Weerakoon），斯里兰卡前总统和总理的顾问这样告诉我。而且，占人口多数的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常年被更有创业精神、更有活力的少数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所包围，这种感觉就如同在欧洲列强统治下的宗教压制一样，先是信

---

① K. M. de Silva, *Reaping the Whirlwind: Ethnic Conflict, Ethnic Politics in Sri Lanka* (New Delhi: Penguin, 1998), p. 8.



奉基督教的葡萄牙，随后是荷兰和英国，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中期。<sup>①</sup>

因此，僧伽罗人就像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和伊朗的什叶派教徒一样，虽然人口占多数，但却有着一种充满危机的、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的情结。概括来讲，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不像其他佛教徒那样严于律己、善于思考。他们是激进宗教人士，有着“鲜血与土地”的认同。这种认同可从 2300 年的佛教崇拜中找到踪迹，那激动人心的建筑与雕塑，耀眼的黄铜制的服饰，真金白银制成的器物，红色与金色的灿烂的雕像。公元前 3 世纪孔雀王朝的伟大帝王阿育王的弘法将这些艺术传统从印度传到这里。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其他信仰一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专注于精神追求，因而不崇暴力，但又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如种族划分、领土争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引发暴力和仇恨。（重申一点：这并不是东方特有的弱点，因为西方宗教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有同样的过失。请记住，尽管我提到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是因为他们构成了这场战争的大致轮廓。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暴力行为是由基督教徒犯下的，特别是天主教徒，战争的双方都有。实际上，基督教徒是主要的恐怖主义者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对于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来说，由于公元五六世纪在印度南部的印度教取代了佛教成为主要宗教，他们也成了具有多数民族情结的少数民族。随后，斯里兰卡中北部的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一个富饶繁荣的信奉佛教的城邦，受到了来自印度南部的入侵，到 13 世纪之前，形成了一个泰米尔人的王国，

---

<sup>①</sup> K. M. de Silva, *Reaping the Whirlwind: Ethnic Conflict, Ethnic Politics in Sri Lanka* (New Delhi: Penguin, 1998), pp. 19, 82.

这也为今日斯里兰卡东部和北部泰米尔人占多数的格局打下了基础。<sup>①</sup>

在这个国家独立后的经历中，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内战就占了四分之一世纪，证实了这两个团体之间深存的疑虑。僧伽罗人不得不应对泰米尔游击队的叛乱，它们与更广为人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一样严酷而具有毁灭性。而泰米尔人则不得不应对主要由僧伽罗人构成的政府机构的高压统治、差别待遇以及需要依靠自身来保护的共同权利。正如维拉孔等人所说，斯里兰卡就是一个例证，可以看到，几十年来，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群体是如何利用民主来表达自身的权利要求，而这并不像我们在西方所理解的，仅仅是一种个人权利的表达。

早在 1948 年独立后的几年中，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就已经开始争执。20 世纪 50 年代，僧伽罗人举行示威，反对政府给予泰米尔人少数族群权利，在政府做出让步收回承诺之后，泰米尔人又举行示威活动。泰米尔暴徒在斯里兰卡北部袭击了僧伽罗人的住宅和店铺，而僧伽罗人在斯里兰卡西南部泰米尔人聚居区袭击泰米尔人的住宅和店铺。同时，政府安全部门越来越低效，到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更多的僧伽罗民族主义分子。僧伽罗政府将泰米尔人作为自己过失的替罪羊，还提高僧伽罗语的地位，使其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在所有公共领域，僧伽罗人都受到特别优待：多数民族不仅在安全部门，而且在行政部门中也

---

① John Richardson, *Paradise Poisoned: Learning about Conflict, Terrorism and Development from Sri Lanka's Civil Wars* (Kandy,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thnic Studies, 2005), pp. 24 - 27; Kingsley M. de Silva, *Managing Ethnic Tensions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pp. 361 - 368; Tom Lowenstein, *Treasures of the Buddha: The Glories of Sacred Asia* (London: Duncan Baird, 2006), pp. 62 - 66

占据了主导地位。选区的划分也使农村的僧伽罗人口获得压倒性的影响。<sup>①</sup>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斯里兰卡已经不再是一个世俗的多民族国家。在这里，僧伽罗人占优势地位，佛教为国教，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公民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现象发生的同时，国家的民主制度却从未退化为专制制度。僧伽罗政治家，包括 1960 年成为世界首位女总理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始终维持着大多数僧伽罗人的这种情绪，而未曾努力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僧侣使这种优越感变得令人无法容忍。他们以一种中世纪神职人员的方式使用着政治权力，回首过去，他们曾经是锡兰国王背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力量。

尽管如此，糟糕的经济状况，包括上涨的油价使大批僧伽罗青年或是失业，或是工作机会有限，导致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出现了游击运动，其拥护的意识形态融合了佛教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区之间的杀戮取代了罢工和示威。1971 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民族分子的暴动导致一万五千人死亡，而 1989 年的一次暴乱可与秘鲁的“光辉道路”游击队组织的暴动相提并论，导致 5 5 万人丧生。遇难者中很多是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惨状难以用语言表达。正是果断终结这种局面的能力在 20 年后最终给予军队足够的自信来击退泰米尔反叛分子。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安全部队凭借绝对的权力，已经沦为无情的犯罪组织。美国学者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在他关于斯里兰卡的著作《中毒的天堂》（*Paradise*

---

① 关于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冲突的背景，很大部分的信息来源于理查德森（Richardson）中立而详尽的著作，以及西尔瓦（de Silva）的同样全面的著作：*Reaping the Whirlwind*。

*Poisoned*) 中写到了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年轻女子梅纳姆佩里 (Premawathi Menamperi)。1970年, 她住在斯里兰卡最南端的僧伽罗人聚居区。由于被控与极端马克思主义组织有联系, 她被警方控制。并且, 被剥光了衣服, 据说被强暴多次, 然后赤裸着身体在城中游街, 而她曾经扮成女王在这里参加新年的游行庆祝活动。最后, 她被一位警官用冲锋枪射杀。斯里兰卡可能曾是一个民主政体, 但在其获得国家地位仅仅二十年后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公民社会了。

这个年代, 民选政府本身渐渐转化为铁托主义及其他更为温和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变体。同时, 1972年, 韦卢皮莱·普拉巴卡兰 (Vellupilai Prabhakaran) 建立了泰米尔新虎 (Tamil New Tigers) 组织, 随后, 这一组织的名称通过全球媒体广为人知: 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 (LTTE), 简称泰米尔猛虎组织。普拉巴卡兰其实是一位基督教徒, 这是另一种人类能动性 (human agency) 的例证。如果普拉巴卡兰这样一个人不存在, 尽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族群之间的冲突如何惨烈, 内战也可能并不会爆发, 或者至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展现。普拉巴卡兰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头号被通缉的恐怖分子之一, 他和他那些最令人惧怕的能干的游击队领导者, 是两个重要因素的产物: 针对泰米尔人的等级歧视以及他们桀骜不驯的中产阶级青年出身。他年轻时求知若渴, 饱读关于拿破仑诸次战役的书籍, 尽管他也见缝插针地读漫画书, 但更多的是在父亲身旁听大人谈论政事, 讲述僧伽罗政府如何折磨他的泰米尔同胞。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传说中的泰米尔武士卡塔波曼 (Veerapandia Kattabomman), 还有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Subash Chandra Bose), 这位孟加拉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排斥甘地的不抵抗主义, 奉行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主义, 在印度与英国人对抗。

年轻的普拉巴卡兰用弹弓和气枪射杀动物，并练习自制炸弹。他把大头针从自己指甲缝里扎进去，以提高自己对疼痛的耐受力，还用针刺死昆虫，以使自己做好拷问敌人的准备。起初，他带领猛虎组织进行抢劫、募集资金，用于在偏远的丛林地带训练队伍，并不辞辛苦地对组织成员的候选人进行筛选。“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惧怕鲜血，”他在斯里兰卡北部泰米尔人居住的城市贾夫纳指责学术界时曾这样说道，“没有什么斗争是不会带来杀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僧伽罗人占主导地位的安全部门实践了他的理论。猛虎组织实施的小规模的杀戮行为却引发了警察在僧伽罗暴徒的帮助下针对泰米尔难民的大范围的报复行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几十年来社群之间的仇恨和民主暴政把斯里兰卡推到了灾难的边缘。<sup>①</sup>

如前所述，普拉巴卡兰本人是一位基督教徒，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其他一些重要成员也是基督教徒。在这场悲剧中，宗教因素远不如民族因素重要；永远不要忘记的是，猛虎组织压迫的印度教徒与佛教徒同样多。

1983年7月23日，内战正式开始。普拉巴卡兰精心策划并亲自领导了针对贾夫纳大学附近的斯里兰卡巡逻军队的袭击，包括地雷爆炸和自动武器开火。参与巡逻的15名战士中有13人身亡。随后一周内，在首都科伦坡和其他僧伽罗人居住的区域爆发了动乱，与僧伽罗人友善为邻几十年的泰米尔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产业付之一炬，遭受着暴打、轮奸、谋杀，甚至被活活烧死。正如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发生的一样，出于对泰米尔

---

<sup>①</sup> Narayan Swamy, *Tigers of Lanka: From Boys to Guerrillas* (New Delhi: Konark, 1994), pp. 40–92; Mary Anne Weaver, “The Gods and the Stars,” *New Yorker*, Mar. 21, 1988; Richardson, *Paradise Poisoned*, pp. 351–352, 479–480.



人的选票的考虑官方开始介入印度的调查分析局——简称 RAW 的间谍机构建立了训练营培训好战的泰米尔青年与僧伽罗人作战，尽管如此，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仍试图进行调解。20 世纪 80 年代末，印度军队曾作为维和部队驻扎斯里兰卡，最终却与泰米尔猛虎组织这一印度曾经帮助训练过的组织作战。印度人最终彻底失败，撤离了斯里兰卡。1991 年猛虎组织的一位女子以自杀式炸弹的袭击方式刺杀了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sup>①</sup>

1983 年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在吞没了七万人生命的这场内战中，斯里兰卡成为新闻报道中一个悲哀的角色：一场正在上演的人道主义悲剧，却遭到封存，不得而知。特别是在美国，似乎战争越惨烈，就越不为人所知，或越不受关注，因为在当时没有多少人认为这个小岛具有战略价值。

在战争进程中，普拉巴卡兰将泰米尔猛虎组织变成了一个准邪教式的恐怖组织，他本人则在其中被奉为神灵。已故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拉杜曾这样写道，“要理解猛虎组织，可以想象一下圭亚那的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还拥有‘海军’和‘空军’，以及约两万名全副武装的狂热的追随者”。<sup>②</sup> 实际上，普拉巴卡兰的猛虎组织是世界上第一支拥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的游击队叛乱组织。空军的机型是捷克制造的兹林 Z-143S，海军更为重要，其主要组成是装有炸药的拖网渔船和一支小型的潜艇部队。在猛虎组织控制下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要求每个家庭必须有一人加入猛虎组织。猛虎组织还有一个分支，称为黑虎队，

---

① 被刺杀时，拉吉夫·甘地是总理竞选者，还未当选。——译者注

② Michael Radu, "How to Kill Civilians in the Name of 'Human Rights': Lessons from Sri Lanka," E-not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pri.org, February 2009.

专门从事谋杀和暗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猛虎组织的自杀式爆炸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一直是这一领域中的先锋。在战场上，猛虎组织将成千上万的平民作为人体盾牌，用孩子们来充当搬运工。<sup>①</sup> 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发展史表明，执迷不悟的暴力行为，在大量平民中混入战士，肆意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这些都不是穆斯林或阿拉伯—波斯世界独有的罪行。

猛虎组织还象征着另一种令人极为苦恼的现象：似乎永久的社会动乱与随之而来的国家权力的缺失。21 世纪初，大众传媒和武器技术的发展使那些在联合国没有正式代表甚至几乎没有机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安全领土的组织鼓起了勇气、壮起了胆子。正是因为这些组织无关国家治理，也就省去了妥协的需要，可以脱离道德的限制而生存。<sup>②</sup> 这类组织，例如黎巴嫩真主党、基地组织、塔利班和泰米尔猛虎组织，所具有的长期性和致命性恰恰直接源于其正式的主权责任的缺失。与基地组织作战使美国政府多少丧失了理智，同样，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战斗也对斯里兰卡当局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其民主管理本身就远远弱于美国的民主制度。

2008 年末，猛虎组织内部的叛乱使斯里兰卡东部脱离其控制，随后，斯里兰卡军队中的精锐之师，大约五万人，开始在北部和西部有条不紊地展开攻势。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从 7000 平方英里左右缩减为大约 30 平方英里，而且斯里兰卡军队从陆地

---

① Michael Radu, "How to Kill Civilians in the Name of 'Human Rights': Lessons from Sri Lanka," E-not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pri.org, February 2009

② Jakub J. Grygiel, "The Power of Statelessness," *Policy Review*, April/May 2009.

和海上对其形成合围之势。两军对垒之间，还有 20 万泰米尔平民，据称猛虎组织将其用作人体盾牌。猛虎组织将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招数发挥得淋漓尽致，遁身于平民之中。然而，僧伽罗政府军在面对这一道德窘境时毫不退缩。他们用迫击炮和多管火箭炮炮轰平民，然后使其断粮，即使在收复失地、肃清残敌时也是如此。据报道，1983 年开战以来死亡的 7 万人中有 10% 是在 2009 年战斗的最后几个月中丧生的，其中大部分是平民。<sup>①</sup> 而且，面对泰米尔猛虎组织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最为残忍的组织之一，斯里兰卡政府逐渐赢得的胜利只会使科伦坡的政治局面更为严峻。政府不仅粗暴地滥用那些反对猛虎组织的泰米尔平民的权利，就连具有独立思想的僧伽罗人，特别是记者，也被追捕、杀戮。

“谋杀已成为国家用于控制新闻出版的主要手段”，2009 年初，记者拉桑塔·维克拉马通加（Lasantha Wickramatunga）在自己创作的讣告中预期自己被刺杀时这样写道。据说他最后被铁棒尖端穿透脑壳而死。“如果有着各种社会关系的拉桑塔都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那么他们就能对任何人这样做。”当地的一位记者这样告诉我说。这位记者还给我讲述了他们被打得浑身青紫的故事。科伦坡的气氛是一种极端的自我审查——“最糟糕而且最阴险的那一类”，另一位记者告诉我说，“拉桑塔的遭遇真正地吓到了我们。像我这样的人认为活着比报道新闻更重要”。我遇到的记者中几乎没有人愿意越过雷池，公开地攻击政府。美国政府需要一边应对独立的世界媒体，一边在伊拉克镇压暴乱；而斯里兰卡政府在获取胜利的征途中从未遭遇这样的挫折。

---

<sup>①</sup> Al Jazeera, May 20, 2009.

2009年春季西南季风将要到来之际，我访问了斯里兰卡，当时泰米尔猛虎组织正坚守他们在东北部的穆莱蒂武区最后一两平方英里的土地，还有困在其中的成千上万的作为人质的平民，斯里兰卡政府即将取得对泰米尔猛虎组织这一具有一些非传统特点的法西斯组织的最终胜利。但是，斯里兰卡也处于恐惧之中。媒体通常是自由社会的守护者，但在斯里兰卡，它们已经被政府在心理层面上与公众分隔开来。随着战场上胜利的临近，斯里兰卡政府的人权问题也逐渐令公众无法容忍。在这个位于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交汇之处的岛上，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的文明的分水岭从未如此凸显，尽管起初这并不属于宗教纠纷。

一位外国专家告诉我说：“自从2005年拉贾帕克萨家族掌权后，绑架和失踪事件迅速增加。”他指的是2009年我访问斯里兰卡期间统治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三兄弟：民选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国防部部长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Gotabhaya Rajapaksa），以及总统最信任的顾问巴泽尔·拉贾帕克萨（Basil Rajapaksa）。这三人体现的统治风格与前任斯里兰卡政府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前统治斯里兰卡的森纳那亚克家族和班达拉奈克家族是出身于科伦坡的精英，而拉贾帕克萨家族则代表了农村地区多少有些仇视外国的、半文盲的、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口的集合。关于其与下层社会以及与毒品、人口走私的深入联系，既有流传的谣言，也有来自外国使馆的可信的报告。拉贾帕克萨兄弟对政权的巩固就相当于通过民主手段实行政变。

2003年时，除了战争本身，斯里兰卡相对而言并没有多少人权问题，而自2009年，几乎每年有1000起法外处决和失踪事件。这些谋杀和绑架事件主要针对的是泰米尔青年，但是也针对

记者、律师和其他科伦坡精英阶层，而肇事者则是军事情报机构控制下的黑暗的下层社会组织，这些事件也会报告给政府的高层领导人。

还有一些更出名的案例。例如，一家法国非政府组织雇用的救援人员，包括 16 名泰米尔人和 1 名穆斯林，于 2006 年在东部的亭可马里港附近被射杀，子弹从脑后射入，像执行枪决一样。科伦坡市中心和乡下遍布军警路障，泰米尔青年被绑架，并被送往拥挤的收容所。由于这一政体的成员较为单纯，来自中国的与道德无关的援助，政府的不合法行为，加之军事和安全机构的残忍野蛮，使得外交官和人权工作者担心战争的压力会最终使斯里兰卡政体在获得划时代的胜利之时转化成缅甸和津巴布韦一类的政体，这种担忧使人联想起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发生在阿根廷的变化。在僧伽罗神职人员和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拉贾帕克萨兄弟从僧伽罗人的历史中提取出了一个根植于民族特性的皇家王朝，表面上看类似于古代在康提的佛教诸国，竭尽全力地保全本民族，可以不对议会和内阁负责；然而民主却孕育出了家族政治。彩色的旗帜在四处飘扬，歌颂赞美在这场针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伟大战争中的英雄。

拉贾帕克萨兄弟为之奋斗的政体并非康提古老的佛教王国政体，两者并不相同，后者是纯佛教的，而前者却是一个综合体。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展开围攻，试图征服康提王国。而康提王国凭借其在海岛中央的位置以及多山的地形和广袤的丛林，一直保持着独立，直到 1815 年被英国人攻陷。康提王国的统治者那耶卡族人原本是信奉印度教的南印度人，尽管他们保护、支持上座部佛教，但也为其信奉佛教的男性继承人寻找信奉印度教的新娘。英国人终结了这一王朝，由此中断了佛教和印度教之间的这种联系，为后殖民时代斯里兰卡政治的种族分化搭建



了舞台。上座部佛教专注于道德规范和从世俗存在中的解脱，这对于锡兰农民而言过于清苦，因此需要印度教诸神提供必要的色彩和魔力，这才是真相。在距离康提几英里的丛林深处，在叶片闪亮的茶园中，在中世纪的加达拉德尼亚寺（Gadaladeniya）、兰卡蒂拉克寺（Lankatilaka）和恩贝卡寺（Enbeka）那黑石砌成的门廊中，我看到了同一屋檐下并立的佛陀和印度教众神的雕像，虽笼罩在黑暗中，仍庄严华丽。

在恩贝卡寺，佛像上覆盖着用以防护的印度教的挂毯，我掀起挂毯的一边来瞻仰佛像。在兰卡蒂拉克寺，我看到佛像四周环绕着各种祷文，敬献给来自印度教、佛教和源于波斯的宗教的各位神灵——荷色神（Upulvan）、萨满（Saman）、毗沙那（Vibhishana）和塞建陀（Skanda）。在佛教圣地加达拉德尼亚寺，我见到的石刻风格也是基于南印度安得拉邦信奉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石刻风格。西南季风带来的滂沱大雨激发出心灵和艺术的盛会，雨雾席卷这个丛林王国之时，人们在树下尖叫、拍手。我想，这才是斯里兰卡真正的传统，泰米尔猛虎组织和拉贾帕克萨兄弟，却对此犯下了暴行。

一位外交官告诉我说，西方应该排斥拉贾帕克萨政权，不必担心其成为中国大国战略中的关键一环。正如他所见，在美国的利益中，与中国在印度洋上多建一个港口相比，投入美国经济的成百上千亿美元的中国资金占据着更为核心的位置。在任何情况下，相比美国，印度海军和日本海军都会对中国在印度洋兴建的港口更为忧虑。而且，更类似于缅甸政权形式的斯里兰卡政府过于腐败，因此也不太能够在其他领域胜任，尽管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对拉贾帕克萨兄弟来说，他们轻视西方和美国，充满了为自己辩护的正义感。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下面这段历史：

2006年，一次，当新上台的拉贾帕克萨政府从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缔结的毫无意义的停火协议（双方依旧向对方射击）中撤出时，猛虎组织控制着斯里兰卡三分之一的国土。直到那时，美国政府仍然在增加对斯里兰卡政府的援助，这是“9·11事件”后美国战略的一部分，而猛虎组织则被认为是与基地组织类似的恐怖组织。但是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当选，誓要最终赢得这场战争。2006年他也非常走运：由于普拉巴卡兰一位重要的盟友卡鲁纳上校（真名为 Vinayagamorthy Muralitharan）的背叛，猛虎组织占领的斯里兰卡东部地区被放弃。现在到了乘胜追击夺取最终胜利的时候了。然而，终止这次战争意味着要正式撕毁停火协议，加之拉贾帕克萨统治下的科伦坡不断地侵犯人权，美国停止了对斯里兰卡的军事援助。因此，斯里兰卡的消防雷达、“休伊”直升机或是 C-130 运输机，都再也没有备件的供给了。斯里兰卡军队此前对于其海域雷达探测充满信心，但美国很快终止了所有的服务，也不再供给配件。海军此前依赖来自美国的 30 毫米自动炮作为与猛虎组织自杀式袭击对峙的手段，但是海水对设备的侵蚀严重，又没有后续的配件供给。斯里兰卡人感到当自己正有效地应对无政府主义叛乱时，美国人在他们面前摔上了门。“正在他们的荣耀时刻，‘国际社会’却在他们脚踝上咬了一口”，科伦坡的一位外交官这样描述道。

同时，中国感觉到了机会的降临，开始援助斯里兰卡越来越多的武器和弹药。与美国的相比，中国的消防雷达质量差，但至少配件是可以供给的。来自北京的军事援助很快从头到脚地将斯里兰卡武装了起来：军事关卡装备的冲锋枪是中国的 T-56、俄罗斯 AK-47 的仿制品，即为明证。在联合国安理会，每当西方大国想要谴责斯里兰卡时，中国都会在背后为斯里兰卡撑腰。中国还在其军事院校中为斯里兰卡军官提供培训机会。如同在乌兹

别克斯坦和尼泊尔一样，斯里兰卡政治自由的缩减导致西方弱化了与其的关系，而中国人却认真地开始强化与其的关系。

斯里兰卡其他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来自巴基斯坦、伊朗、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利比亚，甚至来自以色列。以色列向斯里兰卡海军提供了“德沃拉”级巡逻艇。非西方世界不那么被人权问题所困扰，在其支持下，2008年斯里兰卡针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军事行动不断加速，军中成立了新的师级机构和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中国坚实的支持给斯里兰卡带来了安全感，斯里兰卡军队有条不紊地、耐心地向前推进，不受任何政治时间表的驱使，并将指挥权充分移交给战场上的军官。同时，斯里兰卡海军在印度洋东南方击沉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母舰，或称浮动仓库。这支军队中的士兵都是从僧伽罗腹地最贫穷的内陆村庄中招募的，他们的表现令人难忘，但对当地人却没有一丝真情实感。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想过要为泰米尔人修建学校或打挖水井。这完全就是一场战争，成千上万的平民陷入其中，成为人质。在2008年和2009年的战斗中，胜利和一千多名僧伽罗士兵的牺牲使政府毫无妥协的意愿。国防部部长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对中国、俄罗斯和以色列进行了正式访问。斯里兰卡的贷款来自利比亚，石油来自伊朗，还有中国提供资助并在汉班托塔建设代表目前世界最先进水平海港，西方在这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了。

斯里兰卡能够在拒绝西方的同时赢得战争的胜利，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战略考虑。尽管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这样的组织一定会受到欢迎，然而这一目的达成的方式却展现了中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崛起为受到其影响的国家和政权带来的令人忧虑的反响。西方在亚洲海上地区影响的衰落，尽管在更广的历史跨度中是完全自然的，特别是鉴于达·迦马的航程之后西方给当地造

成的创伤，这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良性的现象，但却并非完全有益的。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在给予军事援助的同时还要推进人权宣传。中国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也不允许自己的内政受到干涉。中国的外交政策无论如何也不是极端的或者好战的，然而却体现了最简朴的现实主义。这表明了世界上新出现的两极现象：将人权纳入政策考量的国家，以及在决策时不考虑人权的国家。

然而，尽管中国在斯里兰卡打击猛虎组织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还不能因此而得意起来，原因很简单，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看，斯里兰卡仍处于印度的阴影之下。是的，1987年印度军队对斯里兰卡的干预是灾难性的，但本质上是为了保卫泰米尔人并终结与猛虎组织的战斗而侵略了斯里兰卡，猛虎组织不能容忍除了自身之外任何其他力量。然而，今日的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要好于其与其他较大和中等规模的邻国的关系，例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sup>①</sup> 由于1998年的自由贸易协定，斯里兰卡与印度的贸易交往十分可观：印度在斯里兰卡的进口中占主导地位，还是斯里兰卡的第三大出口市场。<sup>②</sup> 印度对斯里兰卡的天然影响力显而易见，斯里兰卡独立之际由于惧怕印度入侵，如同在印度大陆的海德拉巴和果阿可能发生的那样，而与英国签署了一项防御协定。正如我们看到的，印度可能会给其周边那些半失败的国家带来困扰，但同时，这些国家无论多么暴躁，也必须就印度做出自己的地缘政治考量。例如，巴基斯坦对阿富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支持完全可以这样解释：巴基斯坦想要在中亚的纵深树

---

① 印度与马尔代夫和不丹关系密切，但这些国家规模较小。

② 斯里兰卡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主要出口商品是纺织制成品，如女用内衣。

立一个劣等的伊斯兰国家，以此来对抗印度。因此，在将所有因素考虑进来后，斯里兰卡新近出现的亲中国的政策倾斜也只是与此相关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的海上竞争升温之际，斯里兰卡将不得不小心地在两个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以获得某种虽不结盟但能起到结盟作用的关系状态。斯里兰卡的穆斯林人口不断增长，影响力不断增大，其在内战中欠下中国人情，地理上又毗邻印度，最终将成为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趋势的见证者。

尽管如此，科伦坡政策选择中心（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的执行主任潘奇瑟西·萨拉瓦南姆特（Paikiasothy Saravanamuttu）指出，印度已经在与斯里兰卡的关系中做出了妥协，其原因与其说是其1987年失败的干预行动，倒不如说是泰米尔纳杜邦这个导火索。印度的这个邦与斯里兰卡毗邻，这里是斯里兰卡处于围困中的少数民族泰米尔人的民族家园。由于泰米尔纳杜邦对德里的政治家施加了政治压力，印度当局需要努力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尽管其同时需要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竞争，努力赢得科伦坡的僧伽罗人当局的友谊。正如萨拉瓦南姆特所说的，印度与这个海岛的非常纠结而充满困扰的关系使得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纠纷的解决与印度的利益息息相关。印度比中国更加希望在斯里兰卡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

2009年春季，政府有条不紊的攻势转化为“不接受战俘”的态度。5月18日，战争宣告结束，普拉巴卡兰的尸体在电视上展示，泰米尔猛虎组织占领的最后几百码领土也被政府收回。次日早晨，由于误闯禁地而被关押的我平安出狱，开车驶过僧伽罗人南部沿海的心脏地区。到处都是游行的人群，旗帜飘扬，人力车排成一队队按着喇叭，年轻人一边大喊着一边放鞭炮，尽管其中很多人都没有稳定的工作。拉贾帕克萨总统的画像张贴在各处。村民们在道路两旁向过路者提供放在棕榈叶上的免



费的食物。普拉巴卡兰的尸体被拖出来，人们燃烧他的画像以泄恨。我从这些年轻人的行为中感到一种骇人的、荒唐的厌倦感，仿佛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是这群人可以放火点燃泰米尔人的家园，就像早些年发生的那样。但值得注意的是，我距离科伦坡这个各民族人口混居的中心地带越近，这种表现就越不明显。

的确，这是值得庆贺的。与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国所做的相比，普拉巴卡兰夺去的生命和造成的破坏要严重得多，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得多。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只能幻想这种鲜明的、显而易见的胜利，因为美国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复制斯里兰卡政府这种获取胜利的方式。

那天早晨，我停留在坦加勒（Tangalla），收看斯里兰卡国家电视台播出的拉贾帕克萨在议会的胜利演讲。当地为这次活动特别安放了一个巨大的屏幕，上百人聚集在屏幕前，挥扬着独特的斯里兰卡国旗。旗帜上栗色背景下的狮子象征着僧伽罗人，橙色和绿色的小条纹代表着泰米尔人和穆斯林。起初这看起来是一场出色的马基雅维利式的表演：在战争中绝对的无情，在胜利后又慷慨大方。在长期剥夺泰米尔人和媒体的权利之后，拉贾帕克萨反复地提到民族和解。他开始演讲时并没有使用僧伽罗语，而是用泰米尔语演讲。他谈到了一个民族团结的国家：“我们必须团结如一人。”甚至，他还提到了占人口少数的泰米尔人的发展、教育和医疗问题。过去他也曾在国际论坛上这样演讲，但绝不像今日在国内观众面前这般综合全面而充满慈悲。尽管政府并没有宣布具体的项目，但似乎斯里兰卡走上国家复苏之路的希望远远大于过去的岁月。

但是，他并没有对战争的遇难者表达歉意或悔意。几天后，他向康提的佛教僧侣许诺，“我们的祖国永远不会（再）分裂”。

而且，他还告诉这些僧侣，只有两类斯里兰卡人，热爱祖国的和不热爱祖国的。尽管民主并不完美，却能够创造奇迹。几个月后，为了赢得全国大选，拉贾帕克萨别无选择，只能向泰米尔人献殷勤。这引发了佛教领袖在印度教寺庙的公开传道。斯里兰卡的宗教分歧从没有像民族分歧那样大，而民族分歧也被证明是可以沟通弥合的。信奉基督教的普拉巴卡兰死后，斯里兰卡看上去已做好准备进入一个崭新而丰收的历史时期。在访问中，我所遇到的外交官和非政府组织成员总体上都对拉贾帕克萨改过自新的能力表示怀疑。但也有一位希望他们的悲观是不必要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要为此感谢民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正是这场胜利能够实现的部分原因。西方人认为，即使为了最期待的结果，也不能使某些充满争议的手段成为正当的。尽管要赞扬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或许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但中国的援助模式的确有其自己的逻辑。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196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托马斯·霍布斯和沃尔特·李普曼早前已经观察到，执政当局，即使残暴，也胜过没有。哦，我们是如何在伊拉克学到了这一课啊！我们西方人习惯于扫描发展中世界，寻找道德的纯洁性，谴责落后社会中的腐败现象；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却满足于稳定的局面，无论获得稳定的途径是多么的不合法。我们的对外援助强调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而他们则强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执政当局是否文明并无所谓。

我们应该牢记，我们的目标是由我们独特的历史经验决定的。这一目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一直以来就是要限制执政当局的权力，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很轻易地从17世纪的英格兰舶来，而世界其余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不得不从零开始建立合法

权威。<sup>①</sup> 因此，对于许多将要在 21 世纪出现在世界中心舞台的那些国家而言，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总是那么重要。软弱、迟钝或根本不存在的政府机构仍然界定了重要的地理分隔带，正如我们仍然生活在欧洲帝国解体的余波中，这些帝国曾将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落后政体暴露在严酷的现代性前，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几十年。

当然，美国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在印度洋西端的非洲最为明显，但是接下来我想要谈的是缅甸，因为不仅是美国和中国，就连印度也深深地卷入了这一地区。缅甸在孟加拉湾地区的作用将与巴基斯坦在阿拉伯海地区的作用同样关键。巴基斯坦类似于巴尔干地区，具有分离的倾向，而缅甸则类似 20 世纪初期的比利时，毗邻的大国在此群雄逐鹿。<sup>②</sup>

---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7

② 与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高级经理 Pat Garrett 的访谈。

## 第十二章

# 缅甸：印度与中国碰撞的地方\*

雨季的云团压碎了缅甸东部如海草般墨绿的景致。陡峭的山坡上，柚木和椰子树的叶片闪闪发亮，高高的野草肆意地伸展，大雨过后，黑色和赭色的泥浆铺满地面。夜幕降临之际，响亮的蝉鸣声和壁虎扰人的呱呱声似在与滂沱的雨声比试。我蹒跚着踏上三条竹板做成的小舟，经过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溪，进入缅甸。我的向导是一位克伦族的士兵，他手举手电筒，脖子上挂着古老的六伏特的电池，中间用裸铜线相连。前方的危险与其说来自缅甸政府军，倒不如说来自泰国军队。由于原木以及其他资源的商业利益，经过民主选举上任的泰国政府当时是缅甸军政权的密友。泰国总理沙马·顺达卫曾说道，缅甸统治阶层的将军是乐于冥想的“优秀的佛教徒”，生活在缅甸这样的国家就是“生活在和平中”。因此，泰国军队对克伦族士兵保持格外警惕，作为山地部落的少数民族，克伦族从 1948 年起就不断地与历届缅甸政权作战。

---

\* 注：本章中缅甸人名、地名的译法得到了云南李晨阳、祝湘辉两位老师的帮助，特此致谢。

“越南结束了，柬埔寨也结束了，什么时候缅甸也能结束呢？”苏罗基（Saw Roe Key）这样问道。我刚穿越边境就遇到了这位克伦人。一枚毁人足部的地雷夺去了他的一条腿。军政府在缅甸大部分山地的村庄广布这种地雷，面积覆盖了全国40%的土地。有六个以上的民族，包括克伦族，长期在这些地区处于某种叛乱的状态。我在缅甸边境的村落遇到的约二十多名克伦人中，有四人被地雷夺去了一条腿。尽管如此，他们组成了一支杂牌军。一些人穿着绿色的迷彩服，装备有M-16型步枪和AK-47自动步枪；大多数人穿着T恤衫和传统的纱笼——笼基。这个哨卡在山坡下，笼罩在森林的树荫下，其实是一堆乱糟糟的木板搭成的茅屋，建造在高高的支架上，干柚木叶子当作屋顶。村子不断地被甲虫、疟蚊和其他昆虫侵蚀，因此装备了太阳能电池板和制作精巧的供水系统。在印度洋世界的这样一个战略结合处，是游击队活动的一片完美之地。在这片丛林中，不仅反政府的游击队和缅甸政府发生冲突，向东看的印度和向西看的中国同样在这里发生冲突。

苏波帕（Sawbawh Pah），50岁，身材矮壮，头上仅有一簇头发。他开办了一家小诊所，为受伤的士兵和被迫离开家乡的人们服务。缅甸有150万这样背井离乡的人。仅在克伦邦就有3000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华盛顿邮报》称缅甸为“慢动作的达尔富尔”。<sup>①</sup>苏波帕用一种简单的、逆来顺受的语气告诉我说：“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杀掉了我的父亲、我的叔叔和我的堂兄。他们射中了我叔叔的头，还砍下了他的腿。当时村子已经被毁掉了，我叔叔正在寻找食物。”我一边吃着炒面加鸡蛋，用如厕的卷纸替代了餐巾，沉浸在苏波帕讲述的经历中，尽管他那重

---

<sup>①</sup> *Washington Post*, editorial, Aug. 30, 2007



复的讲述使听者精疲力竭。

基图（Kea Htoo）少校是克伦族游击队当地部队的指挥者，由于常年嚼槟榔的习惯，他的嘴唇被染红了，左颊肿胀。他亲眼看到他的村庄和自家的稻米在燃烧。“他们强奸妇女，杀死水牛。”他们，指的就是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或者，如果事件发生在1997年以前，就是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这是缅甸执政集团之前的名称。他和我遇到的其他人一样，包括那四位肢体不全的人，他们都告诉我说，看不到战争的终点。他们并不是完全地为在缅甸建立更好的政权而战；由更加开明的军官作为政府成员，也不是为了建立民主政府或由昂山素季这样的缅甸人来领导，他们是为了克伦族的独立而战。失去一条腿的图路（Tu Lu）曾在克伦族军队中服役二十年。最年长的基昂（Kyi Aung），55岁，已经战斗了34年。这些游击队员没有薪水，只有食物和基本的药品。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已经浓缩成了一个似乎不现实的独立的目标。这主要是因为从1962年缅甸落入军事暴政之后，没有任何人曾经提供给他们任何类似妥协的机会。

目前，缅甸的战争热度极低，军政府诱捕克伦人、掸人和其他族群，将他们关进缅泰边境附近领土上的小堡垒中。然而，这个政权，也被其自身的问题所困扰，军官腐败而士兵常开小差，似乎缺乏取得最终胜利的力量。而这些族群则很强硬，他们与缅甸国家几乎不存在的历史认同导致了强烈的反抗意图，所以他们试图继续战斗。

缅甸巨大的痛苦可以被概括为单一的、显而易见的事实：由于无尽的冲突和因政权分割而造成的经济不发达，使缅甸呈现出了一种原汁原味的落后。因此，缅甸与西藏和达尔富尔成了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它们各自凸显的道德危机深深地激发了西方后工业时代追求道德审美的人们的责任感。1952年英国作家诺

曼·刘易斯 (Norman Lewis) 出版了《金地球》 (*Golden Earth*) 一书，记录了他在缅甸各地游历的经历。这部杰作文风简朴，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克伦人、掸人和其他山地部落的叛乱成为书中的叙事背景，使作者的游历险象环生。只有北部一个很小的地区，居民大部分是克钦人，这里“完全没有土匪或叛军”。他在这里过了一夜，被老鼠、蟑螂，还有一只蝎子折磨了一夜，早晨醒来后依然如故，“有力的犀鸟在头上呼呼地飞过”。的确，游历中所遭受的苦楚只是一笔小小的代价，这个国家的美丽神秘而单纯，道路破烂，也没有适宜的旅馆，在那里“人们寒暄的话题不是股票市场的起伏，而是灵魂的归处。”<sup>①</sup> 尽管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作品，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直到现在仍然毫不过时。想想看，由于全球化，对几乎所有的地方而言，即使是一本十年前出版的旅游书也都会过时了。

但是缅甸不只是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那里的民族斗争也不仅出于蒙昧的利益。首先要明确的是，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由少数民族构成，他们居住在脆弱的边境地区的七个邦，占缅甸的14个省（邦）的一半。一旦军政府倒台，克伦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要求一定会凸显。即使缅甸真的打开妥协的大门，民主也不能帮助缅甸这个民族众多的小国走出困境。不仅如此，缅甸的山地部落是地缘政治这一崭新而更为庞大的画卷的一部分。缅甸经由孟加拉湾，正处于印度洋的前沿。缅甸与印度和中国接壤，这两国都垂涎缅甸富饶的物产：石油、天然气、铀、煤、锌、铜、宝石、木材和水电。中国尤其希望缅甸成为自己的附庸国，以便在这里建设深水港、高速公路和能源管道，为中国西南内陆

---

<sup>①</sup> Norman Lewis, *Golden Earth: Travels in Burma* (1952; reprint, London: Eland, 2003), pp. 137-138, 151, 205.

地区提供海上通道，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也将从这里得到波斯湾运来的石油。这些路线必须从印度洋向北经过历史上一直受缅甸民族叛乱影响的地区。

简言之，缅甸为理解未来的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尽管这是一件值得争夺的奖品，但中国和印度现在的做法都不太含蓄。由于燃料价格波动，海滨灾害频发，例如 2008 年缅甸的飓风和 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各国纷纷进入了开发新能源通道的时代。美国海军意识到缅甸及其邻国所代表的重要意义，建议不再永久地在大西洋前沿部署，而应在未来几年、几十年集中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部署军力。对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而言，缅甸这样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现在已经或应该处于其考量的中心位置。

缅甸战略位置重要，自然风光浪漫怡人，这里又发生着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引人注目。一群美国人就被这里的一切吸引住了。出于他们在邻国泰国工作的隐蔽性，我不能指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将泰国作为基地，我也是在泰国与他们会见的。虽然他们从事的工作和服务对象很敏感，但是他们的故事值得讲述，因为他们使用的专业技术及其自身的目标都说明了缅甸的地缘政治利益。

由于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缺乏导致了伊拉克的混乱局面，文化的功效近来成为理解地区冲突的法宝，其实人们忘记了美国最伟大的地区问题专家便是基督教传教士。美国历史上有两类传教的地区问题专家，向古老的阿拉伯传教的分支和向亚洲或者说中国传教的分支。阿拉伯这支是指新教徒传教士，他们在 19 世纪初行至黎巴嫩，最终在贝鲁特建立了一所学校，就是今日的美国大学。这一支的继承者便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务院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亚洲这支的起源同样高贵，也始于 19 世纪，并在冷战早期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许多该领域内的专业技术人士，但其中不少人

在关于中国的麦卡锡主义泛滥期间遭到清洗。就缅甸问题为我提出建议的这位美国人是美国中西部浸礼会传教士的后裔。几代之前，19世纪末，他的祖先来到缅甸，援助这里的山地部落，尤其是掸人所在的几个邦以及边境另一边的中国云南地区。他的父亲被称为“蓝眼睛的掸人”。在入侵日军的铁蹄下，他的父亲逃离缅甸，征召入伍，成为英国的印度军队中的一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指挥着一个掸族营。因此，我这位熟人是在印度和战后的缅甸长大的。在他早年的记忆中，还有这样的场景：在缅甸首都仰光，旁遮普士兵命令日本战俘捡碎石。他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会讲掸族语、缅语、印地语、老挝语以及中国的云南方言和普通话。他毕生都在研究缅甸，除了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曾在印度支那参与美国在越南的行动。

我们第一次谈话是在他的家中，他穿着缅甸传统的笼基，盘腿坐在一个突起的台子上，坐得直直的。他头发花白，面如雕像，声音威严，宛如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他举止气派，彬彬有礼，是一位具有某种东方气质的有教养的、睿智的政治家。他身边散落着几本书和一些照片，有蝴蝶翅膀，有泰国国王和王后，也有他自己的照片，照片摄于越南，当时他还是一位强健的青年，拿着子弹带和大刀。

“中国情报人员当时正开始对反政府的缅甸山地部落的少数民族施加影响，”他告诉我说，“中国人想维持缅甸的专制统治，但是也讲究务实，对于这个国家，他们也有其他的计划。中国的高级情报官员对克伦人、掸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告诫是‘找我们来寻求帮助，不要找美国人，因为我们就在隔壁，而且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地区’。”

同时，他解释说，中国也开始接触泰国的年轻军官。近年来，泰国王室和泰国军队，特别是特种部队和装甲部队，对于与

亲华的缅甸军政府作战的山地部落感到同情；而泰国的非军方政治家是军政府的最佳盟友，各种想要与资源丰富的缅甸做生意的游说集团都努力对其施加影响。总而言之，泰国的民主有时是缅甸民主的敌人。

但是，他暗示说，中国人仍然不满意：他们想要泰国的民主人士和军官两者都站在自己这边，而他们自己也与缅甸军政府及其少数民族反对派同时合作。“一张新的竹幕可能会降落在东南亚”，他担心道。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这不会像铁幕那样成为坚硬稳固的墙壁，也不会成为类似于越南时代的某种想象出来的亚洲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一部分，这更有可能成为中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下的一个不显眼的地区。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忽视正是这种局面形成的因素之一。在乔治·W. 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就多少反映了这种情况。中国人在缅甸和泰国的各个层面运作，而布什政府的首席代表们却经常缺席东盟的峰会。过去十年中，中国建立了27个单独的东盟—中国机制，而美国在三十年中只建立起了7个。<sup>①</sup> 我这位朋友希望美国重新回到这场博弈中。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令他满意。<sup>②</sup>

“要推翻缅甸专制政权，”他说道，“这些少数民族需要全职的顾问团，而不是靠进进出出的雇佣兵。这包括驻在泰国的一个协调中心，但还需要一个平台，让缅甸军队中所有心怀不满的军官能够投靠过来。”而且，与回归越南时代的战略相比，他谈到

---

① Dana Dillon and John J. Tkacik Jr., “China’s Quest for Asia,” *Policy Review*, December 2005/January 2006.

② 奥巴马政府指派了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特使、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特使和朝鲜问题特使，使（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得以从上述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印度洋和亚太地区事务。从结构上来说，就应对崛起的中国和印度而言，美国国务院的组织结构比几十年前更佳。



了更含蓄、更隐秘的一种支持方式，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阿富汗圣战组织提供巴基斯坦境内的基地来打击苏联一样。亲克伦族的泰国军方可能重掌国家政权，即使其不能掌权，如果美国发出信号，表示要向缅甸的山地部落提供正式的支持，反抗一个几乎全世界都仇视的政权，那么泰国的安全机构也会自行找到援助的方式。

“中国边境附近的掸人和克钦人，”他继续说道，“受到了缅甸军政权的不公平待遇，但是他们对于优势明显的中国也感到紧张。他们感觉受到了挤压。而缅甸山地部落的团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有外部的力量提供一个机制，让这些部落都聚拢过来。”

缅甸不应该和巴尔干地区或者伊拉克混为一谈。在那些地区，在独裁主义的甲壳下，民族和宗派的分歧几十年来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一旦中央集权瓦解，矛盾立即爆发。几十年来，山地部落一直在与历届缅甸政权作战。战争疲劳已经来到，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如果现政权解体，这些部落还会再与下一个政权斗争。与其说他们之间争执不休，不如说他们分裂不和。他告诉我说，即使在他们内部，掸人在历史上也曾被分隔为几个国家，由较小的国王治理。因此，对于美国人而言，或许应在此充当一个静静的组织者的角色。

他还提到，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警告说，美国人必须保持对这一地区的接触，作为对“中国巨人的平衡”；美国作为唯一的区域外大国，要有必要的手段来放缓北京前进的步伐，尽管美国本身并没有在亚洲的领土诉求。整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越南，都有其害怕中国的历史原因，希望美国在缅甸问题上抗衡中国。泰国将面临王位继承的问题，这将会给其国内政治带来不稳定，因此担心在此期间来自中国的影响。我的朋友说道，即

即使是缅甸军政府，也不想成为一个大中华的一部分，18世纪满族人那漫长的侵略带来的痛苦而血腥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只是因为缅甸的这些将军想要掌权，从而别无选择。

无论如何，缅甸注定将成为中国的能源管道。但它不需要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一个省，并永远地被当地残酷的政权统治：自然资源被掠夺而将军们中饱私囊，奴隶一样地修建能源管道——一部分受跨国公司援助，因此可以作为全球化黑暗而无良知的一面的范例。很多事情可能仍然取决于美国如何行动。我这位年长的朋友熟识的信条是在暗处安静地工作，用自己对这一地区的了解而不是荷枪实弹来武装自己。需要有人来继续他毕生的事业，而且，更具体地说，需要有人来继承他在缅甸内部深处的网络。

另一位在缅甸工作的美国人是塔吴瓦阿帕（Tha - U - Wa - A - Pa），缅甸语意为“白猴之父”，他根据女儿的呢称起了这个绰号。他的父辈也是到这一地区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原本来自得克萨斯。他本人成年以后也和父母一样，一直是某种形式的传教士，但他曾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九年，最后作为特种部队的少校退役。他也会说多种当地方言。与我那一位熟识的朋友相比，他要年轻得多，而且与那一位不同的是，他更为活跃，身体强健、肌肉发达，全身上下充满精力。我的那一位联系人毕生的工作都集中在中国边境的掸邦各部落，而塔吴瓦阿帕多半是在与泰国毗连的缅甸东部的克伦族以及其他部落地区工作，而他运作的网络已经延伸到了缅甸另一端的印度边境。

1996年，他在仰光会见了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当时正好是她没有遭到软禁的那段短暂的时间。这次会见激发他启动了缅甸的“祈祷日”，为缅甸民族团结而工作。1997年缅甸军队的攻势使成百上千的人背井离乡，当时他正独自深入缅甸，

到那些“状态最糟的地方”去，从一个被烧毁的村庄到另一个被烧毁的村庄，从双肩背包中拿出药品分发给村民。他给我讲述了政府军的这次攻势以及其余他所亲历的场面，教堂被付之一炬，孩子们被开膛破肚，全家人惨遭灭门。“这些故事没有让我麻木，”他的眼睛圆睁，面部肌肉紧绷，动情地说，“每个故事都像初次听闻一样。我总是祈祷正义能够得到伸张。”

1997年，在结束了缅甸国内的游历之后，他开始了“自由缅甸游击队”的行动。这项活动有300多名志愿者参加，他们组成43个小型的医疗队，为克伦人、克伦尼人、掸族人、钦族人、克钦人和阿拉干人服务，实际上覆盖了缅甸的整个高原地带，这片地区从三面环抱着位于中心的伊洛瓦底江河谷，这是大多数缅甸人的家园。<sup>①</sup>“自由缅甸游击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救援组织，或者说是非政府组织。

“我们与村民们站在一起，而不是凌驾于他们之上。如果他们无法逃离政府的军队，我们也不能逃离。我们每个小组有一位医生、一位摄影师，还有一位技术人员，负责标记缅甸政府军的GPS位置、在地图上标记宿营地、用长焦镜头拍照等事务，这些内容我们都在网站上展示。我们要沟通五角大楼，沟通人权组织……以更高的道义责任善意地进行干预，因为沉默其实是某种形式的许可。”他继续快速地说道，“非政府组织乐于宣称他们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提供援助的行动本身就是支持一方或者另一方，尽管并不是直接的支持。非政府组织一直都是具有政治立场的。”近期的历史中对此有充足的证据。20世纪80年代，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阿富汗难民中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基本上是帮助阿富汗圣战者与亲莫斯

---

<sup>①</sup> 这里原文用词为Burmans，强调民族性，而Burmese强调的是国籍。

科的阿富汗政府斗争的，同一时期苏丹的救援人员也帮助厄立特里亚人和提格雷人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军事斗争。而在这里的泰国边境，救济品的供应体系中也混有运送枪支的秘密运输。

塔吴瓦阿帕对这一“硬道理”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泰国人在泰缅边境的泰国一侧主持缅甸难民营的工作，民族叛乱分子为缅甸国内背井离乡的人们安营扎寨，克伦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甚至在缅甸军队集中的前沿地带设有流动诊所，而背着背包打游击的自由缅甸游击队实际上是在敌后行动。塔吴瓦阿帕与我的那一位熟人一样，都是逐渐形成的一种特别的行动人员：美国安全机构几乎不能接受这种类型，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某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人更接近。但如果美国想要在地球上这些偏远的地方能够具备不依靠傲慢专横而形成影响力的话，这种特别行动人员所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又是美国所迫切需要的。塔吴瓦阿帕是这样形容佤族的（与他在丛林中和克伦族以及其他部落相处的年头相比，他与佤族几乎没有接触）：

佤族是缅甸共产主义者的主要力量。中国人为他们提供武装。1989年，大约在天安门事件前后，他们宣布独立，打发掉了中国人。他们愿意放弃鸦片种植，改种农作物作为替代，并武装起来打击缅甸军政府。但是他们发现没有西方人愿意买他们的账。自由缅甸游击队现在对佤族有一个小型的医疗援助项目。佤族现在与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丹瑞串通，只是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可能有人怀疑美国政府给予自由缅甸游击队某种资金援助。但是真相更为可悲。“我们的资助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堂组织。我

们的年度预算是 60 万美元。而我们一度只有 150 美元，所有人都在祈祷，所幸第二天得到了一笔 7 万美元的赠款。我们仅能糊口。”在缅甸内部执行一些任务时，塔吴瓦阿帕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起行动。和我的那一位朋友一样，对于他说，缅甸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他毕生的依恋。

“缅甸不是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他告诉我说，“这不是种族灭绝，也不是某种意外。这是一场慢慢扩散的癌症，政府努力地主导、控制并想从根本上同化这个国家所有的民族。”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杰克·丹福德，泰缅边境团的执行主任。他曾在曼谷对我说，缅甸军政府“像上了发条一样坚持不懈，修建大坝、道路和巨型农业工程，接管矿山，铺设管道”，从邻国和外国公司吸引资金，以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出卖自然资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稳固其政权。缅甸这片土地上可见大规模的毒品走私、童兵、强奸，还有佤族军队大规模生产的安非他命。

不久以前，塔吴瓦阿帕曾经在夜晚坐在缅甸的一个山坡上，暴露在缅甸军队和一群难民之间，正是军队逼迫这些难民逃离家园。和他在一起的克伦族士兵向缅甸军队的方位发射了火箭筒，作为回应，缅军士兵开始用迫击炮向他们一轮轮地射击。正在这时，他携带的通信设备收到五角大楼一位朋友的信息，问他美国为什么应该对缅甸产生兴趣。

他回了信息，列出了一大堆原因，从极权主义到阔叶林的破坏，到佛教僧侣遭受的宗教迫害，到利用劳改犯扫雷，还有好多其他的原因。但是他并没有触及多少战略或地区安全问题。正如我所说的，塔吴瓦阿帕是位十足的传教士。当我问到他称呼时，他回答道，“我是个基督徒”。正如这样，他在为上帝工作，道德层面是最首要的，特别是在克伦族人中间，



这个民族中有很多基督徒，都是在像他父母这样的人的影响下改宗的。

来自加利福尼亚拉古纳海滩的退休陆军上校蒂莫西·海涅曼，的确从战略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他也曾是特种部队的一位老兵。2002年，我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见过他，当时他是那里的系主任。现在他经营着一个非政府组织“全球影响”，帮助少数民族，主要是克伦族人；他还管理着大量的跨境项目，特别关注将媒体团队送进缅甸，记录那里的苦难。穿着平底人字拖，魅力十足的海涅曼还是另外一种特别行动的运作者，这种特别行动体现了间接接触冲突的途径。五角大楼主要的计划文件之一，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正强调了这一点。海涅曼告诉我说，他“使条件背景私人化了”。他解释道：“我们致力于建立边界两边的关系网。我们设法为非政府组织找到机会，让他们更好地合作，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需要。我也尽自己的一点职责来说明情况，这样美国就可以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保护国家利益、国际利益和人道主义利益。美国政府的各部门都了解我们的工作。与对黎巴嫩的真主党不同，反对缅甸军事独裁政府，美国没有战略和作战计划。昂山素季几乎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民主优先！’——的象征。在缅甸，民族权利和民族力量的平衡是民主的前提条件。美国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历中并没有得到多少启示。”海涅曼和塔吴瓦阿帕一样，生活仅能糊口，从能弄到赠款和捐助的地方抓一把来，有时候还要自己出差旅费。他发现缅甸是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令人心醉的”地方。

他继续说道，但是缅甸也是一个潜在的朝鲜，对于美国军方和其他部门而言，是一个完美的心理战的靶子。他和其他几位解释道，俄罗斯人在缅甸北部和西部克钦人与钦人的居住地帮助緬

甸政府采铀，朝鲜人则时刻准备着在核技术上帮助缅甸。缅甸军政府渴望具备某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拥有国际影响力，有助于其长期执政。海涅曼又指出，“但是这个政权又很偏执，很迷信。他们在地上转动鸡骨头并以此来决定接下来怎么做”。

“缅甸军队有40万人（美国现役军队有50万人），但却倾向于反叛政府，”海涅曼继续说，“只有在最高层的人才是忠诚的。传播谣言，进行信息战，让军队解体可能费不了多少力。”的确，据报道，缅甸士兵只能拿到他们军饷的一部分，在主要的基地，他们的武器在晚上都要锁起来。但另外，军队构成了缅甸最安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有医院和学校，这也带来了军队中一定数量的效忠者。<sup>①</sup>但是，“低等级军人并不信任他们的上司”，一位克伦人抵抗军士兵这样说道。军政府的领导人丹瑞从前是一位邮局职员，从未去过西方。人们都知道他曾与夫人一起咨询占星家。“他出于恐惧而统治，他并不勇敢”，昂佐（Aung Zaw）这样说道。他是《伊洛瓦底江》（*The Irrawaddy*）杂志的编辑，这本杂志是流亡国外的缅甸人在泰国西北部的城市清迈办的。“而且丹瑞很少公开讲话，他的个人魅力甚至还不及奈温”，奈温是1962~1988年缅甸的独裁者。

海涅曼和昂佐都向我讲述了2005年缅甸迁都的事情，这个政权是如何突然有一天遗弃了仰光，向北迁到了内比都（“国王的居所”）。这是在仰光和曼德勒之间的一座小城，是用缅甸的天然气换来的收入从零开始建设起来的。缅甸的新都坐落在丛林深处，地下燃料库是其突出特征，以抵御这个政权所惧怕的美国

---

<sup>①</sup> Joshua Kurlantzic, “The Survivalists: How Burma’s Junta Hangs On,” *New Republic*, June 11, 2008.

的入侵。迁都的日期是由星相学确定的。海涅曼观察着中国、印度和其他的亚洲国家算计着这个世界上最糟糕、最古怪、最富有同时战略位置最重要的政权之一，以争夺有利位置，这种结果有可能是一场政变或者甚至解体。要是美国能够采用我的这几位朋友倡导的那种耐心、低调又花费不多的接触方式该有多好。

海涅曼在军中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作为伊拉克战争中占领阶段的策划者。他亲眼见证了庞大的军事机器漠视当地现实造成的错误。他将缅甸视为伊拉克的反面，在这里，如果能够聪明地战斗，美国会为自己和他人带来好处。

在曼谷最昂贵的酒店之一的套房里，我见到了另一位为缅甸付出良多的美国人。20世纪70年代，他曾是特种部队的参谋，现在他是新加坡居民，在新加坡的安全产业工作。他喜欢别人用他的缅甸昵称达多提（Ta Doe Tee，意为“游泳的公牛”）称呼他。尽管他穿着定制的昂贵的黑色服装，但他那咄咄逼人的充满肌肉的体格仍然将他的经历彰显无遗。他戴上老花镜，打开一本亮闪闪的黑色活页笔记本，其中有一张印度洋的地图。地图上画着一道线，从埃塞俄比亚到索马里，穿越经过印度的水路，最后向北一直到孟加拉湾，穿过缅甸的中心地带，直到中国的云南省。“这张地图就是一个例子，看看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公牛”解释说。

他又给我看了另外一张地图，这一张放大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对两国边境的奥加登盆地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重要储备都做出了分度标记。地图上的霍比奥被圈住，这是索马里的一个港口，15世纪初中国的海军将领郑和曾到访这里。郑和的宝船船队定期从印度洋来回穿越，途经的正是与今天运送能源的路线相同的航路。“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和天然气将从霍比奥直接海运到缅甸西部”，“公牛”告诉我说，中国人正在缅甸阿拉干邦

兰里岛上的皎漂建设一个新港口。这个港口具备处理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的能力。据“公牛”说，这张地图说明了中国人在整个印度洋的运作是多么容易，“能够引进伊朗和其他波斯湾的能源供应国”。尽管如此，他们的最大问题将是如何切入缅甸。“中国人需要占有缅甸，并使其稳定。”他说道。

中国的西进和印度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推进——使其避免在战略上被中国海军包围——意味着两国在缅甸的碰撞。由于中国和印度正在争夺这地区权力和影响力，缅甸成为一个安静的战略战场。

直到2011年，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缅甸走的是堂堂正正的路线，谴责缅甸政府的镇压行为，并向反对党领导人、曾在新德里求学的昂山素季的事业提供道德支持。在一次访问新德里时，一位印度的高级领导人曾经告诉我说，印度不能只是袖手旁观，看着中国的影响在缅甸扩展。缅甸的丛林也成为印度东部各民族好战的叛乱分子的后方基地。而且，正如《澳大利亚人报》的外国编辑谢里丹（Greg Sheridan）所写，当中国沿着印度和缅甸的边境建立情报收听电台时，印度一直“很吃惊”地看着这样的进展。<sup>①</sup> 因此在2001年，印度决定全面地接触缅甸，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和训练，包括销售坦克、直升机、肩射式地对空导弹，以及火箭发射装置。

印度已经决定修建经过缅甸的能源管道。实际上，在2007年缅甸镇压僧侣时，印度的石油部部长已与缅政府就深海勘探签约。在缅甸西部毗邻孟加拉国的阿拉干邦附近的海面，是良旭的天然气田，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资源储备之一，未来可能出

---

<sup>①</sup> Greg Sheridan, “East Meets West,”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06.

现两个管道系统。一个是中国的，在附近的皎漂港，将来可从良旭甚至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之角的地方运送油气。目的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油轮不用必须从中东启航，穿越整个印度洋，然后经马六甲海峡和印尼群岛，到达距离台湾海峡及美军基地极近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另一个是印度的。印度花费了一亿美元来发展阿拉干港，将其作为开放印度东北部封闭且叛乱频发的内陆地区的贸易窗口。这条管道将向北延伸，穿越阿拉干邦和钦邦，然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经孟加拉国到达加尔各答，另一部分绕着孟加拉国经印度领土到达加尔各答。

这其中没有任何阴险的图谋，完全是正当合理的需求。随着中国和印度的上百万人生活方式的改善，他们将需要更多的能源，正是这种强烈的需求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但是魔鬼就藏在细节中。进入中国中心地带的最直接路线是穿过缅甸，而不是巴基斯坦或者孟加拉国。中国对缅甸的态度碰巧与其对朝鲜的态度类似。对于丹瑞和金正日那种疯狂的本质，北京感知到了，也感到不适。北京也一定更喜欢在道德上不那么令人生厌的领导人作为盟友。但是，正如我们在斯里兰卡所看到的，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的领导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将寻求世界道德的改善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中国在长期对缅甸和朝鲜有兴趣，甚至可能预见在未来某个遥远的重大事件发生后的时刻，民主会出现在这两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缅甸，中国人同时发起了与山地少数民族部落以及其他争取民主的反对势力的接触。据报道，2007年9月缅甸僧侣发生叛乱时，中国非常意外。中国不愿深感被动。与此同时，在短期内，它通过大力支持这个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之一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道德问题不只涉及中国或印度。例如，美国的雪佛龙



公司和法国的道达尔公司都卷入了将缅甸的天然气引入泰国亚达纳管道的项目。问题在于，至少是根据一些人权组织的报道，负责管道安全的缅甸军队沿着管道经过的路线没收村民的土地，强迫村民劳动、种植稻米并搬运军事设备，还犯下了强奸和拷打的罪行。21世纪印度洋的能源政治在聚集力量，缅甸的近5000万人口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成为输家——极权主义、实力政治和企业利润三者汇合的邪恶影响下的受害者。在缅甸东部，森林被毁坏，运载着木材的卡车车队川流不息，开往中国。在缅甸西部，据与我交谈的阿拉干抵抗军讲述，整个生态系统和文化遗址都将因新建的管道而受到影响。

正如在第八章中提到的，阿拉干邦有大量由罗兴亚人组成的穆斯林人口，其中逾20万人因缅甸大规模的军事镇压而在孟加拉国避难。在缅甸众多土生土长的民族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通常长达几世纪的独立状态也是其鲜明的特征，但如今都像罗兴亚人一样在军政府统治下以各自的方式经受着折磨，而他们也有各自不同的需要。因此，即使军政权明天倒台，缅甸在未来岁月里也会出现政治乱局。

这又把我带回到“游泳的公牛”那里，他告诉我说，对于丹瑞统治下的缅甸，他思考了很多。他解释说，地图上主要的航线以及战略专家在全球范围的计划常常受制于一个特定的部落和某个民族分歧。看看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这使他谈到了克伦人、掸人、阿拉干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斗争，这将成为他毕生“活动的剧场”。美国想在缅甸建设“非常规战争能力”，他说，因为中国的因素在缅甸还只是刚刚开始。

讨论涉及的话题与我和其他三位美国人之前讨论的类似。“公牛”谈到了通过兴建学校、诊所和灌溉系统在少数民族山地部落建设、管理网络的必要性。这将会成为美国与中国竞争中非

官方的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被迫接受一个民主的缅甸，联邦程度极高，并与西方有着很强的联系。

但问题是，尽管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和其他我所会见的亚洲专家认为缅甸在美国战略中处于中心位置，现役特种部队的圈子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要服从命令，重点关注基地组织。缅甸并不涉及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主题，即使是罗兴亚人穆斯林，其成为恐怖分子潜力也仍然停留在理论上。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主要忙于印度洋西半部的阿拉伯—波斯事务，对于其东部的这一半的投入要少得多。我的这几位朋友说道，这就是一个例子，可以看到美国对于基地组织势不可当的投入是如何扭曲了其更为宏观的战略视野——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整个印度洋，从非洲到太平洋。

接下来，“公牛”又向我提到了掸人，这是山地少数民族部落中最大的一支，占缅甸人口的9%，其土地面积占全国领土的20%。泰国军方以及王室会通过自身在缅甸东北部的投资来支持美国的援助，通过与其合作，美国可与掸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大量的越境人道主义援助将体现这一关系。他说道，与掸人结盟会使美国获得一个机制来缩减该地区的毒品流，而且能够在中缅边境形成平衡中国的力量。在缅甸未来任何一种民主设想中，掸人都将在议会中控制相当多的一部分席位。“公牛”指出，通过对一个具体的缅甸山地部落的人道主义援助所能得到的，要多于美国耗资实施的许多重大防御项目的所得。在缅甸西部，可以在印度的帮助下将同样的战略用于中国。在未来的岁月中，不只是在伊拉克，在缅甸也是一样，与部落的非正式的关系很重要，他强调说。

“公牛”对于缅甸、东南亚以及像他这样的人在那里所起到的作用充满激情。他属于特种部队中有受挫感的那一代人，

错过了在越南服役的机会，在吉米·卡特执政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执行海外任务的机会。罗杰·堂伦（Roger Donlon）1965年出版的《自由的前哨》（*Outpost of Freedom*）根据他年轻时激动人心的经历写成。堂伦是越战中第一位赢得荣誉勋章的士兵。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牛”驻扎在马萨诸塞州的德文斯堡，那些越战中袭击战俘营的士兵引领他、教导他、指挥他。他充满敬意地重复着那些名字“迪克·麦度斯（Dick Meadows）、格雷格·麦古尼（Greg McGuire）、杰克·乔普林（Jack Joplin）、乔·路普雅克（Joe Lupyak）”——1970年，戴着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队员猛攻河内附近的山西战俘集中营，营救美国战俘，却以失败告终。“越南和东南亚就是他们所谈论的全部”，他告诉我说。

但是，1978年卡特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将近200名管理海外特工的官员解雇或强制其退休。这些人一直在提供情报，其中很多人都在东南亚。中情局暗中进行的网络被破坏。“公牛”讲述说，许多被解雇的官员不愿被“关闭”，决定维持自给的网络，“带上孩子”，像年幼时的“公牛”，继续上路，只是不再受特种部队管理。他们送他去学习航海和飞行，他成为持有执照的货轮船长，也是持有联邦航空局证书的飞行员。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参与东南亚的行动，例如将设备带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他模糊了这种有争议的、阴影下的政府行动和有时用来维持生存的非法手段之间的界限。1988年，他试图将70吨大麻带到美国西海岸，还带有一群听从他指挥的东南亚船员，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他抓捕。他在美国的一所监狱中服刑五年后又回到了东南亚，此后一直待在这里。他告诉我说，自己在这个地方待了一辈子，在当地的各力量中纵横捭阖，现在自己老了。他在名片上将自己界定

为“买办”，一位在这一地区有着深刻的文化印记的全能的总管。实际上，这正是那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运作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能人。他相信，未来美国与中国竞争的特点将是模糊的，而不是明显的敌意。穿着制服的士兵不如他这样的人更为必需。他的青春岁月里的英雄都集中在越南战场，而他相信缅甸及其部落可以为他的才华提供用武之地。这在掸人的个案中，强调了一种谨慎而人道的接近途径。

我和他在一起多少有些不自在，他的背景中也有些内容让我感到紧张。尽管他的方法可以被证明是多么的含蓄而负责任，但也不应该低估他和其他美国人所建议的这种方法的危险性。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很可能将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必须小心，不能随便破坏这一关系。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美国已经看到了拿着小棍而大声疾呼的代价。因此，如果我们要增加对缅甸少数民族的支持，给予支持的方式就必须给中国以压力，推动其在缅甸表现得更好，而不是悄然地激怒中国，这种做法的必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不能形成美国无力阻止的破坏性的行为。

我说这话时缅甸正在为全国选举做准备，将于2010年1月进行大选。在我写作时，还不可能知道选举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选举将如何进行，选举结果将使哪些受约束的政治力量摆脱束缚。但是，举行大选本身可能就说明了西方和缅甸政权之间的建设性接触将比任何美国冒险家与缅甸少数民族的接触得到的更多。缅甸少数民族无疑是重要的，并且相对来说，媒体对缅甸事务的分析中忽视了这些少数民族，这也因此激发了我对他们的关注。但民主可能仍然更为重要。做出举行选举的决定本身就至少体现了奥巴马政府与缅甸军政府接触的成果。

正如这四位美国人所相信的，如果美国注定要以某种方式卷

入缅甸政治——就像 20 世纪 80 年代陷入阿富汗部落，90 年代陷入南斯拉夫各民族群体，这个十年陷入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还有一次陷入阿富汗部落——那么一些历史背景可以派上用场。因为“今日关于缅甸的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惊人的漠视历史的本质”，历史学家吴丹敏（Thant Myint - U）这样写道：

专制和民主的前景在过去十年、二十年的历史棱镜中都可看到，仿佛三次盎格鲁—缅甸战争，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具有无限破坏性的日本入侵和占领，五十年的内战，外国干预以及共产主义叛乱从未发生过。<sup>①</sup>

因此，可以将下面这些内容视为简短的基础知识，留作未来岁月里可能的新闻头条。

缅甸历史一方面受地理流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宗教—文化隔绝的影响。贸易路线使缅甸与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取得联系，而缅甸的上座部佛教又将其与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和尊崇儒家学说的中国隔绝开来。<sup>②</sup> 结果产生了缅甸独一无二的历史——从未被外来者影响过的历史。

中世纪，在印度和暹罗（即今天的泰国）之间的平原和丛林中有三个主要的王国：阿拉干、孟和缅甸。“缅甸”一词是缅甸语词汇，指的是中部的伊洛瓦底江河谷及其周围地区。18 世纪末，缅甸最终征服了另外两个王国。此后，孟国的都城达光

---

① Thant Myint - 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A Personal History of Bur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p. 41

② Thant Myint - 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A Personal History of Bur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pp. 47, 59



(Dagon) 更名为仰光 (Yangon), 缅语意为“冲突的终结”, 外国人又称为仰光 (Rangoon)。此外, 山地王国钦、克钦、掸、克伦和克伦尼即使在缅甸掠夺者的攻击下仍保持独立。这些山地王国内部也分成几派: 例如, 深受冲突之苦的掸族各国也是敌对的佤人、拉祜族人、勃欧人 (Paos)、克洋人 (Kayans) 以及其他部落民族的家园。这一整片领土开始疯狂地蔓延开来, 面积比英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大, 各个小国的界线模糊不清, 丛林中马蹄形的山脉、伊洛瓦底江、亲敦 (Chindwin)、萨尔温 (Salween) 和湄公河的河谷都是其分界线。历史上, 缅甸各个不同民族的迁移可追溯西藏地区、中国、印度、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其民族的差异之大由此可见。例如, 缅甸西部的钦人和东部的克伦人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sup>①</sup> 掸人和缅人之间除了都信奉佛教之外也没有任何语言或文化上的共同之处。其实, 历史上经常迁移的掸人与边界另一边的泰人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sup>②</sup> 阿拉干人则是都市海滨文明的继承者, 信奉印度教的孟加拉对其影响尤为突出。他们感到自己与缅甸的其他地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甚至将自己的困境与中东和非洲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国家相比。<sup>③</sup> 只有克伦人不只限于一片具体的民族国家的领地, 而是向外扩展, 他们在东部山地的大片土地以及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都有重要的聚居地。

1886 年, 英国人推翻了缅甸王朝, 将整个地区附加在他们的

---

① Pankaj Mishra, “The Revolt of the Monk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 14, 2008.

② 例如, 阿霍姆人 (Ahoms) ——掸族的一支——在 17 世纪初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向下迁移, 并与莫卧儿人发生冲突。

③ Martin Smith,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London: Zed, 1991), ch. 2

印度王国之中。尽管殖民统治只持续了62年，但正如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在其涵盖广博的著作《缅甸：叛乱与民族政治》（*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中所写到的，英国人将权力中心从缅甸中心位置的阿瓦（Ava）和曼德勒的朝堂移到了距孟加拉湾南部几百英里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仰光，这个国家曾经拥有的全部地理逻辑就这样被打乱了。而且，英国人还将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家园——“上千平方英里崎岖不平的山区上地以及游离的、独立的迷你小国”并入自己的领土。<sup>①</sup>

王朝的摧毁剥离了这个国家几个世纪的传统，而在中世纪以前正是这些传统强化着伊洛瓦底江河谷的社会。“新的缅甸、英国人的缅甸是漂浮不定的，”吴丹敏写道，“突然被推入了现代世界，而缺乏与过去相连接的锚”，倾向于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sup>②</sup>似乎是1886年，英国人将缅甸从悬崖上扔下，124年之后，缅甸仍然在下落。<sup>③</sup>英国人的方式是经典的分而治之。即使对河谷中在人口上占主导地位的缅人曾施加了直接的镇压，他们更喜欢的是山地部落自治，将克伦人、掸人、克钦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招募进当地军警部队。<sup>④</sup>如果保守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

---

① Martin Smith,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London: Zed, 1991), ch. 2.

② Thant Myint-U,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p. 162

③ 参见 *The Glass Pala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高士 (Amitav Ghosh) 对这种历史的破裂进行了详尽而富有新意的研究。

④ 在弗格森 (Bernard Fergusson) 旅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缅甸的回忆录《狂野的绿色地球》(*The Wild Green Earth*) (London: Collins, 1946) 中，他写道 (第133页)：“我只能向我的同胞称赞这个英勇的种族 [克钦人]，我的同胞们大多并不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对日作战，毫无支持，为了要继续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生活方式，他们需要我们的保护……与此相同还有另一个杰出的种族克伦人。”这是英国人对山地民族持赞许态度的典型代表。

赢得了1945年的英国大选，山地民族可能就将成立自己的独立公国，作为维护大英帝国与缅人作战的奖励。缅人恼怒于英国的统治，成为日本人的支持者。但是劳动党的候选人艾德礼（Clement Attlee）赢得了大选，他决定将全缅甸作为一个单独的单元，予以独立，却没有同时提出清晰的民族和解的路线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人的领袖昂山将军和30位同志到了日本并建立了民族主义者的军队，欢迎日本人进入缅甸。但是当昂山在战争中途回到缅甸时，他很快意识到作为占领者，日本人比英国人更糟糕，就意外地转变了立场。战后他与艾德礼进行了谈判。但是少数民族声称昂山作为缅族人，不能够代表他们。在他们眼中，昂山只能代表缅甸本部（Burma Proper），即历史上的孟、阿拉干和缅甸三国，而不包括钦、掸、克伦以及其他山区土地。所以昂山放弃了原来的选择，以非常明智而开明的姿态同意与少数民族分别进行谈判。昂山眼观邻国印度在独立之后各族群之间的屠杀如何导致孟加拉和旁遮普出现一百万难民，还有成千上万人丧生。在印度通往血腥的分治之时，他就下定决心，缅甸要避免这样的冲突。

结果是，1947年2月，他在掸族小城彬龙（Panglong）与当地的封建统治者土司签署协议，促成了缅甸联邦的形成。这一协议基于三项原则：国家采取分散权力的联邦结构、承认山区的各民族首领，多年后承认他们脱离国家的权利。

但是那年七月，昂山被刺杀，1948年1月英国人离开之际，进行民族和解的努力也终止了。公布的新宪法更多地凸显了中央控制，克伦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因此叛乱。印度作家米施拉（Pankaj Mishra）解释道：

将欧洲那种拥有语言和民族同质性的民族国家模式强加

给缅甸这样一个多样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困难的。日本人拖延在这里的占领，及其与英国人的残酷的战争更加剧了这种难度，这分散了古老的殖民国家的权威，使这个国家被各个政治组织和民族群体的浪潮拍打冲刷，在后殖民时代，他们雄心勃勃，而且拥有自己的枪支。<sup>①</sup>

陷入英国人和日本人丛林战争的旋涡之中，的确使缅甸的民族困境更为糟糕。1943年和1944年中，英国从其后方基地印度东北边境城市英帕尔（Imphal）发动了著名的非常规战争，缅甸正是其战役上演的地点。这些战役中，少将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打破常规、骁勇善战，成为传奇人物。他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儿子。在缅甸的丛林中，在日军战线后方，他领导着小分队，在滑翔机的掩护下，远程、深入作战，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缅甸日军战线后方作战的同盟国士兵被称为缅甸传说中的神狮。在温盖特大胆的行动之前，日本人已经攻到了英属印度的大门，即将开始入侵。温盖特帮助他们扭转了局势。他战斗的这片土地在今日正是中国人不得不为了他们的管道而施以安抚的地区（塔吴瓦阿帕也是温盖特一类的人物，他曾经送给我温盖特将军一位下属的战争回忆录，是1946年版的，上面还有先知以赛亚的名言）。<sup>②</sup>

冷战又为缅甸的混乱引入了新的变数，尽管热情而富有领袖魅力的平民总理吴努在昂山逝去之后努力维护着国家的团结，然而最终仍徒然无功。1950年，一万多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士兵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下逃到缅甸，在掸邦安

---

① Mishra, "Revolt of the Monks"

② Brigadier Bernard Fergusson, *The Wild Green Earth* (London: Collins, 1946)

置下来。在下一个十年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武装起了一支共产主义的游击队叛乱组织，在山区与缅甸政府作战。面对这些挑战，仰光的平民政权踉跄前行，而缅甸军队则扩充到了十万人。现在的缅甸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缅族人，而少数民族在其中只能升到少校。1961年在奈温将军领导下的这支军队努力将国民党驱逐出缅甸，赶到了相邻的老挝和泰国。

同年，在掸邦的首府东枝，非缅族的民族群体聚集在一起，要求根据1947年彬龙协议的精神修改宪法。这一问题在议会进行辩论，吴努对掸族人的困境尤其同情。然而，对这一情况做出的回应，以及对国家整体上恶化的安全形势做出的回应，却是一场军事政变。奈温将军由此在1962年掌权。这场政变使充满善意但又日益无用的平民政府无疾而终，带来了近五十年的灾难般的统治，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经济收归国有，却又经营不善。整个国家机器都被军事化、缅族化，民族冲突激化。

1988年正当奈温下台时，仰光街头爆发了平民冲突。巧合的是，已故的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此时从英格兰返回仰光照料病中的母亲。结果昂山素季领导了一场自发性的争取自由的群众运动，有成千上万缅甸人参加，主要是缅族的学生。但是新一届的军政府，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很快取代了奈温，并在1989年将国家更名为缅甸（Myanmar），缅语意为中央山谷，山地的少数民族部落以及许多开明的缅族人绝不接受这个名字。自由运动被镇压后，许多缅族学生逃到少数民族地区。尽管那里艰苦的自然环境很难适应，但是他们为缅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合作开创了先例。

1990年，军方允许进行选举，尽管昂山素季本人处于软禁之中，但她的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军方随后宣布选



举结果无效。更糟糕的是，冷战的终结也终结了泰国暗中对缅甸山区部落的军事支持，这些部落正与依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作战。因此，泰国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与军政府签约，缅方在少数民族边界地区就伐木和水电都做出了让步。同时，中国提供的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开始不断注入，金三角地区的鸦片贸易也进一步帮助了军政府。很快，新加坡、印尼和印度受缅甸自然资源的诱惑，开始接受这一政体。因此，尽管世界范围内军政府几乎绝迹，缅甸却继续被扼制在军事暴政之下。1992年，当今这位独裁者丹瑞掌权。

2007年发生的袈裟革命中，仰光、曼德勒和附近的木各具爆发了大型的示威活动，随后也有上千名僧侣遭到残酷的镇压，而在山区却没有得到支持。尽管这次暴动吸引了西方的兴趣，缅甸的少数民族却仍然没有被打动。缅甸不仅与朝鲜和津巴布韦一样，是世界上的专制国家之一，而且也是最不团结的国家之一。每个切实卷入袈裟革命的人现在或者在狱中，或者被流放，或者东躲西藏。

今天在缅甸这个国家，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人均花费为1.1美元，教育方面仅有每人40美分，但却维持着世界上最大的现役部队之一。缅甸军队在本国领土上横冲直撞，就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在近东开辟疆域。缅军一边掠夺平民财物，一边与佤族和其他部落分离出来的小派系签订短命的和平协议。在少数民族地区，士兵们用刺刀刺穿农民的锅，这样农民无法做饭就将挨饿。<sup>①</sup>成千上万的缅军士兵散布在边境的山地，那里上千个村庄被毁掉，布满地雷，甚至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背井离乡，在国内流浪，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坐在泰国的难民营中，感染艾滋病、疟

---

<sup>①</sup> *Washington Post*, Aug. 30, 2007.

疾和肺结核的风险“在全球风险最高之列”。<sup>①</sup> 尽管有能源管线和水电项目，断电和汽油短缺仍然困扰着缅甸的城市。现在的缅甸可能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事最猛烈时还要更悲惨。这个政体，尽管没有斯大林或萨达姆·侯赛因那种冷漠的、官僚政治的邪恶，但对其人民那种愚昧和马虎的冷漠仍然非常突出，这个国家对待其人民像是对待臣民，而远非公民。<sup>②</sup>

同时，几届美国政府对待缅甸政体的政策几乎没有变化。巴拉克·奥巴马、乔治·H. W. 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 布什都欢迎缅甸民主这一原则，即使他们对于大张旗鼓地支持少数民族叛乱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哪怕是暗中表现出来的兴趣也没有。这正证明了这样一种论断，即美国的对缅政策更注重说教，而不是道德。特别是前总统乔治·W. 布什，尽管包括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在内对缅甸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但他倾向于对缅进行无用的说教，如同前总统吉米·卡特经常因为在类似问题上这样做而饱受指责一样。根据这一逻辑，美国应该与军政府进行公开的会谈（就像奥巴马政府国务院最近所做的），而不是冒着被印度和中国排斥出整个孟加拉湾地区而让缅甸毫无限制地被大规模开发的风险；或者以一种有效但安静的方式支持少数民族，就像这一地区的我那几位美国熟人所建议的。“现在，我们从美国那儿得不到什么大的资助”，缅甸众土族委员会（Burmese Ethnic Nationalities Council）的秘书长廉萨空（Lian Sakhong）这样告诉我。

美国官员回答说，在他们的声明中的确有起到阻碍作用的因素。例如自从1997年之后一直禁止在缅甸投资（由于此前有

---

① Mishra, “Revolt of the Monks”

② James Fallows, “Evil in Burma,” *The Atlantic. Com*, May 11, 2008.

先例，因此从优尼科继承到特权的雪佛龙能自由地在此从事管线建设)。2003年和2007年又新加入了若干约束性的条款，如人道主义援助是通过在泰国运作的某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而且，从权力政治的立场出发，美国并不愿在缅甸陷入太深，因此乐于看到其盟友印度和新加坡间接地针对中国来维护美国利益。至于以任何形式支持克伦族和掸族斗士的跨境活动，官员们注意到，一提到这种政策时，美国在缅甸的大使馆就会被洗劫一空。

然而，据泰缅边境团(Thailand Burma Border Consortium)的杰克·丹福德(Jack Dunford)称，美国是唯一一个向军政府提供“强硬的、道德的信息”的主要大国，“这有效地阻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对缅政策”，因此，使缅甸避免建设更多的大坝和基础设施来加剧蹂躏这里的景观。丹福德继续说，美国的政策“也重新集合了西方和国际的压力，这使缅甸军方不堪重负”。根据这一思路，有朝一日这个政体将会垮台，可能会很快，这将使美国在缅甸人民需要的时候派上大用场。

这个政体垮掉的方式可能各式各样。尽管一场群众暴动的恐怖之象激发着西方的想象，然而更有可能的应该还是另一场军事政变，或者是更为细腻微妙的变化——领导人的简单更换，年过七旬的丹瑞因健康状况不佳而下台。然后，新上台的将军会解除对昂山素季的软禁，并与她展开会谈。当然，即使举行选举，也不能解决缅甸的根本性问题。作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全球媒体的明星，昂山素季具有道德感召力，使各个山地部落也能接受。但这个国家仍然处于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制度、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正在成长却依然脆弱的状况中。时刻准备着的众多的少数民族最终会对占主导地位的缅族失去信任。外国观察家认为，全国民主联盟缺乏管理技巧，而少数民族本身软弱又不团

结。就这一点而言，缅甸可与伊拉克和罗马尼亚相比，这两国的斯大林式的政体垮台后也是这样。伊拉克陷入多年乱象，而罗马尼亚的混乱只持续了两周，因为共产党的另一个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分支从示威者手中夺取了政权，领导国家在最终启程前平稳度过了五年的过渡时期。一位国际谈判代表告诉我，教训就是，“除了使军方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领导作用以外，别无选择，因为缅甸如果没有军队，就什么也没有了”。在缅甸掌权时日已久，无论军方统治多么糟糕，但对于任何解决方案来说，军方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比西方一些人提出的‘美女与野兽’——昂山素季与将军们——的设想要复杂得多，”廉萨空说道，“毕竟我们必须终结60年的内战。”

总而言之，缅甸必须找到回归1947年彬龙协议精神的途径，这一精神为建立非中央集权的缅甸联盟做好了准备。不幸的是，这一协议从未实施，也因此引发了此后的所有问题。

即使在远离山区的中部的伊洛瓦底江河谷和三角洲，大批克伦人和孟人也要求取得与缅族平等的地位，昂山将军在被刺杀前曾这样向他们许诺。2008年5月，三角洲居民受纳吉斯飓风影响损失惨重时，国际社会要求对其进行救济和援助，但将军们几乎没有顾念生活在那里的克伦人，而更关心维持附近的仰光的社会秩序。对于国际社会而言，飓风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而对将军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潜在的社会安全危机。

在丛林中的首都内比都，军政府可能代表了缅甸后殖民历史中最后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的政体。东部的克伦人和掸人以及西部的钦人和阿拉干人将很有可能看到他们的力量在后军政府时期的民主缅甸发展壮大，无论是通过和平的、管理良好的过渡，还

是通过动荡的、无政府状态的过渡。这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各种各样的管线协议可能必须与居住在管线必经之地上的少数民族进行协商或重新协商。印度洋上的斗争，或者至少是孟加拉湾顶端附近的印度洋东部的斗争，可能要归结为谁能够更有技巧地应对缅甸的山地部落。



## 第十三章

# 印度尼西亚的热带伊斯兰教

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发生后，2005年初，我跟随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前往当地执行救援工作。当时，洪水从位于苏门答腊岛北部顶端的班达亚齐退去，涌入孟加拉湾。用一位军官的话说，这里像个“漂浮的公墓”：鞋、衣服和支离破碎的房屋漂在海中，“简直像目睹了一幅完整的生活图景”。这次海啸让这些军官和海员第一次看到尸体。2003年春天，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从另一艘驱逐舰上向伊拉克发射战斧式导弹，然后跑到电视前，通过CNN得知他们击中了什么。对他们来说，伊拉克是抽象的。但是，乘直升机在班达亚齐上岸后，他们看到了树木、桥梁和房屋都朝向内陆的方向倒下，仿佛是被高压消防水龙带冲刷了一般。这场自然灾害而非战争，使这些穿着制服的青年成熟了。<sup>①</sup>

我在泰缅边境遇到的那些特种部队原先的军官们代表了美国在孟加拉湾的实力部署和救援中非传统的一面，而这些海军军官

---

<sup>①</sup> Robert D. Kaplan, *Hog Pilots, Blue Water Grun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in the Air, at Sea, and on the Grou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ch. 3

和海员代表的则是光谱中传统的那一端。但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影响这个地区广阔、深刻而又复杂的环境、宗教和社会力量的序列中，美国的影响是有限的。

这场里氏 9.3 级的地震造成的海啸每小时的速度接近 200 英里，海浪高度超过 60 英尺。海啸造成了印度洋沿岸国家 25 万人丧生：这也许可以与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人数相比了。这次海啸仅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就摧毁了 12.6 万座房屋，半径几千英里内的国家都遭受了损失，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马尔代夫、塞舌尔群岛、马达加斯加、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以及其他国家。海啸的影响显示了我们这个星球的脆弱，自然力量可以不动声色地重塑历史。

四年之后，我重返这场灾难的震中地区，回到班达亚齐的景象中：在静默寂寥的田野里，大批的坟墓守着成千上万的尸体；崭新的清真寺、柏油马路，一片片小型的居住区中的铁皮屋顶；船舶原封不动，仍然搁浅在当年的巨浪将他们冲拍到的地方。距海边三英里多的一片田野中，公鸡在高高的草丛中跑来跑去，巴朋（Bapung），一艘 2600 吨的巨轮奇异地矗立着。这艘轮船曾实现 10.5 兆瓦的发电量，它长逾 200 英尺，生了锈的红色船体高达 60 英尺，主甲板以上的部分和肮脏的烟囱还要高得多——更像一个巨大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工厂。在它近旁，几乎像是后来添上似的，一艘 70 英尺长的渔船停在两座房屋的房顶上——这竟成为安置渔船的地方。

我看到一座清真寺的柱子竟然弯曲了，仿佛《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参孙站在中间把几根柱子推开了一样，但它们竟然没有完全断开。另一个奇迹是，水流席卷到宏伟的大清真寺的台阶前，却又退去了。这不仅是当地的传说，照片上也可以看到这些

逸事的真相。海啸，就像《圣经》中那些伟大的自然现象一样，在这个地区有着深刻的宗教意义，也因此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苏门答腊岛北部与位于爪哇的印尼中央政府之间那种历史上的独特而又有争议性的关系因这次海啸而彰显，而更重要的是，海啸影响着印尼的伊斯兰教为自己的灵魂本身而战的这场本就极为复杂的战斗。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也位列世界第四人口大国。

印尼所发生的事情将会强有力地决定伊斯兰教的未来。在这里，从保守拘谨的沙特瓦哈比教派群体，到全球流行的半岛电视台，都在和当地森林中的神灵以及多神教的残余势力来争夺民心。没有什么能像不可思议又极具破坏性的自然事件那样影响宗教。事实上，宗教的出现就是对自然世界的一种反应。印度尼西亚全体 2.4 亿国民生活在一个火圈上：置身于洲际的断层线上，在变动的地壳板块中，在大规模的滥伐毁林和活跃的火山中。全世界住在距活火山七英里以内的人中有一半住在印尼。“海啸后，这里的伊斯兰教变得更加自觉，几乎是更加有了自知之明。”莉亚·菲特利（Ria Fitri）这样认为，她是一位女性运动的激进分子，也是一位法律教授。

在印尼的现代历史上，这次海啸并不是第一次作为一个改变了宗教和政治路径的环境事件。作家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记录道，1883 年，位于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Krakatoa）火山爆发，之后引发了海啸，使成千上万人丧生；还造成了破坏性的社会影响，爪哇反抗西方的伊斯兰战斗爆发，这为此后的一个世纪开创了先例，<sup>①</sup>带来的不仅

---

<sup>①</sup> Simon Winchester, *Krakatoa: The Day the World Exploded: August 27, 1883*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3), pp. 40-41, 320-321.

仅是原教旨主义本身的危险，在孟加拉国的例子中，重要的是原教旨主义与环境压力以及人口压力形成了互动的方式。

在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地区都是独立的、由苏丹统治的领土，与马来西亚联系密切，而且，由于稳定的雨季季风规律，也与中东联系密切，甚至比与印尼群岛其他地方的联系更为密切。亚齐的许多清真寺及阿拉伯半岛的胡椒贸易和宗教朝圣者形成的有机的关系使这一地区得名“麦加走廊”。亚齐是印尼唯一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地方，但宾馆里有啤酒出售，体罚也仅限于软鞭鞭笞，与沙特阿拉伯一样，这里也不会发生强制截肢的事情。在学校里男孩和女孩一起玩耍，戴着头巾的女人们露出迷人的微笑，她们也可以穿紧身的牛仔裤和高跟鞋，还可以开摩托车。在印尼的其他地方，随处可见女子将头发完全遮盖起来，穿着紧身的上衣和热裤，还有最新的名牌服装。尽管不能证实，但据说在雅加达确实有女子戴着头巾又穿着紧身背心、裸露的肚皮。在印尼，端庄仅到脖颈为止。

但状若头盔的头巾却是现代性的标志，因为这说明这位女子通过学校教育了解了宗教。戴上了头巾，这位女子就象征性地端庄了起来，可以进入男人们的职业世界。“对女子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着装要求，只要把身体盖起来即可。很多情况要取决于个人如何解读，”妇女运动的倡导者莉亚·菲特利解释道，“中东和马来西亚一些地区的着装要求更为严格，但在这里并不适用。”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在印尼，对女子的着装要求远不是伪善的标志，而更像是令人惊奇的宗教多样性的体现，因为伊斯兰教陷入了与印度教和佛教的下层教众之间和平但又重大的争斗，直到今日仍是如此，即使在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的亚齐也是如此。

印尼 2.4 亿人口中有逾 2 亿人口是穆斯林，成为伊斯兰教最

伟大的改宗成功的案例之一。<sup>①</sup> 在这里，伊斯兰教并不是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进入印尼，而在其他几乎所有的地方，从伊比利亚到印度次大陆都是通过军事方式。在中世纪，以亚齐作为起点，伊斯兰教通过印度洋贸易的方式进入印尼。在很多情况下，传播伊斯兰教的人是商人，因此这些人常认为四海一家，不去寻求同质性，或者毁灭其他的文化与宗教。爪哇最早的穆斯林传教士被称为“九位圣人”。这个神话与十二位苏非圣人的神话类似，他们将伊斯兰教带入孟加拉国的吉大港。这些在印度洋东端非阿拉伯地区的圣人很有可能是商人。

伊斯兰教早期植根的地方都是那些距离国际贸易航线最近的地方，例如马来半岛，以及马六甲海峡的苏门答腊一侧的岸上。<sup>②</sup> 越往内陆走，进入丛林滴翠的暗紫色群山中，伊斯兰教的气质就越来越特殊。伊斯兰教并不是皇家军队用刺刀在短时期内强加给印尼的，而是在几百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中逐渐深入印尼的，还饱含着信奉异教的苏非派的影响。许多穆斯林从大中东来到这里——波斯人、古吉拉特人、哈德拉毛人——他们本身就是压迫的受害者，也因此对教义的意义持开明态度，班达亚齐的国立伊斯兰学院院长萨比（Yusni Saby）解释道。

已故的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这样写道，“在印尼，伊斯兰教不是构建了一个文明，而是适应了一个文明”。也就是说，格尔茨解释道，伊斯兰教只不过是丰富而错综复杂的文明的顶层，而在它横扫阿拉伯和北非时，进入的“基本上是一片高雅文化的处女地”。在印尼，从13世纪开始，伊斯兰教遭遇

---

① Simon Winchester, *Krakatoa: The Day the World Exploded: August 27, 1883*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3), p. 326.

② M. C.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 120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



了“信奉印度教和佛教的爪哇王国，这是亚洲最伟大的政治、审美、宗教和社会的综合产物之一”。即使在伊斯兰教横扫整个印尼——从北部顶端苏门答腊的亚齐到最东端的香料群岛——几近三千英里的跨度之后，印度的传统，尽管“被剥离了……大部分的仪式性的表达方式”，但其“内在的气质”却丝毫未动。格尔茨继续阐释，极少有例外，“当地的精神、家庭仪式和熟悉的护身符”，这些印度—马来“基础”都将继续主导广大农民的生活。到19世纪末，在印尼各地，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已被广泛接受，但作为一种“按照教规遵守的教义，却还没有被接受”。因此，格尔茨将印尼的伊斯兰教描述为“适应性强的、尝试性的、融合性强的……百家争鸣的”，还有，“在精神上是费边主义的”。<sup>①</sup> 今日，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印尼穆斯林是正统穆斯林（santri），其余都是名义穆斯林（abangan）。<sup>②</sup> 因此，印尼的伊斯兰教代表着南亚和东南亚整体对伊斯兰认同的具有细微差别的回应，这种理想已经规避了阿拉伯世界中的很多东西。<sup>③</sup>

的确，我亲眼所见，一群群的印尼穆斯林学童，女孩们还戴着头巾，在婆罗浮屠结队而行。婆罗浮屠是爪哇的一座纪念碑式、多层阶梯状寺庙群，与柬埔寨的吴哥窟有相似之处：有着1200年历史的灰色石砖已被岁月浸染成黑色和赭色，完全对称

① Clifford Geertz, *Islam Observed: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Morocco and Indone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 11–12, 16, 66 费边主义指的是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的一场运动，通过一种渐进的、非革命的途径来寻求社会民主和自由改革。

② Giora Eliraz, *Islam in Indonesia: Modernism, Radic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Dimension* (Brighton, Eng.: Sussex, 2004), p. 74.

③ 伊朗的宗教身份也与通常假定的有细微差别。尽管最近几十年中伊斯兰教被贴上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标签，但伊朗的伊斯兰教是位于更古老的波斯身份和琐罗亚斯德教身份之上的。

的结构极其神秘。婆罗浮屠修复工作的复杂性证明了在伊斯兰教到来前很久，这里的文化已经丰富多彩，要与这样的文化竞争，伊斯兰教处在极大的压力下。在婆罗浮屠附近的普兰巴南（Prambanan）的印度教神庙间，我也同样看到了印尼穆斯林学童的身影。帝国统治下的爪哇的宗教史不能被战胜，伊斯兰教只能附加其上。

因此，尽管亚齐是印尼最近似于阿拉伯的地区，但也彻底缺少中东那种严肃的宗教氛围。印尼被荷兰人统治了几百年，由于常常是松散的统治，群众对西方并没有多少恨意：几乎感觉不到其历史和文化因外来入侵而枯萎。这一事实也有助于印尼宗教氛围的形成。这一列岛上由来已久的领导权通常是爪哇的，而不是欧洲的。爪哇的统治本身就是其对抗欧洲多样性的一种屏障。

然而“这可能是我们的自由终结的开始”，阿古斯万迪（Aguswandi）担心着，他三十一岁，是位热情而充满活力的知识分子，是班达亚齐一个印尼非政府组织的项目经理。与许多印尼人一样，他使用单一姓氏。“这里的伊斯兰教教法得到了强化，胁迫了海啸之后的亚齐，”他告诉我说，又解释道，“海啸为什么会发生？宗教领袖们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他们总结说发生海啸是因为亚齐人不够虔诚。女子们遮盖得还不够严实，外国人还在喝啤酒。因此，海啸发生了。尽管同时海啸也带来了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世界性影响。”

阿古斯万迪继续说，“我起初认为后者将会胜出。毕竟，海啸刚刚结束后的亚齐就是伊拉克的反面。把犹太人的钱给了基督教的慈善团体在伊斯兰小镇修建学校，怎么可能会带来文明的冲突呢？我想，在未来，这就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伊斯兰教，一种热带伊斯兰教：在热带，天气潮湿炎热，人们不可能包裹严

实。”

阿古斯万迪顺着这个思路讲下去，告诉我说，对此起到积极作用的是亚齐和爪哇岛上的印尼首都雅加达之间历史冲突的本质。“这场冲突跟伊斯兰教没什么关系。这完全是后殖民时代中央与边缘的冲突，所以这场冲突本身以及在冲突中针对的都是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亚齐位于苏门答腊岛北部的顶端，插入孟加拉湾，遥望印度和斯里兰卡，又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填在大海和高低不平的山区之间。这种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一个很容易被界定的地区，与印尼其他地方截然不同。那些地方与此相反，是朝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亚齐是在伊斯兰教君主治理下的富足之地，处于印度洋贸易体系之中。亚齐针对苏加诺和后来苏哈托领导下的爪哇雅加达中央政权的游击战十分类似于其早先针对荷兰人治下的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发动的斗争。

但是海啸为这场看起来由来已久的斗争画上了一个突兀的句号。伴随着这种新产生的局势，马六甲地区的海盗也急剧减少。一位西方观察家告诉我说，海啸“杀死了许多坏人”。或者就像萨比解释的，国际救援组织的到来改变了亚齐的局势，那么多人死去，暂时没有什么可为之战斗的了。这就像《圣经》故事中引出诺亚方舟的洪水，吞没了此前的世界。

亚齐游击队与雅加达政府对抗了近三十年，但仅在海啸发生后八个月，双方就在赫尔辛基签署了和平条约。现在，此前的游击队——亚齐自由运动组织已经通过印尼中央当局运作下的民主进程在亚齐的许多地区当选，取得了合法性。1998年苏哈托政权被推翻，此前一年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考虑到这些，亚齐的情况尤其突出，许多分析家都设想印尼会崩溃，而亚齐将是第一站。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辽阔的群岛紧紧地团结在一

起，随后海啸又以终结战争的方式支持了中央集权。

“印尼并不是像伊拉克或巴基斯坦那样的虚伪的失败国家”，阿古斯万迪说道，它更像是一个“混乱的帝国”，有着一万七千个岛屿，伊斯兰政党在这个国家被合并成一个虚弱的民主体制，有些类似土耳其的情况，尽管这个制度本身也在摸索着寻求有组织的非集权化。西部伊斯兰教的亚齐与东部几千英里以外的信奉基督教和万物有灵论的巴布亚都以这种方式在雅加达的帝国疆域内实现自治。“几个世纪以来，一切都是关于爪哇的，因为印尼的一半人口住在那里，”阿古斯万迪解释道，“但现在全都是关于亚齐、巴布亚、加里曼丹（旧称婆罗洲）了”。

十年以前，印尼正在滑向失败国家，而海啸就像催化剂，将亚齐和平协议推过终点线。班达亚齐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紧张的氛围。民宅中也没有枪支。但是阿古斯万迪突然变得很严肃又很消极，他告诉我说，“非政府组织在这里的经济泡沫就要破裂了，这将会产生危险的真空，可能会被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混乱状态乘机填充”。

海啸发生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都涌入这里，班达亚齐兴起了建筑高潮，这座接近30万人口的小城出现了一大片无用的房屋和店面，并出现通货膨胀，200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2%。“非政府组织提供了灾难救济，并为人们修建房屋，”亚齐非政府组织论坛的维拉特马迪纳塔（Wiratmadinata）解释道，“但是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紧急援助得以提供，但当地经济的基本构件仍然缺乏。”由于伊斯兰教法，旅游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2009年和2010年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急剧减少，这个地区大多数人口是渔民或农民，可能会很快陷入贫困。

班达亚齐向南行驶三小时就到达了皮蒂，在火山的阴影下，这一地区遍布种植着香蕉和辣椒的田地。我在这里遇到了苏莱曼（Suadi Sulaiman），他今年三十岁，曾是亚齐自由运动的游击队员，长相酷似巴拉克·奥巴马。他把我带到他家，在店面的后边，很简陋。不用我做任何提示，他就告诉我说他反对恐怖主义，认为伊拉克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是伊斯兰教禁止的。我问他1999年毕业后为什么加入亚齐自由运动，他给我讲述了昔日独立的亚齐王国的荣光，还有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战争。他继续讲道，尽管有石油和矿藏，地区发展仍然缺乏资金，还有雅加达政府的不公。但是在我的深入追问之下，他对自由缺失和发展不足的怒火归结为在人生的关键时期找不到工作，于是成为亚齐自由的斗士。现在经济状况好转，他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在当地立法机构争取一个席位。他支持“自治，但不独立”。他担心非政府组织的离开会使这一地区回到以前他找不到工作时的状态。

正像阿古斯万迪所认为的，在海啸刚刚发生后来到这里的世界主义的最初的花朵将会随着非政府组织一同离去，尽管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也在利用这一政治进程。贾巴里（Fuad Jabali），雅加达国立伊斯兰大学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校长，也有这样的恐惧。“贫困为激进主义提供了窗口”，贾巴里解释道，特别是在亚齐这样的地方，这里经历了繁荣与萧条。激进分子利用民主，但本质上认为这是西方霸权的工具。“对激进分子来说，协商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因为你不能让道德败坏的人选择国家的方向；而在激进分子眼中，这个社会充满了道德败坏的人，只有纯洁的人才可以被允许选择，或者投票。”

但是贾巴里小心地提到，这样一种排外主义的观点更多的是中东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东南亚历史的产物。我们又回到了人类



学家格尔茨提到的那种明显的区别：中东棕色沙漠中的伊斯兰教吞噬了整个地区文化，而在丰饶的绿色热带丛林中，伊斯兰教只是众多世纪积淀的印度教文化和佛教文化顶上及中间的一层。尽管中东处于西方媒体视野的中心，是先知的土地，这里的人们讲的是与先知同样的阿拉伯语，但是，从人口方面来说，伊斯兰教的“心脏”在印度次大陆，特别是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西方的民主在中东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与伊拉克以及美国前总统乔治·W. 布什的视野联系在一起，整个阿拉伯世界只有三亿穆斯林，而在南亚的印度和东南亚的印尼，实际上生活着五亿穆斯林，西方民主却无可指摘。“在印尼，”宗教学校（*madrassa*）<sup>①</sup>的毕业生贾巴里这样说道，“任何提倡在民主之上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人都不会在投票时得到支持。这里可能有5%的投票人支持激进组织，比如印尼战士理事会（*Majelis Mujahidin Indonesia*）和印尼真主党（*Hizbut Tahrir Indonesia*），这些组织提倡建立伊斯兰教国，而只有10%的人支持砍掉小偷的手。”布什想要通过暴力在伊拉克建立民主，而在印尼，没有他的帮助，民主通过和平的方式也发展了起来。

印尼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穆斯林学者如何在没有任何激励的情况下拥护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在亚齐，因为这里恰恰是融合度最低的地方，也因此是群岛中伊斯兰化最强烈的地区。“我们在这里很高兴，”萨比说道，“这里不是中东，你要为了以上帝的名义而战来战斗。宗教不应该以敌人为重点。我们与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徒都有良好的关

---

① *Madrassa/madrasah* 指的是非专门性的宗教学校，除了宗教课程之外，这里的学生还要学习世俗学校的文化课程，而下文出现的 *pesantren* 则指专门性的宗教学校，也就是伊斯兰教私塾，这里的学生只学习与宗教相关的课程。——译者注。

系。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意识形态——才会改善宗教。”他对宗教学校（pesantren）纯粹关注于区分穆斯林与其他民族的那些东西表示痛心。<sup>①</sup>奈保尔（V. S. Naipaul）在十多年前游历印尼时，曾经说这些学校做的“只不过是”教育“穷人继续做穷人”。1981年，他从印尼的立场观察伊斯兰教，这样写道：

（伊斯兰教）的起源有其缺陷——这一缺陷在伊斯兰教的整个历史中都存在：对于其提出的政治问题，伊斯兰教没有给出政治的或者是实际的解决方案。它只提供了信仰，只有先知将会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先知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政治的伊斯兰教是愤怒的、无政府的。<sup>②</sup>

奈保尔的观点肯定与中东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政治相关，但是在印尼，从他到访这里之后，战斗已经转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访问过的宗教学校的确存在，但是在印尼全国各地，更多的学校教授对这一信仰有更广义的阐释。萨比告诉我说，“在印尼，宗教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很多种灰色”。另一位伊斯兰学者，萨比在同一研究所的同事阿布巴卡尔（Alyasa Abubakar）告诉我说，除了《古兰经》和圣训，“地理给了印尼一种不同的对宗教的阐释。中东的穆斯林沉醉于他们光辉的过去，而那对我们来说几乎没什么意义。我们没有这样的负担”。随后他列举了几位女子的名字，“萨菲亚图丁

---

① pesantren 一词来源于 santri，意为“正统的”。

② V. S. Naipaul, *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New York: Penguin, 1981), pp. 304, 331.

(Safiatuddin), 卡玛拉茨娅 (Kamalatsyah), 伊娜亚茨娅 (Inayatsyah)”等, 在17世纪和18世纪, 她们是亚齐苏丹国的重要人物。

还有印尼的前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 他出生于1940年, 是伊斯兰多元主义的元老, 也被称为古斯度尔 (Gus Dur), 其中“古斯”是对穆斯林的敬称, “度尔”是他名字的呢称。我曾在他在雅加达的办公室与他见面, 那里由一系列黑色的洞穴般的房间组成, 里面满是蜷缩在椅子上抽烟的人。他们指给我里面的密室。古斯度尔近乎全盲。他坐在黑暗中, 闭着眼睛, 穿着传统的巴蒂克布制成的衬衫, 用手指用力敲着空空的桌子, 从一边到另一边。在中东, 同样在这样阴暗的环境中, 挤满了不停抽烟的男子, 我曾从他们中间听到许多针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激昂的演说。但是印尼与此不同。

古斯度尔告诉我说, “激进组织在这里很软弱。这是激进主义在被消灭之前最后的挣扎,” 他半抬起眼皮, 强调道, “与中东不同, 正式的伊斯兰教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只有在中东, 这个宗教才是政治化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只会大喊大叫。主动权掌握在犹太人手中, 他们正在以一种有条理的方式努力创造未来。”他继续说道, “我们更像土耳其, 而不像阿拉伯或者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 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作对。在这里, 伊斯兰教是对(世俗的)民族主义的确认”, 这反过来也会包容印尼信奉佛教和印度教的过去。“不再有分裂的威胁。尽管有许多岛屿, 然而我们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家。在印尼, 伊斯兰教充满活力。”尽管《古兰经》是绝对的, 然而“伊斯兰教并没有完结, 仍然在与其自身以及其他宗教对话……”他继续这样说道, 这种表达方式是他特有的, 如闲谈一般逐步推进, 说教

一般，又充满憧憬。<sup>①</sup>

他的话并非老生常谈。在我对印尼长达一个月的访问中，人们总是自发地提到与犹太人和其他宗教团体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这一点非常突出。而且，2002年在巴厘岛的迪斯科舞厅进行爆炸袭击的恐怖分子被逮捕、审判并处决，尽管印尼当时恰恰还在继续稳定其民主体制；对三位恐怖分子的处决，公众也没有消极的反应。如果说乔治·W. 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是关于反恐战争，第二任期是关于推广自由和民主，那么，对于布什所倡导的，印尼可算是全世界的最佳范例，甚至实现的顺序也相同，尽管布什政府经常过于全神贯注，却注意不到这一点。

但是印尼伊斯兰教深奥的进程，就像爪哇的巴蒂克布的图案一样复杂，并不以古斯度尔的人道主义而终结。实际上，这里的伊斯兰教中的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在班达亚齐的拜图拉赫曼大清真寺也可窥见一斑。它那六个深黑色的圆顶引人注目，建筑物的正面又是耀眼的白色，奢华美丽，令人赏心悦目，既让人想到东南亚，也会想到中东。这使我想起印度北部那些宫殿般宏伟的清真寺，那些不同地理区域的传统，快乐的、花卉的、人体曲线美的，在这里混合而遍布各处。那种严肃的、堡垒一样充满雄性气息的清真寺，特别是埃及和北非那种类型的，在这里完全不见踪影。祈祷堂里满是玩耍的孩子们，他们高声嬉闹，热带地区鸟儿的叫声也混在其中。女子们戴着头巾，穿着飘逸的白色

---

<sup>①</sup> 古斯度尔 2009 年底辞世。他曾经对前美国驻印尼大使保罗·沃尔福威茨讲道，在摩洛哥参观一座清真寺时，他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展示在那里，为之落泪。“如果年轻时我没有读过《尼各马科伦理学》，我可能会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古斯度尔说道，他还说，没有宗教的帮助，亚里士多德也能够觅到道德的深刻的真理。Paul Wolfowitz, “Wahid and the Voice of Moderate Islam”,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7, 2010.

长袍 (mukennas)，跪在地板上祈祷。清真寺中的女子与男子人数差不多。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团体聚集的地方。一张照片记录了海啸之后漂浮着的瓦砾残骸堆到清真寺台阶前的情景。但现在，整个庭院，连同倒影池，都在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支持下恢复原样了。中东的保守派甚至一些激进的倾向在这里都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尽管这一信仰在东南亚地区特有的特征仍然顽强地存在。

除了沙特的资金和权力以外，这里还有基于中东的全球电视网络的动态影响。例如半岛电视台，非常专业，娱乐性也强，将印尼人带入阿拉伯和欧洲的中左翼政治思潮与情感的主流世界。半岛电视台有助于印尼人形成对布什的强烈且挥之不去的反感，以及在2009年初，对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的厌恶。“在印尼，以色列在加沙问题上输掉了舆论之战”，阿古斯万迪告诉我说，原因就是以色列在电视上表现出来的形象。这是一种新现象，印尼此前从未像以色列邻国埃及和叙利亚那样感到被以色列所羞辱。

与此相比，大众对于罗兴亚穆斯林的困境却很冷漠。罗兴亚人被缅甸军政府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罗兴亚人住在边境另一边的孟加拉国，他们所在的难民营在世界上最肮脏的难民营之列。2009年2月，泰国军队中的一些人将一船船的罗兴亚人放到海上，几乎没留下什么食物和水。这些罗兴亚人在亚齐上岸，当地大众几乎没有抗议的声音，尽管可以轻易地证明缅甸阿拉干省的罗兴亚穆斯林受欺压的程度要甚于巴勒斯坦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基于波斯湾的全球媒体效应来解释这种矛盾，媒体现在已经渗入最小的村庄，其重要性将会与日俱增，因此有助于弥补与中东地区的观念差距。

还有商务航空旅行的效应。20万印尼人由此可以每年去沙



特朝圣，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 170 万朝圣者中最大的代表团。而且，也门航空公司每周四次飞往印尼，加强了也门的哈德拉毛与印尼的爪哇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印度洋联系。此前几代来自哈德拉毛和沙特阿拉伯的汉志（Hejaz）的商人将开明的、非正统的苏非派的影响带到印尼。但是，今天，在瓦哈比派的资金支持下，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译成了印尼的官方语言——印尼语，很大程度上在阿拉伯半岛激起了仇恨。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各种类型的思想通过大众媒体变得类同，反过来又被各种坚定的利益集团影响，形成了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

这与印度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例子一样，印尼那些最受激进主义吸引的人并不是伊斯兰学者，他们关于这一宗教的知识使其不易受大众媒体影响，而第一代以某种行业为生的专业人员，他们刚刚从村庄中解放出来，可以广泛地接触书本、新闻出版物以及电视，又仍然多少有些轻信。在印尼，一位年轻的化学工程师比一位年长的神职人员更有可能成为激进的穆斯林。对这个国家穆斯林组织的考察只会增加印尼伊斯兰教这种无法抗拒的复杂性。

印尼可能是这个星球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社会，但也是拥有相当多人口的少数民族——华人、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家园。因此，在功能上，这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这也使得穆斯林公民组织蓬勃兴起，成为世界之最，因为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根本不需要这些公民组织。雅加达的巴拉马蒂纳大学（Universitas Paramadina）校长巴斯维丹（Anies Baswedan）解释说，“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世俗的国家容纳了充满活力的宗教生活，与此同时，强有力的穆斯林组织也给予世俗的执政当局以合法性。因此个人的虔诚就会旺盛地滋长，这种方式绝不会发生在伊斯兰国

家，那里的宗教无法避免地要被政治化。”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和穆罕默迪亚是其中两个最著名的组织，有上百万的成员。由于其规模庞大，这两个组织的政治观点经常是模糊的，很难清楚说明。不过，宏观的基调是清晰可辨的。

古斯度尔曾长期担任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U）主席。该组织成立于1926年，当时是出于对严苛的、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派的影响的担忧，当年伊本沙特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之后，这一影响已开始渗入印尼。这一组织传统而保守，忠于苏非派的圣人，也因此多少有些违反，但兼容并包、支持公民社会。这是因为，对伊斯兰传统的深刻的强调保护了其不受当代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代伊斯兰意识形态寻求捍卫伊斯兰教，使其不被印度教和佛教等其他宗教影响。由于其植根于历代伊斯兰思想之中，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是一个自信的信仰体系，不会感到来自其他思潮的威胁，因此也不必通过树敌来界定自身。对于现代世界中的矛盾，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处之泰然。因此，该组织提倡妇女佩戴头巾，但也对同性恋的权利持理解的态度。然而该组织的记录也不完全白璧无瑕。例如，在苏加诺统治的最后几年中，该组织表现得极为狂乱，1965年秋天，其青年运动在爪哇进行了一场针对共产主义者的杀人狂欢。<sup>①</sup>

这两个组织中，穆罕默迪亚更为现代，也因此多少有些违反直觉、不那么开明，尽管在这方面不走极端是很重要的；这更像是一种模糊的情感，而不是界定清晰的政策方向。穆罕默迪亚强调写实主义，回归《古兰经》和圣训用文字书写的方式，而这一传统已被异教徒破坏，因而也受到世界范围内该领域传统中的

---

① John Hughes, *The End of Sukarno: A Coup that Misfired; a Purge that Ran Wild* (Singapore: Archipelago, 1967, 2002), pp. 166-169.

反动因素的侵蚀。事实上，穆罕默迪亚是有益于激进主义的，即使其存在本身及其组织结构阻止了许多自称为激进分子的人采取进一步措施演变为恐怖主义。

穆罕默迪亚在年轻的专业人员中间大受欢迎，这说明，伊斯兰教与其他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混合在这里的局限性。几个世纪以来，直接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浪潮持续地影响着印尼的伊斯兰教，拒绝融入当地的环境。因此，最终来讲，半岛电视台和商业航线联系的到来为古老的故事添加了浓墨重彩，而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要更好地解释这一点，就牵涉历史和哲学的讨论。

荷兰的殖民主义只是加强了印尼人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感，用格尔茨的话说，他们成了“反对派穆斯林”（*oppositional Muslims*）<sup>①</sup>。19世纪五六十年代荷兰人登上了苏门答腊海岸，随后就遭遇了苏门答腊北部游击队的强烈抵抗，伊斯兰圣战的呼声在亚齐反抗荷兰人的战争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场战争始于1873年，直到1903年亚齐的苏丹投降才告终结。战争不仅见证了穆斯林反抗荷兰殖民者斗争的成熟，而且也见证了从中东引入的泛伊斯兰的观点对圣战者的激励。

但是这种与中东穆斯林居住地区非常直接而激进的联系也恰好同时受到了另一个因素的激励，那就是，作为荷兰的殖民地，印尼不能与附近的南亚或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频繁交往，因为他们处于英国这个与荷兰竞争的另一欧洲强国的殖民统治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印尼的穆斯林有时候受到来自阿拉伯的更为纯粹的理念的影响要多于来自印度穆斯林居住区的那种融合性更强的伊斯兰教的影响。

---

① Geertz, *Islam Observed*, p. 65.

诚然，蒸汽时代中越洋的交流更为便利，移民的浪潮特别是从也门东部的哈德拉毛向下直到亚齐和印尼的其他地区，不仅带来了苏非派这一非传统教派的见解，还有由于他们与麦加相对较近的距离而形成的严格、正统的理念。<sup>①</sup>

当说到 19 世纪伊斯兰正统观念正式开始进入印尼时，我们必须小心地说，与东南亚的多样性相比，这样一种纯洁的伊斯兰教本身就被中东内部的各种新的思潮所影响。在这方面，最为重要且激动人心的观点来自 19 世纪末埃及学者和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Muhammad Abduh）的现代主义。

在印尼的经历中，阿布笃至关重要。已故的美国阿拉伯问题专家马尔科姆·科尔（Malcolm H. Kerr）解释说，阿布笃的“历史作用就是把门打开，使一个发霉的传统暴露在新鲜的气流中”。<sup>②</sup>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盲目地接受传统的宗教教条，充满了迷信，阿布笃对此表示遗憾，并在伊斯兰教早期的原始信仰中寻找解决埃及现代困境的答案。阿布笃对那些曾经不过是最简单的信仰的东西给出了原因和解释，因此对将伊斯兰教带回 20 世纪的辩论做出了贡献。学者萨比讲道，阿布笃提供的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计划。因此，阿布笃在不知不觉中既激励了世俗的温和派，也给原教旨主义的激进派带来启示，而两者都是现代主义的元素。<sup>③</sup>尤为重要的是，阿布笃努力改善宗教教育，使其适应现代的需求，这对于使中东的伊斯兰教成为标准的

---

① Eliraz, *Islam in Indonesia*, pp. 42 - 43; Winchester, *Krakatoa*, pp. 333 - 334.

② Malcolm H. Kerr, *Islamic Reform: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ies of Muhammad Abduh and Rashid Ri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 15.

③ Geertz, *Islam Observed*, p. 17.

全球宗教大有裨益，使其能够为与印尼的印度教—佛教底层的汇合而斗争，能够对基督教实现实质上的包容，还有，同样重要的，能够与世俗的民族主义斗争。<sup>①</sup> 在印尼，阿布笃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还形成了创建穆罕默迪亚的哲学思想。从组织上说，印尼在宣传阿布笃的思想——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合——方面比中东的任何地区都做得更多。穆罕默迪亚也积极推动大量社会运动，就像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既关注激进主义，也关注社会自助网络。

因此在印尼，这场战斗还在继续，或者说正在进行中。在目前所处的阶段中，原教旨主义试图抓住一些几乎没有人在乎的问题，并使其成为议会的争议所在，例如色情文学和音像制品、青年男女在街头有伤风化的行为，以及谁来证实哪些食物是合乎伊斯兰教律法的。在这个辽阔的群岛，我们看到的似乎既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也有着文明的融合。信奉伊斯兰教的东南亚是一个开门迎客、令人兴奋的文化综合体，这与在沙漠上炙烤着的中东截然不同。尽管东南亚有这样的特点，但依然存在针对华裔基督徒的周期性的屠杀，2002年的巴厘岛袭击以及次年雅加达万豪酒店爆炸案。这些暴力行为说明，除了宗教融合以外，激进伊斯兰教在印尼还要面对另一个敌人：西方化本身。印尼社会相对占少数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对于当代世界别无选择，只能对其做出反应。正如研究印尼伊斯兰教的以色列学者艾利拉兹（Giora Eliraz）所说，“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需要相称的对手”。<sup>②</sup>

格尔茨将印尼和摩洛哥这两个伊斯兰教地理光谱中的端点作

---

① Eliraz, *Islam in Indonesia*, pp. 6-8, 14, 20.

② Eliraz, *Islam in Indonesia*, p. 31



为例证，认为宗教之所以会转向极端的意识形态，不是因为人们怀疑上帝，而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这种怀疑反过来也可追溯到他们对现代化的恐惧。<sup>①</sup>正是这种怀疑及由此作出的极端的回应毫无疑问地影响着印尼的命运。

然而，也有强大的理由来保持乐观。尽管这个国家几乎85%的人口都是穆斯林，但85%的印尼人驳回了建立正统的伊斯兰教国的主张，相反地，他们更支持以多元和确保民主为原则的潘查希拉。1945年的印尼宪法将这一温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奉若神明，潘查希拉的五项基本原则是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

印尼地势崎岖不平，众多岛屿覆盖的海域面积与美国本土一样广阔，这里是中国世界与印度世界融合的地方。这种地理状况导致的结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几十年来依次处于苏加诺和后来的苏哈托的专制统治下。<sup>②</sup>尽管苏加诺的左翼的剧场国家(theater state)是那样华丽而设计精巧，并为新的印尼国家贡献了一个有用的神话；苏哈托的右翼的军事国家是荷兰和日本那样类型的后殖民主义国家，用新的制度再次强化了 this 神话。但是地理最终压倒这两种寻求极度中央集权化的企图。在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伊斯兰团体中，穆罕默迪亚冲在最前线，忠于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进步思想。恰恰是这些团体，而不是世俗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了20世纪90年代末反对苏哈托的后民主斗争。据报道，一位伊拉克知识分子曾这样说道，“当我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时，我感觉我看到的是伊斯兰教的过去，但是当我到了印尼，我

---

① Geertz, *Islam Observed*, pp. 61 -62.

② Andrew MacIntyre and Douglas E. Ramage, "Seeing Indonesia as a Normal Country",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Barton, 2008.

感觉我看到的是伊斯兰教的未来”。<sup>①</sup>

丰富的知识可以避免信仰的意识形态化，这种宗教的活力和生机只可能发生在一个多派别的国家，在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后的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事实证明这个国家比许多人想象得要更加稳固。印尼现在炫耀着自己拥有独立的媒体，有十一家国家电视台，还有一家东南亚最自由的出版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可能除了中国，这里有最多的人脱离了贫困，所以印尼也已做好准备成为21世纪的经济巨人。印尼也已做好定位，承受住分权化的凌厉攻势，尽管是分散的群岛，仍要团结在一起，因为共同的语言——印度尼西亚语——将这个国家凝聚在一起。这种语言由于是一种商人的语言，不属于某个特别的团体或者岛屿，因此受到所有团体和岛屿的热情接纳。随分权化而来的还有在每个地方根据当地传统而实施不同的宗教法律的可能性，这就更进一步地消除了宗教本身作为政治问题的危险性。

在过去几年的民主环境中，宗教进步人士取得的针对激进分子的胜利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因此，印尼的知识分子开始不情愿地将此归功于苏哈托建立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及其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提携。没有这些，印尼绝不可能在他下台后团结在一起。那些举行示威游行，直接导致苏哈托下台的学生们，在年幼时正是苏哈托推行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倡议的受益者。我甚至听到过人们将苏哈托与现代土耳其的建立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以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了韩国工业力量基础的朴正熙相提并论。苏哈托（以及苏加诺）的努力有助于推动世俗的民族主义在印尼的发展，这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战役中是至

---

<sup>①</sup> 讲述给学者 Robert W. Hefner，见 Eliraz, *Islam in Indonesia*, p. 67。

关重要的。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如伊斯兰祈祷团，有着强烈的也门元素，仍然潜伏在较为温和的伊斯兰组织之间，但是人们认为他们的势力弱，其中部分原因便是因为苏哈托的遗产并不都是坏的。

伊斯兰教在亚齐的这些岛屿上得到了认可，与此相反，在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像雅加达这样的城市的贫民窟和摩天大楼之间，现代生活中宗教的位置之争还在继续。据估计大雅加达有两千三百万人口。雅加达的天空中映衬出建筑物美丽的天际线，传递出了圣保罗的繁华，但这里歪歪扭扭的红屋顶的房子和脏兮兮的店面又让人联想到马尼拉那种破烂肮脏又忙忙碌碌的生活。高峰时间，汽车和摩托车在街道上缓慢蠕动，这种交通状况和加尔各答一样糟糕，几乎比亚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糟糕。在雨季，这个城市的四分之一都会被淹没。

而观察印尼人的最有趣的地方是在那些令人愉快的崭新的购物中心。这些地方通常是当地华裔出资兴建的。华裔只占印尼人口的4%，但是却参与这个国家商业交易的一半以上。这些崭新的购物中心里满是路易威登、范思哲以及其他名牌的店面，这里可以看到女子们戴着最时尚的丝绸头巾，穿着颇为裸露的精致女装。除了偶尔发生惊人的恐怖主义事件，极端主义已陷入困境。在这里，真正的价值观冲突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一派和另一派之间的冲突，而是中东伊斯兰教的外表与从中国肆意蔓延的物质主义之间的冲突。后者尽管仍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中国，特别是这里的华裔社群代表着全球资本主义，这构成了对印尼伊斯兰教的真正威胁。然而，同样是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他们给予中国美好祝愿的同时，却与美国发生冲突。

在这些紧张关系中，有一张万能牌，就是环境。记住，印尼处于地震火山的包围之中。我在班达亚齐遇到的伊斯兰教学者阿

布巴卡尔（Alyasa Abubakar）告诉我说，因为“人们接受海啸，认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海啸后没有出现混乱。由于有伊斯兰教，尽管人们失去了许多家人，但并没有因为悲痛而失去理智。这里的人们有信仰，与卡特里娜飓风后新奥尔良的那些人不同。这两场自然灾害的社会反应差别再明显不过了”。

因此，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伊斯兰教必然会得到加强。这只会增加对这一信仰持续演进的关注，有关于此的争论在印尼比几乎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活跃，而这正是因为印尼是一个非阿拉伯的、事实上是世俗的国家。这里的人们讲的不是先知的语言。尽管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家喻户晓，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也由此在公共关系上获得优势，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在地理上遥不可及。伊斯兰教律法没有得到广泛实施，也并没有一直受到尊崇。最重要的是，印尼是一个民主国家，在这里，人们并不害怕印刷、出版他们关于宗教的想法，不害怕政府或激进组织对自己进行报复。因此，印尼正为在 21 世纪建立伊斯兰教的真正的视野和哲学本质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场所。与印度一样，印尼正在作为一个充满生机、精力旺盛的民主国家而崛起。雨季的亚洲将真正处于各种事物的中心。

## 第十四章

# 海上亚洲的中心

印尼，特别是苏门答腊岛，以及在马六甲海峡另一边的马来西亚半岛，形成了海上亚洲的中心。马六甲海峡是 21 世纪多极世界的富尔达走廊（*Fulda Gap*）。红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几乎所有的海上航线都汇聚在这一世界贸易最重要的咽喉要道；印度和中国的海上影响力在这里交汇；印度洋在这里与西太平洋相连。到 2020 年，在这一海峡，与能源相关的油轮运输量将至少增长 50%，这进一步增强了其重要性。

印尼除了本身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以外，还将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作为东亚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国。这个国家辽阔的群岛、丰富的能源资源、多样的民族、占优势的伊斯兰教、制度缺陷和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都将使其成为世界政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心。<sup>①</sup> 历史是具有启发性的：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苏哈托巩固了政权，使印尼走向右翼，美国的海上航线得到了保障，因此越南战争其实并不必要，只是我们那时没有意

---

<sup>①</sup> Juli A. MacDonald, Amy Donahue, and Bethany Danyluk, “Energy Futures in Asia: Final Report”, Booz Allen Hamilton, November 2004.



识到这一点。

我又站在了班达亚齐，站在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这里有500多英里长，北端有200英里宽。但其极端拥堵的靠近新加坡的南端入口仅有11英里宽，潜藏危险的浅滩和来往的载重船只使这里更加拥挤，从超级油轮到小拖船、捕鱼船都在争夺空间。<sup>①</sup> 在这里，地理统治一切。迄今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没能减少商业对这一水道的依赖。在东亚和东南亚的14个国家中，有12个高度依赖中东石油，这些石油主要经这里运来。<sup>②</sup> 马六甲海峡使这一点极为明显：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开放的大洋”，而印度洋是“半封闭的”，这正是其脆弱的原因，但也因此，使其拥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sup>③</sup> 事实上，人们最初并不使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这样的术语；在当地商人的心目中，不得不进行协商的水域包括一系列各自分开海域，从东非一直延伸到新几内亚附近的印尼的香料群岛。<sup>④</sup>

在马六甲海峡的马来西亚这一边，离新加坡不远处，是马六甲这个古老的商业中心。它正位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网络的中点，这一贸易网也不得不服从双向的雨季季风：船只只能在马六甲城等到一场季风结束，然后利用下一场季风。在中世纪末，马

---

① 在我的上一本书中，我概要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情况。*Hog Pilots, Blue Water Grun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in the Air, at Sea, and on the Grou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ch. 3.

② Mohan Malik, “Energy Flows and Maritime Rivalrie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8)

③ Ian W. Porter, “The Indian Ocean Rim”,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6, No. 6 (1997) Malik 提到的。

④ G. B. Souza, “Maritime Trade and Politics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ncluded in Ashin Das Gupta and M. N. Pearson, eds.,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1500–1800* (Kolka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六甲成为海上的伊斯兰城邦，一个生机勃勃的马来集市城镇，依赖印度古吉拉特的商人，也依赖中国人的保护。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马六甲就与中国人巩固了关系。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并在此后的130年中将其作为葡萄牙人垄断贸易帝国的总部。葡萄牙人对商人征税过高，许多商人只好将船开到其他港口，削弱葡萄牙人获得贸易支配地位的企图。<sup>①</sup>葡萄牙人、中国人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商人使得信奉伊斯兰教的古吉拉特人被迫离开马六甲，他们或多或少都将生意转移到了海峡那一边的亚齐。他们出口印度的织物，到那里换取胡椒。

胡椒，“热带藤蔓上长出的气味刺鼻的莓果”，在干湿交替的热带季风性气候下生长繁茂。胡椒是这里主要的贸易商品，一如海洋那一端的乳香，一如今天的石油。需要密集的劳动力、很难产出、从古罗马到中国的所有人都渴望得到的黑胡椒（真正的胡椒）与乳香一样，因其药物特性——心脏和肾脏的兴奋剂——而闻名，其重要价值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分。苏门答腊北部——亚齐——满是这种植物。<sup>②</sup>事实上，葡萄牙人没能接管苏门答腊胡椒贸易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他们处于马六甲之外，还因为古吉拉特人和与其同为穆斯林的亚齐人合作发展出了一个替代性的供应网络——通过印度的科罗曼德海岸和伊朗到达红海。<sup>③</sup>16世纪末，葡萄牙人每年运输120万磅胡椒到好望角附近，但约有400万磅经红海运输。当时亚齐的海上王国正处于鼎盛时期。

---

① Dorothy Van Duyne,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2007.

② Donald B. Freema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Gateway or Gauntlet?*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5

③ Patricia Risso, *Merchants & Faith: Muslim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Indian Ocean* (Boulder, CO: Westview, 1995), p. 90.

在苏丹卡哈尔（Ala-al-din Riayat Shah al-Kahar, 1537~1571）统治下，亚齐是马来世界中最强大的王国，其国际联系向西远达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sup>①</sup> 在后来的一位苏丹乌丁（Ala-uddin）的统治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支舰队于1602年驶入亚齐。

大致就在同一时期，17世纪初，葡萄牙人基本已被荷兰人逐出东印度群岛。这既是由于荷兰人在海上进行的围攻和封锁，也是葡萄牙人本身目光短浅的贸易行为使然。荷兰人先是作为解放者受到欢迎，接着又发展出一个贸易体系，与葡萄牙人的一样强大，并且更加全面。荷兰人不仅成为贸易路线的掌控者，而且还成为印尼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商业文化”的大师。<sup>②</sup>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曾因马六甲海峡开战，1786年，在比其欧洲竞争者开明得多的贸易体系的支持下，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的小岛槟榔屿建立了据点。有鉴于此，在现代早期，马六甲海峡就已处于大国角逐的中心地带。然而，英国和荷兰认识到两国之间这种敌意会引发暴力，不能持续下去，因此相互妥协，于1824年签订了《伦敦条约》。条约规定，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马来半岛，荷兰人则仅限于印尼群岛。<sup>③</sup>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版图开始形成。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荷兰人这里，因为正是他们创造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实际上，苏加诺和苏哈托都继承了荷兰人那种帝国

---

① Arun Das Gupta,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onesia: 1500-1800", in Ashin Das Gupta and Pearson,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New Delhi: Sage, 1987); Satish Chandra,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 (New Delhi: Sage, 1987), pp. 181-182.

② Michael Leifer, *Malacc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Sijthoff & Noordhoff, 1978), p. 9. 以及 Van Duyne, "Straits of Malacca".

③ Van Duyne, "Straits of Malacca"

式的中央集权的统治风格，他们正是在荷兰人建立的混乱的帝国之上继续建设并巩固这个帝国。

荷兰人是帝国主义者中最为功利的，这种性格特点来源于他们在家乡与自然的战斗。那里是一片水域、围海垦田、风车和水泵站的迷宫。到处“都能听到流水的声音和无止境的预告灾难的声音，让人害怕”。在荷兰全境，都需要“精确的协调与合作——工程师的智力”，“秩序的推进力”，以及发展出的一种与此相应的需要——准时，因为迟到与失败和不负责任联系在一起。纪律就是一切。在这种文化下，最终没有“天主教的浮夸和排场”，也没有“罗马的轻浮”。生活按照严格的加尔文教派的规则进行。<sup>①</sup>

你可以“治”水，却不能“强迫”它。因此，在他们自己的社群内也发展出了对忍耐的最高的要求，只有忍耐才能协调与合作。这是一种“共识”的文化。

但是如果地理决定了国家的性格，为什么这样一个机械的、技术的、合作的社会不能在其他庞大的港口的三角洲地带发展出来呢：孟加拉？在孟加拉，与荷兰一样，自然之水无尽肆虐，因此似乎也需要人们的合作来驯服。但是孟加拉的国家特点却与荷兰的不同，这是因为个人做出的决定与地理做出的同样重要。在孟加拉，“农民要向当地的地主……朝贡交税”。如果恒河改变河道，河水淹没土地，这些并不拥有他们耕作的土地的农民就会迁到距离最近的一块干燥的土地上，重新开始耕作。只有英国殖民者在孟加拉引入了土地所有制之后，当地的地主才开始有意识地

---

① Han van der Horst, *The Low Sky: Understanding the Dutch*, trans. Andy Brown (The Hague: Scriptum, 1996), pp. 29, 85, 127; Geert Mak, *Amsterdam: A Brief Life of the City*, trans. by Philipp Blom (London: Harvill, 1995, 2001), p. 1

保护他们的财产，修建堤坝和其他建筑来控制洪水。<sup>①</sup>

正如荷兰国内的社会纪律出于深刻的不安全感——担心欧洲西北部这一片和海平面一样高的土地会被逐渐渗入的水侵蚀，帝国统治的纪律则体现在他们对殖民前哨的“脆弱的控制”；事实上，荷兰人“在福摩萨（指台湾）失去了其位置……被踢出了巴西”，英国人把他们扔出了纽约。整个海洋贸易本身“是一场赌博”。<sup>②</sup> 然而荷兰人的海上王国仍在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印度洋和东印度群岛。荷兰作家黑特·马柯（Geert Mak）告诉我们说，17世纪中期，在其鼎盛时期，荷兰人有700多艘船只在海上，“这支舰队比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的舰队总和还要大”。<sup>③</sup> 1600~1800年，共有9641艘船只从欧洲驶往亚洲，其中几乎一半是荷兰的。“到1648年，荷兰已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国，”博克舍（C. R. Boxer）写道，“商业前哨和强化的‘工厂’广布在从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到累西腓（Recife）、从阿姆斯特丹到长崎的广阔地域”，印度洋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sup>④</sup> 这个紧凑小国所具有的支配优势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其船只和前哨并没有强大的军队做后盾。<sup>⑤</sup> 葡萄牙人作为十字军战士到达了印度洋，而荷兰人最初是作为商人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说贸易就是一种宗教。<sup>⑥</sup> 荷兰以这种方式在17世纪就预示了后美国时代的多极

---

① Van der Horst, *Low Sky*, pp. 90 - 91

② J. H. Plumb, introduction to 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 - 1800* (London: Hutchinson, 1965)

③ Mak, *Amsterdam*, pp. 160 - 161

④ Boxer, *Dutch Seaborne Empire*, p. 29. 这一部分关于荷兰帝国的许多资料都基于这本经典著作。

⑤ Mak, *Amsterdam*, pp. 120 - 121

⑥ Alan Villers, *Monsoon Seas: The 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p. 166 - 167.



世界中主要大公司的商业和经济帝国，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这样的中小型国家以及欧盟这样大型的国家联盟，在其中军事尽管肯定的是国力的影响因素，但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

已故的英国历史学家普拉姆（J. H. Plumb）写道，荷兰的大师如伦勃朗和哈尔斯的油画中的脸庞“谨慎、精明、自鸣得意、朴实无华……一点也不显露他们潜意识中的动力，而是就他们生活中的节制和奉献进行着雄辩”。<sup>①</sup>的确，正处于帝国鼎盛时期的荷兰人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非常现代，实际上，非常团结的、钢铁一般的决心。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私有的土地所有制和持续抵抗海岸洪水的需要塑造了他们的国家性格。此外，荷兰人与英国人一样建立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公司来运作的帝国主义模式。1602年，荷兰共和国特许东印度公司（VOC）垄断东到好望角跨印度洋，西到麦哲伦海峡跨太平洋的贸易和航行。

东印度公司是国中之国，能够缔约、结盟，并以尼德兰联邦（现代荷兰的前身）的名义发动防御性战争。荷兰对东方的征服不是一种国家间的征服，而是民间商人的征服，被征服者被赋予权力，可以将这些要塞随意交易。历史学家博克舍观察到，“荷兰和泽兰（Zeeland）的这些商人——寡头政治执政者，总体上提倡国际贸易自由，特别强调海上的自由，主要……是被自身利益所驱使”。<sup>②</sup>

荷兰帝国形成和扩展其影响的方式与今天的欧洲联盟依稀有些相似。欧洲北部低地的七个反叛的省或邦（state），其中荷兰是最重要的一个，1579年同意加入乌特列支联盟（Union of Utrecht），对外部世界形成共同阵线，并相应地将外交政策交由海牙的荷兰议会掌管，这是一个有行政权的议会。这七个省或邦

---

① Plumb, introduction to Boxer, *Dutch Seaborne Empire*.

② Boxer, *Dutch Seaborne Empire*, pp. 50, 102.

尽管有许多不同，但逐渐在经济和商业政策方面凝聚起来，并推动了东印度公司的形成，这是这一联合过程中的几个高潮之一。正是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海上网络中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心，荷兰人、泽兰人、佛兰芒人（Flemings）、瓦隆人（Walloons）和马拉诺人（Marranos）建立海外网络的热忱成为其运作的基础，这些商人的社群将要辐射整个地球。

印度洋为荷兰人提供了在地中海和黎凡特地区扩展贸易的一个自然区域。一些荷兰人曾与葡萄牙人一同航海，因此熟悉东印度群岛，这使开展贸易更为便利。还有那些许多人追求的瓷器、茶、胡椒以及其他东方的香料，更不用说欧洲人对印度织物，特别是古吉拉特的棉制品的欲望，以及波斯、孟加拉和中国的丝绸，爪哇的咖啡和糖。对于印度的靛青和硝石、锡兰的大象以及阿拉干和巴厘的奴隶，亚洲内部和亚洲之外的地区也都有着需求。因此，17世纪最初的几十年见证了荷兰人是如何与葡萄牙人竞争，对其进行封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马鲁古群岛、马来亚、锡兰和印度等地将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取而代之。<sup>①</sup>

在东印度群岛的“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荷兰人是如何行动的？答案是：令人憎恶的。历史学家菲布尔（Holden Furber）写道，“目的单一、野心勃勃地要获取个人财富，而对于人们的痛苦冷酷无情”，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比雅加达这个爪哇岛上的小港口的征服者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更糟

---

① 实际上，荷兰人超越葡萄牙人获得优势地位的过程是非常残酷的。英国在波斯湾给他们带来麻烦，莫卧儿人在孟加拉使其困扰，但葡萄牙人的以下基地被荷兰人掠夺：香料群岛（1605年）、马六甲（1641年）、科伦坡（1656年）、锡兰其余地区（1658年）、柯钦（1662年）。A. J. R. Russel-Wood,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 - 1808: A World on the Mo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

糕了。科恩就像是从距其两个世纪以前的非洲帝国建立者的模子里出来的一样。他寻求使雅加达——被荷兰人重新命名为巴达维亚——成为波斯湾和日本海之间的亚洲海上贸易的中枢。他的原则是在群岛的大部分地区进行领土扩张，无情地垄断三种主要香料——丁香、肉豆蔻坚果（nutmeg）和肉豆蔻种衣（mace），并引入荷兰移居者，辅以奴隶作为劳动力。<sup>①</sup> 科恩的“业绩”中包括对马鲁古群岛的班达群岛土著几乎彻底的灭绝。他的残忍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荷兰殖民者摆出的文明面孔与在荷兰船只上工作的那些野蛮的罪犯之间没什么太大的差距。尽管荷兰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上比葡萄牙走得更远，但是在对待热带岛屿土著居民方面，他们的行为却别无二致。19世纪的伊斯兰学者赫格朗杰（Snouck Hurgronje）指出：

值得我们钦佩的是，他们不屈不挠、精力充沛；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以及他们为达成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即使我们必须以他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评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难以抑制我们的憎恶。<sup>②</sup>

他继续解释道，就像将会表现出来的一样，亚洲的居民接触到的是“荷兰这个国家的渣滓，他们对当地人极端的鄙视，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倾尽全力壮大祖国那些股东的利益”。<sup>③</sup> 公司没

---

① Holden 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 - 180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6.

② Apud E. du Perron, *De Muze van Jan Compagnie* (Indonesia: Bandung, 1948), p. 13; also see Boxer, *Dutch Seaborne Empire*, p. 56.

③ Apud E. du Perron, *De Muze van Jan Compagnie* (Indonesia: Bandung, 1948), p. 13; also see Boxer, *Dutch Seaborne Empire*, p. 56.

给多少雇员开出过适当的薪水，迫使他们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谋生。还有，想想在海上六到八个月的艰辛，以及在对疾病预防几乎一无所知的热带环境中生活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荷兰人自然不愿忍受，公司的成员便经常是粗俗卑贱的人中之最，选择到东方谋利的商人也是最为寡廉鲜耻的一群。船员们淫乱、喝酒、偷盗、谋杀，不得不用“铁棒像对待未被驯服的野兽那样”实施管理。<sup>①</sup> 狠揍和鞭打很常见，而对于同性恋的惩罚则是把两个犯人绑在一起扔到海里去。

黑特·马柯写道，荷兰东印度公司招收新人的工作是由所谓的灵魂商人（*zielverkopers*, *soul merchants*）进行的。他们从街上救回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给他们提供食物和居所，直到最后“通过喋喋不休地鼓吹和宣扬”告诉他们，船上需要人手。于是这些人就被骗到了船上，随后在船上大批地死去：从桅杆上掉下去，从甲板上被海浪卷下去，被海盗杀掉，感染上坏血病、疟疾或者痢疾，“或者与船一起沉没”。舱面水手中有十分之一死于驶往海外的旅途中；在离开阿姆斯特丹的67.1万人中，26.6万人再也没有回来。<sup>②</sup> 每个星期去往好望角或从那里返回时在大西洋的赤道无风带停留时都有许多尸体被从船上扔到海中。<sup>③</sup>

许多船长经常自己在船上享受着酒肉美食，一旦到了好望角的东边，他们削减船员应得的份额，还私吞在巴达维亚得到的利润。他们驶往东方的船只被称为“印度人”，从外表看，这些船只光鲜如画，但船里却黑暗、寒冷、潮湿、憋闷。由于船上载满了水手储物箱、一桶桶的饮用水以及其他给养，显得凌乱不堪，

---

① Boxer, *Dutch Seaborne Empire*, p. 78.

② Mak, *Amsterdam*, pp. 160 - 161

③ Villiers, *Monsoon Seas*, p. 177.

几乎没有人员活动的空间。因此，也没有空间来将病人和健康人隔离开来。许多疾病迅速传播，特别是因为一些人嫌去厕所麻烦，就在角落里大小便。船上满是垃圾和粪便。食物也不新鲜，爬满虫子，食用的肉的部位也是最差的。许多人在航海途中晕船严重，甚至走不到厕所去解手。

从阿姆斯特丹向南经过好望角，再向东沿着“咆哮西风带”——南纬36度到50度——到达印尼的巽他海峡，这一航程通常需要七个月的时间。从1652年赞·范里贝克将荷兰国旗插在那里，直到两个多世纪之后苏伊士运河开通，“好望角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中途住所”，“印度洋的客栈”，在这里水手们补充给养、醉酒、休息，然后再开始另一个回合在公海上的地狱一般的、漫长的隐居生活。<sup>①</sup>

就葡萄牙人来说，这样贫困的生活会产生残忍的人，他们上岸后大部分时间都喝得醉醺醺的、虐待当地人，如同在宣告他们的种族优越性。所有的文化中都有流氓渣滓，荷兰和葡萄牙两国都将其最差的国民送到了殖民地和前哨基地。因此，当地人见识是这些西方国家呈现出的社会光谱的最底层。<sup>②</sup> 不同的帝国主义的长处和弱点是由具体将其呈现给当地居民的那些人决定的。总体上说，在印度的英国人倒不至于是英国人中最差的，他们仅仅是平庸的普通人。因为美国没有真正的殖民地，而主要是军事前哨基地，因此近年来一直是训练有素的，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纪律严明的军队在呈现大国的实力部署。（不可否认，入侵伊拉克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残忍的事件，但这些都是来自华盛顿的宏观政

---

① Boxer, *Dutch Seaborne Empire*, p. 273.

② 葡萄牙和荷兰派出的并不都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以荷兰为例，德国人和瓦隆雇佣兵也在其中。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很低。



策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个别部队的行为，尽管也有阿布格莱布这样的例外）因此，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后者事实上是存在的）一般说来要比葡萄牙和荷兰更为温和。这一规则的例外包括荷兰人对待日本、台湾地区和波斯居民的乐于通融的行为，他们热衷于教化当地强有力的领导者，无论是幕府将军还是伊朗国王。

总的说来，荷兰人在他们的殖民地留下的文化印迹要少于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当地的程度是荷兰人做不到的，他们余生都定居在这里，而荷兰人都等不及服役时间结束就想离开。而且，葡萄牙人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像是俗气而又华丽的风景画，使遥远的印度洋海域的居民日眩神迷。对念珠的使用、对圣人的狂热崇拜等都令人神往，在某些方面，与印度人的宗教很相似，在一些情况下，又与佛教相似。荷兰人的加尔文教派，逻辑严密，仪式简朴，简直不能与其匹敌。而且，葡萄牙的教士是独身主义者，他们在一个地方居住许多年，因此与当地社群的联系紧密，而荷兰的牧师是已婚的，要照料家庭，频繁地在不同处所间搬迁。与罗马天主教徒相比，加尔文主义的信徒也几乎没有派出多少传教士，他们正忙于欧洲内部的宗教纷争。除了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加尔文教派几乎没有给东方各族人民留下多少印象。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使葡萄牙语成为几个世纪以来亚洲沿海地区的通用语，而荷兰语，或者至少是荷兰语的一种形式，唯一扎根的地方是南非。

但是最终击败荷兰帝国的并不是这些。与许多帝国一样，其消亡是逐渐发生的，罪魁祸首就是帝国的过度扩张，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这样表述。<sup>①</sup>这并不是说荷兰人在印度洋

---

①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及其周边水域以及在西印度群岛有太多的殖民地和前哨基地，而是维持所有这些地方的费用，再加上荷兰人卷入的佛兰德（Flanders）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冒险活动的开销，事实证明是过多了。荷兰海军不能满足这么多在全球维持治安的需要。在尼德兰联邦中，只有阿姆斯特丹的海军部找到了资金来建造足够多的军舰（1723～1741年共计33艘），与此相比，鹿特丹7艘，泽兰4艘，弗里斯兰（Friesland）1艘，其他为陆地所包围的省份则一艘也没有。

表面上看，这有点像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行动加之其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消耗巨大的陆地行动所需的费用和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造船数量的衰减——从90年代早期的600艘到21世纪最初10年末的不足300艘之间的关系。21世纪初的美国像18世纪的尼德兰联邦一样，可以承受在世界各地的前哨基地，但若加上其在一些地方承担的地面部队的义务，就不一定能够承受了。

对荷兰帝国的了解是理解雅加达的“都市丛林”的起点。这座城市是在爪哇海上的古老港口——帆船码头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里有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存放香料的库房，长长一片白色的房子，巨大的柚木横梁和红瓦屋顶因岁月流逝而发黑，库房旁边，棕榈树排成一排，优雅美丽，附近是铁皮顶的窝棚和洒满垃圾的管道。由于这座城市的这一区域缺少高大的建筑物，因此能够使人想象旧时巴达维亚的模样。这里就是伦勃朗的一些主顾挣钱的地方。这片海洋在三个半世纪以前，比现在距离陆地要近得多，因为在这期间进行了土地开垦。然而，我爬上了一座塔，看到了距岸边中距离处的渡船和捕鱼船，一条条堆在海陆边界。雅加达从这里一直向南延伸，如此之大，更像是一个城邦，而不是一座城市。

自从荷兰人到达这里，就一直有大量的华人集中在这个地

方。华人从糖和香料生意起步，做着所有的中介贸易，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东欧的犹太人。他们也同样地遭到辱骂：对经济至关重要，却因所有的灾难而受到责怪。在1740年的动乱中，数以千计的华人被杀害，也因此被赶到城墙之外居住。反华的屠杀也成为当地历史的周期性特点，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98年，尽管在帆船码头附近就是生机勃勃的唐人街。

在中国的牛年的倒数第二天，我拜访了古老的雅加达的一座建于1650年的中国寺庙。这是一个红色与金色、烟与火的世界。人们烧着纸钱，为他们在天堂的祖先送去象征性的支持。巨大的蜡烛和石头雕成的龙形成了一座森林，人们拿着一把把燃着的香，围着这座森林，向空中膜拜。

甚至在今天，印尼的华人也被有效地排除在军队、司法等职业之外，因此他们主导了商业世界。尽管有过动乱，通往寺庙的街道上站满了印尼人，排着队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实际上，今天当地人对待华人的态度要比可怕的族群间的历史所体现的微妙得多，这的确有助于影响当地人理解中国的方式。

1998年以来，反华人的暴力行动不再发生，华语媒体在印尼蓬勃发展。印尼华人和中国人都不再成为印尼的敌人。更确切地说，华人代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战略和经济力量，印尼必须和平地适应这种力量，印尼正努力寻找一种方式来牵制这种力量。2005年，中国与印尼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2007年又就国防事务合作签署了协议。与此同时，印尼又帮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入东亚峰会的框架，针对中国两面下注。<sup>①</sup> 每当讨论转到美国和

---

<sup>①</sup> Andrew MacIntyre and Douglas E. Ramage, "Seeing Indonesia as a Normal Country",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Barton, 2008.

印度在东南亚的作用时，中国就会出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华盛顿和新德里的海军在马六甲海峡附近越投入，印尼就会越独立。因此，这个伊斯兰世界中最大的国家背地里（secretly）欢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与此同时，将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印度看作同伴，认为印度也是位于亚洲中心的民族主义高涨的民主国家。印尼的高级官员告诉我说，他们希望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能够用太平洋联盟体系限制住中国，由此有效地抵消其影响。

事实上，对于印尼来说，抵抗中国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印尼最大的离岸石油生产商，中国还从婆罗洲的加里曼丹购买橡胶和煤炭。印尼电网的扩大也依赖中国。中国军舰还访问印尼的港口。

雅加达国防与安全研究所的执行主任巴克利（Connie Rahakundini Bakrie）这样说道，作为民主国家，印尼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是军事在国内的作用相应缩减，正是因此，印尼现在对于中国强大实力的侵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脆弱。她以及其他解释道，由于军队在支持苏哈托及其有污点的人权记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军队和军方作为一个整体，其名誉在印尼多少受到了损失，就这一点而论，也成了政府低预算的受害者。印尼有2.4亿人口，其地理跨度像美国一样辽阔，而国防预算却比新加坡这样微小的城市国家还要少，虽然与马来西亚的国防预算规模相同，但马来西亚只有印尼人口的十分之一。新加坡有四艘潜水艇，印尼只有两艘，还不能运转。

拉哈昆迪尼（Rahakundini）注意到，民主化最终意味着权力分散，这个国家最令人觊觎的自然资源大多位于亚齐和巴布亚这样处边缘的地带，因此担心道，除非印尼能够发展出某种类似于世界级的、重视海军的军队，否则“我们会被非正式地分裂，一点点地分成受外部影响左右的模糊的不同领域”。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尼军队因过分参与国内政治而在国内声誉受损，同样是这支军队，现在又被迫切地期望集中于向外针对潜在的敌手。印尼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在战略上越来越重要，甚至越来越成为穆斯林民主国家的成功典范，与此同时，地区海军和渔船队的崛起——来自中国的、印度的、日本的——意味着印尼可能将逐渐失去一些主权。

印尼国防部长尤沃诺·苏达索诺（Juwono Sudarsono）告诉我说，印尼军方的战略是一种“耐心”的战略：在中产阶级深入发展的时候坚持下去，为军队的扩充，特别是海军，提供国家税收；与此同时，继续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提高国际地位，因此得到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支持。

同时，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其政治制度的多样性显示出受压制的迹象，似乎在中国重商主义影响的席卷下进一步明显。泰国曾经是这一地区的支柱，其选民越来越分布在两极，一边是可向上流动的、农村的劳动阶级，另一边是以曼谷为基地的中产阶级，恰巧受人尊敬的国王年事已高，王位继承人——他的儿子显然非常不受欢迎。

民主越来越混乱，泰国也将被削弱。同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将进入各自充满挑战的民主过渡期，两国的建国之父、政治强人马哈蒂尔和李光耀都退出了政治舞台。<sup>①</sup>

事实上，马来西亚与印尼正好相反。印尼人口的85%左右是穆斯林，而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更明显的、锋芒毕露的“伊斯兰教国”，只有60%的人口是穆斯林。由于所有的马来人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被种族化，结果形成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之间尖锐的隔阂。潜移默化的伊斯兰化导致在过

---

<sup>①</sup> 李光耀的概况参见拙作 *Hog Pilots, Blue Water Grunts*, 第三章。



去二十年中有七万华人离开马来西亚，留下的华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华语学校去读书。总体而言，马来西亚的政治怨恨在增长，2007年末，十万印度人集会，反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地位。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样，发现美国在东南亚的海军存在便于防范中国，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尽管吉隆坡提出了穿过马来西亚北部修建油气管道的提议来向北京献殷勤——这项提议将减轻北京对马六甲海峡石油运输的依赖。实际上，马来西亚越来越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之下，尽管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统治者在其华裔国民看来越来越成为沙文主义者。<sup>①</sup> 可以这样解读：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对华人的反感并不一定延续到外交政策的范围内。北京越来越强大，除了最高级别的敬意以外，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对待。所有这些国家都希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海军存在能够继续，再加上印度海军以及其他海军，例如日本和韩国的海军的崛起，这将平衡中国的力量。

新加坡的行动最清楚地揭示了对中国的这种静默的恐惧。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战略位置重要，位于马六甲海峡最窄处附近。在新加坡，华人与马来人相比处于优势地位，77%对14%。因而新加坡害怕成为中国的附庸国，因此与台湾地区发展了长期的军事培训关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一直公开敦促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保持在该地区的投入。<sup>②</sup> 新加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其充满争议的独立将是北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的标尺。

这发生在新加坡温和的独裁主义面临挑战的时候。执政的人

---

① Ioannis Gatsiounis, "Year of the Rat: A Letter from Kuala Lumpur", *American Interest*, May/June 2008.


② Dana Dillon and John J. Tkacik Jr., "China's Quest for Asia", *Policy Review*, December 2005/January 2006

民行动党的合法性一直有赖于其经济表现，当全球的经济衰退影响到这一地区时，人民行动党别无选择，只能开放其制度。<sup>①</sup> 尽管长期来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会受益于民主化，但在短期，严格的选举政治将暴露两国内部的弱点，这会使其更易受到北京的压力影响。与荷兰和其他在东南亚的西方列强不同，这些国家从他们国内的港口远程运作，而中国就在近旁，并且在本地区地理上占有优势地位，这使其有机会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而这与我们在过去所见的相比，将会更加含蓄、更加全面。

---

<sup>①</sup> Hugo Restall, "Pressure Builds on Singapore's Syste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 5, 2008.





## 第三部分

第十五章 中国的两洋战略？

第十六章 和谐与混乱

第十七章 桑给巴尔：最后的前沿



## 第十五章

# 中国的两洋战略？

在五百多年以前，印度洋为西方的征服行动提供了舞台。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将“现代史的开端”与葡萄牙人掌控非洲—欧亚海上航线（始于航海家亨利亲王和达·迦马）联系在一起。<sup>①</sup>葡萄牙人之后，我们看到了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英格兰人和美国人在印度洋及其近海具有重要意义的大片土地上先后留下自己的印记。这些西方的征服者大多是为商业利益而来，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抱定决心要守卫海上交通线路，以安全地从大洋的西部进口中东的石油，他们也守卫了迪戈加西亚岛的珊瑚环礁的中部，将英国的领土用作基地，分别在1991年对伊拉克、2001年对阿富汗进行了空袭。

冷战的几十年间，美国是伟大的全球海上强国，而苏联是主导欧亚大陆的陆上强国。但是随着冷战成为过去，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崛起，实际上，在美国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困境不得脱身之时，在欧亚大陆的海上边缘地带，不仅包括印度洋，还包

---

<sup>①</sup>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565



括西太平洋，一种新的并且更为复杂的秩序正在逐渐出现。随之而来的分析认为，美国海军已经达到其支配优势的顶点，面对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以及印度的崛起，这预示着西方人对这些水域的控制将宣告终结。回首望去，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间，美国军方以援助印度洋海啸遇难者的名义在苏门答腊沿海地区进行救灾工作，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作为美国海军力量在亚洲存在的高潮之一。航空母舰和远征战斗群都出现在那里，还有配套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直升机从甲板上腾空而起，从船到岸不断环行，再加上救援的游泳者和卫生员，这幅景象创造出了强势和美德混合在一起——而这两种特质很少混合在一起——的鼓舞人心的光环。尽管统一援助行动的目的是人道主义的，但其所用的技术——迅速集结大量的军舰和飞机以“最佳速度”穿越几百英里的洋面——在本质上却是战争所必需的。这次救援行动传递出的真实信息是：看呀，这就是美国海军的实力！

然而现在真相就在眼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多年实现对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几乎完全的支配后，美国逐渐失去了自己名副其实的“军事湖泊”的这两大洋。私人智库战略预测公司（Strategic Forecasting）的安全分析家们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几年之后，南亚和东南亚海上再次出现同等程度的灾难时，美国将不会成为主要的救济援助的提供者。在下一次紧急情况发生时，我们的船只将与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可能还有中国的新的“大甲板”来分享这片水域（还有荣耀）。与此同时，中国生产和获得的潜水艇是美国的若干倍。实际上，中国正处于造船和购船的狂热中，这在未来十年中将导致解放军拥有比美国海军更多的船只。当然，我们也将会看到，数字讲述的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尽管很重要。

不可否认，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海军一直在收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拥有 6700 艘船。在冷战期间，美国有大约 600 艘船。90 年代柏林墙倒掉后，美国有 350 多艘船。现在减少到少于 280 艘。尽管海军计划将这一数字增加到多于 310 艘，但据美国国会预算局和国会研究服务部称，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该成本已超出限额 34%，意味着这样的计划可能过于乐观。在下一个十年以及以后的岁月中，如果美国海军每年仍然只建造七艘船，舰队的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年，那么可以想象到，船只的总数会缩减到两百艘左右。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衰退，五角大楼的预算可能会进一步缩减，而船只的发展属于非常昂贵的资本项目，代价不小。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海军将很快让出其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优势地位。上文引用的数字说明的是一种缓慢发展的趋势，不排除会受到形势逆转的影响。但这确实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七十年，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以及非国家因素，如海盗，终于开始挤入这幅图画。美国在世界大洋中的单极时代开始逐渐消失。正如已经提到的，与此同时，中国——美国在 21 世纪最有可能的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正日益将其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海上力量。

值得重复的是，中国军队崛起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不合法的因素。美国在内战后巩固了自身以陆地为基地的力量，并解决了美国西部的问题，由此获得了优势地位，并在 20 世纪初修建巴拿马运河时达到了实力的顶峰，中国的优势地位正好可与此对比。在美国那些最容易被遗忘的总统执政期间——海耶斯、加菲尔德、亚瑟、哈里森，等等——美国经济以高速的年增长率静悄悄地前进。因此，随着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越来越多，美国第一次在那些遥远而广大的地方发展出了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推动了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南美和太平洋地区登陆，以及其他的军事行为。为什么我们要幻想中国会走一条与此不同的道路呢？现在中国社会的一点一滴都如同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社会一样充满活力。

1890年，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出版了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认为一个国家保护其商船队的海上力量一直是世界历史的决定因素。马汉一直受到那些寻求海上主导权的人的青睐，现在中印两国的战略家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著作。但是要认为中国严格遵循将获得海权作为实现地区霸权或者可能是全球霸权目标的手段，又太过武断。大国经常并不是在有意地寻求什么。恰恰相反，随着国家开始变得更加强大，但相反他们会产生出一系列新的不安全感，推动其有机地向海外扩张。

中国不是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统治下的伊朗。中国没有威胁要毁灭任何国家，而且热情地与美国发展外交和经济关系。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将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更紧密地捆在了一起，美国依赖中国的廉价商品，还依赖几万亿美元的中国存款支持美元，中国则依赖美国作为其主要的消费市场。牢固的美中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不仅是可信的，而且可能是21世纪全球体系最好的发展模式，真正的世界治理由此可以形成。

严格来讲，中国可能并不民主，但其体系允许就政策和社会的方向进行激烈的、活跃的辩论。甚至还有这种可能，中国将面对某种内部的剧变，这将导致其领导层发生分裂，并使中国向大国地位的征程延迟几年甚至更长时间。20世纪70年代苏俄政体研究者对苏联了解有误，预测冷战会再持续若干个十年，同样的，我，以及其他的人，起初假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甚至可能就是错误的。然而，考虑到目前的趋势，这样持续的增长必须被认真

地视为一种可能性。

因此，我认为，美国与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美国将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未来的中美竞争，特别是在经济和外交安排方面，将为“微妙”这个词赋予新的含义。然而，如果这一关系中出现明显的冲突，我预料其中必有一处将会是两国海军互动的场所：大印度洋和西太平洋。

美国的船只采购过程一直被形容为时断时续，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时期，面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减少，努力地维持海军现有的规模，而中国的国防预算二十年来一直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其经济，尽管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仍将在未来的年份里以每年8%~10%的速度扩张。中国的水下军火库包括12艘K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装备有尾流自导鱼雷；13艘宋级潜艇，与K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类似；2艘093型（商级）核潜艇，以及一艘094型（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三艘即将到位。

显然，这样的阵容无论如何也不能和美国海军现役的74艘核动力攻击和弹道导弹潜艇相比。在全世界的34艘航空母舰中，美国豪占24艘，而中国一艘也没有（但正在发展一艘或者是两艘）。还可以再列举一些这样的对比数据。但是，要重申的是，数字讲述的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更确切地说，这个故事是潜在的趋势、不对称的实力以及海军、经济 and 领土权力的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结合，这能够在整个亚洲开辟势力范围。

中国正在慢慢地赶上，但这一速度已快得足够警示美国人：他们并不会永远都处于优势地位。伊拉克显示给美国的是路边炸弹那种粗糙的、低端的不对称性，而中国，随着其导弹和空间项目的发展，将会通过劝阻和反介入的艺术向美国显示这种不对称性的含蓄、高科技的一面：未来中国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使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靠近亚洲大陆时冒更大的风险。最后，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亚洲的中心地位，其不断增长的海军力量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实力，将导致美国继续在亚洲失去影响力。

因此，论述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展开的海军战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至关重要。但在我进行这一概述之前，有必要再说说中国为什么转向海洋。具体来讲，中国正在发展的哪些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可以依稀与一个世纪以前美国自己的利益相比较？<sup>①</sup>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忙于应对这样或那样的陆地入侵。中国的长城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以驱逐突厥入侵者；20世纪中叶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担心来自北方的苏联的侵犯。因此，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将其国防预算集中于陆军，明显地忽视了海洋。但是这样的担忧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散。而且，近年来中国的外交官一直忙于解决与中亚各国以及其他邻国遗留的边界纠纷。实际上，现在一种反向的影响正在进行中，中国人正在通过移民的方式缓慢地接管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中国对海权的追求首先说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陆地边界首次不受任何威胁。

---

① 我对这个海上世界的想法大体上基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些学者的著作。他们关于中国海上战略的著作极为详尽、充满创造性，并且语气温和。他们是：Gabriel B. Collins,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James R. Holmes, William S. Murray, and Toshi Yoshihara. 我对以下四项文献尤表感激，我从中得到了统计资料 and 许多启发：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The Turn to Mah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Holmes,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bis*, Fall 2005; Gabriel B. Collins et al., eds., *China's Energy Strategy: The Impact on Beijing's Maritime Polici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and Andrew Erickson and Gabe Collins, "Beijing'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The Significance of a Chinese State-Owned Tanker Fleet", *Orbis*, Fall 2007。



滨海的城市国家和岛国，无论大小，追求海权都是理所当然的，而像中国这样在历史上封闭的大陆国家追求海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奢侈的：是强国崭露头角的标志。仅仅通过以广泛的方式转向海洋，中国显示出了其在亚洲中心地带的陆地主导权。的确，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岛国，中国对其周边并不像 19 世纪末的美国对其周边那样有安全感。但是，现在的中国在陆地上比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都更有安全感。

另一个使中国转向海洋的因素是其经济引人注目的快速增长，这已经引发了贸易的爆炸式发展，因而也同时引发了沿中国海岸的商业爆炸式发展。2007 年，根据货物装卸量统计，上海的港口超过香港成为世界之最。2015 年前，中国将超过日本和韩国，成为世界上最多产的造船商。海权部分由商船运输决定，中国在这一领域将引领世界潮流。

首先，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决定了其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需要不断增长的、连续的能源供应来维持其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尽管中国越来越强调煤炭、生物能、核能以及其他替代能源，但中国比以往需要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中国官员将把进口石油产品的需求视为一个产生外交压力的点，认为未来的对手可能会就此做文章。（对能源来源多样化的需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公开地与苏丹这样可憎的政体来往）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碳氢化合物的用量翻了一番还多，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中还将再翻一番，而 1993 年以来其国内的石油生产一直处于停滞，于是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中国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的 85% 都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其太平洋沿岸各港口。从中亚通过管道进口的石油不够量，国内煤炭用量的不断增加也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更加依赖沙特阿拉

伯的石油和伊朗的液化天然气。因此，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南部的重要海上交通线必须得到保护。鉴于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伟大的文明国家的历史以及其近代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的历史，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会将这样重要的防御地带永远委托给美国海军这一自认为神圣的世界海洋的保护者呢？如果是你管理中国，承担着将上亿的中国人带进对能源高度依赖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责任，那么你也会为了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保护你的商船队而寻求可靠的海军。

但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距离拥有这样一支海军还有多年之遥。因此，目前，分析家马尔维农（James Mulvenon）认为，他们可能对搭美国海军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一“顺风车”感到满意。<sup>①</sup>然而，随着中国海军能够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这样“搭顺风车”的行为将变得不那么必要，特别是如果美国自身舰队的规模缩减，两支海军在能力上将更加接近。

要记住，从非洲向东到印尼，然后再向北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世界将日益成为一个广泛的连续体，因为各种各样的运河与大陆桥项目未来将可能在这两大洋间提供通路，而现在只限于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和巽他海峡（都在印尼水域内，后两个海峡与马六甲海峡相比是更次要的通路）。换言之，欧亚沿海地区的地缘格局注定将在某个时刻成为浓缩的世界整体。

尽管这里将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然而目前仍然是两个世界，马六甲海峡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海上文明的终点和另一个的起点。中国作为一个内陆大国接近印度洋，向沿岸国家例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缅甸寻求获得港口的通路，因此也将自己

---

<sup>①</sup> Gabriel B. Collins et al., eds., *China's Energy Strategy: The Impact on Beijing's Maritime Polici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带入了与印度潜在的冲突；中国有着面向西太平洋的漫长海岸线，这使其同时面临与美国的潜在的冲突。

因此，让我们超越印度洋，转向西太平洋。中国海军在这里几乎只看到了麻烦与挫折，中国战略家称其为“第一岛链”，从北向南包括日本和琉球群岛、朝鲜半岛的“半个岛”、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sup>①</sup>除了澳大利亚以外，其他地方都是潜在的导火线。可能出现的情境包括朝鲜的瓦解或朝韩战争，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的战斗，可料想到的海盗或者恐怖主义行为将阻碍中国的商船队进入马六甲海峡或其他印尼海峡。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可能能源丰富的洋底还有边界纠纷：在东海，中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尖阁列岛主权存在纠纷；在南中国海，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就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或全部存在主权纠纷。特别是在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上，这一纠纷对北京有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在任何需要的时候点燃国内民族主义的契机，但在其他方面，这对于中国的海洋战略家而言是一片糟糕的海景。从中国的太平洋海岸看这条第一岛链，他们将其视为一种“颠倒的长城”，用海军战争学院的两位教授霍尔莫斯（James Holmes）和吉原（Toshi Yoshihara）的话来说：美国的盟友很好地组织在一起，相当于在日本、琉球群岛、韩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建立了警戒塔，都能够潜在地封锁中国到更大的海洋的通路。中国战略家看到了这幅图景，并对中国海军被这样封锁感到愤怒。

以韩国和朝鲜为例。这两国的统一对中国而言在地理上带来的不便应该是最少的。朝鲜半岛从亚洲大陆伸出很远，控制着中

---

<sup>①</sup>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Holmes,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bis*, Fall 2005.

国东北部所有的海上交通，特别是将渤海拢入腋下，而那正是中国最大的离岸石油储备地。而且，统一的朝韩将可能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对其庞大的邻国中国和日本怀有明显的复杂感情，这两国在历史上都曾寻求对其控制甚至占领过朝鲜半岛。短时间内朝鲜半岛的分裂对中国是有利的，朝鲜——尽管其与世隔绝的政体给北京带来许多麻烦——在中国和活跃而成功的民主国家韩国之间形成了缓冲区。

至于台湾问题，则阐明了世界政治中的基本内涵：道德问题在深层仍然是权力问题。各方都在道德意义上讨论台湾问题，但其主权的归属具有关键的地缘政治结果。中国在巩固其自古拥有的领土的意义上谈及台湾，认为统一中国是为了所有华人的利益。美国在保留民主典范的意义上谈及台湾。但是台湾还具有其他意义：用已故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这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主导着中国的沿海地区，美国这样的外部大国可以从这里沿着中国的海岸外缘“辐射”力量。<sup>①</sup>因此，没有什么比台湾实质上的独立更能激怒中国的海洋规划者了。在这一颠倒的海上长城所拥有的众多的警戒塔中，可将台湾比作其中最高、位于最中心的一座。随着台湾回归中国大陆的怀抱，这一长城及其所代表的海上紧身衣将会突然裂开。

中国渴望拥有一支真正的蓝水海军，或者说海洋海军，就像美国曾经拥有的那样。要建立一支蓝水海军，美国首先不得不通过向西扩张和移民定居来巩固北美大陆的温带地区。如果中国能够实际上统一台湾，不仅其海军将在突然面对第一岛链时处于战略优势，同样充满戏剧性的是，中国的国家能量也会

---

①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Holmes,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bis*, Fall 2005.

释放出来，在实力映射的层面向外辐射，并达到迄今无法企及的程度。随着台湾问题转向对中国有利的一面，正如霍尔姆斯和吉原所设想的，中国随后将会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更加毫无拘束地追求海洋的大战略。（如果中国能够在最西部的省份新疆更有效地巩固汉族对信奉伊斯兰教的讲突厥语系语言的维吾尔族的控制，可能会更加鼓舞其在泛海洋的领域内为建设海军所做的努力）。

台湾这一挑战对中国具有的潜在影响，至少在象征意义上，类似于印第安战争中最后一次主要战役——1890年的伤膝河大屠杀。在这一可怕的事件之后，“蛮荒的美国西部”得到控制，美国的军力开始正式向海洋聚焦，十多年之后，开始修建巴拿马运河。尽管“多极”这个形容全球形势的词汇如今已被到处随意使用，然而正是台湾与大陆的融合才是这种多极世界真正出现的标志。

中国正在许多方面勤勉地努力着，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以改变美国主导的第一岛链的状态。像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会将中国作为头号贸易伙伴。以菲律宾为例，回溯一百多年以前美国人留下的遗产，包括战争、占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干预和巨大的经济援助，而中国则一直在竭尽全力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甚至在几年之前向菲律宾提供了一项防御协定，其中包括情报共享协议。因此，人们可以想象未来日本重新武装起来，统一的韩国和朝鲜民族主义高涨，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并发挥其作用，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在名义上亲美国、却已经通过贸易和其他与中国持续的经济和军事崛起相关的事实联系而处于中立。这一结果，加之美国力量的衰落和中国在所有海防前线的突围，将会使西太平洋局势极其不稳定。

这样一种情境下，在东边，中国开始觊觎中国战略家所称的



第二岛链，主要是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这样的美国领土。实际上，从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在大洋洲快速发展自己的利益，广泛地加强与那些似乎很难打交道的小岛国中的许多国家的外交和经济联系。

但是，中国的海上利益在南面最为突出，这里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之处，处于南中国海和爪哇海的复杂的海上区域，占主导地位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半岛、菲律宾南部，特别是属于印尼群岛的成千上万的岛屿，中国通往石油丰富的中东和非洲的海上交通线在这里的风险最大。这里有激进伊斯兰教、海盗、印度在海上的崛起，再加上印尼各海峡严重拥堵的地理“瓶颈”，却是中国油轮和商船队中很大一部分船只的必经之路。这里还有很多中国希望开采的重要的石油储备，使南中国海在一些战略判断上被视为“第二个波斯湾”。<sup>①</sup>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决策者眼中代表了机遇、挑战和噩梦，使印度洋东大门的这一区域跻身未来几十年中最具有关键意义的海域之列。美国海军在一个世纪以前采取行动控制了加勒比盆地，中国海军也必须这样行动起来。即使不是控制某个地方，也至少要像美国人一样在这些海域获得支配地位，因为马六甲海峡可被视为通往更广阔的世界的出口，与巴拿马运河相似。<sup>②</sup>

20世纪中叶，荷裔美籍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注意到，综观历史，国家一直致力于“圆周形的跨海扩张”来获得对毗邻海域的控制：希腊寻求控制爱琴海，罗马寻求控制地中海，美国寻求控制加勒比海，根据这一逻辑，中国寻求控制

---

① Andrew Erickson and Lyle Goldstein, “Gunboats for China’s New ‘Grand Canal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pring 2009.

②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The Turn to Mah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52–53.

南中国海。<sup>①</sup>

想象一下，看着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和远程战斗群在中国重要的后院随意航行，中国人心里是怎样的感受。美国海军在印尼进行的印度洋海啸救灾援助对中国人来说反衬了其在自己海上领域的无能，因为他们没有航空母舰可以派到当地实施救援。这次救援活动在中国的权力圈激发了一场不间断的辩论，中国是否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艘航空母舰，而不是继续集中于发展像潜艇这样纯粹用于发动战争的平台，后者在援助行动中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在中国人的眼中，未来中国海军对这些水域的支配是一项自然的权利。海啸救援行动只是强化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决心。

当想到海上的东南亚时，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难于治理的菲律宾南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群岛上那些激进伊斯兰教的危险。对于中国人来说，激进伊斯兰教是危险的，因为这使搜寻恐怖分子的美国军队有借口离他们的海滨更近。2003年和2006年两次在菲律宾就“永久自由行动”进行采访时，我直接见证了这一点。为了搜寻与基地组织和回教祈祷团相关的恐怖主义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美国特种部队在棉兰老岛建立了军事基地，帮助菲律宾陆军和海军士兵在南部被敌人围困的苏禄群岛执行反恐行动。其效果是，在1992年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关闭之后美国军队首次重返菲律宾，而且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菲律宾群岛的主岛吕宋岛的南部首次部署

---

①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ancis P. Sempa (1942;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7), p. X VI. 这一说法首次出现在以下这一文献中: Spykman and Abbie A. Rollins, "Geographic Objectives in Foreign Policy I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ugust 1939.

美国军队。这对于中国战略家而言完全是令人沮丧的消息。我访谈过的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军事存在的地缘政治含义直言不讳，他们告诉我说尽管今天的问题是激进伊斯兰教，但是这样的部署能够使美国军队在未来面对与中国的竞争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然后是海盗问题。这一问题困扰中国的原因显而易见。海盗潜在地威胁着中国在这些拥挤而狭窄的水域的海上生命线。近年来，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三国海军之间的合作已经大大减少了海盗行为，因此在东南亚，海盗问题已不再像其在印度洋对面的亚丁湾那样成为苦难的根源。然而，海盗行为许多个世纪以来在这里都是海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考虑到海盗行为重返东南亚带来的结果，中国的海军将领可没有条件悠然自得。

如前所述，有一种推测认为，在可预测的未来，中国人将资助修建跨越泰国克拉地峡的运河，这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提供另一连接通道。这一工程项目规模与巴拿马运河相当，规划耗资 200 亿美元。在古代，中国转由陆运的货物正是穿越克拉地峡才到达印度洋的侧面和后面。<sup>①</sup> 对于中国而言，克拉运河可能与大运河同样重要——大运河在中国古代晚期全线通航，连接中国中部的杭州和北部的北京。克拉运河将会为中国提供新的港口设施和炼油厂，以及用于转运的仓库，总体而言，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平台，从这里可以将北京的影响扩展到东南亚。距离克拉地峡不远的地方就是南中国海上的海南岛，中国从那里的军事基地部署空中和海上力量的能力越来越强，这里也是中国潜艇的秘密停泊处。<sup>②</sup>

---

① Donald B. Freema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Gateway or Gauntlet?*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7.

② Juli A. MacDonald, Amy Donahue, and Bethany Danyluk, "Energy Futures in Asia: Final Report," Booz Allen Hamilton, 2004.

同时，正如你可以回想到的，迪拜港口世界公司正在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关于在克拉地峡附近修建一座大陆桥——在克拉地峡的两边都有港口，并通过铁路和高速公路将其连接起来。马来西亚政府对连接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港口的东西油气管道网很感兴趣。一段时间以来，海上世界的战略中心不再是北大西洋，而是西太平洋和大印度洋地区。此外，这些项目中至少一个或者两个（如果不是三个的话）的最终建成可能会使这一趋势加速，这反过来将对海军未来部署模式产生同样引人注目的影响。亚洲经济崛起的趋势与中东政治崩溃的趋势将使印度洋及其周边海域的海战受到重视，这里的咽喉要道越来越易受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的影响。

中国未来从这些项目中的获益不可估量。一旦东南亚的这些水域不再那么受限，不再那么集中于一个海峡，海盗行为和印度海军的崛起所意味着的潜在威胁将会烟消云散。而且，对于拥堵、污染和危险货物的担忧也将减轻。更重要的是，中国海军显然更愿意成为一个存在于两大洋的军事力量，拥有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之间的多条通路，缓解所谓的马六甲困境。只存在于西太平洋的一洋海军使中国成为地区大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两洋海军将使中国成为强国，能够在整个可通行的欧亚边缘地带部署力量。

中国的马六甲困境有两种长期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提供从一个大洋到另一大洋的替代海路即可。第二种是从中东和中亚获得更多中国所需的能源供应，经陆路运抵中国，这样经印度洋到太平洋运输的碳氢化合物必须减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可能包括使用印度洋港口来最终将石油和其他能源产品通过公路和管道向北运输到中国的中心地带。实际上，中国抓住这一机会在亚丁湾部署了两艘驱逐舰和一艘补给舰，以保护中国船只不受海盗侵犯，这一过程引人注目。除了给予海军官兵亲身实践非本地的长途航行经验以外，这还推动了中国将印度洋作为合法场地进

行海军行动的诉求。

这里值得重新回到宋朝和明朝初年，即从十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那是中国在印度洋拥有强大海权的时代，郑和下西洋是这一时期的顶峰。郑和的远征使中国的商业和政治影响远播到东非，中国人在孟加拉、锡兰、霍尔木兹和摩加迪沙（Mogadishu）这样的地方登陆。郑和的船队包括数百船只和成千上万的船员，特别是，郑和船队在1405~1433年间的航行并非仅是一件奢侈的怪事，而是经过精心计划，以在南亚和中东港口显示中国实力的安排。郑和船队的航行也旨在保障重要货物的运输不受海盗侵犯，是通过其他方式展现一个温和而仁慈的强国形象。有趣的是，宋朝和明朝初年的中国海军并不寻求像后来欧洲列强那样在印度洋港口建立基地或者维持永久的存在；更确切地说，他们通过朝贡体系的形式建立联盟，以此寻求进入当地的途径。<sup>①</sup> 这种更为含蓄的力量展示似乎完全是中国人未来想要表现的。以巴基斯坦为例：中国人与巴基斯坦维持着安全和贸易关系，修建了连接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喀喇昆仑公路，在阿拉伯海上的瓜达尔建设了深水港口。这有助于发展中国想要的途径（access），尽管瓜达尔港本身是由新加坡人管理的。的确，在瓜达尔和汉班托塔这样的地方，中国海军基地羽翼渐丰，这对于印度人来说充满挑衅，坦率地说，很难预见这样的事最终会发生，因为关键词是“途径”，而不是“基地”。

明朝的皇帝最终结束了他们对印度洋的渗入，但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在陆地上受到来自蒙古的压力，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北部边界。现在没有这样的挑战威胁中国了。相反，中国在稳

---

<sup>①</sup> Ja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2–148.



定其陆地边界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甚至已经以移民为理由对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因此，中国的道路很清晰，就是将注意力转向海洋。

然而，值得记住的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只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目前，中国的官员集中于台湾问题和第一岛链，印度洋相对而言只是次要的考虑。而在今后的几年和几十年中，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印度洋将决定中国在葡萄牙、荷兰及其他国家之后成为军事大国的程度。中国的大战略是什么？印度洋将帮助我们看到。

因此想象一下，从非洲海岸一路经过两个大洋直到朝鲜半岛，中国的商船队和海军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这里，实际上覆盖了温带和热带的亚洲所有水域，也由此保护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及其运作了其中的海上体系。再想象一下，印度、韩国和日本都出动潜艇和其他战舰在非洲—印度洋—大西洋地区巡航。最后，想象一下，美国仍然拥有各种霸权，仍然维持着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和海岸巡逻队，但是与其他世界级的海军之间的差别更小。这就是我们很可能将走入的世界。

诚然，美国将从经济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危机中复苏，但是美国与亚洲巨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这也会影响到各自海军的规模。当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衰落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人能够知晓未来，衰落，作为一个概念，也许被估计过度了。英国皇家海军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相对衰落，尽管如此，大不列颠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继续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帮助拯救了西方。<sup>①</sup>

---

<sup>①</sup>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 - 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尽管如此，某种模式已经出现。美国在冷战的几十年中主导着世界经济。毕竟，当其他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重大的基础设施毁坏，而美国却未受损失，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优势。（中国、日本和欧洲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遭受重创，而印度仍处在殖民统治下）但是那个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他国家已经迎头赶上，留下的问题是，美国如何负责任地对多极化做出回应，多极化在未来几年中更有可能成为世界体系的特点。

海权将成为日益复杂的全球力量安排的精确指标，与任何其他指标一样精确。的确，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能够为美国带来巨大机遇。要重申，幸运的是，中国海军是以一种合法的方式崛起，是像美国所做的那样为了保护经济利益和正当的安全利益，而不是在海上锻造一支潜在地自取灭亡的叛乱力量，后者就像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似乎下决心在波斯湾所做的那样。<sup>①</sup> 这为中国和美国提供了一些合作的交叉点。海盗、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都是两国海军可以合作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国的利益并非异于美国。而且，中国可能会小心地开放与美国在能源方面的海上合作，即在海上交通线的联合巡逻。中美两国都将继续依靠来自大中东的碳氢化合物——在未来几年中特别是中国会这样——所以两国在这一领域内的利益看来也会交汇。因此，没有领土纠纷、都需要大量地进口能源、居住在地球的两端的这两个大国，尽管各自关于治理的哲学体系迥然不同，尽管相去甚远，但两国关系却不像美国和苏联那样遥远，两国或将成为对手，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利用印度和日本这样的盟友来针对中国至少在一个意

---

<sup>①</sup> Fariborz Haghsheenas, "Iran's Asymmetric Naval Warfar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September 2008.

义上是负责的：这能够为美国提供一种机制，来逐渐地、优雅地将大国的责任让与和自己志趣相投、自身能力又在崛起的其他国家，以此作为有计划地从单极世界撤退的一部分。但是要遵循这样一种封闭的战略，又要冒着不恰当、不必要地疏离中国的风险。因此，利用盟友必须作为一个更大的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战略寻求将中国纳入亚洲中心联盟体系，在该体系中各国军队在大量问题上进行合作。

的确，“过去的‘海上战略’集中于对海洋的控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穆伦（Michael Mullen）将军2006年（当时他是海军行动的负责人）曾说，“新的海洋战略必须承认，并不是在海洋被一个国家控制、而是在海洋可为所有国家安全、自由使用时，所有国家的经济浪潮才会兴起。”穆伦将军继续说，“我相信那句谚语，1000艘船的海军，就会形成一支舰队，如果你愿意，这支舰队由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组成，守护着海洋，守护着彼此。”

穆伦将军的话听上去可能像是夸夸其谈的陈词滥调，但实际上，这是对于美国自身已削弱的物力的务实回应。美国将越来越不能够独自行动，因此将会日益依赖联盟，因为各国海军要比陆军之间合作得更好，其中部分原因是海军官兵们被某种海上形成的友谊连接在一起，这种友谊出自他们面对狂暴的自然力量时那种共同的经历。正如在美国海军和中国海军之间可能出现的微妙的海上冷战一样，相反地，海军之间比陆军之间合作更好的趋势可能也意味着两国海军终将成为两大国之间合作的前沿，并以此努力建立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多极体系。考虑到美国与激进伊斯兰教在文明层面上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与欧洲之间不时争吵的关系，还有野蛮而又充满仇恨的俄罗斯，美国必须竭尽全力发现与中国的共性。美国无法独自承担整个世界的责任。

最终，美国的军力必不会主要作为陆地上的调解人，甚至陷入伊斯兰内部的纷争，而应作为一个以海洋和空中为中心的平衡者，驻扎在近处，做好准备介入海啸救援和孟加拉国这类的人道主义紧急救援，并与作为欧亚海上体系一部分的中国海军和印度海军合作。这将改善美国从前在第三世界的形象。尽管美国必须随时为战争做好准备，但是必须每天努力维持和平：美国的目标应该是不可缺少的角色，而不是处于支配地位。这样一种战略将减轻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挑战。即使在优雅的衰落中，对于华盛顿来说中国的崛起也是史无前例的机遇，在亚洲的季风区这必须被看作良性的外部力量。

15 世纪末，对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西向深入始于葡萄牙人的血腥。荷兰人排挤掉葡萄牙人，英国人替代荷兰人，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sup>①</sup> 随后是美国人在亚洲的公海上替代了英国人，这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流血、杀戮而实现的。因此，在海上从美国的单极到美—印—中某种形式的共管的和平过渡将是史无前例的。这样一种过渡并不是对责任的放弃，而是在五百年中第一次将大印度洋交到自由而应负责任的亚洲当地国家手中。21 世纪最重要水体的海滨缺少一个超级大国，而这在最终的分析中正是其地缘格局的中心事实。中国的两洋战略，如果有一天成为现实，将不会在真空中产生，而将被其他国家的海军所束缚，这将使情况大不相同。

---

① 我们不应该忘记法国人，其作用特别是在印度洋西南的岛屿的作用，可见以下这本专业而全面的著作：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 第十六章

# 和谐与混乱

中国正在与阿拉伯文明和波斯文明重续历史联系。而印度从未与这两个文明真正隔断，印度洋世界——东半球的万向节——正飞速地奔向联合的状态。“中国经济的崛起是阿拉伯世界发展的加速器，”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首席中国经济专家辛普芬多弗（Ben Simpfendorfer）写道，“中国对石油的需求能够为阿拉伯经济助力。中国的工厂生产出大量生活消费品来填充迪拜和利雅得那些开着空调的商场。”<sup>①</sup>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一种战略伙伴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形势转向对同盟国有利之前，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这样的战略家们关心的是非洲和欧亚大陆通过控制法西斯国家而联合起来。<sup>②</sup> 在未来几年或者几十年中，我们也会接

---

① Ben Simpfendorfer, *The New Silkroad: 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

②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1942; reprin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8).



近这种联合的状态，但并不是通过军事支配，而是通过贸易体系的复兴，就像中世纪穆斯林建立起来的贸易制度，这一制度又在葡萄牙人手中发扬光大。

在这张越来越纠缠不清的经济活动的网络中，位于印度洋西部边缘的非洲，也并没有被遗忘。非洲的复兴，缓慢而又断断续续，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东和亚洲的投资所驱动的。过去人们所说的第三世界正在逐渐消失，因为第三世界中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展了，并正在集中他们的能量建设那些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

的确，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发生在所谓的西方和其他地区之间的现象，也是发生在其他地区之间的。因此，非洲正在成为复兴的中国的受益人，印度正在超越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局限而崛起，因此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充满活力，这也使非洲受益。

中国对非洲的关注来源于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为了不过于依赖脆弱的霍尔木兹海峡内的石油储备，中国在非洲搜寻石油。现在中国三分之一多的石油从非洲进口，三年中胡锦涛总书记对非洲进行了三次访问。中国已经向非洲各国政府拨款 190 亿美元作为援助和优惠性融资，作为回报，中国获得了非洲油田的股权。<sup>①</sup> 在茶叶种植、土壤分析、灌溉和水稻种植方面，中国向非洲提供了技术援助。为了利用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的作为回报——科特迪瓦的巧克力、赞比亚的铜、津巴布韦的钢铁，中国将帮助非洲对铁路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建设高速公路、发电站和水坝。<sup>②</sup>

---

① Simpfendorfer, *New Silk Road*, p. 40; Ulrich Jacoby, "Getting Together",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ne 2007.

② Andrew Droddy, "The Silent Scramble for Africa,"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2006.

与中国的竞争推动印度深入与非洲大陆的接触。印度以软贷款、发展援助和政治支持来讨好非洲，以赢得有利可图的石油项目。第一届印度—非洲峰会 2008 年 4 月在新德里举行，印度和 14 个非洲国家参加。印度已经向非洲国家提供了价值 20 亿美元的贷款。来自尼日利亚的石油占印度全球进口的 10%；印度现在能源进口的五分之一来自非洲。印度和非洲之间的贸易额已经从 2000 年的 33.9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300 亿美元。尤其是，印度和南非的贸易以 30% 的年增长率增长。南非出口黄金，印度抛光南非的钻石。再举一个例子，印度是毛里求斯最大的单一海外投资者。<sup>①</sup> 这样的数字可能从事物发展的宏观规律来看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但是的确能表明一种趋势。

此外，来自海湾的石油收入也不断流入东非，从 2000 年的 110 亿美元到近年来的 500 多亿美元。海湾的各酋长国一直将资金投入非洲的电信业、旅游业、矿业、地产业和金融业。他们发展援助的一半针对的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利他的。这些欧亚大陆精力充沛的经济体都是到非洲来搜寻资源的。他们在民主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利益，他们所作的某些交易更多带有旧时殖民主义的味道，而不是冷战后西式外国援助的风格。在这个人口以引人注目的速率持续增长的世界中，耕地的获得日益成为紧张关系的根源，因此，仍然在期待着绿色革命的非洲，隐约显露出作为食物资源的最终战场的命运。特别是韩国在马达加斯加种植谷物和棕榈树，沙特阿拉伯在埃塞俄比亚种植水稻和大麦，中国在刚果种

---

<sup>①</sup> Alex Vines and Elizabeth Sidiropoulos, "India and Africa", *The World Today*. org, 2008; Vibhuti Hate, *South Asia Monito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10, 2008.

植棕榈树作为生物燃料，还有，韩国、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苏丹种植小麦。与传统的农业投资计划不同，这些项目对于作物的现金收益关心不多，而更关注自己国内可能缺少的主要粮食作物，并寻求将所有产出都出口回本国。<sup>①</sup> 随着非洲逐渐被卷入大印度洋贸易的主流，在生产性投资和开发之间将会出现细微的界限。

这种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活动完全是在这样一个非洲的背景下发生的，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非洲一直在展现稳定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2003 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每年 6.5% 的年增长率。这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重大转变，当时低于 1% 的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相对于其人口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实质上正在衰落。随着经济进步而来的是政治进步。根据美国一个名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组织的统计，有多党统治、公民权利和自由媒体的国家已经从 1977 年的 3 个上升到 11 个，而完全不自由的国家的数量也从 25 个减少到 14 个。在这些社会的开放过程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技术，例如，手机网络的发展使非洲能够超越基础设施的匮乏。<sup>②</sup>

从中东和亚洲的前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和资金的流入最终使得非洲可以摆脱其地理隔绝状态，而这一直是贫穷的又一主要的罪魁祸首。尽管非洲面积是欧洲的五倍，是世界第二大洲，然而非洲

---

① Sharon Burke, "Natural Security",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09.

② Mohan Malik, "Energy Flows and Maritime Rivalrie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8); "Opportunity Knocks: Africa's Prospects" and "Everything to Play For: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conomist*, Oct. 9 and Nov. 19, 2008; Sarah Childress, "In Africa, Democracy Gains Amid Turmoil",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8, 2008; Tony Elumelu, "Africa Stands Out", *The World Today.org*, May 2009.

在撒哈拉南面的海岸线却只有欧洲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而且，这一海岸线缺少优良的天然港口，东非是个例外，那里的港口与阿拉伯和印度的贸易往来活跃。热带非洲的河流中几乎没有是可以驶入海洋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瀑布和急流从内陆高原降落到海边平原。许多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对南北人员往来造成了障碍，因此在古代及其后的伟大的地中海各文明面前，非洲隐蔽了起来。<sup>①</sup>

1993年，当我游历整个西非时，我看到的只有动乱，特别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这样的国家。<sup>②</sup>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末，动乱的确以血腥战争和分离分子叛乱的形式降临到这些国家，而对于整个非洲而言，那些年份在发展的意义上正是毫无希望的十年。但是一个新的经济政治周期已出现。已故的法国人类学家蒂利翁（Germaine Tillion）写道，“事件在成为历史之前必须走完他们的历程，这样所有真正的历史只由于其自身的结论而存在。”<sup>③</sup>在几十年的暴力和混乱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后殖民传说的结论可能就是融入全球体系，具体而言，融入印度洋体系。

尽管如此，在这整体上积极的趋势内，仍将有令人气馁的一系列挑战。只要想想：在肯尼亚，东非最富有的经济体，平均每个女子有五个孩子；在富裕国家，这个平均数是1.6个孩子。在邻国埃塞俄比亚，70%的青年成人没有工作。<sup>④</sup>在非洲的各种困

---

① Robert D. Kaplan, *The Ends of the Eart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p. 7;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p. 92.

②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Atlantic Monthly*, February 1994.

③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 - 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

④ "Opportunity Knocks", *Economist*.

境之中还隐约可见索马里这个失败的国家，在非洲之角与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相邻，还拥有非洲最长的海岸线，从非洲大陆突出，进入印度洋。这一广阔而难以管理的空间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印度洋的主要问题之一——以非洲为基地的海盗行为的出现。

维利尔斯 (Alan Villiers) 写道，在印度洋，“海盗这个行业与航海业本身一样古老。曾经跨坐在漂浮的圆木上的第一个人可能会把坐在另一根圆木上的第二个人打下来。海盗行为就这样开始，并一直持续下去。”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波斯湾、莫克兰海岸 (the Makran coast)、卡奇湾 (the Gulf of Kutch) ——实际上整个阿拉伯海地区，从远古时代就一直有海盗活动。<sup>①</sup> 巴图塔 (Ibn Battuta) 曾经在印度西部海岸沦为海盗行为的受害者，他告诉我们说，14 世纪印度洋上航行的船只采用全副武装的护航队作为防御措施。<sup>②</sup> 15 世纪下半叶，在郑和的最后一次航行后，中国明朝从印度洋和太平洋撤出，导致海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来自各个国家的海盗。<sup>③</sup> 在稍早些的时间框架中，马可·波罗描绘了古吉拉特海岸的许多海盗船，在那里海盗们掠夺商船，和他们的女人与孩子们在海上度过整个夏天。他们每隔五六英里就将二十或三十条船围起来，用烟或火在彼此之间发信号。“面对所

---

① Alan Villiers, *Monsoon Seas: The 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p. 208, 210.

② Ross E. Dunn,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14<sup>th</sup>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 219; Simon Digby,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ia”, in Tapan Ray 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Vol. I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52. See, too Patricia Risso, *Merchants & Faith: Muslim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Indian Ocean* (Boulder, Co: Westview, 1995), p. 53.

③ Ja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3.



有这些麻烦，”历史学家乔治·侯拉尼（George Hourani）写道，“船员和商人乐意向上帝寻求帮助，对海洋的叙述中满是上帝的名字。”正如中世纪的阿拉伯文献所悲叹的，“人在海上就是碎片上的昆虫。”<sup>①</sup>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将海盗行为称为“战争的次要形式”，倾向于在大国冲突的间歇期爆发。这种形式的战争“被某座小城市引发，这类小城市要么是自治的，要么充其量有限地依附于一个大城邦”。<sup>②</sup>学者诺顿（Richard J. Norton）将这样的海盗基地称为“野生的城市”：的确，在我们这个时代，索马里就是这样。<sup>③</sup>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上，海盗行为一直是印度洋固有的问题，从亚丁到马六甲，特别是从16世纪初的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人侵入这些水域之后。海盗团体有时被称为海上吉卜赛人，随着贸易的勃兴，海盗在数量和胆略上都有升级的趋势，因此海盗行为本身经常是繁荣的标志。<sup>④</sup>“作为寄生虫”，海盗“当贸易繁荣时表现最好，因为宿主可以很容易地被利用”，澳大利亚学者皮尔森（Michael Pearson）这样写道。<sup>⑤</sup> 在罗马的

---

① George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55, 113 - 114.

②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Vol. 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865, 869.

③ Richard J. Norton, "Feral Citie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Fall 2003. See, too, Matthew M. Frick, "Feral Cities, Pirate Havens", *Proceedings*, Annapolis, MD, December 2008.

④ Donald B. Freema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Gateway or Gauntlet?*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5

⑤ Michael Pearson,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127

商业征服的高潮时期，图拉真（Trajan）皇帝派出了一个报复性的远征队去打击肆虐在波斯湾的海盗。<sup>①</sup> 在欧洲人看来，在18世纪东南亚的苏禄苏丹国的伊斯兰世界，海盗行为是主要的，苏伽塔·柏瑟这样写道，但是从苏丹国自身看来，这是对欧洲人垄断贸易行为的合法回应。在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周围的区域曾经极不安全，被称为海盗海岸。<sup>②</sup> 直到英国人到来前，从索马里南部到莫桑比克的东非海岸还是“海盗国”，阿拉伯的单桅三角帆船来到这里抢劫、绑架、掠夺、奴役当地人。<sup>③</sup> 海盗挑战了欧洲人所宣扬的传统和极为正式的主权概念，这一概念扩展到公海上：对一国而言的海盗是另一国的爱国者。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接受这一点，在帝国鼎盛时期，他们派遣人员进行反海盗巡逻，恰恰就在索马里海盗现在威胁航行的地方。<sup>④</sup> 所以，今天海盗横行的水域证实，印度洋反映了一个更早些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集中在天然港口周围的各个小的酋长和首领的动乱：在国家软弱或者缺位的地方，或许可以赞成这一概念，那些飘扬着国旗的船只只是不错的猎物。

英国地理学家弗里曼（Donald B. Freeman）解释说，在马六甲海峡的狭窄水域中，印尼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在这里交汇，因此强迫装载着丰富货物的船只在危险的浅滩上缓慢移动，“商业船只在空间上的集中”使许多世纪以来这些海域成为海盗的巢穴。马来海盗的装备在19世纪初形成，有上百条马来人所用的

---

① Freeman, *Straits of Malacca*, p. 175.

②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olden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5 - 47

③ Abdulrazak Gurnah, *Desertion* (New York: Anchor, 2005), p. 83.

④ 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pp. 255 - 256.

细长而快速的帆船，奴隶划着这些轻巧的船，上面有穿着花里胡哨的盔甲的海盗武士，配着矛和短剑以备近身搏斗。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海盗小型船队每年通过马六甲海峡环行。载着鸦片的快速帆船更是海盗们追寻的目标。<sup>①</sup> 这样一个挑战，即使是有着强大海上实力的英国人也不时感到无力应对，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蒸汽推动力的出现才使英国人和荷兰人在面对海盗时拥有优势。<sup>②</sup>

海盗行为在我们的时代复活既说明了贸易的繁荣，也体现了国家防卫能力的不足。目前，海盗行为是巨大的麻烦，对贸易航线造成了不利影响，并导致了新的国际联盟的形成，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卷入其中。因此，海盗虽不那么正大光明，但可能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海盗成了各国共同的敌人——实际上这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标志——相互竞争的大国随后能够形成协议一起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全球治理以这种方式得到加强，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平衡体系也因此更加稳定。也正是部分地出于减少马六甲海峡海盗行为的考虑，1824 年的盎格鲁—荷兰条约才得以达成。

至于海盗的浪漫形象，则主要来自于 17 世纪加勒比地区伟大的海盗时代：船上飘扬着海盗旗——头盖骨与交叉的腿骨——船上戴着黑色眼罩和头上绑着带子的海盗，他们掠夺西班牙的船只和城市。21 世纪初的印度洋海盗在一些方面与其不同，但在另一些方面很相似。只有透过漫长的历史我们才能发现加勒比海盗的所谓迷人或浪漫之处，他们其实是凶残的暴徒，就像他们今日在印度洋的同行一样。问问美国海军少校博克（Rory

---

① Basil Lubbock, *The Opium Clippers* (Boston: Lauriat, 1933), pp. 8, 181.

② Freeman, *Straits of Malacca*, pp. 174 -179, 181 -183.

Berke) 就知道了，他曾在 2006 年 1 月在索马里海岸遭遇海盗。

博克是美国军舰拿骚号 (Nassau) 远征战斗群的一位海军情报官员，派驻在印度洋，为期六个月，拿骚号的航行路线本身就构成了一节重要的地理课。塔拉瓦号 (Tarawa) 等级的两栖突击舰，加上附带的两艘驱逐舰，以及其他船只于 2005 年 11 月离开了弗吉尼亚的诺福克 (Norfolk)，和 2300 艘潜艇一起驶往伊拉克。在穿越漫长的大西洋和地中海之后，战斗群驶入了“壕沟”，也就是苏伊士运河。“正是此时开始感觉到刺激，那时候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在海军服役，”博克少校开始说道。“几周以来始终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辽阔开放的水域上，在那里不会受到伤害。然后突然就到了阿拉伯人中间，两边看上去也就有十英尺的水面，载有埃及人的车队沿着运河在地面上尾随，以防战舰遭袭。在红海上航行，通过曼德海峡，沿着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海滨，越来越刺激。一旦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知道你已在游戏中，伊朗就在右舷那边。拿骚号战斗群沿波斯湾上行到科威特，在那里停靠潜艇。沿途路过的伊朗轻巡洋舰上的水兵向美国人友好地挥手。轻巡洋舰代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正规海军，与美国海军并无龃龉，并不像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陆战队那样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政权更为接近。”

拿骚号从科威特掉头南行，中途经过波斯湾到达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在这里得到命令加入在印度洋西北的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角海岸的国际海军特遣部队。美国人发现他们已巡逻到在公海中不受法律制约的索马里海岸，从 12 英里的区域性限制到 500 英里以外。这里的海盗掠夺形形色色的船只，从小小的单桅三角帆船到旅游船，到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一艘名为海燃情 (seaburn spirit) 的游轮就被海盗袭击未遂。但是大多数时候，受害船是亚洲的捕鱼船。

索马里是一个失败的非洲国家，这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水域，而这并不是巧合。海盗行为在海上构成了无政府主义在陆地上造成的那种连锁反应。当时，那支国际特遣部队的船只来自荷兰、英国、法国、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美国，其工作就是“通过存在来镇压”。

2006年1月21日清晨，博克所在的美军军舰拿骚号在距索马里海岸150英里处，收到插着巴哈马国旗的货船三角洲突击队员号（Delta Ranger）的求救呼号，这艘船已经加速行驶以避免被海盗俘获。这艘船的干舷有25英尺长，意味着海盗将必须在受到船员攻击的情况下成功攀爬25英尺才能到达这艘货船的甲板。海盗们胆敢袭击这种干舷高的船只正说明了索马里海盗的无耻和凶猛。

美国海军派出了一架P-3侦察机到达三角洲突击队员号呼救的周围地区搜寻海盗，很快就找到了目标：几条小艇拉着一条单桅三角帆的捕鱼船。索马里海盗同盟经常分成多组，每组十人左右，分散在三条小艇之间。这些小艇用腐败的木头或者玻璃纤维制成，破旧不堪，蟑螂寄生在上面，几乎没有上漆，船上也没有遮光阳棚。海盗通过观察星星驾驶小艇：西方是家——索马里；东方是开阔的大洋。一个典型的海盗小组一次出海大约三周。他们装备有饮用水、供他们那种单引擎的尾部装有马达的小艇所用的汽油、匕首、爪钩、两节拉梯、AK-47冲锋枪，以及火箭筒。他们还带着嚼着吃的小米和麻醉性的咖特（qat），用来捕鱼的绳子和网，他们生吃捕来的鱼。一艘被俘获的海盗小艇上载有一大块鲨鱼肉，上面满是牙印。

海盗的想法是接管一艘较大的单桅三角帆船，通常是一艘捕鱼船，船上印度人、中国台湾人或韩国人，然后住在船上，把小艇和大船连在一起。一旦占有了一艘单桅三角帆船，海盗们随



后就想占领一艘更大的船。在他们跃上更大的船只时，会放掉此前侵占的较小船只。

海洋辽阔。只有某艘大船发出求救呼号，拿骚号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海盗。如果所有的海盗只是驾驶小船，即使这个国际特遣部队用上所有电子设备，也无法找到海盗。

P-3 侦察机找到单桅三角帆船和三只小艇之后立刻向离该地区最近的战舰——美国的驱逐舰温斯顿·S. 丘吉尔号发出警报。丘吉尔号立刻赶到海盗和标志着进入索马里水域的 12 英里界线之间。如果海盗退回到 12 英里之内，就只有索马里政府才能合法地抓捕这些海盗了，而这个政府几乎不存在。到达海盗旁边后，驱逐舰立刻鸣枪示警，声音响亮，在海面回响，此外还派出直升机在被俘的单桅三角帆船和附在其上的小艇上方低空盘旋。十名海盗投降了，单桅三角帆船巴克第·萨加尔（Bahkti Sagar）号上的 16 位印度船员在距索马里海岸 54 英里处获救。拿骚号接管了一切事务，海军少校博克通过翻译对海盗进行盘问。

在此前的六天中，海盗们殴打、戏弄这些印度船员，还把他们的饿得半死。他们甚至把船员们要运送到迪拜的一只猴子活生生地扔到海里去。<sup>①</sup>

海盗们穿什么？他们看上去怎么样？我问博克。

“大背心、薄夹克、平底人字拖鞋和 80 年代的短裤。他们表面傲慢自大，却又胆战心惊。他们以为，既然我们抓住了他们，就会很快杀掉他们，作为美国人，我们也会吃掉他们。”其中最

---

<sup>①</sup> 在对海盗及其俘虏的盘问过程中，博克得到了一位索马里语言学家的帮助。一家私营承包商向拿骚号推荐了这位语言学家，在拿骚号执行任务期间，他一直跟随着；他还得到了一位有印度血统、会讲印地语的美国士兵的帮助。巴克第·萨加尔号上的船员是占吉拉特人，也讲印地语。

年轻的那位海盗不停地恳求说，“请别向我开枪。”他们极度缺乏营养、严重脱水，还需要看牙医，美国海军为他们提供了这一切。

博克提到“正当程序”和“警察”时，海盗们茫然地注视着他。“他们概念中的警察就是索马里城镇中那些穿着半身制服抢劫他们的人”，博克告诉我说。海盗们看上去在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十人中只有一人有可以联系的家庭成员，有两人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其他人只知道他们在“战斗”过程中出生，没有家人。在索马里文化中，他们是贱民，没有任何家族归属。尽管索马里内战始于20世纪90年代，然而这个国家实际上在此前十年就已经分裂了。约有一半的海盗都有子弹或匕首留下的旧伤。

博克解释说，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就是在码头闲逛的人，当地的军阀派他们去为其带回收入，并保卫当地的水域。他们将自己视为未发展成熟的海岸警卫队，设法谋生，并以自己的方式向外国船只征收某种形式的税收。”

攻击群的军事检察官迈克尔·巴哈尔（Michael Bahar）少校询问他们携带武器的情况。一位海盗回答说：“我是索马里人。在索马里，枪就是我们的政府。”

为什么选择做海盗？巴哈尔少校问他们。他们的回答是：因为在索马里，在陆地上被杀死的可能性会更大，他们勇敢地面对开阔的海洋。海盗行为是有组织的犯罪，就像流动的团伙一样，每个小组都在海上固定的部分巡逻。“忘掉约翰尼·德普的魅力吧，”巴哈尔说，“他们的魅力是一种野蛮的残忍，但并不是出自怨恨或邪恶，就像狮子杀死羚羊，其中几乎有一种自然的纯真。”

索马里的海盗危机只证实了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次国家因素的兴起。例如，正是索马里东北部的海盗之国邦特兰，像真主党和基地组织一样，使国际社会感到惶恐。

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于索马里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为其坚持将索马里看作一个静止的——尽管是失败的——国家。实际上，索马里是三个相互分离的实体，因此表现出了不同的治理水平：西北部的独立的索马里兰，东北部的邦特兰自治区以及动荡的南部地区——极度虚弱的索马里政府仍然在那里继续打击青年党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上升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海盗正是起源于邦特兰的，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通过邦特兰才能处理这一问题。

邦特兰是根据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到的古老的彭特之地（Land of Punt）命名的。1998年邦特兰宣布与索马里其他地区分离，实行有限的自治，同时出于对跨越边境在索马里南部城市基斯马尤（Kismayo）的米朱提因（Majerteyn）宗族资深成员的义务，选择了反对完全独立的宣言。在索马里的整个历史上，宗族一直是政治、法律、社会表现的重要形式，这一现实也反映在邦特兰政府的组织中，这使得当地的长老具有格外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族的民兵组织，而不是像附近的索马里兰那样拥有更为正式的自卫队。因此，邦特兰政府尽管并不像索马里兰政府那样能够发挥作用，但比起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仍然是一个大得多的存在。邦特兰拥有有组织的议会，2009年1月法罗里（Abdirahman Mohamed Faroole）当选新总统。因为这里是海盗的基地，与其他地方相比，海盗的战利品极其明显。

例如，在埃尔镇（Eyl）——公认为是亚丁湾地区海盗行动的中心——海盗行为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产业，大量来自赎金的现

金涌入，为这个城市的发展浪潮助力。尽管邦特兰宗族政治的本质使得政府无法不在某种程度上以默许的方式卷入其中，然而邦特兰政府在表面上对海盗行为采取强硬措施，并声称政府在减少海盗行为方面不够强大，声称将在某些情况下对其定罪。实际上，自从2009年4月那起被广泛宣传的涉及快桅阿拉巴马号的事件之后，邦特兰政府已经要求国际援助来建立反海盗的特别小组。快桅阿拉巴马号是一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轮船，遭到了海盗的袭击，这些海盗后来被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击毙。

在邦特兰，海盗行为普遍被认为是有利可图而且合法——有利可图是因为海盗赎金数额在地球上最贫穷的地方之一甚至可与邦特兰政府的全部预算相媲美，合法是因为海盗行为被视为有助于减少肆意蔓延的非法捕鱼和向索马里领海倾泻有毒废物。一个极端虚弱但却能够生存的亚国家实体因此为一项犯罪事业创造出了成熟的条件，现在还有将其归入整个国家机器的威胁。

一个事实上的海盗国家的出现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是极其棘手的，然而在这个地区各种各样有组织的中央权威的存在也创造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机遇。换句话说，国际社会将需要提供援助的胡萝卜和在陆上的回击这根大棒来吸引以宗族为基础的政府的注意力。毕竟，索马里海盗问题不能被单纯作为基于海洋的全球问题来解决。除非美国愿意投入相当数量的地面部队来从事国家建设（这是非常不可能的），美国必须接受与邦特兰政府合作以使在亚丁湾和印度洋打击海盗行为，尽管其存在国际合法性的缺失。由于邦特兰政府一直打击青年党的极端主义分子，支持邦特兰的政府能力将不仅有助于制止海盗行为，而且也能为在非洲之角打击激进伊斯兰开辟一条道路。邦特兰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索马里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而这在其他地方经常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欧洲城邦的缓慢的崩溃，以及与此同时在宗

族、部落和地区之上的身份认同，以更为健全的形式得到恢复。

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古代开始，像邦特兰这样的海盗国家和海盗联盟一直是印度洋现实的一部分，也是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的直接后果。冷战在第三世界提供了确定的秩序，模糊了这一历史事实，然而海盗们又回来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从未离开。罗马人、宋朝和明朝的中国人，以及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格兰的帝国主义者都在这些水域遭遇了海盗，现在轮到美国及其盟友了。特别是随着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海盗这一祸害将为这一地区这些新的大国之间的合作提供机遇。但是暂时美国力量仍然是必要的。海军少校博克的经历就这一点而言具有象征意义。



## 第十七章

# 桑给巴尔：最后的前沿

从索马里到南非，四千英里的非洲海岸线为印度洋的西边镶上了边界，其中不少是穆斯林，讲斯瓦希里语。如果说邦特兰及其周围地区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非洲的动乱上，那么在南部更远处的桑给巴尔，可能在同样的强度上使人们看到非洲的未来。几个世纪以来，位于坦桑尼亚海滨的桑给巴尔岛，阿拉伯语意为“黑人之地”，一直是印度洋商业和文化的一个主要的节点、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文明的熔炉。的确，在中世纪后期，来自也门哈德拉毛的伊斯兰学者会感到在桑给巴尔就像在印尼一样舒服。在19世纪早期，上百条单桅三角帆船挤满了这个港口，这些船上载着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毒品、咖啡、鱼、象牙、兽皮、红辣椒、龙涎香、蜂蜡、丁香、玉米、高粱和香料。对于统治这里的阿曼苏丹而言，桑给巴尔不只是一个印度洋上的港口，而是，用历史学家哈尔（Richard Hall）的话说，“一个巨大的贸易帝国的中心，其触角深入非洲”，直达肯尼亚高地、非洲大湖区和刚果东部。<sup>①</sup>一直到进入20世纪，这一中心一直如此。在1937年

---

<sup>①</sup>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pp. 397, 415, 446.

3月的一天，维利尔斯在锚地数到了50多条单桅三角帆船，其中34条是阿拉伯人的，其他来自科摩罗群岛、印度和附近的索马里。<sup>①</sup>

在岛上的第一夜，雨滴坠落在老桑给巴尔中心的石头镇那生锈且吱嘎作响的波浪状铁屋顶上，我在黎明之前就醒来了。我从一个朋友那儿租到了集市上面的两间房子。我的阳台是木质和铸铁的，上有简单花卉图案，我从那里几乎可以碰到蜿蜒小路对面那石灰刷过的墙。我的房间特色明显，有常见的东方的地毯，挂着蚊帐的四柱床，彩色玻璃窗户，用木头、黄铜和红铜制成的家具：毫不费力地将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非洲的美学融合在一起。清晨，我爬到房顶的“茶馆”，一个凸起而开阔的平台，布满了九重葛，猛烈的海风刮过，呈现出石头镇灿烂的屋顶景色。在倾斜的屋顶下，正是这个巨大迷宫般的石头镇有如其名的那些建筑材料：混有灰泥沙子的石头，盖着刷墙用的白浆。有着三个对开拱门的莫卧儿风格的尖塔，一座19世纪末法国大教堂脏兮兮的、饱经风霜的尖塔，成为这景致中突出的形象。还有奇迹屋（House of Wonders）那细得像铅笔杆一样的铸铁柱子，这是1883年为阿曼苏丹赛义德（Barghash Bin Said）修建的一座具有热带风情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风格的宫殿。宫殿上布满铁锈，这一幅远景，不只生动别致，看上去还充满了坚定的精神。我的视线到达了地平线，货船、舷外支架、独木舟和用厚木板制成的单桅三角帆船全都扑通落入印度洋那乳白—青绿色的海水中，这一色调是那么不真实，让人们在脑海中更多地想到的是一种水彩画色，而不是海洋本身。

---

<sup>①</sup> Alan Villiers, *Monsoon Seas: The 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 87.

我的房东斯钦斯 (Emerson Skeens) 是美国人，在石头镇住了 22 年。他用手指着从集市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那些屋顶，向我介绍着他的邻居：印度的印度教教徒、奔巴岛人（来自附近的岛屿）、印度的穆斯林、也门人、波斯的什叶派教徒、十二伊玛目派（这种情况下多来自巴基斯坦）、博赫拉人（什叶派教徒的另一支，来自古吉拉特）、阿曼人、果阿人、又是博赫拉人、非洲人、设拉子人 (Shirazis)、又是非洲人、科摩罗人。“桑给巴尔是非洲的，但又和非洲不同；它是阿拉伯和波斯的，但是也和阿拉伯与波斯不同；是印度的，但也和印度不同。”拘萨 (Ismail Jussa)，来自古吉拉特卡奇湾的一位桑给巴尔朋友这样说道。他们来自这个大洋的不同部分，被伊斯兰教、最终也被斯瓦希里语团结在一起。斯瓦希里语有来自阿拉伯语的喉音和外来语，班图语的语法，作为纯粹、激动的表达方式而发挥作用。<sup>①</sup>

在非洲本地人之后，大约在一千年前，设拉子人乘着单桅三角帆船从伊朗海岸来到这里，当时，桑给巴尔，主要拜东北季风所赐，已被远道而来的中国商人造访。设拉子人不仅是波斯人，还包括少数阿拉伯人。他们来自设拉子城，可能因异族压迫而成为难民。葡萄牙人是最早到达桑给巴尔的西方人，从 15 世纪末的达·迦马时代起就定期往来于东非海岸，还引入了木薯和玉米。他们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堂，那些从中国进口丝绸的阿曼人在 18 世纪早期将其毁掉，用这些石头建造了一座堡垒。今天参观者看到的石头镇主要是阿曼人的建筑，带有强烈的印度影响的印记。

然而，首先，桑给巴尔，特别是石头镇，用已故的波兰记者

---

<sup>①</sup> 斯瓦西里语的 25% 由阿拉伯语词汇构成，还有些许的波斯语、库什特语和印度斯坦语。

卡普钦斯基 (Ryszard Kapuscinski) 的话说, 在 19 世纪是奴隶贸易的一颗“悲伤、黑暗的星星, 一个冷酷的地址”。<sup>①</sup> 上百甚至上千的奴隶经过多年的囚禁而被驯化——男人、女人和孩子——和那些刚刚从内地到达这里的奴隶一起在每条街道上流浪, 在虐待下有一半人变疯, 另一半人死去。这种场面就像“目睹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 记者和历史学家穆尔黑德 (Alan Moorehead) 这样忧郁地描写 19 世纪中期的桑给巴尔, 那是理查德·伯顿 (Richard Burton) 和约翰·汉宁·斯皮克 (John Hanning Speke) 寻找尼罗河源头的远征的起点。<sup>②</sup> 因此, 桑给巴尔使我着迷, 但我要说, 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岛并不是没有自己的隐伤, 首先无法逃避就是奴隶制度——阿曼印度洋帝国的原罪和生机的根源。

实际上, 石头镇, 并不是一个可爱的希腊小岛上的村庄, 而是一座纪念这一历史进程的纪念碑, 破旧、粗糙、用沙子堆就、筋疲力尽、沾满盐渍, 多少有些令人害怕。在这里很容易迷路, 尤其是在晚间。第一天清晨, 我在街上闲逛, 女人们快速地挥动着扫帚扫开夜间积下的雨水, 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这里的门, 比房子本身制作得更加精致, 似乎有着更多的故事。西尔瓦 (John Baptist Da Silva) 是一位艺术家, 来自印度西部葡萄牙人占领的果阿, 毕生都住在石头镇。他为我解读着这些门, 仿佛它们是书, 读得出字里行间的意味。这是简单的、方形的大门, 用阿曼的芒果树的木材制成, 上面有很大的铸铁钉。门框周围布满鱼鳞的图样, 代表着多子多福, 还有莲花的图案,

---

① Ryszard Kapuscinski, *The Shadow of the Sun*, trans. Klara Glowczewska (New York: Vintage, 2001), p. 83.

② Alan Moorehead, *The White Nil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60), ch. 1

象征力量与财富。几何图案是数学的象征，因此，代表着航海。绳子的图案表示帆船贸易，因此，这是一位富有的阿曼商人的家，他有很多孩子。

古吉拉特人的大门用柚木制成，镶着巨大的钉子，半圆形的边框下是方形的图案，刻着植物和向日葵，每个宗派都用一种不同的颜色粉刷大门。印度人的大门是方形的，上有花卉图案。阿拉伯人的大门用桃花心木、面包果树和菠萝蜜果树的木材制成，还有其他木材，《古兰经》的铭文成为这些大门的特色。波斯和俾路支的门框刻着柱子的形状，代表着新古典主义的倾向。斯瓦希里的门要比其他的短些，颜色鲜艳耀眼。

清晨的气息中饱含这些味道：甜罗勒、柠檬草、茉莉……丁香、肉豆蔻、肉桂和小豆蔻。甘薯和木薯摆在石头长凳上，看上去像是石化了一样。这些石凳造出来主要是为了说八卦和拉家常，呷一口阿曼咖啡，点燃聊天的热情，石凳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石凳，并不一定要在自己家附近。男人们戴着编制的帽子，穿着阿曼传统的白色长袍，在桑给巴尔被称为康祖长袍（kanzus）。女人们穿着非洲风格的有图案的棉质肯加布（khangas）制成的衣服。这里的清晨有着一种清晰的亲密感，每一样事物、每一个人都显示出一种肖像般的光环，正是这一点使这里很难忘。

遍布各处的棕榈树和罗望子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我注意到在53座清真寺中间，嵌着一座耆那教寺庙和在罗马设计基础上建成的波斯浴室。一位穿着肯加布服装的斯瓦希里女子正在做印度薄饼和中东的沙拉三明治，同时还在炸木薯。桑给巴尔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使全球化看起来是人类本质上的正常功能，只需要技术来使其实现。

然而全球化也带来了紧张，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在如此近的



距离内交汇融合，在桑给巴尔，也并不是一切如意。我观察到的人种和习俗的闪闪发光的融合实际只是昔日胜景的残留。实际上，1963年桑给巴尔脱离英国而独立，实际上，任何了解独立前的桑给巴尔的人都会为现在这里城市环境的单调而感到悲哀。这里的活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访这里。

在石头镇的中心，我闲逛到一座阿拉伯人的住宅，这里斥重金翻修过，却多少有点缺乏品位，像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样。几个男人穿着洁净的长袍，戴着帽子，在那里呷着小豆蔻味道的咖啡，大声咀嚼着从阿曼进口来的枣。他们邀请我加入。房子的主人是一位迷人而好客的男子，身材圆胖，短短的白色胡须梳理得非常完美。他告诉我说，这是他祖父和父亲传下来的房子。起居室里挂着他祖父的黑白肖像，包着头巾，留着胡须，让人想起阿曼的帝国岁月。房子主人指着照片说，“这座房子曾经是他祖父的房子。”尽管他目前在阿曼和桑给巴尔两边跑，然而却认为桑给巴尔是他真正的家，即使他认为自己是纯粹的阿曼人。他翻修了这座房子，部分原因是为了做出一种声明。他随后用优美的英语用词解释说，我在这里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更为世界主义的世界的残余：在蒸汽机车的旅行方式减轻了季风带来的不便之前，在苏伊士运河修建之前（苏伊士运河终结了桑给巴尔作为欧洲和印度之间的中途停留站的身份），阿曼苏丹在英国监护下统治这里。

但是现在还要考虑后殖民历史，他告诉我说，1963年以来，桑给巴尔不仅受到困扰，而且还经历了一些最糟糕的暴力的破坏，特别是民族一种族冲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得不遭遇这些。“（非洲）大陆使这个岛屿堕落了，”这位阿曼主人坦率地宣称，“他们必须为革命而道歉。”似乎从“革命”之后，至少在

在他看来，桑给巴尔更像是后来岁月里文明冲突的例证，而不是早期的全球化的例证。

在这一文化分歧的一边站着英国人及其阿曼代理人，他们得到当地阿拉伯社群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少数民族的支持。另一边则站着贫穷得多的非洲本地人——由于奴隶制度的历史，由于他们的土地由阿曼人处置，他们在太多情况下都处于苦难之中。和非洲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设拉子人，由于他们在中世纪早期就到达了桑给巴尔，早于其他移民，而且经常是作为难民来到这里，因此他们几乎已经彻底陷入与非洲人的通婚网络中。就在英国人撤走前的这一时期，当地的选举中选票分成两极。这种不确定的结果只会使民族和种族的紧张加剧。

“在政治到来之前，种族和民族从来不是问题”，拘萨解释道，这位古吉拉特人是反对派公民联合阵线（Civic United Front）的外交事务发言人，这一组织主要由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构成。换句话说，帝国陷入教派政治（communal politics）是因为在单一的绝对权威下权力聚集的结果。而一旦帝国的秩序崩溃，其分而治之的后果暴露出来，教派政治毁灭一切。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印度次大陆以及亚非的其他许多地方都是这样，在桑给巴尔也是这样。这是对殖民主义的许多形式（即使不是全部形式）的真正的继承。

1963年12月英国人离开，阿曼苏丹真正独自控制着这个堡垒。仅仅一个月之后，1964年1月，苏丹就被打点行装送上快艇离开，一场反阿拉伯人的大屠杀在石头镇的街道上爆发：许多非洲人实际上相信英国人离开后，阿曼人会重新引入奴隶制，或者至少给予其不公平待遇。“桑给巴尔的非洲民族主义者所拥护的种族政治，”美国学者伯吉斯（G. Thomas Burgess）写道，“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世界主义并没有产生财富与和谐，而产生出了

文化沙文主义和种族不公的外来的、具有欺骗性的外表。”<sup>①</sup> 我遇到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和非洲地区专家认为，结果不亚于是一个“迷你的卢旺达”，以相同的比例夺走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命，作为非洲—设拉子暴徒，讲着革命、非洲大陆民族主义和统一的语言，继续着带有种族意味的狂怒。桑给巴尔历史学家谢里夫 (Abdul Sheriff)，桑给巴尔印度洋研究中心的领导，将这场暴力描述为“成比例的种族灭绝”<sup>②</sup>。伯吉斯注意到，这个岛上所有阿拉伯人有三分之一或被杀害，或强迫其流放。

桑给巴尔小说家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 记述道：

“我们喜欢将自己视为一个温文尔雅的民族。阿拉伯非洲印度科摩罗人：我们住在一起，吵吵闹闹，有时通婚……在现实中，我们一点也不接近‘我们’，在我们各自分开的院子里，锁在我们的历史居住区中，宽恕自己，因褊狭、种族歧视和怨恨而沸腾。”<sup>③</sup>

无政府主义，并不是革命后的新的稳定，而是其结果。攫取权力的非洲—设拉子人在其内部也有分歧：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与简单的疯狂杀戮者之间的竞争。朱利叶斯·尼雷尔 (Julius Nyerere)，坦噶尼喀 (Tanganyika) 的领导者，尽管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却很担心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人会利用这场

① G. Thomas Burgess, "Cosmopolita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in *Race, Revo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Zanzibar*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Abdul Sheriff, "Race and Class in the Politics of Zanzibar", *Afrika Spectrum*, Vol. 36, No. 3 (2001)

③ Abdulrazak Gurnah, *Admiring Silenc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6), pp. 66-67.

动乱，沿着其海岸线建立一个傀儡国家。伊萨（Ali Sultan Issa），那一时期的主要革命者之一，现在已是一位得了癌症的老人，公开向我承认他对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热爱，他曾经经常与这两人会面，他们的照片就摆在他的卧室里。然而，伊萨并不是非洲—设拉子血统，而是也门—阿曼血统，根据他给我看的照片，那一阶段的其他革命者也都是阿拉伯和印度血统。伊萨坚持认为，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而不是种族斗争。“那是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形态跨越了肤色的界限”，他坚持说道，嘴里叼着一支烟。“例如，奔巴岛的非洲人反对革命，而一些阿拉伯人支持革命。奔巴岛的印度人没有受到伤害。将革命定义为种族主义，那就没有抓住要领。尽管如此，一场革命并不是一次茶话会。”

不，当然不是。为了防止出现另一个古巴，以及稳定政治动乱，尼雷尔在1964年4月达成协议，将桑给巴尔带回与坦噶尼喀的联合，形成了坦桑尼亚。尼雷尔让警察和来自大陆的战士保护桑给巴尔的新总统卡鲁姆（Abeid Karume），不受卡鲁姆所在的联合中更为激进成员的袭击。尽管如此，一个强硬的社会主义的政体形成，没收了石头镇的阿曼任何其他少数民族的财产，使非洲人重新定居在那里。由于这些新居民很贫穷，负担不起维修房屋的费用，这成为石头镇荒废的背景。今日的石头镇，在卖给游客的小装饰品和手工艺品的商店突然大量出现之外，当你仔细地观察时，更像是些茅舍小屋。悲哀的是，这是桑给巴尔作为一个政体的真实代表，非洲人占压倒性的多数，还有少数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构成了集市上的居民，这些少数民族多种多样，但绝对数量很少（石头镇与岛上其他地方相比具有更为多元文化的人口构成，更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大本营）。

学者谢里夫全面而正确地看待 1964 年革命。他告诉我说，“那既与阶级有关，也与种族有关。但是种族的这一方面更为明显。的确，并不是所有的阿曼人都富裕，也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贫穷。然而即使是贫穷的阿拉伯人在苏丹政体下也感到舒服，而许多从来没有被奴役过的非洲人在新的革命政体下更感到舒服。”但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国有化和其他政策使许多阿拉伯人逃回阿曼，他又说道。

1972 年，卡鲁姆被他自己的强硬派刺杀，伊萨和其他人曾经代表着这场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方针，此时成为阶下囚并被刑讯，因为怀疑总是处于支配地位。革命政体继续坚持，得到了种族政治的支持，其经济政策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一直蹒跚前行。“我们通过弯刀掌权，我们不会通过投票来放弃，”据知这一体制的成员曾这样宣称。

穆罕默德（Nassor Mohammed），一位与反对党联系紧密的律师，告诉我说，与现在相比，在英国和阿曼统治的最后阶段，桑给巴尔更拥有一个真正的多党制。1992 年，出于来自西方捐赠者的压力，各反对党紧随东欧的民主革命之后建立。但是这个“革命政府”，仍然自称通过恐吓和发放政府工作及补贴的方式维持权力。每五年一次的选举只会使紧张状态更加恶化——已被承认为政党，却仍然与种族组织混在一起——也为部队暂时占领该岛提供了机会。在选举之前，在桑给巴尔的投资也会减少，随后当每个人都发出放松后的叹息，动乱又一次被避免了，投资又会回升。实际上，穆罕默德认为，保持桑给巴尔和平的就是这种世界主义，它一直努力着生存下去，尽管 1964 年后的经历很可怕。

“对于大陆来说，桑给巴尔使其为难”，一位外国外交官告诉我说。的确，由于坦桑尼亚大陆和邻近的莫桑比克取得了一



定的经济和政治进步，继续着部落间暴力的肯尼亚仍然脆弱，索马里则几乎不存在，尽管桑给巴尔拥有所有的世界主义特质，仍然陷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殖民往事中，基本上是一党统治，其政体也并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来吸引必要的外资来吸收大批失业的年轻男子，这是发展中世界稳定的真正关键，尤其是在非洲。桑给巴尔本身便是东非海滨依然是印度洋最后的前线的例证。这个前线与是否举行定期选举无关，而是在于建立强大的、客观的制度，不因种族、民族、部落或个人联系而有所区别。

“如果我们能够脱离大陆，我们的成长将只是时间问题，桑给巴尔的后代将从印度洋周围各处返回，因为我们真正的历史就写在雨季的季风中”，伊德里斯（Sheikh Salah Idriss Mohammed）告诉我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将他的公寓维修成一个博物馆，过去的阿曼苏丹的照片和阿曼皇室的世系图谱凌乱地直堆到天花板上。到处都是书籍、地图和手稿，泛黄发霉的纸页记述着 1964 年之前的岁月。劝我喝下有丁香和生姜味道的咖啡后，他悲叹道，“我们根本没有民主。在美国你们选了奥巴马，一个黑人，那才是民主！”

我尽力抱有希望。与六七十年代后殖民时代的早期相比，种族思想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似乎确实是在撤退。反对派越来越充满活力，当时的形势也对其有利，同时有利于通过贸易和旅游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系。我拒绝相信，海湾国家、印度、中国和印尼能够持续强劲增长，而东非和南部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却不能最终受其积极影响。阿拉伯人正在想着如何归来，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能够将桑给巴尔曾经失去的还给它，并且不会导致新一轮革命的压迫。

在任何情况下中，由于东非仍然是一个前线地带，其形势

很重要：东非最终成熟地并入大印度洋贸易体系将使这一体系，也必将包括东亚，成为 21 世纪世界上真正的勃动的核心。没有哪个存在，甚至连中国也不能征服东半球的海上边缘，但是一个贸易体系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贸易体系凭借其自身力量就可以成为一个存在，有能力与欧盟和美国竞争。带有旧时世界主义传统的桑给巴尔，与任何地方相比都是观察上述现象发生的好地方。

没有任何事物，也没有任何人为我总结出非洲和印度洋的概念能像古尔纳的小说那样多。1948 年他出生于桑给巴尔，现在在英格兰教授文学。古尔纳笔下的桑给巴尔是一只“漂浮在印度洋边缘的摇摇欲坠的筏子”，衰老而低调，国际化但又偏执狭隘。<sup>①</sup> 这个地方的人口包括非洲当地人、索马里人、阿曼人、俾路支人、古吉拉特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所有人都通过不同的个人、家庭和集体历史的经历来看待同样的街道和海岸线，尽管伊斯兰教是共性，就像每个人呼吸的空气。不管怎么说，商业和雨季的季风已把他们带到这里的海滨。“这正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要做的事情，”古尔纳笔下的一个人物这样宣称，“做贸易。”进入内陆寻找货物，带回海岸，游历最荒芜的沙漠或者最难以穿越的森林，为了与“国王或野人”做生意，“对我们来说都一样。”<sup>②</sup> 贸易传送和平与繁荣。贸易是民族和国家之间出色的平衡器；对防止战争而言可能比任何其他活动都更有效。

然而在小说家挽歌般的视野中，桑给巴尔那来自世界各地

---

① Abdulrazak Gurnah, *Admiring Silenc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6), p. 151

② Abdulrazak Gurnah, *Paradis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 p. 119.

的人口形成了一个分离与抛弃、还有最严重的个体伤害的世界。贸易使机会和行动成为必要，因此也永远影响着家庭联系。正如一个人物所说的，“这样的痛苦永不终结……意味如此丰富的事物永不会结束。”<sup>①</sup> 另一个人物，一个年轻的男孩从父母身边被带走，为了偿还他父亲的债务，到一个商人那里谋生，在多年之后“想知道是否他的父母还想着他，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但他知道自己宁愿永远不知道结果”。同时，这个男孩“在他的生活中不能保持对他父母的鲜活的记忆，这种内疚感使他麻木”。<sup>②</sup>

在主人公离开他们所爱的人的单程的旅途中，他们所遇到的新的风景和经历所带来的震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主人公这种深切的个人伤害。这个忧伤而美丽的世界，永久的别离与扬帆远行——卡默斯和古尔纳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捕捉到了这一点——殖民主义的经历使这一切更具有悲剧色彩。古尔纳笔下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是一位年轻的东非学生，他被送到英格兰学习，在那里过着边缘化的生活，最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因此在哪里也没有家的感觉。在提到他在英格兰遇到的人时，这个人物评论说，“蓝色的眼睛可以是那样的冷漠而充满轻蔑”。<sup>③</sup> 的确，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努力维持公平和自由的最高传统，殖民者及其属民之间的这种关系却导致了残忍的误解以及原住民感受到的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甚至被奴役的状态。

但是古尔纳对于自己的祖国在后殖民时代的失败甚至更加毫不留情，这只能使他笔下的人物遭受更惨痛的耻辱。独立后不

---

① Gurnah, *Admiring Silence*, p. 131

② Gurnah, *Paradise*, p. 174.

③ Abdulrazak Gurnah, *Desertion* (New York: Anchor, 2005), p. 212.

久，野蛮就以1964年革命的形式降临。在“谋杀、驱逐、拘留、强奸，凡是你能说出的应有尽有的罪行”之前“几乎没有时间来习惯（新的）旗帜”。各帮派成群结伙地在街上游荡。当地还有一位独裁者，对他来说“不卑鄙就太小气了”，即使他自己最后也被扛着机关枪的“卑鄙的杂种”杀死，这显然指的是卡鲁姆。<sup>①</sup>随后还有一些自治的琐碎的“剥削与悲惨”：堵塞的厕所，一天只有几小时供水供电。英国人保持着的有历史意义的房屋“变成了陋屋”。丑陋的现象一连串。

正如古尔纳所写的，“我们不知道如何能为我们自己造出点东西来，任何我们使用或想要的东西，甚至是一块肥皂或者一包刀片。”<sup>②</sup>

在英国人离开之后，这个想象中的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汇聚在一起相互通婚形成的印度洋文明，并没有锻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是弥漫着“沸腾的”褊狭和“种族主义”，所有这一切都被独立后的政治推上了台面。殖民主义租来了传统岛屿文化的结构，使其在独立后饱受自己强加的以及他人强加的屈辱。这就像一个复杂的生物体，却没有发展出任何具有防护功能的部分。散散步，“不特意去任何地方”，在小说家看来，这就是一幅“后殖民时代的景象”。<sup>③</sup>

但是，在某一时刻，必须要给走路的人一个方向，因为后殖民时期本身必须进入一个新时代；实际上，我已经在旅行中经历了这个时代。看着我周围这些形形色色的面孔和肤色，我知道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家庭关于分别和告辞、关于斗争和放弃的独特的

---

① Gurnah, *Admiring Silence*, pp. 69, 144, 121, 150

② Gurnah, *Desertion*, p. 256.

③ Gurnah, *Admiring Silence*, pp. 67, 134.

经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贸易。”

古尔纳有很多要教给我们。“想象是一种真理”，他写道，因为去想象就是要能够让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立场上。想象得越多，就越了解自己知道的有多么少，因为“对任何事物过于肯定就是偏执的开始”。<sup>①</sup>

我从石头镇行进了一个半小时，到达了桑给巴尔的东南端，海滨小镇马坤都池（Makunduchi）。当时是七月末，设拉子人的马卡·柯格瓦节（Mwaka Kogwa）即将到来，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新年庆典，很早以前就融入非洲斯瓦希里居民的文化。传统认为，通过格斗仪式的洗礼，当地人将会洗净他们所有的怨恨和其他，在一年中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不好的情感。

在红土地的开阔地带，斗士们排成几条长队从不同的方向慢跑进来，高声地唱着战歌。这些非洲人穿着各种古怪的廉价衣服，包括人造革外套、旧的摩托车用和建筑用的头盔，还有破烂的羊毛滑雪帽。其中一些男子甚至穿成女子的样子，将小椰子绑在胸前，象征乳房。

每个男人都拿着香蕉茎，当作武器。小男孩紧跟在他们身后。气氛中充满威胁，好像真正的暴力将会发生。随后，肉搏战爆发了。很快就是一大堆混战，到处都在战斗，旁观的人群逃向一边，避免被打斗者踩踏。尘土飞扬。在一小时筋疲力尽的打斗后，村里的女人们穿着康加布制成的服装，从四面八方唱着歌走进来。打斗逐渐结束，生起火来，非洲人进行的波斯节日庆典画上了句号。

晚些时候，人们聚在海边野餐。单桅三角帆船离开浅滩，就像用墨笔快速地写出风的味道。小浪花被击碎，仿佛整个宇

---

<sup>①</sup> Gumah, *Desertion*, pp. 110, 225.



宙都在回响。在几英里之外的珊瑚礁的那一边，就是辽阔的印度洋，一直延伸到印尼。我想到了阿曼和印度，以及在这两地之间其他那些我去过的地方。尤其是，设拉子节日给我的深刻印象，让我想到了一位年长的波斯商人，数月之前我在加尔各答遇见了他。

对他的朋友来说，他的名字是哈比布·卡里尔（Habib Khalili）。对于加尔各答的印度人来说，他的名字是哈比布·卡里尔·阿尔-设拉子（Habib Khalili al-Shirazi）——也就是，来自波斯设拉子的哈比布·卡里尔。在波斯，他的名字是哈比布·卡里尔·阿尔-设拉子·阿尔-印地（Habib Khalili al-Shirazi al-Hindi）——意思是，来自设拉子的哈比布·卡里尔，最近来自印度。哈比布·卡里尔是位茶商，号称在新加坡有四十位亲戚，在马来西亚和阿布扎比则更多。“我真正的家乡是印度洋”，他告诉我说，他的手指在夜晚喧闹的空气中快速滑动，仿佛数着念珠。

我们在加尔各答的一所房子见面，1928年他就出生在这里。这里满是盆栽植物、成堆的旧报纸，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圆柱之间传来了车来车往的呜咽声，法式的窗户敞开着，送进雨季的微风。到我们谈话结束时，天已经很黑了，我已看不清他的面孔。他已经简化为只是一个兴奋的声音，像他的手指一样起伏伏，充满了伊朗文化和语言的强大磁力，这种血脉延伸到孟加拉，直到与东南亚的边界处，在西南方延伸到莫桑比克北部的索法拉。

“德干高原上的波斯坟墓比树木还要多”，他说道，指的是印度南部的高原地区。“50%的孟加拉语过去是来自波斯语的外来语。随着1947年穆斯林的东孟加拉的分离，现在是30%。”他继续说，“伊朗这个国家从未被征服过，但是也从未自由过。”

他的谈话就是这样，没有过渡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我不能让他固定在一个话题上。

我没有费心去核对他的数字：波斯一直在印度次大陆具有重要的影响。直到1835年，波斯语仍是印度的官方通用语，最终英语取代了其地位，直到现代早期，孟加拉人人都懂波斯语。甘歌帕德亚（Sunil Gangopadhyay）关于19世纪加尔各答的小说《那些日子》（*Those Days*）中暗示了波斯语如何是一种第二语言。<sup>①</sup> 17世纪，达卡的许多艺术家、诗人、将军和行政人员都是从伊朗移居来的什叶派。<sup>②</sup> 从16世纪直到18世纪的莫卧儿人的统治带有强烈的波斯印记。次大陆体现出的伊朗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美索不达米亚。而伊朗，正如那位商人所提到的，尽管从未被殖民过，其事务却不断被欧洲列强干涉。伊朗不能够正式地表达被压迫的感觉，发展出一种受压迫的情绪，现在这种情绪变得更糟。

“我的家族最终可追根溯源到希伯伦，在圣地，阿拉伯语的名字是哈利勒，‘上帝亲爱的朋友’，我的曾曾祖父是卖克什米尔披肩的商人。三百年前他从克什米尔艰苦地跋涉到设拉子，哈菲兹的城市，ahh，”这位商人说道，他指的是14世纪的一位诗人，他是一位苏非派的神秘主义者，他的感性的诗歌讲述异教之火，这样的讲述意味着中世纪末期欧洲骑士歌谣中的红酒。“我的曾曾祖父的妻子的家族来自马德拉斯。她的兄弟靠做生意发了财，需要为他的女儿找个夫婿。因此，我的曾祖父从设拉子跋涉到马德拉斯去和他的表亲结婚。他也发了财。”波斯人到印度去

---

① Sunil Gangopadhyay, *Those Days*, trans. Aruna Chakravarti (New York: Penguin, 1981, 1997), p. 7.

②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 - 17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60, 167 - 168.

的原因和欧洲人到美洲的原因相同，都是去寻找机遇。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人为了靛蓝和鸦片贸易，最终从马德拉斯到了加尔各答。在鸦片之后，我们最终成了茶叶经纪人。

“我的父亲是一位茶叶出口商。茶叶被装入木箱，并用牛皮缝起来。茶叶箱穿越印度，从孟加拉到拉贾斯坦，然后又由骆驼运入俾路支斯坦，再到伊朗的扎黑丹（Zahedan）。向北到达马什哈德和阿什哈巴德（Ashgabat，现在在土库曼斯坦），我们在那里有仓库。恺伽王朝时期，我们失去了阿什哈巴德，被俄国人占去了。在干热的气候下，牛皮收缩，将箱子裹得更紧，而这提升了茶叶的质量和价格。”

他开始谈论用他们在苏丹喝的尼罗河水做的樱桃红茶，还有大吉岭茶，在他看来其品质比斯里兰卡的一些茶还要高。

“我想要整个印度次大陆统一。看看我们和孟加拉国：同样的字母、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语音、同样的食物”，他坚持这样认为，尽管他也承认印度自身并不纯粹。他又一次打断自己，开始谈到与纱丽不同的长衫长裤（shalwar kameez），认为它们并不是源于印度，而是源于波斯。“我们都是吉卜赛人，”他说，“你要在哪里划上边界呢？”他看上去像是精神病人，那些不连贯的想法和记忆围绕着一个单一的主题回旋，他始终不离开这一主题。

“你去过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寺吗？”他问道。

“去过。”我说。

“那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异教之火的寺庙，一座希腊风格的美丽建筑，一座犹太教会堂、一座教堂、一座清真寺。如果仅用一个名字称呼它，而把其他的分割开来，就错过了最重要的东

西。”

这个包括非洲和欧亚大陆南部边缘的世界稠密又充满流动性，相互连接紧密，正如波斯商人所指出的，很难在地理和文化上分解开来，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雨季的季风。表达大印度洋文明的声音众多，然而也保持着整体的元素。学者纳斯尔（Vali Nasr）在他2009年的书《财富的力量：新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崛起及其对我们的世界意味着什么》（*Forces of Fortune: The Rise of the New Muslim Middle Class and What It Will Mean for Our World*）中又为此增加了一个成分。纳斯尔的论点认为，实际上，我们过于肤浅单一地关注基地组织和激进主义，已经错过了这个时代真正的发展：在大中东和更远处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应该说，这一点是伴随着太多地方的极度贫困、环境恶化、政府反应迟钝这些不安定因素而发生的。因此，印度洋地区的大多数人面临的挑战最多只是间接地与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中国的军事崛起有关。恰恰因为这个新的中产阶级的许多挑战——还有希望和梦想——是个人的、物质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对更好的政府的呼唤，还有，是的，对民主的呼唤。在这种视野下，伊朗的政体将成为过去，甚至在阿曼也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阿曼的一人统治，尽管一直给人印象深刻也相对自由，然而最终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印尼的温和民主可以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目标。

再没有比以卡塔尔为基地的阿拉伯电视频道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更能清楚地作为这种中产阶级现象的例子了。半岛电视台的英文版对整个印度洋地区和更大范围内的前第三世界那些软弱和被压迫的人的痛苦进行了生动的、开创性的报道，堪称盛宴。在我整个旅程中的许许多多多个夜晚里，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已经成为我从阿曼到桑给巴尔所做的许多访谈的替代品，其中，与波斯商人的访谈是最典型的。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并不是一个大国的指挥

部，尽管在地理上，多哈位于印度洋世界的中心。这个事实造就了半岛电视台，使其能够对地球的四个角落保持同等程度的关注，而不仅仅集中在任何帝国主义或后帝国主义利益的焦点上。美国一些人认为半岛电视台有偏见，但这仅仅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偏见。半岛电视台的记者为公正而大声疾呼，他们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兴起的、还在发展中的中产阶级观点的真诚而公正的代表。也就是说，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尽管其成员没有安全感，并以另一种视角看到他们周围尽是不公。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与衰落，葡萄牙人之前的穆斯林—印度教徒的早期国际贸易都市，现在正在中国投资的支持下重建。在这个新的印度洋世界，人们寄望于斯里兰卡将得到新的稳定，搁置民族差异，政府将被迫逐渐适应和平的力量；同时，在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中国之间将会开通新的贸易路线，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联系将充满活力与张力。

的确，对美国最终的挑战，更多地并不在于中国的崛起，而在于与崛起的非洲和亚洲如何在一般意义上进行全球文明的交流。至于中国，我已经提到了其正通过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在军事上崛起。中国在将其海上影响扩展到印度洋的过程中会遇到自己的挑战。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并不一定是美国的对手。但是除非美国与大印度洋版图代表的几十亿人和平共处（其中许多是穆斯林），不然美国力量在这一地区将不会被看作完全合法的。还要记住，合法性是权力的一个首要特征。在前面的章节中，我说到了强大的、向前发展的美中双边关系不仅是可信的，而且可能是21世纪全球体系中最好的一种情境，真正的世界治理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但只有在考虑民族—国家的双边世界的情况下才真的能够实现。前第三世界锻造出了一种新的联合，这种联合被半岛电视台这样一种支持潜在的文化综合体的大众媒体所驱



动，非洲—亚洲的群众将越来越处于一种关键的地位，他们将根据每个具体的危机中的表现来给予美国、中国和其他强大的国家声望或谴责。他们，除了作为参加者之外，还是 21 世纪权力政治的最重要的观众。

大国政治还将如以往一样继续，美国海军和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为了争夺有利位置而各施手段，展开安静的竞争，而印度和中国则就航线和影响力而展开竞争。但是这些活动都将越来越受到全球文明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新中产阶级的产物，这个阶级内部及其本身已构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道德力量。

上亿的穆斯林及其他人，悄然地跻身中产阶级，正在寻求过上和平、多产的生活，尽管他们将合法性授予强国或大国——这些国家的行为帮助他们“开展贸易”，我的波斯朋友和小说家古尔纳都认为，地球上的人类最终所作的正是“贸易”。贸易是郑和曾经所为，当中国海军庆祝其在印度洋的壮举时，美国也能够从这位明朝的探险家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不仅将军事活动看作是硬实力的展示，而且将其视为软实力的表达：有助于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保护全球公域和贸易体系。美国只有抓住每一个机会，努力应对大印度洋世界的那些国家，其权力地位才能够最终得到保持。

# 后记

## 后帝国主义秩序与印度洋

恐怖主义、军事冲突、追求核武器的流氓政体，到处都是濒临崩溃的国家；中东僵化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中国这个一党统治的国家对动乱的迹象感到紧张；美国的机密文件被大批泄露；人们能够觉察到——注意，只是勉强地——隐藏在这种动荡下不堪重负的结构在吱嘎作响。在整个历史上越来越虚弱的事物为当前的世界事务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形式，尽管这一事物一直被人们所痛恨：我谈论的这个事物就是帝国。

还记得吗？在冷战中，发展中世界被分成了两个帝国体系，苏联的体系与美国的体系。苏联的帝国是基辅罗斯（Kievan Rus）、中世纪的俄国以及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的继承者，覆盖了东欧、高加索、中亚这些邻近的土地，扶持着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政体。美国的自由帝国，在精神上是对海上威尼斯和大不列颠的继承，也扶持着其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特别是在西欧和东亚。美国忠实于罗马帝国的驻军传统，在西德、土耳其、韩国和日本——这些地区实际上是在苏联的周边——维持着重要的基地。

我并不是要把冷战浪漫化，冷战给越南、埃塞俄比亚和阿富

汗这样的地方带来了重创。苏联帝国的解体尽管使西方欢欣鼓舞、使中亚获得自由，然而也导致了在巴尔干和高加索的民族冲突，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使上百万人成为难民。在中亚，仅在塔吉克斯坦，就有5万人死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内战，美国媒体对此几乎没有报道。然后就是俄罗斯自身经济和社会动乱的集中爆发，还有中东的进一步失控。在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入侵阿富汗，这并非偶然。如果巴格达坚定的保护人苏联在2003年仍然存在的话，美国入侵伊拉克将不可想像。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或者没有可耻地从阿富汗撤军，奥萨马·本·拉登绝不会在20世纪90年代到那里避难，“9·11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了。这些事情就是帝国崩溃的代价。

现在，冷战时期相对和平的另一支柱美国正在松动，而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都没有做好准备来填补空白。美国不会崩溃，因为美国与苏联不同，是由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来坚定地维持着的。而且，美国的帝国存在是一种结构上的意义，而不是精神上的意义。也就是说，美国的联盟和盟友的网络当然代表着过去的帝国网络，美国军队在海外面临的挑战也可与昔日帝国的警察部队所面临的挑战相比，以陆地为中心的冒险行动自古以来一直是帝国的行为，然而美国，特别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崩溃之后，对此却没有心情为之。

美国为这个星球带来一点点秩序的能力正在缓慢地逐渐衰退。美国几十年来所指望的阿拉伯世界的军政权已然破碎，这些地方的稳定的西式民主也将逐渐发展起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日子可能屈指可数，正如电子通讯时代所特有的安全漏洞使美国的外交蹒跚前行，包括其自身民众在内对帝国统治充满敌意。当然还有硬实力本身。军队赢得战争是硬实力的体现，但是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冲突上演的剧场是全球，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距离的缩短，海军和空军成为对国家力量更为准确的衡量指标。正如我在本书中写到的，自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海军的战舰数量急剧衰减，而中国和印度的海军飞速成长。这样的趋势可能还会加速，因为战舰和战斗机是昂贵的资本项目，而美国的国防预算肯定会在财政危机中进行缩减。美国仍然在海洋和空中占有支配地位，而且在未来的几年中仍将这样，但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缓慢地缩小。

我们的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大印度洋的地图最为清晰地展现了这幅图景，即从红海到南中国海的前第三世界的崛起，冷战时期的地区研究强加的分野不再成为这个世界的负担。这并不是说，大西洋、地中海和太平洋的其他部分不重要、不会产生举世关注的问题。这只是意味着，这个包括阿拉伯半岛和中国，还有位于两者之间的印度次大陆的地区将胜过其他地区，成为冲突和贸易的中心。在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时期，所有商品的90%都通过海运从一个大洲到达另一个大洲，正是印度洋将能源丰富的中东和东亚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生活联系在一起。

恐怖主义行为，对暴力武器的向往、民族暴行和对民主的暴力镇压，都是那些终将不能逃离自身道德责任的个人所为。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事件都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个过去曾是最卓越的陆地强国的帝国已逝；另一个大国，世界上最卓越的海上强国，却发现自己影响事件的能力不及以往。

我们身处其中的后帝国秩序所允许的对结构的破坏要远大于冷战时期，印度洋作为前第三世界的主要海洋将继续记录这种动荡。发展中世界的崛起，才是我们时代的关键的潮流，这是一种进步的形式，部分地瞄准了地缘政治的博弈场，以一种关键的方式更进一步侵蚀帝国结构。

同样，在后伊拉克和后阿富汗的世界里，美国必须寻求节约使用其资源、降低其衰落的速度，这意味着要避免卷入导致自身衰弱的陆上的复杂情况，相反，更多地集中于作为离岸的平衡者：即，应将空军和海军力量潜伏起来，只有发生的暴行毫无疑问地在重要的地点威胁到美国或其盟国，并因此在总体上威胁到世界秩序，才进行干预。这一行为过程可能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但这样一种冷漠的意图一旦发出信号，可能就会鼓励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地区恶霸，而这样的流氓政体（以及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愚昧政体）正处于这个世界的关键地区。

朝鲜在核武器项目上兀自前行，已经将炮弹投掷到韩国的岛屿上。这暴露了中国和美国实力的局限性。金正日的行为促使美国战舰进入距离中国很近的黄海。这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而金正日的挑衅行为是对美国的挑战，但美国从根本上几乎对此无可作为。冷战期间，朝鲜被苏联限制，同时，美国海军主导着太平洋，仿佛这一区域是美国内湖。现在，中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主导，加上美国被中东的陆地战争所牵制，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将西太平洋从良好稳定的一极环境变成一个不稳定的多极环境。

如果以中国海军比美国海军落后几十年为借口，那就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刚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经历过陆上不对称战争，应该能预料到海上不对称威胁时代的来临。中国的水雷战能力得到改善，拥有海底声纳网络，还有能力运用反舰弹道导弹开展电子战，更不用说其柴油-电力和核潜艇，多年以后将使美国海军的行动更加充满风险。至于台湾地区，中国有 1500 艘短程弹道导弹瞄准着这个小岛，与此同时，每周都有上百次民航航班通过和平的商业活动将台湾与大陆连接在一起。如果中国有效地将台湾地区容纳其中，那将意味着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真正的多极军事环境的到来。至于朝鲜的未



来，要牢记 20 世纪那些分裂的国家——越南、德国和也门——全都是以一种迅速、混乱且不可预知的方式实现了统一，并没有过多考虑所有外部相关方的权益。换句话说，不能认为东亚的现状是理所当然的；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现状也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那里，巴基斯坦和缅甸这样的半失败国家可能通过内部的不稳定而影响这个地区。

在中东，我们看到了冷战帝国主义秩序的真正崩溃。齐整的阿拉伯-以色列的对立曾映照出美国和苏联的对立，现在已被代替，替代者是稳定性稍逊却有可能实现核武器化的地区力量安排，伊朗影响的非传统地带从黎巴嫩延伸到阿富汗西部，与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竞争，一个新生的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不再亲西方，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崛起为一支地区平衡力量。在突尼斯和埃及这样的国家中低效的、亲美国的国家政体被推翻，是美国影响力弱化的又一迹象。年轻的中东民族国家的世界可以将伊斯兰的民主国家土耳其和印尼，而不是美国，作为范例。（在本书中，我特别提到了中东和整个印度洋地区更自由的社会即将到来——正如我在 2010 年写到的，这是年轻人口和通讯技术的产物。但是我仍然愿意迁就阿拉伯的独裁政权，即使是阿曼也经历过要求民主的社会示威，我对阿曼苏丹慷慨地给予了其应得的赞扬。）

帝国，正如我所理解的，施加秩序；当然那种秩序并不一定是仁慈的，看看信奉宗教的伊朗那逐渐扩展的帝国领域。美国对伊朗的威胁缺乏可信度恰恰是因为自身帝国主义的乏力，这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牵绊的结果。出于自身利益，美国将有可能不卷入中东的下一场单边战争。美国的这种局限性将会使这一地区陷入不稳定的核对峙状态，从而使中东问题与南亚问题联系在一起。即，一旦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做出回应，如果巴基斯坦将核武器停放在沙特阿拉伯怎么办？印度对此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像东亚一样，

这些地区未来将会更加混乱。的确，尽管阿拉伯世界仍然发生动荡，然而直到伊朗出现民主政体而且/或者沙特阿拉伯发生政体转型，中东真正划时代的时刻可能才会到来。就这一意义而言，印度洋周边国家如也门和阿曼至关重要，因为这两国紧邻沙特阿拉伯。

有一种说法是，随着美国的衰弱，中国将作为后美国世界的良性的力量来填补地区安全真空。这是我在本书中深入挖掘的一个主题。但是，这假定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相同的。然而历史表明，这些国家显然是不同的；他们也并没有按照顺序依次弥补前一个的不足。苏联和美国都是被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和自由民主的理想）驱动的传教式的国家，他们可以通过这些理想来治理世界，然而中国还没有这样宏大的概念。中国在海外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碳氢燃料、矿物和金属——的渴求而驱动，中国需要这些资源来使十亿的中国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的确，这对于印度洋、非洲和中亚地区生机勃勃的贸易体系的发展有支持作用，这些地区可能在美国干预最少的情况下维持自身的和平。但是谁来填补道德真空呢？只要中国能得到伊朗的天然气，即使伊朗发展核武器，中国真的在乎吗？如果的黎波里的利比亚政体做好准备屠杀班加西的平民，中国会在乎吗？朝鲜政权使其人民处于定格的半饥饿状态，中国对其可能并不感到完全满意，但仍然给予支持。也许有人会说，道德责任可能随权力而来，但是在寻求以强制力维持现状的国际安全体系中，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伙伴、具备与这一地位相匹配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很可能要到几十年之后了。目前，美国海军提供对世界海运的保护，中国搭便车，旁观美国努力维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稳定，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获取其自然资源。

尽管中国当前的政治秩序是稳定的，但中东的民主运动表明，在一个技术上相互连接的世界，中国可能会在未来遭遇挑

战。而且，中国的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三十年，未来可能会经历一些非常困难的时期，而这也许会加大动荡的机会。如果中国出现不稳定，其成为地区霸权的尝试会被削弱吗？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巩固这种尝试？要记住，一个民主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更强的中国，一个更加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国，因此其军队也会得到更多的资金。

的确，冷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这是由帝国之间心照不宣的理解而保障的，而我们现在将开始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时代，一个帝国的衰落伴随着诸强的崛起，这其中，既有良性的，也有非良性的。

笼罩在所有这些之上的是一张人口稠密的地图。穿过欧亚大陆，从开罗到雅加达，我们要应对的不再是农村人口，而是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易受大众媒体煽动，也易受因环境灾难而造成的破坏的影响。我们要应对的不再是行动迟缓、艰难部署的军队，而是显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射能力的交互的弹道导弹的射程。由于技术的缘故，每一事物都以比以往更快更致命的速率影响其他事物。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武器的小规模化不利于帝国主义秩序的兴起和维持。

美国人缺少一种帝国主义的思维模式。他们一旦减少与世界的接触，将会对人道主义产生毁灭性的后果，这不只局限于人道主义援助领域，还包括对中国和其他崛起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间的权力平衡的维护。同时，中东还需要美国的支持来保障其民主过渡。如果美国从其国际责任中退缩，我们今天所见证的破坏不过只是即将到来的破坏的冰山一角，这种责任至少是由历史界定的——在设计之初就是令人不快的帝国主义的责任。

2011年4月

## 致 谢

这一项目中最不可预见的快乐可能就是我对各种学术著作的介绍，这些著作形成了我在新闻调查过程中的灵感。这些著作的卓越和详尽是我难以企及的。让我来列出其中一些；其余都散落在全书的各种各样的脚注中：Janet I. AbuLughod 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 ~ 1350 的世界体系》（*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 - 1350*）（1989）；C. R. Boxer 的《葡萄牙人的海上帝国 1415 ~ 1825》（*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 - 1825*）（1969）；Richard M. Eaton 的《伊斯兰教的崛起和孟加拉前线，1204 ~ 1760》（*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 - 1760*）（1993）；K. M. Panikkar 的《亚洲与西方统治》（*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1959）；John F. Richard 的《莫卧儿帝国》（*The Mughal Empire*）（1995），以及 Andre Wink 的《信德：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形成》（*Al - 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第一卷（1990）。

我的助手 Elizabeth Lockyer，无人能敌，她为这本书整理了地图。兰登书屋的编辑 Kate Medina 和 Millicent Bennett 在使我的这项研究得以成行以及手稿的形成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还要感谢 Frankie Jones 和 Lindsey Schwoeri。《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以截取的形式发表了本书中的若干章节, 就此我要感谢 James Bennet, Justine Isola, Scott Stossel, 特别是 James Gibney 所进行的编辑和事实核对的工作。我还在《外交》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洋的论文, 我也感谢该刊的编辑 James F. Hoge Jr., Gideon Rose 和 Stephanie Giry, 感谢他们专家级的帮助和他们赋予拙文的显著位置。我要再一次感谢我的代理人 Carl D. Brandt 和 Marianne Merola, 感谢他们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我的职业生涯和利益而操劳。

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在我就本书展开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在机构层面上为我提供了一个家园。新美国安全中心以众多形式向我提供帮助和鼓励, 对此我感激不尽。要点出一些人的名字来表示感谢似乎会忽略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其他许多人对我的协助。尽管如此, 还是让我指出他们的姓名来表达谢意: Kurt Campbell, Michele Flournoy 和 James N. Miller Jr., 过去的管理层, 现在都是奥巴马政府的成员, 还有新的管理层 Nathaniel Fick 和 John Nagl, 以及 Seth Myers 的研究协助。史密斯·理查德森 (Smith Richardson) 基金会为我的这项研究提供了财政资助, 我要特别感谢 Nadia Schadlow 在整个批准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我还要感谢阿斯平战略集团 (Aspen Strategy Group) 允许我参加美国—印度战略对话。

在加尔各答, Gautam Chakraparti 为我安排了一次沿着胡格利河的难忘的旅行。在伊斯兰堡和雅加达, Kathy Gannon, Henk and Emmelne Mulder 以他们的热情和友善, 在他们各自美好的家中为我提供食宿。在桑给巴尔, Emerson Skeens 租给我一间迷人的小别墅, 还提供了许多其他的帮助。陆军中校 Larry Smith 在斯里兰卡将我从狱中带出。我在美国海军学院的同事 Brannon Wheeler 和宗教捐助部的 Abdulrahman Al-Salimi 共同努力为我安



排了一系列在阿曼进行的演讲，使我得以访问这个国家。

Jeffrey Anderson, Michael H. Anderson, Robert Arbuckle, Claude Berube, Gary Thomas Burgess, Robin Bush, Jon Cebra, Kingshuk Chatterjee, Eugene Galbraith, Kiki Skagen Harris, Timothy Heinemann, Fauzan Ijazah, Dilshika Jayamaha, Tissa Jayatilaka, Shahzad Shah Jillani, Douglas Kelly, Joanna Lokhande, Edward Luce, Mohan Malik, Harsh Mander, Scott Merrillees, C. Raja Mohan, Kiran Pasricha, Ralph Peters, Indi Samarajiva, Nick Schmidle, Stuart Schwartz 教授, Mubashar Shah, Arun Shourie, SinhaRaja Tammita-Delgoda, Shashi Tharoor 和 Paul Wolfowitz 也对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我还要再次感谢与我共度二十七年的爱妻 Maria Cabral，如果没有她，其中大部分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 译者的话

翻译并出版一套“海洋战略译丛”，系统介绍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海上力量崛起以及国际秩序变革的作品，是我们在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国际关系重点学科建设任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识和愿望。

从21世纪初开始，海洋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权重日益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以及其他涉海纠纷不断升温。如何处理海上摩擦，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挑战，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课题。在国内相关研究展开的同时，出于对中国如何使用力量的困惑，国外学界对于中国海洋战略、中国海军发展、中美海上力量与战略博弈的关注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大量相关著作迅速面世。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选择地翻译有关海洋战略的国外著作有助于国内学界掌握相关议题的研究前沿，有助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了解国际社会对海洋问题的认知。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为中国民众提供系统化的知识，增强其对海洋安全战略的理解。

我们最早设想在三年之内完成整个译丛工作。但是，在翻译、出版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与阻力，幸得来自各方的支持和鼓励，在重点学科建设进入最后一年之际，第一本

译著《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终将付梓。我们必须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对重点学科建设工作的大力资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向阳院长的大力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丽副总编、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恽薇主任以及王婧怡、许秀江两位编辑为译著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尤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部张蕴岭主任在百忙之中为译丛作序。

我们期待着后续的译著能够尽早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

张洁

2013年6月20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 / (美) 卡普兰 (Kaplan, R. D.) 著；吴兆礼，毛悦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8

(海洋战略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4386 - 7

I ①季… II ①卡… ②吴… ③毛… III. ①南亚 - 研究  
IV. ①D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1282 号

· 海洋战略译丛 ·

季风

——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

著 者 / [美] 罗伯特·D. 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

译 者 / 吴兆礼 毛 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王婧怡 许秀江

责任校对 / 岳中宝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 阳

项目统筹 / 恽 薇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3.375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 307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386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1107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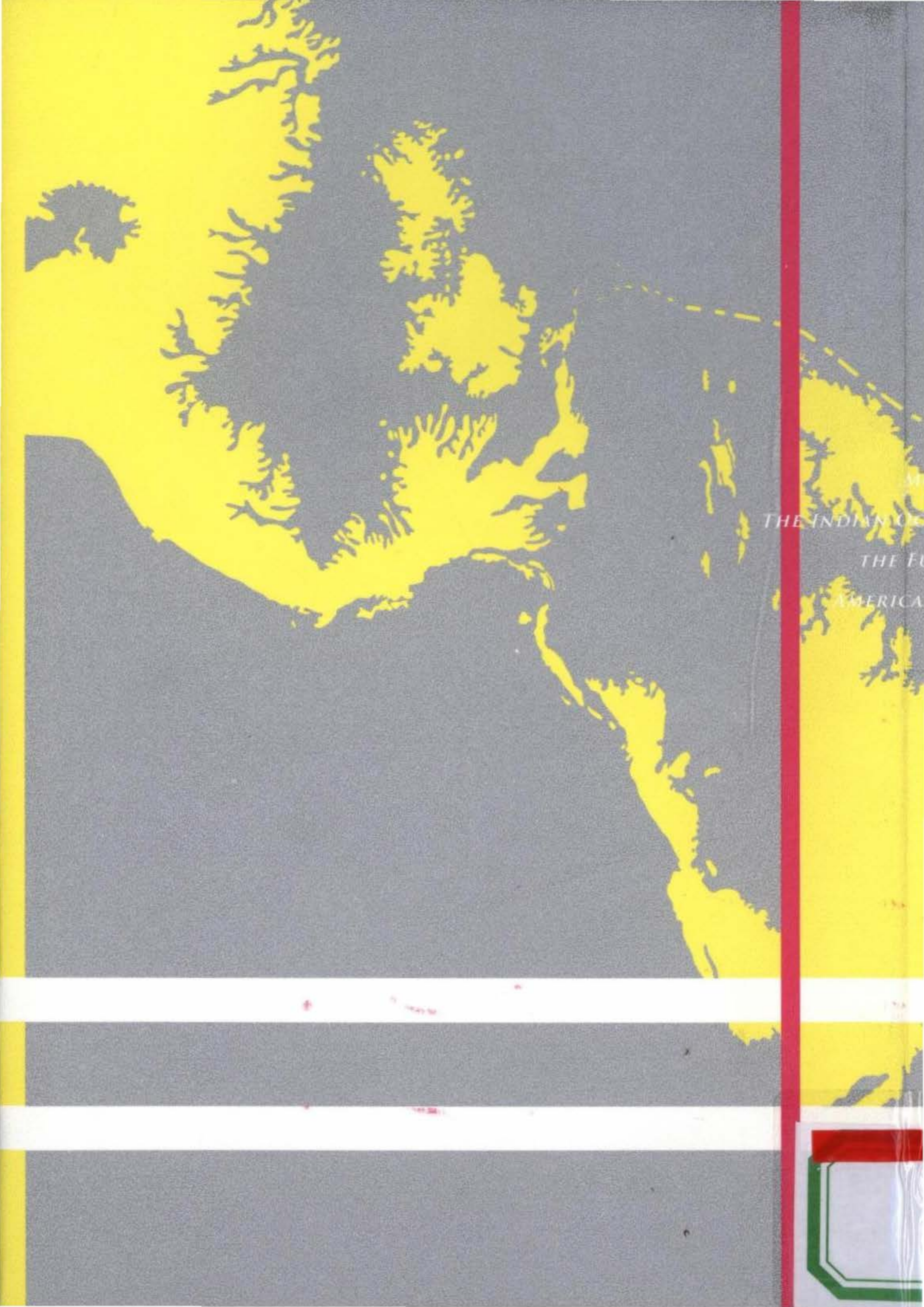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微博关注：<http://weibo.com/transferences>

<http://weibo.cn/transferences> 转载





THE INDIAN OF  
THE FUTURE  
AMERICA

